

著者爲本書中文版所寫的序言

這本“美國帝國主義”是一九五〇年後半年完成的。從那時候以來所發生的一切都證實着書中的主要論點。美帝國主義仍在繼續設法向外擴張，企圖控制世界上更多的地區。巨大的聯合企業更快地輸出了資本。美國政府加緊在世界各地建立它的軍事基地，以保護這些掠奪當地人民財富和剝削當地人民勞動的國外投資。美帝國主義仍然絲毫不肯放鬆最後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企圖。這個戰爭的進攻對象將是蘇聯和所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將是世界各國的人民。這個戰爭的目的是要統治全世界。華盛頓的軍人已更加明目張胆地採取了大規模毀滅人類的戰略。原子彈和氫彈的製造已大爲加緊。投擲這種炸彈竟已成爲美國戰術的主要部分。

在美國國內，推行法西斯主義的活動更爲猖獗，這種活動構成了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征服世界的計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位不可一世的麥卡錫已成爲美國法西斯主義的象徵，全世界人民對於麥卡錫的痛恨不亞於當年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痛恨。艾森豪威爾這位將軍總統和他那由百萬富翁所組成的內閣，標誌着美國經濟的軍事化和金融寡頭與軍事寡頭的密切結合。

“美國帝國主義”一書寫成以後，我們的認識又被斯大林所發現的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所豐富和深刻化了。這個法則就是：

“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①

沒有比現在美國壟斷資本的活動更清楚地反映這個法則的作用的了。“美國帝國主義”一書中所列舉的關於壟斷資本的利潤數字實際上就是這個法則的具體說明——國外貢獻每年達七十五億美元，在國外設立的公司取得了特別優厚的利潤（參閱第三章）；每年靠剝削美國國內黑人勞動所取得的額外利潤達四十億美元（參閱第四章）；公司利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朝鮮戰爭初期增加了六倍之多（參閱第十章）。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一書中所用的“超額利潤”一詞，已不足以形容那種靠加強國內剝削、國外的超額剝削、以及製造戰爭和經濟的軍事化相結合的方式所取得的巨額利潤。

在這本書裏面，我們還可以把美國最大的幾個托辣斯在一九五三年所獲得利潤的這些新數字補充進去：通用汽車公司的利潤率為百分之六十一，杜邦為百分之四十一，通用電氣器材公司為百分之五十四。這些數字都是一九五三年年初的投資所獲得的在繳稅以前的利潤率。這些利潤既不是什麼“平均”利潤，也不是“超額”利潤——而是根據攫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法則所取得的最高利潤。

根據官方的數字來看，自從一九四九年年底（本書第一章關於國外投資的附表所列數字是到一九四九年年底為止）以來，美國各大公司的國外投資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這些投資的利潤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①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四頁。

在一九四七年(本書第四章所談到的年份)至一九五二年期間,白人與黑人的工資差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除了加緊剝削黑人以外,這些大公司和大土地所有者還開闢了一個取得額外利潤的重要來源,那就是從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運來工人,付給極低的工資,讓他們在工廠和農場裏做工。

我們還應該注意書中所談到的其他一些問題,在這些問題方面現在都有了新的發展,需要加以說明。

在許多國家裏,英帝國主義的統治地位已被美帝國主義所取代(參閱第二章),在這些國家的行列中現在又添上了一個伊朗。

美帝國主義把魯爾軍閥和那些仍然極端反動的納粹分子所把持的西德扶植起來,打算讓它在自己的計劃中担任最重要的角色(參閱第七、八、十章),這一點是已經徹底暴露了。世界和平力量爲了反對這種勾當而進行的鬥爭已成爲世界外交和歐洲政治上的中心問題。

斯大林對於幫助我們了解現代資本主義所作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指出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必然要尖銳化,儘管表面上看起來美帝國主義似乎仍操縱一切;這也就說明列寧關於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不可避免性的法則繼續有效。“美國帝國主義”第十章裏曾談到歐洲資本家和美國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問題,但是不得不談得簡單一些,那是因爲它們之間的矛盾當時還沒有發展爲公開的衝突。從那時候以來,這些矛盾表現得越來越頻繁和明顯了。這種矛盾今天使得美帝國主義在企圖實現其戰爭計劃時遭到更多的困難。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日益衰弱使得這種矛盾更加尖銳化。朝鮮戰爭的暫時刺激作用已大部分消失,生產過剩的深重危機

的魔影又出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面前，這種危機將從根本上動搖世界資本主義的勢力。

被美國壟斷資本家所一手扶植起來的具有侵略性的德日壟斷資本家們正在世界市場上作劇烈的競爭，不僅使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資本家的利益受到損害，甚至使他們的美國後台老闆的利益也受到了損害。

歐洲各國的資本家，爲了要保證高額利潤以及由於勞動人民爭取和平與就業機會這一鬥爭的強大，越來越希望擴大他們和世界另外三分之一地區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貿易，以擺脫自己所處的困境。

根據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最近的統計，西歐各國一九五四年向蘇聯的輸出額將比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水平增加兩倍以上。資本主義國家和歐洲人民民主國家以及人民中國之間的貿易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種數額可觀的東西貿易無疑地會使歐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困難大爲減輕。日本的資本家們同樣也在設法通過擴大與中國和蘇聯的貿易來減輕本身的經濟困難。

美國的統治集團已不能再阻止這種貿易的發展，因爲它關係到其他國家資本家的切身利益。到目前爲止，美國統治集團只能使美國自己維持禁運，雖然國內各著名資本家集團和工會組織還正日益要求放鬆禁運。經濟危機的朕兆已在美國以最顯著的姿態出現，部分的原因是由於禁運。一九五三年三月至一九五四年三月之間，美國工業的就業人數就減少了一百四十萬人，而半失業工人的人數又有了增加。目前，美國鋼鐵工業的生產能力只能發揮百分之六十七。美國一九五四年頭兩個月的輸出較一九五三年同期減少了百分之九。

美國尖銳的經濟危機的發展——這個危機看樣子是要爆發的——將使美國國內的鬥爭大大地劇烈起來，這種國內鬥爭也就是勞動人民和那些企圖從新的世界戰爭中尋找出路的人們之間的鬥爭。實際上這場未來的鬥爭已開始了小小的接觸。一方面，杜勒斯及其同夥們更加張牙舞爪地威脅着要發動戰爭。另一方面，工會組織正在全國各地召開會議，準備提出關於以實行改革來解除失業威脅的要求。

在美國國內，杜魯門和艾奇遜，“美國帝國主義”書中所最常提到的這兩位大企業的政治領袖，現在已經讓位給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新舊人物的行動是差不多的。只不過這批為大企業服務的新政治人物比以前那些人更為卑鄙無恥，更為野心勃勃。他們更公開地犧牲公衆的利益而使政府專為他們有錢的靠山効勞。他們加強推行上屆政府反勞工的高壓措施。金融頭子撇開了政治中間人而親自出馬來直接掌管華盛頓的事務，這種情形比以前更多了。

雖然艾森豪威爾政府代表着各主要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但政府裏洛克菲勒、杜邦和梅隆各集團的經濟政治勢力大大抬頭，而摩根的勢力相對地削弱了。挑選艾森豪威爾當總統的就是前面那幾個集團。

洛克菲勒集團在政府裏的代表就是杜勒斯。杜勒斯和這個集團的關係最深，當了國務卿之後仍繼續擔任洛克菲勒基金委員會的主席。杜邦集團的代表是國防部長威爾遜，他以前是杜邦集團所掌握的美國最大工業企業的通用汽車公司的總經理。財政部長漢弗萊是克里夫蘭的金融家，和梅隆、洛克菲勒這兩個集團都有着密切的聯系。

這幾個集團之所以得勢主要是由於美帝國主義加緊軍事化

和對外擴張的緣故。杜邦集團是美國傳統的軍火托辣斯，而目前正在經營氫彈的主要製造工廠。洛克菲勒在國外業務的擴展比其他任何托辣斯來得大，單單該集團所屬的一個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一九五二年國外投資所獲利潤佔美國全部國外投資的利潤的百分之二十。梅隆集團則控制着鋁的生產，鋁是美國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軍火工業——飛機製造工業的主要原料。

特別可怕的是以洛克菲勒為首的石油聯合企業的勢力不斷增長。這個集團是美國國內幾十年來最富於侵略性、最積極反蘇的集團之一。最近幾年來，它又帶頭向中國挑釁。沒有完全脫離洛克菲勒石油托辣斯而獨立的得克薩斯州的石油巨頭之所以成爲臭名遠揚的法西斯分子麥卡錫在財政與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決不是偶然的。

然而，過去三年中最主要的潮流却是世界反帝國主義力量的日益增長。佔世界三分之一地區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力量不斷在增長，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在朝鮮戰爭的暫時刺激作用消失之後，不是發展得不平衡，就是不斷下降。蘇聯的鋼鐵產量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即已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現在已幾乎等於美國的一半了。蘇聯人民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隨着社會主義工業的巨大發展，正以空前的速度上昇着，而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失業和貧困的現象却越來越嚴重。

新中國在短短的幾年中已成爲亞洲的一個強大國家。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援助之下，北朝鮮人民所進行的艱苦的自衛戰已取得了勝利。印度支那人民也贏得了很大的勝利而離最後解放的日子已不遠了。在南非聯邦、怯尼亞、北羅得西亞、黃金海岸、突尼斯、摩洛哥以及其他非洲國家，人民反對殖民制度

的鬥爭已進行得轟轟烈烈。不管英法帝國主義如何殘酷鎮壓，鬥爭的力量却越來越強大。

在美帝國主義後方的拉丁美洲，危地馬拉的反帝政府在為華盛頓所製造的大陰謀所推翻以前，曾給予了聯合果品公司托辣斯以極沉重的打擊。玻利維亞和英屬圭亞那兩地反美英帝國主義的運動也有了巨大進展。隨着美國的帝國主義真面目的澈底暴露，兩半球許多國家裏的反帝戰綫都有了很大的擴展。

在西歐方面，人民羣衆為了恢復他們國家的主權和防止他們的國土完全淪為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和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展開了政治鬥爭。在過去的一年中，鬥爭形勢的發展已經是絕對有利於人民的了。共產黨的力量，尤其是意大利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長。工人們不斷地用實際行動粉碎美國壟斷資本家的代理人用他們主子給的錢來分裂工會的陰謀活動。西歐各國統治階級中有一部分人，在人民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撇開華盛頓的指令不管而極力設法保證自己的利潤，而不考慮他們一度的後台老闆能否獲得利潤。

在美國國內，跡象表明：工人階級採取了更為獨立的政治路綫，並展開了反對壟斷資本家的戰爭破壞政策的激烈鬥爭。統治集團的法西斯暴行引起了人民很大的反感，各階層人民中間公開要求恢復民主權利的人越來越多了。

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所有這些鬥爭都圍繞一個中心目標——爭取和平和打擊華盛頓那些企圖製造新的世界大戰陰謀家以及他們在各國的代理人。

由於世界和平力量的空前強大和不斷增長，世界和平陣綫所提出的“和平必將戰勝戰爭”這一口號的現實性正在得到證實。

誰能否認：由於世界各國人民對於和平的要求，加上朝中戰士的英勇抵抗，美帝國主義才不得不在朝鮮停戰，杜勒斯和五角大樓的將軍們才不得不停下火來，雖然他們對於自己所毀滅不了和征服不了的人民還在叫囂着仇恨恫嚇。

誰能否認：由於世界各國人民對於和平的強烈要求，加上蘇聯在科學、經濟和外交上的成就，英國和法國才不得不向艾森豪威爾表示如果國際緊張局勢不緩和的話，他們簡直無法生存下去了，因而使美帝國主義也不得不在柏林和法國、英國舉行會談。

誰能否認：歐洲各國以工人階級爲首的人民保衛和平的鬥爭在擊敗“歐洲防務集團”中起了極大作用；而且，不管會通過什麼形式的條約或者協定，他們將繼續堅持鬥爭以反對重新武裝新納粹德國的陰謀的實現。

誰會看不到：即使在世界帝國主義堡壘——美國，艾森豪威爾這位好戰的將軍爲了競選總統也不得不作有關和平的諾言；美國人民反對那種絕滅人性的屠殺，也是促成朝鮮停戰的一個重要因素。四年前在美國國內所進行的沙文主義的宣傳鼓動對於發動朝鮮戰爭起了一些臨時的作用，但現在美國報紙却只得承認，由於受到人民的普遍反對，要實現華盛頓所渴望實現的武裝干涉越南的計劃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話，至少是很難了。

美國軍人所進行的氫彈試驗在國內引起了很深刻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却和這些熱中於氫彈的人所指望的相反。美國人民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如果另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話，他們自己也會遭到大規模毀滅和無限的苦痛。人民對於管制與禁用這種武器的要求，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任何和平要求都要廣泛和迫切。

近十年以來，美帝國主義一直企圖在美國人民中間製造一種戰爭熱狂而且是越來越努力這樣做，正像希特勒過去在德國人民中間所進行的一樣。但是美帝國主義者却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失敗過。他們的戰爭時間表一再推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現在已經呈現出這樣一幅景象：兇惡的杜勒斯雖然向人家表示他對蘇聯和中國不共戴天，堅決要最後消滅它們，但同時却不得不和蘇聯、中國商談問題。

雖然形勢已經變得有利於和平方面，但是前面的道路還是很長，很崎嶇，而且帝國主義者中間最冒險的人物在日暮途窮的時候發動戰爭的危險還是存在着的。

中國人民的勝利無疑是美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或許是它歷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嚴重的失敗。關於這一點，本書正文已經論及，但在這篇序言中還應該補充幾句話。

美帝國主義者在過去五十年之中曾竭力設法征服中國，他們把征服中國作為實現他們“美國世紀”這個夢想的關鍵。中國人民給了他們這個夢想一個無比沉重的打擊。從此以後再也不可能出現像“幸福”雜誌一九三一年的那一種報道，說什麼“紐約美孚油公司在中國的權力似乎比中國政府的權力還要大些”。而且，人民中國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偉大進展，加上它在自衛方面的成就以及上昇為大國之一的事實，都給所有仍處於外國資本鐵蹄之下的亞洲國家提供了一個範例，這將使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的統治的末日加快到來。帝國主義如果失去亞洲，它將失去壟斷資本榨取超額利潤的一個最重要的來源。

美國統治集團對於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無限敵視的政策。它之所以最仇恨中國是因為中國人民給它的打擊最沉重。它對中

國甚至比對蘇聯與歐洲人民民主國家更爲歧視，這是因爲它想毀滅和征服中國的心最切。不錯，美帝國主義者這種對待中國的態度是荒謬的，那副執拗的樣子簡直像一個挨了罵的小學生。但是把美帝國主義者比擬爲一個小學生是太危險了。倒應該把美帝國主義者比擬爲草莽裏一頭受了傷的兇猛的野獸。

華盛頓不是威脅要進攻中國，就是表示帝國主義者永遠不會承認中國，永遠不和中國做生意。

好吧，讓我們看一看所謂“永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一九五四年的四月，杜勒斯先生就不得不和中國的外交官們在日內瓦坐在一起談判。對中國人民恨之切骨的杜勒斯先生會想盡一切辦法，要在事先破壞日內瓦會議——但是却枉費心機。這種結局他是躲避不了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強大壓力以及美國與它的搖搖欲墜的歐洲“盟國”之間的矛盾，使得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商業周刊”把中國稱之爲“目前在亞洲事務上舉足輕重的一個強國”，並且評論說：

“……誰也不可能假裝不知道杜勒斯這次去日內瓦等於承認了兩件事：

“毛澤東政權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國大陸，要從內部來顛覆它是不可能的事。

“只要是碰到亞洲問題，無論是朝鮮問題或者是印度支那問題，就不可能在外交上不理會北京。這些都是應該正視的無可動搖的事實。”

美帝國主義應該認識的“無可動搖的事實”還有不少。其中之一就是：許多美國資本家的工廠除非和中國做生意，否則就無法維持下去。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認識到和蘇聯、中國和人民

民主國家進行貿易的必要性。美國政府已經勉強採取了一些步驟，開始和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進行了一些貿易。但由於特別仇恨中國的緣故和由於特種戰爭計劃的需要，它和中國進行貿易方面，還沒有任何動靜。

這種情況也必須改變。由於中國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中國工業化的規模要比過去在任何地方所進行的規模來得大，中國將成爲名副其實的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一九四九年十月，美國國務院召集了一次會議，徵詢各資本家集團關於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採取什麼政策。像通用電氣公司的希洛德和“美國與外國電氣公司”的羅伯遜那些重要資本家都極力主張要和中國做生意並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洛克菲勒和史塔生在會上所發表的敵視中國的意見佔了上風。那些贊成和中國維持和平關係的大資本家們並沒有堅持他們的主張。他們就此不作聲，而且也靠那以反對中國爲目的的朝鮮戰爭所提供的大批的軍事訂貨而大發其財。

朝鮮戰爭結束以來，資本家中間又有人談起和中國做生意的事。克雷斯勒公司的人員在他們的公司和其他汽車大托辣斯競爭越來越失勢的時候，曾表示他們對於賣汽車給中國很感興趣。但是佔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集團正在以設法發動一個反對中國的新戰爭來打消這種要求，這一次是想從越南下手。

歷史的邏輯將迫使這些資本家認識到：既然他們摧毀不了中國，他們自己要生存下去，勢必也要爲自己在中國市場上取得一大塊地盤而作一番競爭。

所有這些遠景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大部分還是取決於我們美國人民將做些什麼。美國人民有着對中國人民友好的悠久傳統。雖然種族歧視的毛病在美國極爲流行，但這種傳統却

是的確存在的。

美國的進步力量正努力設法使國內人民重新覺悟到應該反對帝國主義，使他們認識到當他們舉行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的時候，他們所碰到的敵人正是這些要他們為“拯救自由世界”而去送命的“領袖人物”。但是進步力量所作的這種努力無論在規模上或效果上還都距離要求很遠。

多少年來，美帝國主義者已經把中國人民傷害够了。美國人民有制止這種行爲的重大責任，他們也有責任促使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促使政府與聲名狼籍的蔣介石集團斷絕關係，促使美國武裝力量撤離台灣及其附近海面。

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歡樂，對於在鬥爭中的美國進步力量是一種鼓舞。中國人民在和平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對於全體美國人民來說，都是一種很好的教育。美國人民的力量將不斷增長，而在他們的努力下這樣的日子將加快到來：在老百姓的壓力下，美國將對人民中國採取友好的政策和相互進行貿易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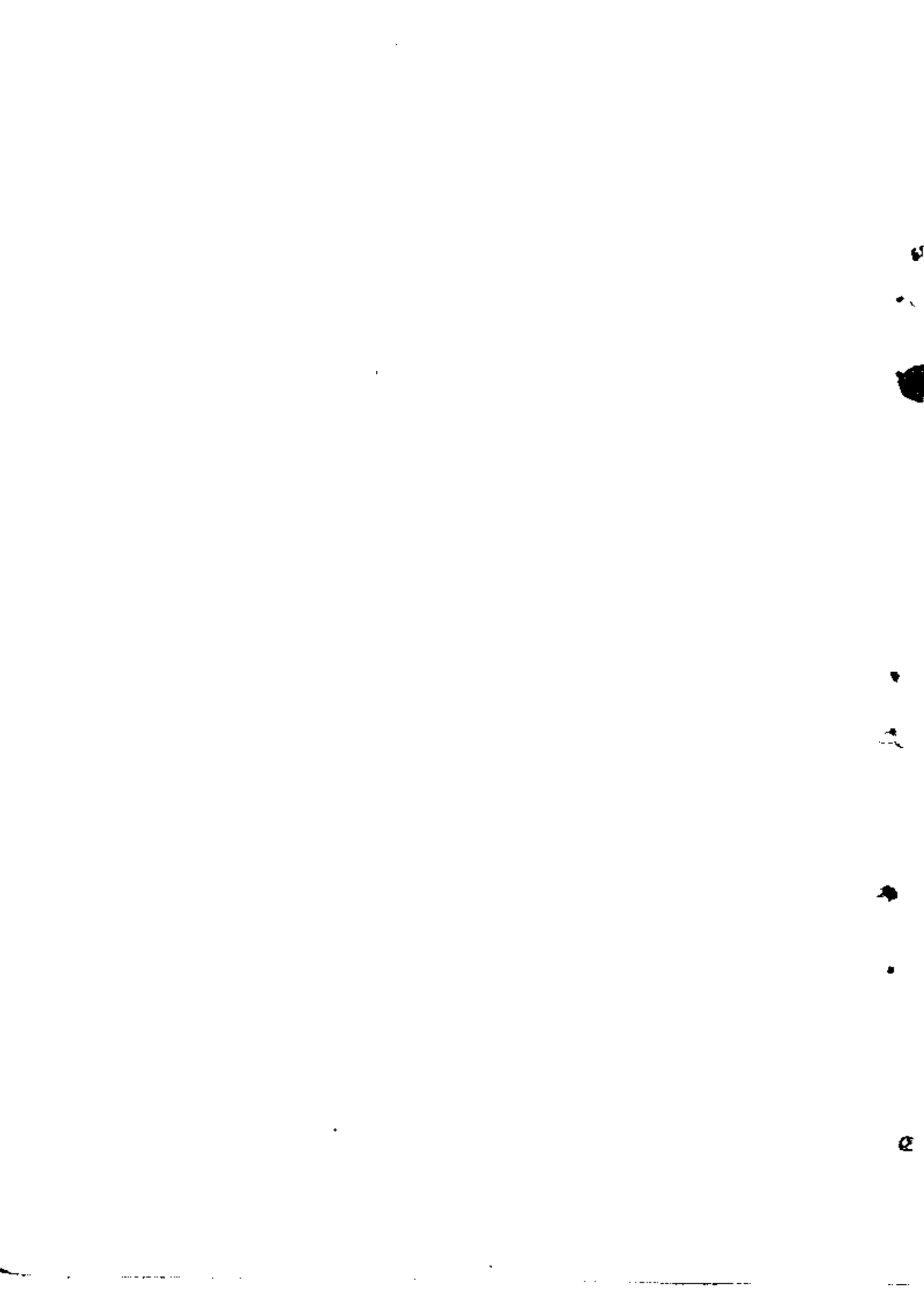
目 錄

著者爲本書中文版所寫的序言

第一章 美帝國主義的興起	17
帝國主義擴張的根源	18
帝國主義擴張的方法	23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統治形式	27
菲律賓	29
爲什麼美帝國主義變成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	36
資本主義的衰落與社會主義的前進	41
美國與垂死的帝國主義制度	45
第二章 華爾街帝國	47
石油托辣斯對世界的瓜分	49
國際五金聯合企業	53
原料缺乏的神話	56
食品來源的佔有	59
工業帝國	61
卡特爾制度	63
銀行帝國	69
貿易帝國	72
領土帝國	74
第三章 美帝國主義的利益	79
超額利潤的形式與數額	82
民族的剝削	92
對勞動人民的超額剝削	93
帝國主義與當地的反動勢力	98
對美國殖民地的超額剝削.....	101

第四章	歧視黑人制度對於華爾街的利害關係	107
	對黑人的超額剝削	109
	政治方面的壓迫	116
第五章	被阻滯的附屬國的開發	121
	政治上與文化上的控制	126
	發展遲緩的原因	132
	附屬國家內試圖工業化的努力	135
	“大胆的新計劃”	144
第六章	控制世界的戰略	152
	美帝國主義的戰時擴張	155
	無限擴張的目標	158
	鞏固國內的戰綫	163
第七章	將歐洲殖民地化的企圖	168
	逐步征服	170
	扶植反動傀儡	171
	宣傳與恐嚇	175
	政治控制的進展	178
	歐洲的“統一”	181
第八章	對西歐的經濟控制	186
	超級的大量傾銷	186
	削減工資	189
	壓制其他國家的國民經濟	193
	對美元的依賴	197
	把歐洲工業轉移給華爾街	203
	歐洲的經濟“統一”	206
第九章	大帝國的迷夢	211
	杜魯門主義與中東	215
	滲入非洲	223
	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前途	230
	侵略朝鮮	231

第十章 軍事控制與戰爭	237
基地與同盟	240
進行殖民鎮壓的武裝	241
對西歐的軍事控制	246
反蘇戰爭的計劃	253
征服世界戰略的破產	258
第十一章 帝國主義和美國人民	267
寄生與“有節制的”資本主義	270
以戰爭來逃避經濟危機	274
使工人捲入戰爭漩渦中去	279
反動派與沙文主義	284
戰爭與美國人民	286
美國人民的特殊任務	289



第一章

美帝國主義的興起

什麼是帝國主義？特別是，什麼是美帝國主義？是否就是老羅斯福的“巨棒政策”？是否就是殖民地的攫取？是否就是侵略行爲和領土擴張？是否就是馬歇爾計劃？是否就是軍國主義和歧視黑人的制度？是否就是塔夫脫—哈特萊法案以及反共的迫害呢？

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帝國主義的特徵，而且這些特徵正構成了帝國主義的政策與行動。然而，帝國主義所包含的內容還不止於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歷史階段。所有上述這些行動與政策，都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同時也是最後的階段時的產物。

列寧在他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裏，曾經對帝國主義的基本經濟因素下過這樣一個簡要的定義：

“第一，生產和資本集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以至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

“第二，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已溶合爲一，因而在這個‘財政資本’基礎上已造成了財政寡頭；

“第三，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已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四，分割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形成起來了；

“第五，各最大資本主義強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¹

帝國主義就是包含着這些因素的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從本世紀開端時就開始了。

那麼，誰是美帝國主義者呢？很顯然，絕大多數的美國人無論與工業或金融壟斷資本的所有權或控制權都是毫無關係的。一個普通的公民沒有資本可供輸出或作其他用途，他既未參加國際卡特爾的組織，也與國外的征伐不發生利害關係。

美國人民並非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只是那些佔有和控制着美國的一小撮人而已。他們就是安娜·羅捷斯特在她的論述美國壟斷組織的著作“美國的統治者”一書中所說的——摩根、洛克菲勒、梅隆之流以及圍繞在他們周圍的那些寡頭。不少的政客、將軍、警察特務、公司經理和監事、報紙編輯和電影製片家、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官員、以及工會的官僚分子，都執行着他們的命令。但是，就是把這些各式各樣的僕從和走狗算在一起，帝國主義者仍然是一個絕對的少數。他們不僅是與美國人民毫無共同之處，而且是美國人民的死敵。他們把帝國主義政策炫耀為代表人民意志的“美國政策”。他們把對外的侵略行為說成是爲了護衛本國和保障本國人民的自由。

因此，我們在讀本書的時候，必須記住，本書對於美帝國主義或帝國主義者的揭露，並不是攻擊美國整個國家或者美國人民。恰恰相反，這種攻擊是針對着那些金融資本的統治家族的。他們毫不關心自己的國家，而只想進行剝削。他們的“愛國主義”就是要把所有的海洋和大陸都變成爲“美國”所有；他們把美國看做是一個利潤的源泉，是用火燄、利劍和原子彈建立起世界帝國的一個根據地。

帝國主義擴張的根源

美帝國主義並不是在半世紀以前突然出現的，它是美國和世界歷史前期發展過程的產物。在獨立戰爭勝利結束以後，美國的資本主義，通過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以及各個歐洲的殖民列強的打擊，大大地擴張了它的領土，從在東部海岸一小長條土地逐漸發展成爲一個橫跨大陸的廣大地區。

南北戰爭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美國工業的發展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快。當歐洲的統治者們用海外殖民的方法來進行擴張時，美國的資本家們主要是在他們自己的政治疆域內進行擴張的。銀行、鐵路、銅鐵及油田的老闆們不是向國外去尋覓資源，而是強佔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沒收了農民的田宅；並且吸收了南方奴隸主們的野蠻經濟。他們從歐洲招募來數以百萬計的勞工，其中包括爲了超越歐洲技術水平所必需的技術工人。他們使用成千成萬的墨西哥人、中國人和菲律賓人在美國西南部建築鐵路和資本主義的農場。他們雖然是在美國境內僱用這些人的，但僅給以殖民地水平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總之，美國資本家們早期的財富，是建築在千百萬個從非洲被綁架過來的黑奴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的痛苦之上的。

當美國資本主義在國內擴展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所必然存在的“大魚吃小魚”的競爭方式使得它的工業與金融走向托辣斯化。

早在一八九〇年，壟斷企業的發展已經給工人、農民和小商人帶來了普遍的災難。雖然，在人民的政治壓力之下，被迫通過了余爾曼反托辣斯法案。但這個法案是毫無實效的，因爲，壟斷企業是資本主義競爭的必然產物，美國的資本主義政府一貫是代表着最強有力的資本家集團的，也就是代表着這個法案所假定要去加以抑制的壟斷企業的。工業上的鋁托辣斯、美孚石油托

辣斯、杜邦化工托辣斯、鋼鐵托辣斯、電工器材托辣斯、以及金融上的摩根家族和花旗銀行，都使得奈爾曼反托辣斯法案成爲笑柄。

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合流而爲金融資本，可以從下列事實中很顯著地看出來：摩根家族對於電工器材與鋼鐵托辣斯的形成，梅隆銀行對於鋁托辣斯的形成，庫恩—羅比公司對於鐵路的歸併都起着主要的作用；洛克菲勒則大量收買花旗銀行的股份和加強對於大通銀行的控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期，一個美國政府的報告告訴我們，已經有八個金融資本集團掌握了百分之六十二的美國大規模工業、運輸業、公用事業以及銀行²。

美國經濟爲金融資本所操縱使得過多的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資本主義的法則就是要不斷地追求利潤，因此壟斷企業就得爲其剩餘資本尋找新的投資出路；否則，它們的利潤就會由於經濟危機而下降。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那十年當中所發生的事情正是這樣。生鐵的產量在前十年中增加了幾乎一倍半，但到一八九一年即開始下降，到一八九三和九四年時則下降得更厲害，而到了一八九七年則僅比一八九〇年時高出百分之五³。失業增加，罷工日益頻繁，工會的組織也更趨活躍。

因此，美國的金融資本集團必須設法運用它的游資，必須在美國大陸疆界以外去尋求更大的利潤——超額利潤——的源泉。於是，過去一直是個資本輸入者的美國，到本世紀初的時候，就通過它的壟斷企業開始大量輸出资本了。

當這些壟斷企業向海外擴張時，它們又與在歐洲的競爭者勾結起來瓜分了產權和市場。早在本世紀的初期，洛克菲勒的石

油托辣斯就與洛士柴爾德和諾貝爾集團瓜分了世界知名的石油資源和銷售市場。

在帝國主義所處的現實條件下，要實行經濟控制，就需要有政治和軍事上的控制；要實行對市場和金融控制的地區必須實現殖民地統治和擁有勢力範圍。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各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已經迅速地擴張了他們的殖民地統治與勢力範圍，而且它們的各種壟斷企業在這些地方取得了獨佔的利潤。到十九世紀結束時，差不多全部非洲和中國以外的遠東地區都已經分割為歐洲列強的正式殖民地，中國本身、亞洲的其他地區以及拉丁美洲也都成了歐洲金融資本的勢力範圍。在一八九八年以前，美國在國外只取得了阿拉斯加、夏威夷、以及薩摩亞羣島的一部分。

這樣看來，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因素都在美國得到了發展，而且是以世界規模在發展着的。這就是構成帝國主義特徵的對外戰爭和掠奪政策以及國內的反動和沙文主義的根源。這些因素為那些替金融資本打前陣的人們如德皇威廉、英國的塞西·羅德、老羅斯福以及其他的帝國創建者準備了條件。

特別是美國這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托辣斯的國家的政府，它企圖按照它自己的慾望去建立帝國，它並且使用戰爭和征伐這種標準的帝國主義的方法來重新分割世界。

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霍柏森曾經在他一九〇二年的著作裏探討過美國向外擴張的動力究竟是什麼。他敘述了工業的迅速發展，龐大托辣斯的形成，效率低的企業停閉歇業，托辣斯的巨大利潤找不到投資的出路，因而促成了向國外進行掠奪。

“正是這些製造業和投資突然需要國外的市場，於是促使共和黨採取了帝國主義政策和行動；而這些工業和金融巨頭們是

屬於共和黨的，這個黨也就是他們的黨。不要讓老羅斯福的冒險狂以及他所自命為負有‘明顯的天命’與‘文明的使命’的黨迷惑了我們。實際上，需要帝國主義的正是洛克菲勒先生、摩根先生以及他們的同夥們，也正是他們把這個担子放在這個西方大共和國的肩上。他們之所以需要帝國主義，是因為他們想用國家的公共力量去替他們的資本找尋有利的出路，否則，這些資本就變成呆滯無用。”⁴

霍柏森集中在說明托辣斯擴張主義的徵象，而列寧却集中在分析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的整個體系，指出了帝國主義不可避免要經歷的道路。

美國印第安納州已故參議員阿·貝弗里治是一個美國帝國主義早期的倡導者。他曾經指出過擴張主義的條件和政策。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他把這些條件在一次很露骨的演講裏指出來了：

“美國工廠所製造的超過了美國人民所能使用的。美國土地所生產的也超過了他們所能消耗的。命運業已替我們安排好了政策，世界上的貿易必須、而且必將屬於我們。我們必須照我們的母國——英國——所教給我們的那樣去佔有這個貿易。我們將在全世界各地建立貿易據點，作為美國貨的推銷站。我們要把我們的商船佈滿各大海洋。我們要建立一支與我們國家偉大的氣魄相稱的海軍。飄揚着我們國旗並與我們貿易的廣大的自治殖民地，將圍繞着我們的貿易據點成長起來。我們的制度將隨着我們的商業貿易而推廣。同時，美國的法律、美國的秩序、美國的文明以及美國的國旗都將移植到那些迄今還是血腥和黑暗的土地上，上帝的使者們將變這些地方為美麗和光明。”⁵

自然，美國工廠裏和農場上的勞動者從來就沒有生產過足

够美國人民所需要的東西。但是，在五十年前，這些勞動者所生產的數量就早已遠超過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容許人民消費的數量。爲了想解決這一矛盾，帝國主義所採用的就是這個資產階級代言人貝弗里治所提出的辦法。

有些歷史學家硬說本世紀初期美國一些孤立派的政客和資本家們也曾經反對過兼併領土的做法，他們企圖以此來掩飾美國擴張的動力所在——即其中所包含的大企業性質。但是，貝弗里治却附和着摩根家族的政治代理人、老羅斯福和厄立胡·路特、波士頓金融集團的洛奇以及大部分商會人士。貝弗里治所宣揚的軍國主義、戰爭以及民族優越論正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猶如托辣斯和銀行集團是它的組成部分一樣。帝國主義者的頭目在對外政策上的唯一選擇只是進行對外征服時所應採用的戰略與戰術而已。

帝國主義擴張的方法

美國人民一直是在一種悅耳的神話中成長起來的。這種神話說：美國的軍隊是非侵略性的，美國的商業是通過和平競爭和對消費者服務的方式滲透到世界各地去的。本書的主要部分就是要通過對華爾街壟斷集團的實際經營和滲透方式的詳細敘述來粉碎這種神話。因此，在這裏概括地敘述一下他們所使用的各種方法是必要的。

事實上，武裝侵略始終是美帝國主義進行擴張的基本方法，正如同它過去是英、法、德、日等帝國主義的擴張方法一樣。爲了重新瓜分世界，美國政府在一八九八年發動了一次帝國主義戰爭。這是一個小規模的戰爭，對手是孱弱的西班牙。然而，取得的戰利品却相當可觀，其中包括全部佔有菲律賓和波多黎各，非正

式地佔有古巴，取得大約包括南美洲北部和中美全部在內的一個勢力範圍，對加勒比海的戰略控制，以及在太平洋上建立強大的海軍力量，為下一步的擴張打下基礎。美帝國主義武裝力量的擴大和戰略地位的加強，使得它的收穫不僅超過了西班牙原有的殖民地範圍，而且將勢力伸展到英法兩國擁有最大投資的拉丁美洲各國。

對西班牙的戰爭只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戰爭在那些被統治的人民頭上打來打去，他們對於走了一批西班牙或英國的剝削者，換來一批華爾街的剝削者，是不感興趣的。為了從他們的冒險事業中更充分地攫取利潤，這些新霸主們對菲律賓、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尼加拉瓜、巴拿馬、海地、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共和國、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以及中國進行了征服戰爭或武裝干涉。

為了實現和維持它在中殖民地國家的經濟統治，華爾街一貫使用武力政策。這可以從布特勒少將的遺書中看出來。當他敘述到他的生平事業時，他說：

“我在我國最活躍的部隊——海軍陸戰隊——服役了三十二年零四個月。我擔任過部隊中的各種官階，從少尉一直到少將。而我在這個時期中，大部分時間充當了大企業、華爾街以及銀行老闆們的高等打手。一句話，我做了資本主義的保鏢人。……

“就是這樣，我在一九一四年幫美國石油集團穩定了墨西哥、特別是坦比哥港。我為花旗銀行找到像海地和古巴這樣適於謀取利潤的好地方。……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間，我為白郎兄弟的國際銀行集團在尼加拉瓜掃清了道路。一九一六年，我為美國的糖業集團給多米尼加共和國帶來光明。一九〇三年，我

使得洪都拉斯滿足美國果品公司的需要。一九二七年，我在中國使美孚油公司暢所欲言地發展起來。”⁶

美帝國是以戰爭和鎮壓的手段起家的，它以後的成長主要都是通過同樣的血腥手段的。美帝國主義所有以後的收穫，差不多都是得自它所參加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和恫嚇手段的。

但是，美國的擴張並不單靠軍事手段。經濟的壓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種經濟壓力同樣的殘酷，而且與自由競爭的那套神話正相違背。經濟壓力的內容是：（一）在有利於美國壟斷資本的條件下，貸款給附屬國和受戰爭蹂躪的國家；（二）商訂貿易協定，但不允許弱國保護它的工業免於遭受強大的美國壟斷資本的破壞；（三）實行禁運和抵制，以及打擊別國的貨幣；（四）給予他國的反動分子以經濟上的恩惠和特權，使他們甘心受華爾街的驅使；（五）訂立條約，使美國的聯合企業可以無限制地攫取其他國家的資源；（六）使用外交干涉手段，為美國某些公司取得特權；（七）強制貸予不需要的貸款，使美國銀行家對於經濟落後國家的財產取得抵押權；（八）安置一批美國的財政顧問和稅收人員，使其能控制弱國的財政。

軍事的和經濟的方法是相輔而行的。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為它的軍事勢力奠定了基礎；然而，同時，經濟與外交的壓力只有以軍事干涉的行動和恫嚇為基礎才能成功。所有這些結合起來就成了美國擴張的總的方式，有時以“和平”的姿態出現，有時又出之以戰爭，但是它永遠是以被犧牲的國家的人民為侵略對象的。

在執行這個擴張計劃時，起決定作用的壟斷資本和政府是密切合作的，而且常常互易地位。外交和軍事人員，輪流担任着

華爾街的董事與華盛頓的政府要職。經濟權力有時由政府機構行使，有時則由私人金融集團直接行使。軍事權力通常由政府行使，有時則由控制着某些國家的大公司直接行使，因為它在那裏組織了傀儡政權和傀儡軍隊。

美帝國主義的目的在於擴張，它所採用的方法是進行軍事的和經濟的侵略，因此，它的政治就必然是反動的。美帝國主義以及所有其他的帝國主義的性質，早已為列寧深刻地描繪出來了。他說：

“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底時代，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到處散佈的都是統治趨向而不是自由趨向。這統治趨向底結果，便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便是政治制度方面的矛盾也極端尖銳化起來。民族壓迫和兼併傾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傾向（因為兼併無非是破壞民族自決而已），也特別尖銳化起來了。”⁷

美帝國主義的戰略是企圖以最低的代價來達到目的，它的方法是利用幫兇和收買敵人。它主要打擊的對象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民族解放運動。它與這些國家中最反動的階級——通常是封建地主階級——互相勾結，同時也與它相競爭的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結為盟友。其中最持久的就是英美的聯盟，它從美西戰爭期間開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一直繼續到第二次大戰以後。它不惜一切地企圖使美國工人階級——美國金融資本最根本的敵人——保持中立，並企圖騙取他們的默許。但是，對於那些阻撓華爾街擴張計劃的美國工人和人民團體，它却毫不猶豫地全力予以打擊，它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時期的所作所為正是如此。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統治形式

華爾街的辯護人總是說，美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它不像英國那樣是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

這是一種企圖以形式來混淆本質的詭計。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對其附屬國實行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統治。統治的形式包括把領土併入征服者的版圖，建立殖民地，以及在附屬國建立名義上獨立實際上受帝國主義國家操縱的政府。最後一種就是半殖民地的統治形式。

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間，有各種各樣的過渡形式；例如委任統治、託管和自治領。甚至，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間在形式上的差別也往往不一定是很大的。英國在它的殖民地裏就利用依附於它的當地人參加政府的統治（如利用傀儡軍隊、當地的酋長和王公、地方議會等），正像美帝國主義在其半殖民地所做的一樣。而且，殖民地的統治形式並不見得就比半殖民地的統治形式更殘酷和剝削得更厲害。比如，英屬西印度羣島殖民地居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決不比美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區半殖民地居民的地位更壞些。

只要在方便而且可能的情況下，美帝國主義也是和歐洲任何列強一樣殘酷地去攫奪和保有殖民地的。例如，對波多黎各、夏威夷、維爾京羣島、阿拉斯加、太平洋上若干島嶼以及保持到最近的菲律賓均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允許菲律賓“獨立”，美帝國的殖民地範圍好像是縮小了；但是，實際上却擴大了，因為它吞併了許多太平洋上的島嶼，並且無限期地通過對西德和日本的佔領來實行在軍事和政治上對它們的控制。

但是，在大部分地區，美帝國主義並不採用殖民地形式。因

爲，在美國進行擴張的具體條件下，用名義上獨立的半殖民地形式比較靈活些，同時也使美帝國主義處於比它的歐洲勁敵更爲有利的地位。那麼，這些具體條件是什麼呢？

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都建立在亞洲和非洲，這裏當時並沒有高度發展的國家，有的只是一羣部落和小王國。而美國的大部分附屬國都在拉丁美洲，這裏有獨立的國家，有些則正在形成獨立國家的過程中。在這裏，建立殖民地的直接統治比較困難，正如美國將軍們在菲律賓所發現的情形一樣。

其次，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大部分都是在十九世紀建立起來的。到了二十世紀，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識已經較前發展，民族解放運動也更加劇烈。因此，美帝國主義進行擴張的時期，正是日益需要利用僞裝形式在各地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的時期。

最後，華爾街的擴張主義者還不得不考慮到美國人民的民主傳統。美國人民自己正是通過革命戰爭擺脫了殖民地地位和取得了自由的。而且，在十九世紀後期，美國農民和城市中等階級一直在抗拒着華爾街壟斷資本在國內的掠奪。這些潮流形成了一種反對露骨的帝國主義擴張的政治力量，它包括“反帝國主義同盟”，“人民黨”（或稱“平民黨”）、以及像馬克·吐溫那樣的國內一切著名知識分子。這個力量幾乎在美國國會中擊敗了通過關於併吞菲律賓的法案，而且相當地支援了菲律賓人民對佔領軍的反抗。美帝國主義採用了新式的殖民地統治方式以後，美國人民對向外冒險行爲的反抗就受到了削弱。而且，它還企圖使公衆相信，美國並不想攫取殖民地領土，只不過想增進其統治地區內的人民福利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華爾街特別運用了它那套虛僞的“反殖民主義”，企圖在這個幌子下面到處擴張勢力。華盛頓政府

還試圖像它五十年前在西班牙殖民地所做的那樣把所有東南亞的民族解放運動轉變為有利於它的東西。

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美帝國主義的主要方法是從財政上和軍事上援助荷蘭、法國、英國等帝國主義去鎮壓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但它同時又製造各地傀儡的“獨立”政府，藉以排擠歐洲帝國主義的勢力，使其對美國有利。它在歐洲也運用了這同樣的方法，歐洲今天也已經成為華爾街所垂涎的直接對象。

但是，到一九五〇年，這種策略已經不那麼稱心如意了。這些國家的人民並不是什麼“反殖民主義”的幌子所能欺騙的，特別是在亞洲，人民加強了他們的組織和戰鬥力量，他們為爭取土地、爭取吃飽、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而進行的民族解放鬥爭，已經發展到使傀儡政權和軍隊無法招架的地步，這些傀儡政權的腐朽破產也暴露無遺。於是，在朝鮮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那就是以使用美國軍隊為主、以歐洲帝國主義軍隊為輔，作為試圖建立和延續帝國主義統治的主要手段。

菲 律 賓

在美國人民面前，菲律賓被歪曲地宣傳成爲一個美國“德政”的良好榜樣，好像是當菲律賓的居民到了“能够”自治並且提高了他們自己的生活和水平等等的時候，美國就給予了他們獨立。而實際上呢，恰恰相反，菲律賓正是帝國主義剝削中最卑鄙的一個實例。在這裏，帝國主義者採用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雙重形式，以野蠻的軍事壓迫與殘酷的經濟束縛相結合來替華爾街謀取利潤。

十九世紀末期時，業已衰退的西班牙王國已經無力繼續維

持它在拉丁美洲和遠東的殖民地。在所有這些國家裏，民族解放運動達到了高潮，迫使西班牙對波多黎各的人民作巨大的讓步；在古巴和菲律賓，革命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經有把西班牙殖民統治者從當地趕走之勢。正如美國人在一百二十年前從英國殖民統治者手中解放出來一樣，古巴與菲律賓的人民組成了他們新的共和國。當美國軍隊登陸菲律賓的時候，西班牙人已經只能退守在馬尼拉和少數幾個設防的城市裏。到一八九九年中，除馬尼拉在美國手裏以外，整個菲律賓已經全部解放。

當美國總統墨金萊允諾給予菲律賓人民以自由的時候，他却把他的陸軍和海軍動員起來去剝奪他們業已贏得的自由。當美國外交官們允諾菲律賓的領袖以獨立的時候，華盛頓却正準備着去吞併菲律賓。美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西班牙“敵人”就是這樣狼狽爲奸地幹着這種背信棄義的勾當。當美軍開到的時候，西班牙的守軍不戰而降地交出了馬尼拉，爲的是使它免於落到菲律賓人民的手裏。原西班牙總督還留任了六個月之久，西班牙軍與美軍還並肩作戰以對付菲律賓人民。爲了酬報他們這些效勞，美國特准西班牙的地主們保有他們在菲律賓的財產，並且在和約上規定償付西班牙國王二千萬美元。

美國化了三年半的時間進行這個艱鉅而耗費巨大的戰爭，才佔領了菲島的主要據點。實際上，當時抗戰的武裝力量得到了整個菲律賓人民的支持與合作。一九〇二年，戰爭算是正式宣佈結束了；但是，堅決而普遍的抵抗還繼續了四年之久，而在棉蘭佬島上的抵抗則一直到一九一三年方才停止^①。

至於這些新征服者的文明使命的實質，可以從一八九九年

① 上述關於菲律賓的解放和重獲征服的情況詳見菲律賓前總督佛布斯所著“菲律賓羣島”第一卷，該書係一九二八年於波士頓出版。

一月舊金山出版的共和黨報紙“阿果諾報”所鼓吹的內容中看出來：

“爲了實施我們的帝國主義計劃，最好是收買一些叛變的頭目使其將阿金納多以及其他主將出賣到我們手中……拷打、吊訊，以火刑拷問，以熔鉛刑拷問，把叛亂者活活煮死……這些方法將會在馬來人的心理上留下深刻印象。”⁸

當阿瑟·麥克阿瑟將軍（即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之父）在一九〇〇年就任菲律賓軍事總督的時候，他最愛用“灌水”的酷刑。每遇當地人民拒絕予以“合作”時，侵略者不惜毀滅他們的全部村鎮。估計，當時呂宋的人口至少有六分之一被殲滅了⁹。

美國大肆宣傳菲律賓人民如何在它的統治下受到了所謂的敎育。西班牙侵略者曾經企圖壓制菲律賓人民已經有了高度發展的文化達五世紀之久。早在西班牙人入侵以前，菲律賓人民差不多全部都是識字的¹⁰。當菲律賓人從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來時，他們最先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在本國文字開辦學校。而美國侵略者呢？却改變了這些學校的制度來達到它的目的，以英文代替了菲律賓本國的文字，宣傳的是殖民地制度的好處，並且企圖消滅菲律賓人民的民族意識¹¹。實際上，沒有一個農場僱工和農民的孩子能到這些學校上學，因為他們都不得在田地裏爲地主們辛勤勞動。其結果就是在美國統治下的整個時期中，不識字的人數總是保持百分之五十的比例¹²。

當地人民的生活情況怎麼樣呢？在那裏，美帝國主義除恢復了地主的統治以外，又加上了華爾街銀行與礦業和農業企業公司的剝削。農業銀行系統是在美國直接控制之下，國際銀行公司（即花旗銀行的附屬機構）又攫取了過去爲英國銀行所經營的許多業務¹³。菲律賓的人民則被迫納稅用以支付殖民地政府的

行政費用，負擔大部分用以“綏靖”他們自己的費用，並且還要支付由華爾街銀行假菲律賓政府名義所發行的公債利息。

美國壟斷資本通過菲美間實行自由貿易的方式，實際上掌握了菲律賓的對外貿易，抬高了當地的生活費用，阻礙了一切重要的民族工業的發展。菲律賓變成了美國取得糖、椰乾、芋蕪、黃金和鉻礦的源泉。菲律賓原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之一，它可以供養八千萬的人口。但是，在美國統治之下，大量的土地從生產糧食轉為生產出口作物，以致於使菲律賓成為一個缺糧國家，連主要糧食大米都得依賴國外輸入¹⁴。它的豐富的鐵礦、煤礦以及其他工業金屬礦藏本足以成為全面發展工業的基礎¹⁵，但是，在美國控制之下，任何基本的工業都未發展起來。

總之，菲律賓人民身受着典型的殖民地經濟制度統治的痛苦。這種制度比起英國在馬來亞所實行的殖民地經濟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比起英國戰前在印度所實行的殖民地經濟制度則更為有效，因為英國在印度畢竟還沒有能夠阻止主權屬於印度人的有限的基本工業的發展。

當然，少數富有的菲律賓和西班牙的地主和傀儡官僚以及他們的爪牙們在美國統治下大走其紅運。但是，絕大多數的人民則一無所得。美國“外交政策協會”所發表的一篇報告中曾經這樣描述過菲律賓的情況：

“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六年美國統治期間，佃農與農業僱工（在菲律賓整個人口中佔絕大部分）的生活水平是否比十九世紀西班牙統治時期的悲慘情況有任何顯著的進展，是十分值得懷疑的。”¹⁶

至於所謂訓練菲律賓實行自治，實際上就是訓練一羣政治上活躍的地主和買辦資本家，同時訓練少量可以供佔領者驅使

的傀儡軍隊。這種方式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期間曾經爲日本侵略者推進了一步，其後又爲麥克阿瑟將軍所繼續實施。

一九三六年的“泰丁—麥克杜斐法案”決定允許菲律賓“獨立”。這一行動是由一些什麼因素所促成的呢？

首先，一切壓制菲律賓人民和把他們“美國化”的企圖都歸於失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人民的抵抗增強了。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間，一九三一年以及一九三五年，都發生過大規模的武裝起義。雖然這些起義都遭到了殘酷的鎮壓，但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却增強了，而且由於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有組織工人在運動中起着日益巨大的作用而更加鞏固起來。美帝國主義想避免這種武裝干涉的浩大費用，要想保持菲律賓成爲它在亞洲的穩固的軍事基地，其唯一的希望就是通過給予菲律賓以形式上的“獨立”來分裂它的民族解放運動。

其次，美國乳酪業和製糖業集團反對那些控制着菲律賓椰子油和糖產的資本家，因爲美菲間免徵關稅和非島工資極低使這些資本家在美國市場上佔了極大便宜。

泰丁—麥克杜斐法案所規定的“獨立”附有下列諸條件：保持美國的軍事基地，保持美國所有的私有財產的產權，承認所有對美國銀行的債務，菲律賓應制訂一部爲華盛頓認爲滿意的憲法，取消菲律賓貨物在美國市場上的免稅待遇。

很明顯的，這並不意味着什麼菲律賓的解放，而只不過是一種統治方式的改變而已。一度擔任過菲律賓副總督的海登教授寫道：

“泰丁—麥克杜斐法案規定了美菲分割開來的條件，這些條件很可能促成一方的早日毀滅，從而使另一方的聲譽受到玷

辱。”¹⁷

在“獨立”被實際上批准以前，由於“菲律賓貿易法案”（即貝爾法案）的通過，取得“獨立”的條件變得更加苛刻。這個法案簡直是蠻橫無理，甚至連如此保守的國務院官員如威廉·德·克萊敦（屬安德生·克萊敦公司）和李維埃·司坦包爾都一致反對。

一位美國的菲律賓經濟問題專家秀萊·詹金斯寫道：

“美國人在菲島所享有的特權和美元與比索（菲幣——譯者）的緊密關係，將保證美國人對於新資本和工業的操縱權……菲律賓貿易法案……已經使美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享有佔有一個附屬殖民地的一切利益，同時却可以不負擔管理行政與國內福利的責任。”¹⁸

爲了要實施這條不愉快的法律，美國的軍國主義者堅持要永久保有二十三處基地和比“獨立”以前更爲強大的武裝部隊。

貝爾法案所帶來的假獨立使菲律賓陷入嚴重的經濟與財政危機，並且更加降低了絕大多數人口的生活水平。

菲律賓人民從未接受這種虛假的“獨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了抵抗日本佔領者而組成的武裝力量——人民抗日軍——首先解放了菲律賓，後來這支力量成爲反抗美帝國主義統治復辟的強大的力量。他們把這個鬥爭與反地主制度的鬥爭結合起來，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五年來，菲律賓的傀儡部隊會不斷企圖擊敗這個人民的革命，但是完全歸於失敗。到一九五〇年時，這支革命的力量變得空前的強大。

美帝國主義者爲這個遠東的殖民地很傷腦筋。代表金融資本重要集團的觀點的“生活”雜誌，曾經極力主張直接使用美軍去鎮壓菲律賓的解放運動¹⁹。兩個月後，杜魯門總統在對朝鮮發

動干涉時又明白地宣稱，美國的武裝部隊同樣也準備去干涉菲律賓。

這種干涉代表着下列這些人物的利益：在紐約舉行會議的“菲美商會”，其中包括美孚油公司、花旗銀行、固特異車胎公司、特卜氏繩索公司（馬尼拉廠）、島國木材公司等代表，這些壟斷企業操縱着菲律賓的財政、商業、農業和林業；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他本是非菲律賓的大地主，他的父親在五十年前與菲律賓人作戰時除了攫取了馬尼拉的聖米格爾釀酒廠之外，還霸佔了大量土地；控制着菲律賓探礦工業的豪色曼大法官；地主與羅馬天主教會，他們實際上自西班牙統治時期以來仍保持原封不動，一直是支持帝國主義的主要基地。

這種干涉是針對着下列對象的：菲律賓的工人、農場工人和農民，實際上包括所有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團體，以及在為建設民族工業而鬥爭的大部分小工商業家。這種干涉也是為了反對阿格利倍大主教的傳統，阿格利倍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菲律賓反對西班牙統治時的一個領袖，在其後四十年間，他領導了反抗美國統治的鬥爭，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領導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並在此鬥爭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這就是杜魯門總統在反對“共產帝國主義”以“保衛自由人民”藉口下威脅着要擴大戰爭的醜惡現實。

在這裏，菲律賓只是作為一個例子來研究的。其實，古巴或波多黎各也足以說明同樣的問題。它們之間個別的細節是不盡相同的，但是一般的因素却同樣存在——對人民的殘暴鎮壓、使其經濟轉向供給對外輸出的作物、由美國公司接管其經濟生活、勞動人民的極端貧困與被殘酷剝削、以及軍事基地的保持等等。

這些事實是很重要的，因為甚至連美國的那些批評帝國主

義的自由主義“評論家”都傾向於集中攻擊別的帝國主義，而對美帝國主義則加以粉飾。例如，派克·穆恩在他的“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一書中，對於歐洲帝國主義者如何蹂躪非洲描寫得淋漓盡致，對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也無情地予以揭露，但當他話題轉到菲律賓和美國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時，對這些同樣的特徵就含混過去，對當地人民如何遭受剝削也是輕描淡寫的。然而，他却大肆強調美國統治的“德政”，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統治者爲了宣傳目的而完全捏造出來的東西。穆恩說他發現：“比起波斯（一九三五年改稱伊朗——譯者）、朝鮮或者剛果來，古巴的命運要無可比擬地優厚得多。”²⁰

這一句二十四年前寫下來的話，用今天的事實來檢驗一下，簡直是一種諷刺。今天，美帝國主義業已在伊朗和剛果成爲很有影響的勢力，但對於當地人民的生活毫無改善。今天，美帝國主義給朝鮮帶來比日本帝國主義時期更多的苦難、死亡和破壞。

爲什麼美帝國主義變成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

美帝國主義進行擴張的動機和基本方法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並沒有什麼不同。然而，美帝國主義却比它的勁敵較爲順利。金融資本的代言人往往把這種順利歸功於神秘的和民族優越的原因。例如，把“美國生活方式”、“美國的技術”、“自由企業制度”等等說成是不同於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而且比它們優越。其實，所有這些只不過是把英國在舊殖民時代所謂“白種人的負擔”的噱頭加以現代化而已。

那麼，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美帝國主義從兩次世界大戰中都獲得了特殊的利益。每次它都是在別的參戰國家都已打得筋疲力盡的時候才參戰，因此

在相對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上便佔了便宜。其他列強與美國自己都需要大量的軍火裝備，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市場，爲一九一四年以來美國工業的大部分擴充打下了基礎。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和人力在戰爭時期遭受了嚴重破壞，而美國却倖免於難。戰爭使美國大發其財而使其他大部分國家陷於貧困，這是造成美國經濟、財政和軍事力量強大起來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國內的發展過程同樣也助長了美帝國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在美國國內有擁有豐富資源的廣大土地供它支配，也有源源不斷的補充勞動力，勞動力的來源是國外的移民和把舊日的黑種奴隸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南北戰爭以後，美國的資本主義比較少受封建殘餘的妨礙。在這些情況之下，興起了一個爲數衆多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在地理上構成了一個統一的羣衆市場。這個市場的規模之大，可以以大規模生產方法來發展生產，而這在歐洲較小的國家裏是從來不可能的。

比起大部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來，美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比較遲的；因而它也就吸取了歐洲國家在過去一世紀中所得到的經驗。它的各項工業都可以在較高的技術水平上開始生產，而且其生產力也超過了英法的工業。而在英法兩國，由於保護現有的資金，就不可能充分地採用最新的生產方法。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陸軍和海軍也都動員較遲，但在物資和人力上却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部隊爲多。最後這一事實，對於美國金融資本攫取經濟利益起着決定性作用。

美帝國主義參與分割世界的鬥爭，比大多數它的勁敵都要晚些。這個事實也變成了它取得額外利潤的一個源泉。當初，華爾街的托辣斯並沒有把它的魔爪伸到世界各個地區，而是集中在西半球進行擴張；因爲在這裏美國佔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同時

英、法、德等帝國主義者難以用軍事鬥爭方式來掠奪贓物。美國資本家首先選擇了向西班牙王國這個最弱的歐洲國家開刀，然後逐漸削弱英法在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地位。

此外，美國金融資本還在國外建立新興工業，從這裏可以取得最大的利潤並為將來的擴張打下基礎。它的資本很少投在如外國鐵路一類的事業，因為這種事業在運輸方法日新月異發展的情況下，越來越無利可圖了。

再者，如前所述，美帝國主義還在其統治地區內採取了更靈活和更易於偽裝的操縱形式，換言之，採取了更適應於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鬥爭時代的方法。這些方法的花費較小，而又能多少阻延拉丁美洲真正的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

所有這些有利條件加在一起就促成了美帝國主義的蒸蒸日上。別的国家雖也曾具備過某一個或數個這些有利條件，但都不是全部具備的。

由於有了這些有利條件，美帝國主義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業已衰落或毀滅的時候還能繼續擴張。同時，這樣一來，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上產生了顯著的變化。

從鋼鐵生產的過程中，可以多少看出帝國主義國家工業基礎的變化。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三年間，美國和德國的鋼的產量增加了三倍，但英國鋼的生產僅僅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而鐵的產量則反而減少。英國這個世界上老牌工業先進國家被它的勁敵遠遠地甩在後面。到一九一三年，美國毫不費力地一變而為工業的領導國家，擁有大約相當於世界鋼產量的近百分之四十。德國佔第二位，其鋼的產量超過了英、法和帝俄的總和²¹。

工業力量的這種變化並不等於爭奪世界霸權中列強力量的變化。儘管英法兩國的經濟力量相對地遭到嚴重的衰落，然而英

法兩個帝國以及英法托辣斯在世界各地的財產却仍舊佔着優勢，而且比之於工業上較強的德美兩國金融資本集團在世界各地所擁有的財產，還大出好幾倍。

工業力量與世界霸權之間的這種矛盾終於爆發成爲企圖強制重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帝國主義與英法帝國主義結爲同盟，這就決定了這場鬥爭的結局：德帝國主義的敗北。華爾街托辣斯集團以這個戰勝者同盟中最強的一員的資格，取得了最大的收穫。

戰爭時期的軍火訂貨和後來國外投資的增加，都爲美國的工業取得更大的利潤開闢了市場。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九年之間，美國的鋼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而德國的產量（因爲受喪失領土的影響）却下降了；英國鋼的產量雖有少許增加，但却爲煤與鐵的產量減少所抵銷。一九二九年時，美國鋼產量差不多相當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總產量的一半²²。

其後的十年正是經濟大危機和隨之而來的長期蕭條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這種崩潰現象，給美國帶來的影響最爲嚴重。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用備戰和向弱小國家進行侵略來解決它們的市場問題。一九三九年時，德國鐵的產量超過了英法兩國產量的總和，鋼產量則幾與之相等²³。西歐工業力量的對比關係差不多又出現了一九一三年時的形勢，而世界霸權與世界財產情況之間的不平衡狀態乃更加突出。

爲了重新分割世界，德國和日本發動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前面已經說過，由於其本土又一次爲兩大洋所保護而倖免於難的美帝國主義，利用了這次戰爭去擴張它的工業和軍事力量以及它的世界帝國。一九四九年時，美國的鋼產量佔資本主義世界鋼的總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²⁴。美國銀行集團擁有資本主

義世界黃金準備的百分之七十三²⁵。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成爲金融中心的華爾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成爲世界金融的決定性的操縱者，倫敦的銀行集團不僅退居次要地位，而且反過來依附於紐約了。美國的軍事力量增加了數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是絕對地超過了所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力量的總和。

衡量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上所居地位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看它的國外投資的價值如何。下面這一表格將告訴我們，四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的私人資本家在幾個不同的時期內國外投資價值的概況：

私人國外投資(單位：十億美元)²⁶

	1900年	1913年	1930年	1949年
美 國	0.5	3	17	19
英 國	12	17	19	12
法 國	5	12	7	2
德 國	2.5	9	1	—
總 計	21	41	44	33

自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三年，德國和美國的國外投資的增加雖比英法爲快，但是其相對的經濟力量則仍在英法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使德國的國外投資等於全部消滅，法國的投資也爲之減少。英國的投資僅增加了一點點。惟獨美帝國主義的國外投資增加了六倍之多。到一九三〇年時，美國的金融帝國勢力已經幾乎可以與英國的分庭抗禮了。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許多國家的國外投資，特別是美國和法國，因爲遭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而減少。而另一方面，德國和日本這兩個侵略國家却由於日益控制歐亞兩洲而增加了國外

投資。然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除美國以外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外投資都形降落，德、日、意帝國主義的地位則根本被取消了。

只有一個美帝國主義有所增益。到一九四九年末時，美國私人的國外投資，超過了所有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國外投資的總和。除了美國的私人國外投資一百九十億美元以外，美國政府還擁有一百四十億美元的國外投資。這些是給附庸資本主義國家的貸款，付息還本都是靠不住的。這些貸款與其說是直接謀利的投資，不如說是政治貸款。但是，這些貸款，由於給剩餘商品創造了市場和為美國私人投資者在借款國家增加了利潤，因而就擴大了美國金融資本在各債務國家中的地位，並且間接地取得了巨大的利潤。

資本主義的衰落與社會主義的前進

以上所述主要集中在說明美帝國主義如何在犧牲其競爭者的過程中起家。但是，具有更基本的歷史重要性的因素是整個資本主義的總衰落，這證實了列寧的學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所以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因為把一切都吞併了的龐大的壟斷資本除了互相吞併之外再也不能前進了，因為在帝國主義制度下的龐大的社會生產組織和國際貿易已經替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即社會主義創造了各種成熟的條件。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衝破了帝國主義世界系統的完整性，並且使得社會主義新制度的真正誕生成為可能。這個事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這是這種制度的一種經濟的和政治的病症，其結果只能導向制度本身的崩潰。

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衰落和日益尖銳的危機標誌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經濟危機，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以毀滅性的打擊；（二）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實行法西斯主義——最反動和最野蠻的政治統治形式；人類偉大的文化成就被壓制，而泛濫於世的却是大量有害於社會的墮落的“文學”和電影等等；（三）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發動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其野蠻程度和破壞性，大大超過了前一次大戰；（四）在這次戰爭中，蘇聯取得了勝利，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被擊敗了；接着有六億人口（由於中國人口調查結果為六億以上，此處應作七億——譯者）的國家獲得解放，這些國家的人民推毀了國內的帝國主義統治，並與兩億蘇聯人民攜起手來加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特別是在亞洲，反帝國主義運動從各方面成長起來。

這些發展大大地加深了帝國主義制度的困難，這可以從前面那張關於國外投資的圖表上看出來。四個主要的金融資本中心的私人國外投資的價值，在一九〇〇年與一九一三年之間，增加了二百億美元，而在其後的十七年中，却只增加了三十億美元，後來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甚至於減少了一百一十億美元。當金融資本比過去任何時期需要更龐大的海外帝國，需要更寬闊的投資出路以解決其在國內資本主義社會無法運用於生產的資金的時候，它却只剩下了一個更小的帝國、更小的資本出路、以及更小的超額利潤的來源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帝國主義世界的經濟日益遭到由其本身矛盾所產生的困厄，它只有靠軍火訂貨的刺激來維持自己。

在這個時期中，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對立的發展日趨重要，以致蓋過了帝國主義國家間內部的變化。由於自一九

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經歷了四年的國際干涉和內戰，蘇聯的工業部分被完全摧毀，實際上幾乎陷於停頓狀態。但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期，生產就完全恢復了。後來在幾個五年計劃期間，生產從未間斷地迅速增加，這和資本主義國家遭受經濟危機的情況迥然不同。雖然蘇聯的工業生產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半遭到納粹侵略者的摧毀和嚴重的損害，但到一九四七年末時，蘇聯已經恢復到一九四〇年的生產水平。而且在隨後的幾年當中，它的工業又發展到了新的高度水平。一九五〇年時，蘇聯的工業生產已經比一九四〇年的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七十。

當蘇聯經濟在和平時期迅速發展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却在下降和停滯，戰時則是例外。下列指數表示出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鋼鐵生產量的發展情況（社會主義世界在一九四九年包括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及中國）。

鋼鐵產量指數表(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²⁷：

年份	鐵		鋼	
	資本主義世界	社會主義世界	資本主義世界	社會主義世界
1899	42	—	24	—
1913	83	—	66	—
1929	100	100	100	100
1932	35	143	39	118
1939	91	357	103	378
1943	114	138*	130	200*
1949	89	490*(495)**	111	582*(143)**

* 表示估計數字。 ** 表示括弧內僅指蘇聯的指數。

蘇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鐵產量的增加率，相當於美國工

業成長時期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鐵產量增加率的兩倍²⁸。從發展的速度和穩定性來看，社會主義制度之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是很明顯的了。這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面臨經濟危機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榜樣。於是，帝國主義國家乃試圖收拾起它們自己內部的爭吵，以便聯合起來向蘇聯進攻，消滅這個榜樣。然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仍然很大，以致於使它們組織不起來這樣的聯合進攻。英、法、美帝國主義者並沒有集中主要力量去防止德、日勁敵對他們自己的進攻，他們却鼓勵德日帝國主義去進攻蘇聯。德日帝國主義者也並沒有集中主要力量去擊敗英美帝國主義，他們利用征服歐洲大陸所取得的資源去試圖摧毀社會主義世界。

在擊敗這個空前的侵略大軍的過程中，蘇聯擔負了主要重任，證明了在堅韌、士氣以及軍事作戰能力方面，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優於資本主義的。而且，在大戰期間和戰後，世界上廣大的地區離開了帝國主義的範疇。到一九四九年末時，世界上已經有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區成立了反帝國主義的政府，還有幾千萬的人民正在從事於武裝的反帝國主義鬥爭。

到一九四九年，蘇聯不僅恢復了它在戰時被破壞的工業，而且其每年生產增加的速度也遠超過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速度。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它的冶煉設備的產量足足增加了四倍多，其他各種主要生產工具的產量亦有同樣的增加²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期間，蘇聯鋼的產量以每年四百萬到五百萬噸的速率增加着。這個增產率比美國在帝國主義半世紀中鋼的每年平均增產率多到三倍以上。此外，蘇聯還以大量的設備供應各人民民主國家。例如，單單波蘭一個國家，蘇聯就同意供給它提高鋼產量每年二百萬噸的

充分的冶煉設備³⁰，這個產量超過了整個拉丁美洲在美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統治半世紀後每年的鋼產量。

一九二一年時，蘇聯鋼的產量還不及美國鋼產量的百分之一。到一九二九年，蘇聯鋼產量達到了美國的十一分之一。到一九四九年，蘇聯鋼產量增到美國的三分之一，而超過了英國鋼產量的百分之五十，成爲全世界第二個最大的產鋼國家³¹。

美國與垂死的帝國主義制度

帝國主義腐朽的因素，在美國這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表現得最突出。如果說美國的對外投資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在不斷增長，那麼從事生產的工廠、特別是龐大的壟斷資本的利潤則增長得更快。各大公司每年在未納稅前的利潤達三百億美元以上，此外各種財產收入又每年超過六百億美元，這就構成了一個極大的擴張勢力。同時，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膨脹起來的國內民用商品市場現在不但不能再行擴大，而且正在日趨萎縮。剩餘資本需要輸出的壓力，比起霍柏森和參議員貝弗里治在五十年前所說的壓力已經無可比擬地大多了。

美國金融資本集團遠不以其所擁有的龐大財產爲滿足，它還企圖吞併它的勁敵的現有財產，包括在它們自己國內的部分，它並且企圖在已經解放的地區重建起它的帝國主義統治。這樣，當二十世紀後半期開始時，美帝國主義已經成爲歷史上最強大的、最富有擴張性的、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了。它的擴張企圖和侵略行爲，毫無例外地針對着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它的龐大的艦隊、日益擴張的陸軍和空軍以及原子彈的儲備，都針對着資本主義的歐洲、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它還急於要征服並且在它的控制之下統一整個資本主義世

界，以便去向社會主義世界發動一次新的和更加激烈的進攻，因為它是懼怕與社會主義世界進行和平競賽的。

。 隨着這條道路前進，美帝國主義包容了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所有的衝突和腐朽因素。它與美國人民衝突；隨着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動員工作的發展，美國人民對他們所遭受的帝國主義的災難已日益明白。爲了重分日益縮小的資本主義世界，美帝國主義又面臨着與它的帝國主義勁敵之間的衝突。它所面臨的還有人數比以前任何時候更爲衆多、組織得更好的全世界人民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抵抗。特別是在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億萬人民正在爲他們的民族解放而鬥爭，這些鬥爭正威脅着要消滅壟斷資本賴以建立其整個寄生機構的基礎——半奴隸性的勞動和廉價的原料。

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沒有力量來抵禦這個浪潮。而美帝國主義則企圖去遏止這個崩潰的發展過程，挽救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以及彌補這個體系的最弱的環節。正如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所說：“美國的反動派有一個很重的包袱，就是它必須支持全世界的反動集團。如果它不支持他們，這房子就要倒塌下來，這是只有一根獨木支撐的大廈。”

第二章

華爾街帝國

在華盛頓的國會會議廳裏，經常可以聽到關於壟斷企業和小商人問題的報告。這些報告的結論總是千篇一律的。威風十足的參議員及衆議員們所提出的報告總是說，壟斷企業如何愈來愈龐大，小商人如何都被擠垮了，國庫及人民如何都被這些壟斷企業搶掠了。但是，其後他們却又都轉而鼓其如簧之舌，重新回到一些例行公事的老套，通過就是這些壟斷企業所命令通過的法案。

一般說來，這些審詢都很機靈地避免談及各大托辣斯的國際性行動——最有危害性的托辣斯行動。一方面雖然有些參議員在國內問題上投票反對壟斷企業，但很少敢於撞擊一下他們的掛着美國國旗做幌子的國外利益。在星期一曾經大肆攻擊托辣斯的參議員，在星期二他却以“國際援助”及“國防”的名義下投票贊成這些托辣斯的世界帝國野心計劃。

實際上，在“外交”或“軍事政策”的範圍內，沒有一個問題不是以某些或全體億萬資本的大公司的非常特殊與非常貪婪的利益為轉移的。在整個世界上，由智利到危地馬拉，由希臘到德國，由朝鮮到利比里亞，美國政府正以“自由”和“反共”的名義來進行軍事與外交的侵略——但其真正的目的，却是為了取得銅礦或水果，煤油或重工業，黃金或樹膠。

自以為“我們”並不是一個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帝國的天真的

美國人都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企業公司正佔有着歷史上最龐大的金融帝國，而政府政策的目的就是去維持或擴張其政治控制範圍——即擴張其政治上的帝國，以便保證能夠促進這些企業公司帝國的擴張。

如果說美國的工業是壟斷的，——實際上確是如此——那麼，資本的輸出與國外帝國的產業的壟斷性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統治整個國內經濟的只是幾百個公司。而在這幾百個公司之中，又只有幾十個能有經濟的和政治的力量去搶奪大量的國外資產，去在廉價工資的殖民地和外國產業中取得特殊的利潤，去排除英德及其他帝國主義托辣斯的競爭，去危害別人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以實現其對這個國家的經濟控制。

一九四三年，在所有受美國控制的國外企業的資產中，有一百家公司及其分行佔有了其中的百分之七十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這些勾心鬥角的國際角逐中，有很多公司就支持不下去了。到了一九四七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直接新資本輸出集中到了十個大公司手裏²！

這十個托辣斯以及其他渴望參與大規模國外投資的公司的需求，支配着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發展。因此，對於美國大聯合企業的世界地位和它們如何與那些以倫敦、阿姆斯特丹以及巴黎為基地的同類的聯合企業們共同進行瓜分各種工業與資源，加以分析是很必要的。

在基本工業原料、煤油和五金方面，這些大托辣斯們的瓜分世界表現得最為明顯。這些物資都取自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有時加以提煉或進行其他加工），被運回各帝國主義本國加以製造，然後再以不同的形式被出售於世界市場。在所有這些榨取、製造與販賣的階段中，都脫不了帝國主義公司們的統制。

石油托辣斯對世界的瓜分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是洛克菲勒石油帝國的一個最大的組成部分。這個公司生產或掌握了差不多等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在一九四八年與一九四九年的石油總產量的五分之一。在其一九四九年度報告中，它在一張世界地圖上表示出它佔有十四個產油區、四十個煉油廠和無數的推銷區域。地圖上綠色的推銷區域包括有十六億七千萬人口——即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二所居住的地區，除去中國大部分地區與北朝鮮（雖然美孚公司自稱這些仍然是它的市場範圍），則包括十二億六千二百萬人口，即相當於資本主義統治下國家的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地區。

下面就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在美國和在各洲上所分佔的市場（其比較僅限於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地區）³。

一九四九年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銷售區域表

人口（以百萬為單位）

洲別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區域人口數目	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地區人口總數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在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比
北美洲	113	206	55
北美洲中之美國部分	74	144	52
南美洲	96	103	93
歐洲	239	297	80
亞洲	718	767	94
大洋洲	12	12	100
非洲	84	188	45
世界總數（資本主義世界）	1,262	1,573	80

在大部分這些區域中，美孚油公司並不是有絕對獨佔的權利的。它通常是與一個或多個其他托辣斯在共同協議的市場分配和售價的基礎上分享權益的。資本主義世界差不多完全被七個石油托辣斯所瓜分。這七個托辣斯中有三個是洛克菲勒的公司，一個梅隆的公司，一個代表幾個不同的美國金融資本集團，一個是英國的，另一個是英國荷蘭合股的公司^①。

有些活動是單獨進行的，例如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是通過其分公司，即熱帶石油公司來控制哥倫比亞的石油生產。另一些活動却由七個托辣斯中的兩個或多個巨頭合組的特種公司去進行。例如阿拉伯油礦的開採權就是為阿美石油公司所獨有，而這個公司係由四個美國聯合企業所組成^②。這四個公司又與英荷殼牌石油公司集團合組一個特別公司共同佔有新畿內亞的採油權。海灣石油公司與英伊石油公司合組了科威特石油公司。煉油與推銷同樣是由這些托辣斯通過不同的組合形式去進行的，雖然在這方面這些公司通常是單獨進行的居多。

在一九三九年，這七個公司控制了除美國、墨西哥與蘇聯以外的全部石油產量的百分之八十⁴。其後，他們所佔的比例數更日漸增加。

這些龐大的公司共同對市場的瓜分與利益的結合，是與它們彼此之間爲了爭奪更大利益而進行極激烈的鬥爭同時並進

① 這七個聯合企業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屬於洛克菲勒；英荷殼牌石油公司集團，屬於荷—英資本；英伊石油公司，屬於英國；紐約美孚油公司，屬於洛克菲勒；德士古公司，屬於洛克菲勒。摩根和芝加哥的金融資本；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屬於洛克菲勒和芝加哥金融資本；海灣石油公司，屬於梅隆。

② 這四個聯合企業即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德士古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與紐約美孚油公司。

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開始之前，伊拉克（當時仍為土耳其帝國之一部）的摩蘇爾石油開採權是德意志銀行與英國的狄雅奇集團所分享的。但在這兩個集團之間，鬥爭繼續存在，以致中東石油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目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協約國以外交及經濟手段去進行伊拉克油礦的重新分割，其最後結果由英國、荷蘭、法國與美國的利益集團所分享。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托辣斯與美國托辣斯一方面在其他地區維持並擴大彼此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却在英國及整個英鎊區域中爭奪對各個市場和煉油廠的控制權。

在過去十年中，由於在軍用上採用石油量的增加和在工業上用煤改為用油的關係，英國與美國的石油托辣斯的利潤與產業已大為增加。美國的托辣斯擴張得更為迅速，而且顯著地提高了其對英國對手的優勢地位。除了其在美國國內產量大部分不流入世界市場者不計外，美國托辣斯所佔世界石油產量的比例由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增至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五十，而英荷集團所佔的比例，在同一個十年間，却從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五跌到百分之四十二⁵。

美國的石油公司在國外進行的大量投資遠遠地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壟斷集團的資本輸出。它們在委內瑞拉的生產增加了一倍，在中東生產所佔的比例數字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不足百分之十提高到一九四八年的近百分之五十。在英國、荷蘭、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它們已經建立了或者是正在建設着各種新的煉油廠。它們大量收買了過去在法國、意大利、中東和日本而由歐洲及日本的資本家所控制的煉油和輸油設備。它們在加勒比海區域、非洲和東印度羣島取得了過去為英法資本家所有的重要的新油礦開採權。

但華爾街毫不以此爲滿足，它的目的是要整個吞嚥英國的石油托辣斯。迄今在石油工業方面比較不佔重要地位的摩根集團業已在規模僅次於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英荷殼牌石油公司集團裏獲得了重要的勢力。爲了要繼續和洛克菲勒在爭取世界石油霸權競賽上作鬥爭，這個英荷集團需要更多的新資本，而這些新資本却不是英國及荷蘭的銀行家們所能供應的。當世界上愈來愈多的區域受到馬歇爾計劃及其他計劃的影響而被迫愈來愈要依賴美元的時候，英國的石油老闆們也感覺到在他們的很多業務中需要用美元來作結算。

爲了取得資本與美元外匯，英國金融家不能不招入摩根集團。在一九四八年英荷殼牌石油公司集團通過摩根卜斯坦萊公司借得了一筆二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來在財政上支持其西半球的擴張。所有西半球的產業都做了抵押品，而殼牌石油公司的有控制權股份及其在美國的支行，也都拿來作爲附屬抵押品⁶。在一九五〇年，摩根的倫敦分支機構摩根·格蘭福公司的聯合董事長史密斯，在摩根·格蘭福公司爲殼牌公司募得了三千萬英鎊的股份之後，即被選爲英荷殼牌公司所屬在英國部分的殼牌運輸與貿易集團這個董事會的董事⁷。

這些石油聯合企業的活動究竟顯示出一個什麼傾向呢？第一，它顯示出金融資本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加深剝削。第二，它顯示出英國資本與美國資本之間的衝突，而同時又顯示出英國利益與美國利益却又在互相結合成爲英—美帝國主義。第三，它顯示出英國資本的日漸依附美國資本，其依附程度已經達到使得英國（以及荷蘭、法國和其他歐洲的）資本家情願將其對倫敦及其他歐洲金融中心的效忠轉向華爾街去。

國際五金聯合企業

資本主義世界的銅主要是分配在三個美國公司和七個英國及比利時集團的手中。美國的三大公司，即安那康達、肯奈各特和費爾布斯·道奇，控制了整個美國銅礦資源的四分之三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銅礦資源的三分之一。

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一個報告書曾經描繪過各個銅業托辣斯之間的關係，以及各銅業托辣斯與主要金融集團之間的關係⁸。這個報告書在敘述這些關係時曾詳細地描寫過六個人物，說這六個人物“能够直接或間接地壟斷整個世界上原銅的產量與價格政策”。

這六個人物及其主要有關的公司為：科尼留斯·凱來，屬於安那康達銅公司；斯坦納德（一九四九年已逝世），屬於肯奈各特銅公司；摩根公司的採礦與石油專家小費來德·西爾斯是紐蒙特礦務公司的副總經理；柴斯特·比泰，是羅得西亞銅礦的主持人；羅勃脫·斯坦萊，屬於國際鎳礦公司；路易·開茨屬於費爾布斯·道奇公司。

這些人通過持股公司、業務公司、銀行聯系以及互相連鎖的董事會一系列複雜系統而進行活動。他們雖為彼此的地位而互相競爭，但在對於採銅工人進行最大限度的與持續的剝削時，和在排斥欲分沾其剝削利益的外人時，他們却為了國際金融資本的共同利益而聯合起來採取一致行動。

在上述的六個主要人物中，五個是美國人，一個是英國人（即柴斯特·比泰）。這反映出在國際銅業聯合企業中華爾街所具有的壓倒優勢。一方面洛克菲勒支配着石油業，而摩根家族則支配着銅工業。就一九四五年而言，摩根公司及其聯合的銀行在

各個主要銅業公司中佔據十六個董事的地位，而洛克菲勒集團的大通銀行則相對的只據有七個董事地位。

從上述六個人物之一小費來德·西爾斯的經歷中，可以看出美國政府與主要金融資本中心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爾斯曾擔任過好幾個與摩根集團利益極有關係的重要職位。其中之一就是担任當時戰爭動員局局長貝爾納斯的生產顧問。在一九四六年，當貝爾納斯就任國務卿時，西南非洲的領袖正要求聯合國援助他們去反抗奉行南非種族歧視的殖民者的壓迫，但聯合國的美國代表團却用拖延手法阻止聯合國採取有效的行動。南非洲政府爲了酬謝英美聯合帝國主義者就給予他們以西南非洲的蘇麥布銅礦，這個銅礦以前是屬於德國的企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沒收的。摩根和西爾斯的紐蒙特礦務公司得到了三分之二的股份。這些新的英美老闆們用一百萬美元的現金投資，在三年之內就刮得了九百萬美元。在一九四七年，當貝爾納斯脫離國務卿職位以後，很快地就被任爲紐蒙特礦務公司的董事。

世界鎳業壟斷組織之簡單與銅業壟斷組織之複雜恰成對比。單是國際鎳礦公司一家公司的出產就佔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鎳生產量的六分之五。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的各個集團並未各自組織個別的公司，而是集合在這個單一的公司中分佔其股權與董事職位。在這裏，同樣是美國的利益集團佔着壓倒優勢。在一九四九年末，美國人佔據着主席和總經理的職位，而在國際鎳礦公司的執行委員會的九個委員席位中，美國人也佔了七個。杜勒斯這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人物，就是國際鎳礦公司的董事和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時又是該公司法律顧問 蘇里文—克郎威爾律師事務所的主任

律師。

鋁業是為一個單一的金融資本集團，即梅隆家族所支配。這個家族的美國鋁公司控制了全世界鋁生產量的極大部分——它在美國居於優勢地位，在加拿大有百分之百的支配力量，它控制着挪威與意大利的各個公司和它擁有對於英國、荷屬圭亞那、南斯拉夫與法國的鐵礬土蘊藏的所有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軍用飛機製造業收購了空前數量的鋁，美國鋁公司已大為擴張。同時，它的主要世界勁敵德國鋁業托辣斯，也暫時解體。因此，當一個與其他金融資本集團關係比之與梅隆家族更為密切的華盛頓行政當局容許兩個新公司——即凱塞爾公司與雷諾公司——加入美國鋁生產的角逐場時，這對於美國鋁公司並沒有多大的影響。雖然多了這兩個公司，美國鋁公司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的生產量仍增加了三倍，而它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鋁生產總量中所佔的數額也由百分之四十增至百分之六十五。再加上這兩個新公司，美國金融資本就控制了資本主義世界原鋁總產量的百分之八十五。

在各種重要工業原料中，只有在橡膠方面美國企業公司佔有數較小。雖然美國橡膠公司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有很多產業，但大部分的天然橡膠仍必須向英國與荷蘭的聯合企業購買。在這裏，美國政府曾採取各種步驟去保護美國輪胎的壟斷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人造橡膠工廠曾在美國設立，其能力足以供應所有美國的需要。因此，美國政府規定了在橡膠製造業中要強迫採用大部分的人造橡膠來與天然橡膠相混合。強有力的美國聯合企業就是通過這種方法剝奪了它們的英荷對手在天然橡膠方面所佔的近乎壟斷的優越地位的。

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金融資本就已經對於玻

利維亞的錫礦頗有利害關係，但英國、荷蘭與比利時帝國主義者却在其他地方的錫礦居於壟斷地位，同時還擁有資本主義世界中的所有熔錫工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就在得克薩斯州的得克薩斯城建築了一個錫礦熔煉廠，替美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此外，美國政府更利用其在遠東和非洲在戰時的軍事勢力，取得了歐洲國家所佔有的大部分錫礦資源供應。在一九四九年，在玻利維亞錫礦中約有百分之六十二、印度尼西亞錫礦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暹羅錫礦中約有百分之三十五、比屬剛果錫礦中約有百分之七，都是在美國得克薩斯城的熔錫廠中化煉的⁹。

原料缺乏的神話

有人用種種方法企圖說服美國人民，使他們相信美國企業公司的國外掠奪與他們有切身利害關係。美國政府與大公司的代表們哀號着國內資源的“耗盡”，並且警告大家說，除非美國的大公司能夠擴張其國外的石油與金屬產業，否則美國就無力抵禦外來的侵略。

美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包含着同時也需要廣大的美國原料資源的相應發展。當美帝國主義正在進行擴張其世界帝國的時候，特別是在過去的十年中，壟斷企業已經愈來愈增加其對於國外原料的使用，來代替國內的原料。這並不是因為國內資源已經用罄。由於鑽探工作的加強和改進，業經證實的和推算大概存在的資源蘊藏量在今天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要來得大。其所以去開發國外資源，乃是因為這些大公司要從殖民統治下實行極低工資的國家裏去榨取原料來攫取超額利潤，同時又因為美國壟斷企業要使所有可能被利用的資源一個也不落在其對手手

中。今天，美國政府正代表着這些壟斷企業囤積大量原料，作為一種軍事的戰略行動，同時又作為一種壟斷購買的形式，企圖一方面阻止社會主義世界向資本主義世界購買原料，另一方面，用以限制對其他與其相競爭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供應。

事實是：今天的美國只有世界上百分之七的人口，却消費了差不多世界重要原料供應的半數（以一九四八年為例，銅，百分之五十一；石油，百分之六十七；天然橡膠，百分之四十八；羊毛，百分之三十四；以上均指其對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消費量而言）。美帝國主義就好像是一條大型的寄生蟲，吸取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然財富。英帝國主義的喉舌“經濟學家”周刊就曾埋怨過美國政府的石油政策，說這個政策好像“假定了美國人有上帝賦予的特權，可以繼續消耗這個重要燃料的世界供應總量之三分之二或更多的數目”（見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該刊）。

所謂資源枯竭的藉口，不是被別人，正是被這些石油公司本身給揭露無遺。而這些公司在“國家利益”與“國防”的宣傳口號下，進行着龐大的對外擴張。例如在一九四四年，這些石油公司羣起反對美國政府建造一個橫渡阿拉伯的輸油管的工程計劃。當時，主要的石油公司寧願推遲阿拉伯石油的全面發展，以便讓它們能按照自己的條件取得輸油管的修建權和完成各公司彼此之間的協議。

通過它們的“石油工業研究基金會”，它們出版了一本以“世界石油的實況與政策”為題的小冊子，其中的內容正可用以反駁那些替帝國主義攫奪原料辯護的典型藉口。因為，照這個小冊子所說，在美國蘊藏石油的區域中，只有極小部分被開採了。它又說：除了由天然煤氣、油頁岩和瀝青砂等新資源而來的油之外，單就美國的自然石油蘊藏量一項來說，就足以供應一個世紀的

使用。最後，用氫化煤的方法來製造石油亦最少可以供應一千年之久。

這些事實，再加上原子能的發展，證明了技術的進步可以使得新的動力來源和原料能夠趕得上工業的發展，並適應其需要。在這方面唯一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東西乃是帝國主義擴張本身。它以瘋狂攫奪外國物資和從中抽取超額利潤來代替國內資源與能量的正常開發，同時又將原子能誤用於非生產的軍事用途。這樣，帝國主義者自己給自己製造出原料的問題。因為，它使自己依靠國外的資源，那麼，當別國人民一經得到解放並堅持要自行使用其資源去發展其國家時，這些國外資源是一定要失去的。

英國、法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已經受到這個教訓了。他們的經濟原來是建立在進口原料的基礎上的，而現在，由於這些帝國主義國家本身力量的衰落和美帝國主義對他們國外產業的吞併，或者由於以前被統治的人民通過民族解放運動重新收回了這些產業，於是就失去了一部分昔日所依賴的進口原料。美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程度遠超過過去任何一個帝國主義，所以也就為美國人民製造着更深刻更長遠的問題。

這個石油工業的小冊子也揭穿了所謂為了國防措施需要國外物資的謊話。它說，原料的爭奪引起了第一次大戰，同時也是第二次大戰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此看來，爭奪國外原料就使得戰爭成為不可避免，並且替國家製造危機，根本不能成為鞏固國防的根據。這本小冊子在討論中東石油情況時曾這樣說：

“美國是否決心將來在世界各處遠地設立前哨防衛站，並且建立與維持一支休閒的和平時代軍隊來保衛這份特殊的財產呢？即使假定我們準備這麼做，我們又能不能夠指出誰是我們未

來的敵人呢？我們應不應該，譬如說，設立對付蘇聯的警戒線？因為蘇聯是今天世界上軍力最強盛的國家，而它的領土又與輸油管橫跨的區域相隔不到二百哩。答案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從軍事的觀點看來，這個警戒線的建立與防衛是需要的話，那麼我們顯然就必須把軍隊駐紮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這個說法，在今天也正如在一九四四年時一樣地不可避免，實際上只是一種用以掩飾這些大石油公司各種行動的虛偽外衣罷了。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乃是阿拉伯石油公司的合夥人。這些石油聯合企業因此成為各種戰爭的首要煽動者；它們煽動內戰，例如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它們煽動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爭，例如印度尼西亞戰爭；它們煽動反社會主義世界的環球備戰（參閱第六章至第十章）。在石油托辣斯與其他有侵略野心的金融資本集團督促之下，美國軍隊駐防於全球，實行“警戒”。阿拉伯是由一個美國的軍用機場所控制，同時又為充滿了美國軍火與軍事顧問的國家——如希臘、土耳其與伊朗——所包圍。

正是這種情況，而並不是所謂“原料缺乏”的神話，才是美國人民與國家安全的真正的威脅。

食品來源的佔有

一般來說，食品的佔有與控制是按地理區域而分割的：美國利益集團霸佔着整個西半球、夏威夷以及菲律賓，英國資本和小部分的法國資本霸佔着非洲與地中海區域，英國與荷蘭資本則霸佔着遠東。

美國集團乃是古巴、波多黎各、夏威夷與菲律賓羣島所產大部分世界蔗糖的直接所有主。阿根廷與烏拉圭的肉類工業主要

是為芝加哥的三個大肉類包裝公司所有，而英國的資本家只居於次要地位。

通過收購的壟斷，像大西洋及太平洋茶葉公司與通用食品公司這樣的食品聯合企業就統制了巴西、哥倫比亞、危地馬拉與海地的咖啡工業。菲律賓的椰乾也受制於同樣的壟斷收購。

與波士頓金融資本有關的聯合果品公司乃是對外投資十大公司之一。

在一九四八年末，它在中美擁有五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英畝經過改良的耕地、一千四百七十四英里鐵路、二百零九英里電車道、七萬二千零八十二頭牲畜以及六十六艘航行大洋的輪船，其中有五十艘是有凍藏設備的鮮果載運船，有十四艘是由其英國分行用以進行歐洲貿易的。它擁有聯結加勒比海國家與美國之間的電報系統、電話線、無線電台與在波士頓附近的一個大煉糖廠，以及一個在美國具有四十五家分支機構的推銷公司。在其所有耕地中，有十四萬八千五百九十三英畝是種植香蕉的，分佈在八個國家內；有十萬零三百七十九英畝是種植甘蔗的，主要分佈在古巴；有四萬八千七百六十二英畝是種植可可的，分佈在四個國家內；有二萬五千九百零八英畝是種植馬尼刺麻的（是替美國政府經營的）¹⁰。

這些產業實際上是代表着某些中美國家，如哥斯達黎加、巴拿馬與洪都拉斯等國國民經濟中一切重要的東西。聯合果品公司對於這些國家還使用相當的直接政治壓力，以配合美國政府為維護該公司利益所實施的一般政治與軍事的控制。

在香蕉工業方面，聯合果品公司早就打敗和吞併了它的主要的英美敵人——大西洋果品公司，愛達爾公司與費佛公司。現在，它控制着整個世界的香蕉商業，包括從種植到零售。在美國

聯邦法庭的民事訴訟中，聯合果品公司曾被控訴為“使用種種壟斷方法，包括售賣香蕉時要與顧客訂立不購別家香蕉的合同；對於購買入口商及別家商店貨品的顧客，聯合果品公司與標準公司將拒絕售貨；有意破壞企圖加入香蕉行業競爭的商人的生意”¹¹。

在近年間，聯合果品公司的產業已經大為擴展，特別是在試圖種植各種非洲與遠東的熱帶植物以打破現存的英國的壟斷。美國政府在物質與精神方面支持這些所謂“愛國”的行爲，因為在西半球種植雜刈萱草、非洲椰子油、可可與馬尼刺藤被認定為是能夠增加美國國家的安全的¹²。

工業帝國

美國的大企業對於他國的控制並不限於對原料及食物的榨取和這些東西的初步加工。這些最大的壟斷性製造業同時又是資本的輸出者。在一九四八年，福特汽車公司與通用汽車公司佔了美國以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汽車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在加拿大，美國汽車公司的地位是壓倒一切的，而在歐洲兩個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家——英國與德國，美國公司也佔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生產量。此外，這些汽車製造商還在全世界各出口市場中設有汽車裝配工廠網。

國際收割機公司與福特公司的拖拉機廠，也同樣有國外投資。在五金鑄造業方面，差不多所有重要的美國公司都在一個或多個先進歐洲工業國家中設有工廠，同時美國各個大公司在大部分生產製造業方面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在加拿大設有分公司的。

美國各橡膠輪胎公司在各大洲上設有無數的分公司。

誰都知道在美國電氣工業中，從透平到電燈，從無綫電到電力公司，從電冰箱到電話，摩根集團的公司都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個帝國擴展的範圍遍及全球。

摩根集團在通訊器材工業方面的世界性業務主要是由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來經營的，這家公司在加拿大、阿根廷、巴西、智利、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典、瑞士、奧地利及澳洲各地分別製造器材。它同時又從各歐洲公司中收取製造器材的專利權使用費。它在世界各國經營電話、電報、海底電綫以及廣播電台。此外還有一些無綫電設備則為另一個摩根聯合企業美國無綫電公司所控制。摩根集團的國際電力事業係由美國海外電力公司經營，這個公司在南美的十一個國家和中國都有經營。

摩根集團的電業世界帝國是以通用電氣公司為台柱的，這是一個最有勢力的電氣器材製造托辣斯。例如，一九四五年時，它在日本、德國、法國、摩洛哥、英國和意大利的各主要電氣器材托辣斯中佔有其股權的百分之十五至四十九。在一九四八年，它在奧地利、比利時、智利、荷蘭、西班牙、瑞典與土耳其等國中也佔有股權，而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烏拉圭、南非和中國的電氣器材工廠中則佔有全部所有權^①。在一九四七年，通用電氣公司所屬的和聯系的海外機構共有僱員二十一萬人，如果以通用電氣公司在其中所佔的投資數目為比例計算，則其所佔的僱員比例數字最少為五萬人¹³。這個五萬人的數字只有通用電氣公司全體僱員數目的四分之一。

通用電氣公司的海外擴張仍在繼續進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四個年頭中，它的海外新投資總額為八千五百萬美元（約佔同一時期中通用電氣公司全部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一）¹⁴。

卡特爾制度

談到這裏為止，我們的討論一直是集中在分析各大聯合企業如何通過資本輸出的方法來瓜分各種工業企業的產權。這的確是帝國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通過這種方法，它們可以對低廉勞動力進行直接剝削從而取得特別的利潤。

但是，和物質財產產權的瓜分齊頭並進的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瓜分。瓜分市場是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國際卡特爾來實施的。這些卡特爾所用的方法雖然各有不同，但也還有一些指導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維持壟斷的高價。第二個原則就是通過專利權的交換在各個托辣斯內保持技術的壟斷。第三個原則是根據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狀況，通過彼此同意的限額來限制生產。第四個原則是實行劃分市場，劃分的方法是將這個或那個地區分別指定為某個國家托辣斯的壟斷勢力範圍，而在非指定的市場中則彼此同意規定一定的銷售範圍。

- ① 在控告通用電氣公司及其海外有關係的公司之反托辣斯起訴書上曾列出其所佔的股權如下：

	百分比
英國：合衆電氣工業有限公司	(優先股) 20.72
	(普通股) 40.66
德國：電氣總公司	18.14
日本：芝浦工程有限公司	15.00
法國：湯姆遜—豪斯頓公司	18.94
意大利：電氣總公司	49.21
墨西哥：麥根尼奇電業會	22.47

通用電氣公司在電燈泡製造公司中所佔的勢力更大，主要是因為它佔有專利權。

有一個流行甚廣的神話，說國際卡特爾只是一種“歐洲的”現象，美國的企業公司在國際上是實行自由競爭的。一九四四年，羅斯福總統在給國務卿赫爾的信裏談到美國反壟斷的傳統時，曾經聲稱美國的法律與政府政策是遵守這種傳統的。他對於納粹黨與德國卡特爾分子，特別是與法本化學工業公司之間的密切關係深表憤慨，並且堅持必須通過聯合國去制裁這種卡特爾活動。

美國人民是有一個強有力的反壟斷傳統的。但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或者工業巨頭的行動，並不是像羅斯福總統所說的那樣歷來都是反對國內或國際壟斷的。

余爾曼法案與克萊敦法案只不過是一種敷衍大眾的東西。在這些法案之下，許多大托辣斯仍然能夠毫不受拘束地組織起來。而且，美國金融資本很快就將其壟斷方法擴展到國外去了。

最早的國際卡特爾之一是在一八九六年由梅隆家族的美國鋁公司與瑞士—德國鋁業托辣斯所共同組成的¹⁵。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的各主要企業公司參與了化學、石油、鋼鐵、硫磺、銅、電氣器材、鋅、鹼、硝、鋁以及軍火等國際卡特爾¹⁶。實際上，美國的公司幾乎在所有的國際卡特爾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的確，法本公司與納粹政府勾結起來進行德國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罪行，受到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是應該的。但法本公司的卡特爾夥伴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是罪惡相等的。這並不像一些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什麼法本的“騙局”。在征服世界的鬥爭中富有經驗的和伸展自如的美國金融資本，乃是希特勒與德國金融資本在建立德國軍力以準備實現兼併蘇聯的妄想時的同謀犯。後來這種同謀協助一部分轉變成為侵害美國人民的

行爲，這個事實正證明華爾街並不是什麼愛國中心，而是美國人民的敵人，因為當它的階級利益能夠實現的時候，它是寧願出賣國家的。

就與壟斷組織合作進行卡特爾活動來說，美國政府的積極性並不下於德國政府。試分析一下一九一八年的韋伯—普魯林法案，這個法案鼓勵了美國的托辣斯去在出口協會中組合其力量以達到其征服世界市場的企圖，試分析一下一九二四年聯邦貿易委員會所作的關於這些出口協會可以正式參加國際卡特爾的決定。又試分析一下瓊斯—柯斯狄根糖業法案，在這個法案中，美國政府等於當了各個國際糖業托辣斯在其瓜分世界協議中的仲裁人。

當美國的製造商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佈置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與其德國同夥們恢復卡特爾計劃時，他們確實是準備這麼做的。但是到了戰後，美國金融資本的首領却偽裝着要反對卡特爾。這其中的原因在理查·沙蘇里所著“法本”一書中有很清楚的說明：

“卡特爾並不能穩定什麼東西。它僅僅表示着在某一個特定時期中存在於某些大生產企業之間的一種關係而已。卡特爾可能是一個一百年有效的合同，可是，當簽約者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時，它是必然要決裂的，有時甚至是一種帶有暴力的決裂。破壞卡特爾的力量往往是由於合夥者一方發展速度超過了另一方所產生的。同時，由於卡特爾中的弱者每每停止前進，而強者則繼續發展，於是卡特爾就成爲一個最易招致戰爭的發源地，最初是經濟戰，最後則變成了真槍實彈的戰爭。”¹⁷

第二次世界大戰，除了代表其他事物之外，還代表各個不同的卡特爾夥伴以武力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爭執的戰爭，結果是美

國壟斷組織成爲最大的勝利者。在目前，卡特爾只能是歐洲托辣斯用以防止美國作進一步侵奪的防衛自己的方法。但是像通用電氣公司的菲利浦·李德那樣虛僞的反卡特爾提倡者已經隨時準備放棄他們這種假裝的態度，一旦新的勢力均衡狀態能夠實現的時候，就要立即組織新的卡特爾。

實際上，甚至於當“反卡特爾”的議論還在甚囂塵上的時候，新的卡特爾照樣在成立。而且，美國政府，和往常一樣，在美國壟斷資本有條件組織新卡特爾的各種工業中協助這些新卡特爾的組成。例如，當美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在進行關於締結國際小麥協定的談判時，它的行動實際上等於是穀物托辣斯的代理人。其後，在一九五〇年，美國政府授意和讚揚法國外長舒曼所提出的建立一個歐洲鋼鐵卡特爾的計劃，因爲在這個計劃中美國的鋼鐵托辣斯可以控制和操縱一切（參閱第八章）。

美國壟斷企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卡特爾協定中所獲得的利益，可以從各個煉鋼設備製造業的托辣斯對世界的瓜分這一個例子中看出來。在這個卡特爾中最主要的托辣斯就是美國匹茲堡的聯合工程鑄造公司，這是一個屬於梅隆勢力範圍之內而同時又與紐約銀行信託公司（屬摩根集團）有關係的公司。

這家聯合工程鑄造公司把持着美國製鋼工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它是全世界製造鋼板鋼條所用的連續軋軋機的首要製造廠，而且具有採用最先進的製造方法的專利執照。它在各個主要的加拿大、英國與日本的製鋼器材製造公司中都有股權^{18①}。

憑藉它的優越地位，聯合工程鑄造公司曾在第二次世界大

① 這個日本公司是指通用電氣公司也佔有股權的日本芝浦工程有限公司。這就是說，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各個日本財閥的企業中，一個最重要的企業已經被摩根和梅隆等集團所控制。

戰以前和資本主義世界中的每一個重要鋼材製造公司分別簽訂了協議。在一九四七年，這些協議曾經重新加以商議，結果是將其他公司的地盤減削，而增加了聯合工程鑄造公司的地盤。這個新的均勢的概略情形，從這個聯合工程鑄造公司與英國鋼鐵公司（屬維克斯公司）在一九四七年所簽協議的條款中可以看出來。這個條款說：“聯合工程鑄造公司的地盤將包括全世界。”一般來說，這些新的協議使得聯合工程鑄造公司的國外競爭者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中淪為向聯合工程鑄造公司收取佣金的推銷代理人，他們只有在極有限的地區中方被允許去銷售其自製的產品，而且還要對聯合工程鑄造公司繳納專利使用費¹⁹。照這樣看來，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製鋼廠這種最基本的工廠只有在得到美國金融資本的准許下，接受美國老闆們所任意規定的條件下方能建立，並且還要對他們獻納各種利益，獻納的方法或者是通過按照壟斷價格去購買他們的設備，或者是為了使用他們的專利製造方法而向其繳納一定的專利使用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電氣器材工業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通用電氣公司與威斯汀豪斯公司，這兩個摩根與梅隆—洛克菲勒的電氣器材托辣斯，已經吞併了國內的競爭者，並且通過種種不同的互相認可的方法和限額協定瓜分了國內的市場。他們在國外建立了強大的國外投資勢力，並且與其他國家的電氣聯合企業將大部分的世界市場加以瓜分。到了一九三〇年，由九個公司組成的國際電氣器材卡特爾已經完成了對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瓜分，在這九個公司之中包括兩個美國的大公司。至於對於那些未被過去各協定包括進去的區域，即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的大部及大洋洲全部，這個卡特爾又訂立了一個“通知與補償”協定。對於任何一種工程安裝計劃（以典型的例子來說，如一個

發電廠)，那些被邀請去參加投標報價的卡特爾分子必須通過卡特爾的機構彼此互相通知，藉以促成彼此同意決定依照何價和應由何公司去承接這個合同。而且，接得該項生意的“得標者”必須在他的標價上加上一筆金額——在某一個已公佈的實例中，這筆附加的數字是百分之十——作為對於那些“未得標者”的一種“補償”²⁰。

這種國外投資與卡特爾組織的結合究竟含有什麼意義呢？第一，不論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任何地方，如果不繳納一種由該壟斷卡特爾分子所勒索的特別收益，那麼誰也買不到電氣工業的重器材。第二，站在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電氣器材托辣斯背後的幕後金融資本集團，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任何一個地區的電力及依靠電力發動的工業的發展都有一種有力的否決權。第三，摩根聯合企業由於它的特殊勢力，它對於其他托辣斯的廣泛滲入，和它在控制各種專利權方面的重要地位，都使得它在這個控制的超額利潤系統中具有最大的勢力。

這樣，舉一個例說，巴西人要在巴西建立一個發電廠，僅僅是願意向卡特爾的公司按照它們所定的超額價格、按期繳納專利使用費等等條件來購買各種發電機和透平是不夠的。即使巴西人願意招請與它們有關係的承辦工程公司去安裝這些設備還是不夠的。巴西人還必須做到不使他們的政策有任何嚴重損害其他摩根集團利益的地方——或者是損害在巴西的梅隆—洛克菲勒集團利益的地方。

如果巴西人士想避免這種壓制，他們可以轉向英國通用電氣公司接洽，在這家公司中，美國所佔普通股權為百分之四十；或者是向德國通用電氣公司接洽，在這個公司中美國利益“僅佔”百分之十八。但不論他們轉向誰家接洽，所碰到的必定是屬

於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或威斯汀豪斯公司系統的公司，或者與它們訂有互相認可協定和推銷協定的公司。

無疑的，假如能將新的卡特爾協定公佈出來，那麼，這種新的卡特爾協定一定顯露出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與威斯汀豪斯公司在世界工業中的絕對支配地位又有了更進一步的擴展。

銀行帝國

美國大銀行參與美國壟斷企業的海外冒險事業的情形，與它們在國內幕後支持各工業壟斷組織的情形是一樣的。在向外的擴張中，各主要銀行為對外擴張担任着談判和推動的工作；在一九三〇年以前，這些投資銀行的銀行家曾經直接成為各種海外證券的放款人和募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控制了更有力的工具。美國政府及國際銀行（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譯者）所貸放的巨額放款的每一分錢實際上都掌握在這些主要投資銀行家的手中。他們的直接代表人都在各個放款機構中佔據着重要的職位。他們的部下主持財政部，他們並且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來指示政府如何解決各種國際金融問題。他們又和英法的銀行家共同組織了許多特種委員會，以便依照有利於美國金融資本的方向來重新分割歐洲的殖民帝國。

作為政府公債券的主要持有人，這些銀行和保險公司每年吞嚥了五十億元以上的公債利息的大部分。這樣看來，這些金融巨頭們是和政府的擴張活動有很大利害關係的，特別是和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活動更是如此，因為幾乎全部的國債都是起源於帝國主義的戰爭的。再來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摧毀了美國人民，但對於那些銀行家們來說，却意味着每年可得一百到二百億美元的額外利息哩。

這些銀行除了一般的銀行經理業務之外，它們還直接參與國外投資。花旗銀行^①、大通銀行（洛克菲勒）、保證信託公司（摩根）和美洲銀行（基安尼尼）這四家最大的美國銀行都各自擁有其國外分支機構，而且在美國金融資本的世界性活動中居於最有力的地位。

以“首屈一指的世界性銀行”自我標榜的花旗銀行在國外設有五十一個支行，並擁有四千四百個職員。截至一九四七年底止，它的國外支行的存款總數共為七億三千六百萬美元，即約三倍於其戰前的存款²¹。它的國外支行的主要業務是替各個在海外經營的美國工業公司服務。這就可以在當地給予各個美國公司以財政上的支持，同時又能夠運用壟斷貸款的方法來排除各種它們厭惡的競爭。

正如這四大美國銀行在所有受到美國資本控制的地區中支配着當地的金融財政一樣，少數的幾個法、英、荷銀行也在同樣支配着各該國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大戰進行期間，德意志銀行也同樣地和德國軍隊在歐洲各地並肩前進。

但是現在的歐洲銀行却正在日甚一日地歸附於它們的美國對手。通過美元的統治地位，華爾街的銀行控制了國際貿易的金融樞紐，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資金的主要部分掌握在自己手裏。一九四九年底時，外國人在美國的存款總額就達到五十億美元以上。單就大通銀行一家來說，在一九四八年它就曾替一千三百家外國銀行和三千八百家美國銀行代收存款²²。衰落的歐洲金融資本中心正日漸被迫轉向美國求援，或者是直接地，或者是間接地通過美國政府或華爾街所控制的“國際”代理機構來要求

^① 在這一家服務於美帝國主義擴張事業的主要銀行裏，摩根集團的勢力近來最有影響。

美國協助它們去實現它們自己的擴張計劃。

一九四八年底時，美國私人對國外投資的地域分配情況，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數年間各個地區投資的增加數額請見下表²³：

地 區	1948年末 (單位：十億美元)	1945年至1948年 的增加數額 (單位：十億美元)
加拿大	6.1	0.7
美洲各國	5.4	1.4
“歐洲復興計劃”國家	3.9	0.5
“歐洲復興計劃”國家 的附屬國(殖民地)	0.6	0.3
其他歐洲國家	0.7	0.0
其他外國國家(大部分 為中東國家)	1.5	0.6
國際性的	0.2	0.2
總計	18.4	3.7

美國投資在工業上的分配情形以及其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的增加數額，請見下表²⁴：

類 別	1948年末	1945年至1948年 的增加數額
製造業	3.6	0.9
裝配業	0.9	0.3
農業	0.6	0.1
採礦冶金業	1.1	0.1
石油業	3.0	1.5
公用事業	1.3	0.1
其他	0.7	0.2

直接投資總額*	11.4	3.0
證券投資*	5.4	0.1
短期資產	1.7	0.6
總額	18.4	3.7

* 關於這兩個名詞的解釋，請參看本書第八二頁。

從這些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金融帝國仍然是集中於西半球的。戰後的擴張大部分是屬於石油公司方面的，此外，製造業的聯合企業也曾擴張了其國外的產業。

貿易帝國

美國托辣斯的投資帝國同時也就是一個國外貿易的帝國，那些美國投資最多的國家，實際上恰巧也就是美國對其輸出商品最多的國家。

這種一致性實際上是金融資本結構本身所必然產生的結果——舉例來說，在半殖民地中經營發電廠的美國的公用事業公司與美國電氣器材的公司之間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當前者購置工廠設備時“自然”是要把訂單交給那些美國電氣器材公司來承辦的^①。這種一致性同時也是由於美國對若干國家實行財政控制的結果，如對古巴與委內瑞拉，既使它們成為美元集團的一部分，同時又使它們對於那些雖與美國投資沒有直接關係的進口商品，例如食品與消費品，也不得不從美國輸入。

這樣看來，資本的輸出首先是那些投資企業公司超額利潤的來源，但同時也是整個美國壟斷企業的額外利潤的來源。金融

① 關於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結合的另一種形式，可以舉格雷士公司為例。這家輪船運輸公司是通過其對南美洲西海岸的貿易控制而起家的，隨後還在秘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和智利購置了或建立了十多個工廠。

資本對鼓勵資本輸出的興趣並不只限於那些最需要輸出資本的工業，而是已經擴展到包括大部分工業、農業以及金融壟斷事業的。

美國壟斷企業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的機會，乘機從它們的對手中奪取了各種市場與各種原料供應地。統計在各國（包括美國）向西半球（美國除外）的國家所輸出的工業製成品總額中，美國所佔的數字已經由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二增加到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三。在各國對亞洲、非洲及大洋洲的工業製成品輸出總額中，雖然這些地方過去大部分都是歐洲列強及日本的殖民地禁樹，但美國所佔的數字也由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十一增加到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五²⁵。對於很多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國家來說，美國的貿易地位也有同樣的進展。下表所列國家均係美國的商業在那裏有驚人發展的國家，這裏所列舉的都是在西半球以外的國家，在這些地區中美國輸出的價值增加了五倍或五倍以上²⁶。

	1935—38年 的平均數	美國對該國的 輸出額(單位: 百萬美元)		美國在該國的 輸入額中所佔 的百分比
		1948年	1949年	1948年
奧地利	2	146	151	42
德國西部	112*	863	820	57
希臘	7	233	187	65
意大利	65	418	458	38
葡萄牙	12	76	52	23
瑞士	9	171	143	19
土耳其	11	101	120	37
南斯拉夫	2	8	20	4
伊朗	7	44	79	30

巴勒斯坦	3	29	79	27**
沙特阿拉伯	2	84	85	74***
印度	35	298	253	20
巴基斯坦	—	17	46	7
朝鮮(南部)	—	70	52	34
印度尼西亞	22	92	124	22
泰國	3	16	32	17
阿爾及利亞	2	37	26	7
法屬摩洛哥	4	28	31	12
法屬西非	5	30	37	10
比屬剛果	2	49	48	31
南非聯邦	76	492	266	38

*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數字包括全部德國。

** 一九四九年的前九個月。

*** 根據輸入總額的不完全資料。

美國對外貿易數字之所以能够增加，主要是通過軍事佔領（指對西德、希臘、土耳其、南朝鮮）、馬歇爾計劃的傾銷以及其他類似的特別辦法。至於資本輸出的增加，却還沒有來得這麼迅速。不過，貿易額的增加如果沒有用增加資本輸出的方法來加以鞏固，那末這種貿易額的增加終究是一種暫時性的。早在一九四九年間和一九五〇年的上半年，當歐洲的生產恢復之後，美國的輸出就相當劇烈地下降。於是，華盛頓當局趕忙實施那些能够鼓勵資本輸出和適合美帝國主義需要的加緊備戰政策，爲了創造有利條件以保持並增加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劫掠得來的收穫。

領土帝國

工業聯合企業和金融聯合企業對於世界的分割是與資本主

義世界在地理上之劃分爲各個帝國主義帝國同時進行的，每一個這種帝國都受單一的權力中心在經濟上、政治上與軍事上的控制。在這裏，我們將美帝國描繪出來——不過，由於其權力的經常變動，在這裏我們僅能作一個嘗試性的描繪。

在這裏，我們僅能列出一張最低限度的表格，表上列入的國家僅限於那些美帝國主義者對它們的控制已經相當鞏固的國家，同時對它們的剝削已經使得它們的主要經濟部門大部分爲美國資本所直接佔有或控制。在下表中，有 * 記號的國家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被哥倫比亞大學的托馬斯·派克·穆恩教授在其所著“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一書中，算入美利堅帝國範圍之內。其他一些國家則係自那時以來新增添的，這些國家大部分是奪自英帝國主義，較少的一部分是取自德帝國主義的。

一九五〇年的美利堅帝國

	1947年時的 人口數字 (單位:百萬)	主要的美國托辣斯 或被美國控制的物 資名稱
阿拉斯加 *	0.1	漁業公司
加拿大	13	多方面的
格陵蘭	0.02	美國鋁公司(冰晶石)
古巴 *	5	糖業托辣斯
墨西哥	23	美國鑄煉公司(非金屬), 其他托辣斯
八個中美洲與加勒 比海沿岸小國 *	15	聯合果品公司,花旗銀行
波多黎各 *	2	糖業托辣斯
委內瑞拉	4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哥倫比亞	11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秘魯	8	格雷士公司(航運), 維羅· 戴·巴士克公司(銅)
智利	6	安那康達銅公司, 肯奈各特 銅公司(銅)

玻利維亞	4	美國金屬公司(錫)
巴西	48	多方面的
圭亞那(荷屬與英屬)	1	美國鋁公司(鐵礬土)
阿盧巴(荷屬西印度羣島)	0.1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夏威夷*	0.5	五大糖業家族
菲律賓*	20	多方面的
沙特阿拉伯與巴林島	6	四大石油公司
土耳其	19	鉻鐵礦
以色列	1	多方面的
希臘	8	煙葉
利比里亞*	2	法斯通橡膠公司, 共和鋼鐵公司(鐵砂)

(附註)

i 本表的人口數字取自聯合國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統計表報”甲類第六冊中“人口及重要統計報告書”。

ii 有*的國家是穆恩教授在其“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一九二六年紐約出版)一書中第五百二十四頁第四表中列出來的。在八個較小的中美洲國家中,穆恩只列出五個。又在本書上表中未包括還有一些幾乎完全成爲軍事基地的重要殖民地,例如關島、沖繩島、巴拿馬運河區。

除去上表所列的特定公司與特定物產之外,在大部分的國家中美國的公用事業公司還控制着它們的動力與交通,美國的銀行控制着它們的金融。

一九二六年時,在穆恩列入“美國殖民帝國”的各個國家中,共有人口二千二百萬。而到一九五〇年,在我們上述最低限度可以列入美國殖民帝國那些國家中,已經總共有人口二億人以上(這是根據一九四七年估計的一億九千七百萬人再加上人口自然增殖數字計算出來的)。

至於日本(人口七千八百萬)與西德(人口四千八百萬)則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美國軍隊佔領着這些國家,美國的金融資本

控制着它們的對外貿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壟斷資本對這些國家已經作過相當大量的投資，然而這些國家都是工業發展的先進國家，其本國人士仍然佔有着大多數的基本工業。在這裏，有人民反對美國佔領者的鬥爭，同時，在德國，更有為國家統一的鬥爭，這些鬥爭是如此的強大，以致使得華爾街對於收購這些國家的主要經濟部門的直接控制權時不能不有所遲疑。因此，在這些國家中，美國的殖民地統治還不能算十分鞏固。

如果把各種不同的背景與控制的程度估計在內，我們可以把一九五〇年美帝國主義者控制的地區列表如下：

	1947年的人口 (單位:百萬)
美國本土	144
完全控制的地區——這是一個對美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帝國的最低估計	197
正在轉入美國殖民統治的地區	96
軍事佔領，但殖民統治仍未能鞏固的地區	126
美利堅帝國(廣義的)人口總數	563

英國及其英鎊區域的人口是比較略為多一點。但是如果由這一點而推論說英帝國大於美帝國，那就不對了。英帝國主義的魔爪在今天已經遠為衰弱；有好些重要的帝國構成部分實際上如果不是處於一個崩裂分離的過程之中，就是正被另一個更強有力的帝國主義所吞併。而在餘下的其他英國區域中，美國資本家也要求滲入以取得合夥人的地位，同時還日益要求多分一點贓物；而且，這是一個片面的滲入，因為在美帝國中英國人並不能得到同樣的權利。

這樣看來，實際上美帝國在今天是一個最廣大和最強暴的帝國主義帝國。資本主義世界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這個

帝國範圍之中。此外，美國金融資本的勢力範圍還不止於此。它還包括着所有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國家以及它們屬下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所有這些國家中，美國的軍事勢力和經濟勢力正在以不同的強度和速度日漸增長着。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由於他們的泥足正在愈來愈深地陷入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普遍備戰的羅網之中，他們的行動自由就愈來愈受到限制。

這些區域，再加上為美帝國所直接控制的地區，就構成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第三章

美帝國主義的利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福特國際的財務主任波格丹曾在紐約舉行的第三十六屆對外貿易全國會議中說過幾句坦白的話。在談到各大公司的國外投資情況時，他說：

“首先，必須讓所有的政府了解，這些投資原則上必須是以謀利為基礎的，不應該期望那些為股東謀利益的大公司根據第四點計劃^①去為人道主義，或其他政治、社會與軍事的目的而進行投資。”

我們已經看見過這些龐大的公司如何瓜分了世界。我們也已經看見過各帝國主義國家如何征服與鎮壓各地人民以便使得這種瓜分成為可能。但究竟這些帝國主義的受益者從中得到多少利潤呢？

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間，美國資本家從其國外投資中得到了一百八十億美元的收入¹，這個數字等於這個期間期末的全部國外投資總值，三倍於剛開始時的國外投資總值。但這還只是一個官方數字，它僅僅包括了美帝國主義實際搶劫的贓物中很微小的一部分。不過，即使是這樣一個數字，也足以揭破所謂自由企業是一個善良制度，其對外投資的目的只是為了改善外國的生活水平與傳播民主的神話。

^① 這是杜魯門在“發展落後地區經濟”的偽裝下鼓勵資本輸出的計劃（參閱第五章）。

杜魯門在一九四九年就總統職時，曾經奢言這種掠奪將不會再有。他說：“在我們的計劃之中將不再有舊式的帝國主義——爲私人利益而進行剝削的舊式帝國主義。”²

但事實的紀錄說明，在杜魯門任職期間，這種舊式的帝國主義不僅繼續存在，而且變本加厲了。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間，每年國外投資的平均收入就等於前二十六年間每年平均收入的一倍。而且，這種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一九四八年的總數³超過了一九四五年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三。

關於從向外擴張所得的利潤的某些特徵，我們有必要加以分析：

(1)這些利潤都是高度集中的，都集中流向極少數的幾個最強有力的公司手裏。

(2)這些利潤都是超額利潤，較之正常的利潤率高出甚多。

(3)這些利潤具有種種不同的形式，有公開的也有隱蔽的，其總數合起來每年達數十億美元。

(4)這些利潤代表着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剝削（奪取其民族財富與收入），同時也就是對當地勞動人民的超額剝削。

(5)在美國國內，金融資本對被壓迫的黑種人進行同樣的民族剝削，而且對黑種工人與僱農進行超額剝削，這樣就爲美帝國主義每年的掠奪又增加了數十億美元（參閱第四章）。

由於國外投資只集中在少數幾個公司的手中（參看第二章），利潤也就必然同樣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了。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國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總額中，有十二家公司就佔去了百分之三十五；而在一九四七年的收益總額中，這十二家公司所佔的比例竟達到百分之五十五⁵。從這些投資中所得的利潤，雖然在全部美國資本家從美國工人身

上剝削所得的利潤中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但在成爲美帝國主義的核心與原動力的幾家公司的利潤總額中，却佔着一個很大的比例，而且有些是具有決定性的比例。

美國商務部的報告說，一九四八年國外直接投資賬面價值的調整利潤率是百分之十七點一，並指出這個數字較各大公司國內外營業所得的平均利潤率百分之十三點八爲高⁶。這是低估了兩者之間的差額的。其實，從國外投資所得的實際利潤只有一部分計算在這裏面。同時，另一方面，上述所謂包括國內外投資而計算出來的利潤率，由於把國外投資計算在內而增大了不少。而且，這個利潤率只適用於最大的幾家壟斷公司。如果包括規模較小的企業在內，那麼平均利潤率將低得多。

把幾家個別的大公司的國內外經營所得利潤率互相比較一下，就可以得出一幅更清晰的圖畫。

一九四八年投資所得利潤率

	國內利潤率	國外利潤率
	(百分比)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11	33 ⁴
通用汽車公司	25	80
安那康達銅公司	5	13
法斯道橡膠公司	7	26

資料來源：各公司的報告書。

• 只計算西半球部分。

這樣，這些公司就承認了其國外投資的超額利潤等於正常利潤率的三倍至四倍。而且，這種情形在對典型的半殖民地的投資（例如安那康達銅公司在智利），與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例如通用汽車公司）都是相同的。

超額利潤的形式與數額

帝國主義的超額利潤有下列幾個主要形式：由投資而得的收益，如紅利、利息以及再投資的利潤；由航運、銀行、保險等等國際壟斷事業而得的收益；以及由價格剪刀差而得的超額利潤，其中包括以高於其價值的價格來出售商品和以低於其價值的價格來收購商品。下面是關於美國金融資本在一九四八年通過這幾種形式所取得的超額利潤數額的說明與估計：

一九四八年私人與國家的整個國外投資的總收益據報告說是十九億美元，其構成情況如下：

	(單位：百萬美元)
直接投資的利潤	1,552
其中：滙返美國所有人的佔	997
在國外再投資的佔	555
其他私人的國外收益	275
美國政府對外國貸款的利息收益	102
總計	1,929

這個總額數字較之章首第四段所說的二十九年間總額數字所依據的數字更為完整，因為那一個公開發表的包括一個長時期的數字並沒有把直接投資所得的再投資利潤和美國政府的利息收益兩個項目包括在內。

所謂直接投資就是為美國的許多公司所佔有和經營的一種生產資財。這種收益形式佔着壓倒優勢，正標誌着美國金融資本的強大力量，這些金融資本今天已不能滿足於以債券和股票（證券投資）這種方式來分沾在國外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了，而堅持要從直接所有權中取得更多的收益和控制地位。

並不是所有用以吸取國外超額利潤的資本都是在各該外國投資的。沒有足夠的工業以建造輪船飛機的那些弱小國家就必須向帝國主義的運輸壟斷企業繳納進出口貨物的運費。沒有足夠的金融力量的國家就必須向帝國主義金融資本中心繳納使用其銀行設備與保險的費用。在一九四八年，巴西在其從美國購入約四億九千七百萬美元的貨物中要付出九千六百萬美元的運費、保險費及其他有關雜費，即等於增加了原貨款百分之二十的附加費“獻納”⁸。在一九四九年，當海洋運費據稱業已降低的時候，巴西在購入三億八千二百萬美元貨物中，要付出九千七百萬美元的附加費，即百分之二十五的額外費用⁹。

其他國外利潤的形式在官方統計數字中是被分開列出的。其中包括電影影片租金收入（在一九四八年為一億二千九百萬美元）；專利權的使用費、國際企業公司在其國外利潤項下為其國內辦事處撥出的費用（七千九百萬美元）；外國商人與外國政府向在美國的買賣代理人所付出的美元支出和維持聯合國代表團的美元支出等等（八千四百萬美元）。

關於美國金融資本由上述各種來源所得的收入，美國商務部作了如下的估計¹⁰：

	一九四八年的收入 (單位：百萬美元)
運輸	1,384
各項私人服務	488
總計	1,872

這些都是不完全的估計。其實，上述各個項目的總額遠比這個估計為大。

在第二章裏，我們已經看見，這些大公司的投資網已經如何控制了附屬國家的對外貿易。這種控制一直伸張到控制貿易條

件——買貨與賣貨價格。這些壟斷企業把出口貨的價格有系統地提高到國內的壟斷價格之上。它們對它們自己所進口的原料則有系統地將價格壓低到國內市場的實價以下。附屬國家收付價格之間的差額在這個帝國主義時代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增長着。

我們可以劃一條向上斜升的價格曲線，代表列強壟斷資本對附屬國家所索取的價格。另一方面橫過這條曲線的畫一條向下斜降的價格曲線，代表這些壟斷資本在購買附屬國家的原料時所支付的價格。這兩條曲線就構成了價格剪刀差，它削減了附屬國家的收入，而增大了這些國際公司的利潤。據聯合國專家們的估計，一九四七年附屬國家在支付其所購的進口製成品時，如果價格比率與一九一三年的是一樣的話，可以少付二十五億至三十億美元¹¹。這個數字說明了這個剪刀差的擴大是如何嚴重地削減了附屬國家自一九一三年以來每年的收入。這個數字還並不能代表帝國主義由賣貴買賤所得的全部超額利潤，因為它並沒有把從一九一三年即已發生作用的剪刀差完全包括在內。

壟斷資本在自己國內同樣運用這個價格剪刀差去對付國內的農民與小商人。但這裏有一個質的差別。國內的價格剪刀差乃是重新分配國內產生的利潤，以利於壟斷資本家。而國外的價格剪刀差却是一個民族剝削的形式，奪取了別的國家所生產的價值，使其轉移到帝國主義國家本身來。同時，也存在着一個量的差別，那就是，國外的價格剪刀差包含着更極端的低價收購與高價輸出。

以這種形式掠奪的所得，其分配的範圍比直接投資的利潤更為廣泛。所有從事實際國外貿易的壟斷公司，不管其個別的國外投資的多寡，都能參與分享。這樣，就在差不多所有各個金融

資本的組成部分中構成了一個要求帝國主義擴張的利益集團。

金融資本之所以能够利用價格剪刀差去掠奪附屬國家乃是因為它在購買與出售時都居於一個壟斷的地位。這個壟斷地位又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行爲而更爲增強。這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和英國）政府對進口原料實行限價，並強迫生產國家以幾乎等於戰前經濟蕭條時期的價格向他們交出這些重要的物資^①。但是，一到戰後，當拉丁美洲及其他附屬國家想利用在戰時出售物資所得的積蓄資金去購買他們所需的貨品時，美國政府却取消了限價。而且，更進一步，政府以管制條例限制了出口貨物的供應，於是，所有外國購買者只能向這小量的供應來討價還價，這樣就使得壟斷企業可以索取特別高的價錢。

結果是：半殖民地與殖民地國家在戰時供應物資時所得的價格是一個價格，而在戰後要付出相對地高出兩倍或三倍的價格去購買東西。它們的收入既相對地減少，它們的金融儲備很快就枯竭，因而它們也就陷入一種從未有過的貧困情況^②。

① 這個方法是以典型帝國主義的兩面手法來實施的。一方面，進口原料要受到限價的管制，而另一方面，國內農產品則沒有這種限價，礦產的限價也因為有特別價格津貼而顯得毫無意義。

② 智利駐聯合國的常任代表赫南·聖達·克羅茲，曾經很適當地說明過這個過程，他說：“世界經濟歷史告訴我們，除了極少數的變化情況以外，工業製成品價格的增長率如果拿來與原料與農產品價格的增長率比較，其增長程度總是急促與大得多。如果我們記得原料與農產品這兩類物品佔了拉丁美洲出口貨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每輸出一噸貨物，拉丁美洲換回的商品即隨之減少。這個情況在戰後時期變得特別嚴重。……二十個拉丁美洲國家已經看到，正當他們還不能取得足夠的必需器材去維持及重振其工業與農業時，它們去年的進口貨還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見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二月及三月對於世界經濟形勢的討論：“關於一九四八年重要經濟變遷的補充說明”，第十一頁至第十二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由於美帝國主義者居於各種貨品的主要供應者這個優越地位，它就能够以史無前例的超過價值的價錢輸出其貨物以攫取超額利潤。不但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而且包括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內，都被迫要付出額外的高價去購買美國產品。

這個做法在一九四七年達到了最高峰，但在一九四八年仍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出口貨的高價政策在五金、機器、車輛與化學等重工業製成品中尤其突出。試以最重要的鋼鐵與化學產品為例，在一九四八年美國的正常鋼板的廠價平均每百磅為三元二角美元¹²，但出口官價則平均為五元五角八分¹³。燒碱的廠價平均每百磅為二元八角五分美元，而正式的根據市場報告的平均出口官價為六元二角七分。在這兩種價格的差額中，由工廠至海岸的運輸費用與其他正當的雜費佔三分之一弱。而對拉丁美洲與亞洲的半殖民地國家索取的價格最高。

輸出的統計數字還隱蔽了許多這種抬高價格的現象。在很多情況下，出口貨只有通過偽造出口許可申請書及發票才能購得，其中一部分還得以黑市價格支付。其他出口貨則以官價“出售”給這些龐大企業公司的國外經銷站，由這些經銷站在外國以驚人的高價再出售。

事實上，正如報紙上所廣泛報道的，鋼鐵與化學方面的出口貨，在裝船時的售價比之普通價格要高達三倍至四倍。譬如，早在一九四八年，一個美國商務部的官員曾經警告過紐約的商人，說他們的鋼鐵出口價格是“不合理的”，因為，當時鋼鐵的出口價格為每噸三百美元，而其國內價格還不到一百元¹⁴。

機器與車輛的價格也有同樣的抬高價格的情形。紐約的商業界中經常談論着關於拉丁美洲資本家如何曾以三倍於新機器

的官價去購買舊機器的故事。官方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間一噸至一噸半載重量的卡車出口價格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九。而在同一期間卡車的國內價格指數只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縫紉機的出口價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而其國內價格（缺乏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的資料）只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¹⁵。

外國顧客在一九四八年購買舊客車要付出每輛平均一千六百九十二美元的價格，較之國內的流行的各種新客車的廠價還要高出很多。據巴西農業協會的報告，在一九二九年一輛福特汽車用二十袋咖啡的收入就可以買到，但在一九四九年却要用二百袋咖啡，即十倍於以前的價格，才能獲得。因為買不起客車，這個農業協會只能在不求利潤的基礎上替其會員們購買吉普車，但也要付出等於八十袋咖啡的代價¹⁶。

國際收割機公司和凱斯公司等農具壟斷企業在國外自行配售其產品，大量抬高其國外售價，使之遠高出於其出口這些農具時的出口價，而坐收這些價格膨脹的利益。一九五〇年阿根廷政府曾試圖阻止這種現象，強迫這些農具公司要以大批批發的辦法將農具售給阿根廷政府的配售代理人。美國國務院與銀行家們立刻出面干預。他們通過外交與財政的壓力，強迫達成了妥協。妥協的結果是：美國壟斷企業仍然可以繼續配售其產品，只不過是把暴利的價格略為降低而已。而這個降低了的暴利仍然高達百分之七十五¹⁷。

登峰造極的抬價剝削的情形雖然以上述的幾種商品最為嚴重。但小量的加價情況是普遍存在於其他商品中的。譬如，一九四八年美國南部粗松木板的正式公佈的平均出口價格就高出其國內廠價三分之一。一九四八年標準波特蘭水泥的平均出口價

格較之紐約港交貨價要高出百分之十九¹⁸。

即使對於某些貨品在國外與國內市場上都有一公開的統一價格，但這當中仍然暗中常常存在變相加價的現象。譬如，依照政府規定，輸出到馬歇爾計劃國家的小麥，其中三分之一要以麵粉的形式輸出，麵粉却要貴得多，儘管事實上這些進口國家都有很多磨粉工廠可以自行磨粉。

總之，在五金、化學品、機器以及車輛的出口貨中，在其根據市場報告所得的成交價格中，最少有三分之一是代表國外買主在本來已經很高的國內價格之上所再付出的一筆超額“貢款”。在價值五十六億美元的出口貨中，這個超額索價就要高達十八億六千萬美元。而在所有其他出口商品的市場報告價格中，最少有百分之十的價值是代表對美國壟斷企業的額外“貢款”。在價值六十九億美元¹⁹的出口貨中，這個超額索價就要高達六億九千萬美元。

這樣看來，美帝國主義依這個形式的掠奪在一九四八年即達二十五億五千萬美元，這還是一個最保守的估計。

構成帝國主義價格剪刀差的另一半的就是帝國主義以低於其真實價值的價格購買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產品。這種情形在經濟危機時期最為顯著。但在繁榮時期也是相當嚴重的。

試看一看美國最大宗的進口貨之一——咖啡。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在南美口岸所付出之咖啡進口價格較之美國消費者所負擔的價格經常要低一半以上。即使把運費、烘烤費用及乾縮損耗等都計算在內，在巴西或哥倫比亞所付出的價格還是遠低於這些咖啡的實際價值²⁰。而食品托辣斯對於種植者連這個官方的進口價也不給。據巴西經濟研究所說，巴西的咖啡市場是受“七家美國壟斷咖啡公司”所支配的，它們“控制了巴西出口咖

啡的百分之四十三”²¹。這七家當中最大的一家是“美國咖啡公司”，這是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公司的一個分支機構，單此一家就控制了巴西咖啡的百分之十。

根據巴西方面的幾個不同的研究材料，這些公司付給咖啡種植者的價格一般只有巴西出口價格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²²，也就是只有美國消費者最後所付買價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五。

一九四八年美國的咖啡進口價格平均為每磅二角五分一美元。售與消費者的價格為每磅五角一分四美元。在兩者之間的差額中約有一半可以算作運輸成本、咖啡乾縮的損耗、烘烤及包裝費用等等。餘下的每磅有一角三分美元就代表着美國壟斷企業從拉丁美洲的生產中所淨得的利潤。以該年進口的二十七億七千萬磅咖啡來說，帝國主義掠奪所得即達三億六千萬美元之多。而食品托辣斯用低於出口價的價格從種植者購買咖啡時所得的利潤還未計算在內。

以香蕉的情形來說，它受着聯合果品公司單獨一家公司的嚴密控制，它的差價更為明顯。這家公司除了向農民收購香蕉外，還自行在自己的農場上種植香蕉，所有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支付的費用，包括工資、收購香蕉的費用、職員薪金、保管與折舊、以及維持他們在中美洲所自置的鐵路的營業費用，一共加起來在一九四八年折合每束香蕉的成本大約為八角五分美元，即每磅香蕉一分七厘²³。

而在同一年內，香蕉在美國的平均零售價格為每磅一角五分九美元²⁴，即等於上述成本的九倍。

除掉應付的運費、包裝成本等等，每磅的超額利潤達到一角一分美元。也就是說，在一九四八年三十億磅香蕉的進口額中，超額利潤共達三億三千萬美元。在這個數字之中，只有很微少的

一部分是計算在聯合果品公司所承認的國外投資所得的利潤之內的，至於以低價購貨裝運到加拿大及歐洲的部分都未計算在內。

同樣的超額利潤也存在於其他商品買賣中。國際貨幣基金會在編製國際收支平衡的統計表時，就曾發現墨西哥的出口貨值比減去運費以後的美國價格低得多。以蕃茄來說，這個價值低了大約百分之七十五；以去籽棉花來說，大約百分之二十；以木材來說，大約百分之六十弱；以海蝦來說，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綜合起來，這個基金委員會發現了在一九四八年墨西哥的輸出中其價值被壓低約四千八百萬美元²⁵。爲了掩飾這個真相，這些御用的統計人員却將這個低估歸結爲墨西哥統計的“錯誤”，而不承認事實，即這是美國買主所得的額外利潤。

咖啡與香蕉都是免稅進口的貨品。大多數製成品和一些原料都是要繳付關稅的。這些關稅代表着美國政府替整個金融資本所吸取的一部分商品價值。古巴的糖進口時每磅要繳付一分半美元的關稅，這就是從古巴製糖工人身上剝削的一部分利潤，雖然事實上這些關稅收入並不在進口商的賬本上以利潤的項目出現^①。我們必須認識，一九四八年的四億一千八百萬美元的全部關稅收入就是美帝國主義掠奪的一部分。

如果把對於咖啡、香蕉、墨西哥商品價值的壓低和海關收入

① 就這方面來說，美國所徵收的關稅與其他國家對由美國輸入貨品所徵收的關稅是有重大差別的。這個差別是由於美國壟斷資本比其他國家的資本家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形成的。成爲主要消費者的美國市場企圖要決定一切進口和出口商品的價格。

舉一個例，面對着美國國內的糖業供應的壟斷，以及菲律賓及波多黎各的食糖免稅輸入美國的現象，古巴的糖價就不可避免地必須降低以適應關稅。還有爲了要在美國市場出售其製成品，外國廠商必須和美國公司所

的估計加起來（至於所有其他通過這種形式而取得的超額利潤還不計算在內），則以低價收購這種方法所得到的超額利潤總額為十一億五千六百萬美元。

以上是對美帝國主義掠奪的主要形式的一個估計。但還有很多重要的項目沒有列舉在內，例如：對日本及西德所徵收的佔領費、美國資本家從西德所得的賠款（較任何其他國家所取出的數額為多）、通過馬歇爾計劃操縱其他國家的貨幣而得的投機利潤、以及那些流亡資本家因畏懼其本國人民而逃亡到華爾街謀取庇護時所帶來的民族財產。同樣沒有計算在內的還有從美國的正式殖民地所得的利潤，這些利潤是不見於官方統計中的。雖然沒有估計這些未計算在內的項目，我們仍能簡述一下一九四八年帝國主義所得的國外利潤，但我們必須記住在下列各項總數之中都是保守的和不完全的計算，因為美國金融資本是巧於隱瞞其利潤的，特別是從國外擴張所得的利潤：

1948年從附屬國所取得的超額利潤表

（單位：百萬美元）

已承認的投資收益	1,900
運輸、保險等等收益	1,900
高價售貨所得的收益	2,500
低價購貨所得的收益	1,200
總計	7,500

訂下的價格作競爭，這就是說，必須將價格減到一個程度足以使得在支付關稅之後仍能以低於美國國內產品價格出售。

對於美國的出口貨來說，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一般來說，美國廠商對外國買主是滿不在乎的，要買就買，不買就拉倒。特別是對於半殖民地國家來說，關稅僅僅是增加了人民大眾對於進口貨價格的負擔。例如，在紐約零售二十美元至二十三美元的一套衣服在委內瑞拉就要賣七十元，而在這個差額中，關稅佔了一大部分。

民族的剝削

“在智利輸出的銅與硝的總價值中，只有大約百分之六十是以勞動力以及其他直接生產費用和稅收的形式被保留在智利本國的，而其餘的百分之四十却以下列的各種形式離開了智利本土，這些形式包括：利潤、抵押借款的利息、管理費用、以及外國公司駐智利分行或外資採礦公司在國外付款購買進口商品的形式。”²⁶

以上這一段智利政府所發表的聲明指出了安那康達銅公司、肯奈各特銅公司和英智硝酸鈉公司所得的超額利潤和這些公司對智利的民族剝削和製造貧困之間的關係。智利主要出產品價值的五分之二變成爲帝國主義者所掠奪的“貢款”。在非洲，情況則更可怕。一九四七年利比里亞的輸出總值爲一千三百四十萬美元。其中，有八百七十萬美元是代表外國投資的利潤、進口貨的運費與保險費、以及償付借款與利息的²⁷。餘下的只有四百七十萬美元，即利比里亞輸出總值的百分之三十五，可以供利比里亞用以購買其所需要的貨物。以沙特阿拉伯的情形來說，在阿美石油公司所取走的石油總值中，只有十分之一留在阿拉伯。事實上，這個石油公司從沙特阿拉伯所掠奪的比該地六百萬居民從各方面所得的全部收入至少超出百分之五十。

拉丁美洲仍然是美帝國主義最老的國外富源儲備地。在美帝國主義每年所掠奪的七十五億美元當中，最少有二十五億美元是來自拉丁美洲的²⁸。這個數字相當於整個拉丁美洲商品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²⁹——這筆“貢款”就等於在農民所收穫的玉蜀黍中每五顆穗取走一顆，在紡織工廠所織出的每五疋布中取走一疋，在地下開採出來的每五磅金屬中掠去一磅。人們懷疑，

有沒有一個羅馬帝國的帝王曾經從那些被他征服的人民中取過這樣巨大的貢獻。

這些帝國主義的巨額掠奪從根本上說明了為什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經濟上仍然是落後的和為什麼它們的人民始終是生活在饑餓綫上。它說明了為什麼過去會是先進的國家如西歐國家，一旦淪落到為華爾街的踐踏之下，就愈來愈貧困，同時它們的工業也就慢慢趨向衰亡。它說明了為什麼世界上大部分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能在取消了殖民地地位之後就停止下來，而必須還要從帝國主義的手中取得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完全解放。它也說明了為什麼印度尼西亞、以色列或菲律賓這些國家，只要他們仍舊容許英美帝國主義者繼續維持並擴張其經濟壓榨，從而把它們的民族命脈中的血液變成帝國主義的超額利潤，那麼它們今天的“獨立”並不會使它們比過去作為殖民地時有更大的自由。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日漸加深，遭受民族剝削的人民的痛苦也就同樣加深，同時他們的解放鬥爭也就會變得更強大。帝國主義者們，掙扎在這個越來越狹小的世界中，同時被愈來愈增長的內在矛盾所夾擊着，仍然繼續對它們控制下的殘餘地區加深他們的剝削。這一點可以從拉丁美洲的情形看出來，在一九四八年帝國主義對拉丁美洲的掠奪就三倍於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間的每年的掠奪平均數字³⁰。

對勞動人民的超額剝削

一位巴西的外交官曾經說過：

“一方面，世界上一些收入高的地域中的生活水平已經大部分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但另一方面，我們仍然面臨着一個冷酷的

事實，那就是在落後國家中廣大的人民羣衆仍然在非人的條件下做着苦工，以謀取一個極其困乏的生存機會。

“當我們認識到，在拉丁美洲和亞洲的落後國家中，大多數國家的人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都在一百美元以下，而西歐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爲五百美元，在美國則甚至超出一千二百美元，那變，顯而易見，人類文明就必須要面對一個重大的考驗。”³¹

整個民族貧窮化的重担實際上都是落在這些被帝國主義支配的國家的工人和貧苦農民的肩上，但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多的負擔。工農階級的辛勤勞動，不但要爲華爾街每年生產七十億美元，爲歐洲金融資本生產數十億美元，而且還要爲他們本國的資本家與地主生產出一筆利潤。

就是這種超額剝削——在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之上所附加的民族剝削——造成了世界上大多數人民令人難以置信的貧窮，很壞的健康和長期的缺乏營養。

國外投資在不同區域中所取得的各種各樣的收益，正如一面反光鏡一樣，反映出這些利潤賴以產生的人類痛苦的深度。下列數字說明了一九四八年美國的企業在世界各地區投資所得的平均利潤率³²：

	百分率
馬歇爾計劃國家以外的歐洲	7.6
加拿大	14.0
馬歇爾計劃國家	14.5
美洲各國	17.4
馬歇爾計劃國家的殖民地	20.0
其他國家(主要是中東)	31.3

在馬歇爾計劃國家以外的歐洲，利潤率比較低，這反映出人

民民主國家雖然在一九四八年還容許外國公司營業，但已經採取行動去限制這些公司的暴利活動。至於其他國家，利潤的大小是與工資的高低成反比例的。利潤率最低的是加拿大，而加拿大的工資和美國的工資差不多。利潤率最高的是產油的中東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奴隸制度仍然合法存在，而工資就相應地被壓得很低。

成爲帝國主義時代以前殖民地特徵的舊式種植園制度，它的利潤率雖然非常高，不過對於每一個個別勞動者的剝削率却相對地並不高。奴隸式的或半奴隸式的工人的工資非常微小，但他們的生產量也是很少的。這種高度利潤率產生的基礎是：固定的投資很少，大量地僱用勞工，而從這些用原始生產方法的每一個勞工身上榨取數量不大的利潤。

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已經大大地改變了這種做法。美帝國主義仍然保持了奴隸式的勞動條件，包括冗長的工作日和低微的工資，但却去強迫工人們去用現代的設備和最新式的美國的勞工組織方法與加速生產的方法。這樣，不但利潤率，而且剝削率也比本國高出很多。

智利就是一個例子。正如上面所說過的，安那康達銅公司在智利所得的利潤率遠較在美國所得的爲高。一九四〇年，在智利的的外資經營的礦場中，每個工人每年所得的平均工資爲二百七十三美元，約等於在美國的銅礦中一千四百美元的平均工資的五分之一。但在智利每個工人的每年平均生產量爲二十三公噸，比較美國每個礦工所出產的每年平均二十七公噸並沒有少多少³³。

最近有一些美國製造廠商已經在波多黎各殖民地上設立了分支機構。在那裏，所付的工資只有美國工資的三分之一至四分

之一。有一個廠商表示：“在幾個月內，這些工人就已經達到美國本土的生產率”；另一個說：“經過兩年之後，這些工人所生產的比預期的多出了一倍”等等³⁴。

這些事實揭穿了美國勞工聯合會駐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代理人羅茂地所說的謊言。羅茂地一方面承認在過去十年間拉丁美洲的實際工資的確有了極大的削減，但另一方面他却鼓勵工人們先去“增加他們的生產率”，然後再去追尋更高的生活水平³⁵。

在阿拉伯和非洲也有同樣的情形。阿拉伯油礦工人的工資還不到美國油礦工人的平均工資的十分之一，但每個工人的產量在阿拉伯實際上比美國還要高³⁶。

在本書第二章裏，我們曾經提到西南非洲的蘇麥布銅礦如何為一個以摩根托辣斯為首的新迪加——紐蒙特礦務公司——所霸佔。三年之間，紐蒙特公司的原有投資金額就已經增加了二十倍價值。這究竟是怎樣達到的呢？

“幸福”雜誌曾經讚美蘇麥布銅礦為華爾街投資企業的一個著名的範例。據這個雜誌說：“那些奧瓦賽和赫里羅部落的土人，從數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走到礦區，每天得到五角錢的工資，還有膳宿的地方，這對於非洲人來說還算是一個相當好的工資。”³⁷

“幸福”雜誌誣衊非洲本地人的工作缺乏效率，作為他們所以應該給予奴隸工資的辯詞。但這種誣衊已為下列事實所完全駁倒：

在蘇麥布城中住有四千個非洲人。假定這些人都受雇於紐蒙特公司（顯然這是一種誇大，但就業人數不詳）則每噸礦砂所支付的工資不過二元五角美元。但每噸礦砂所得的純利高達二十美元，即約為工資的八倍。簡言之，這種令人憎恨的低工資與

工作效率是毫無關係的，但是它與非洲人民遭受的瘋狂的超額剝削倒是有着密切的關係。

從上面這個實例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在半殖民地與殖民地中從事活動的壟斷資本，其剝削率高達百分之一千或甚至一千以上，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對於現有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日益加緊的剝削，使這些地區人民原來已經很低的生活水平更爲低落。

聯合國的一個報告中曾經指出，在遠東的各個主要國家中，實際工資都在下降。它特別舉出，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間，印度的實際工資比戰前降低了百分之十三，而在馬來亞則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這個報告還指出：“在這個區域內的許多國家中，實際工資的下降就是表示生活水平的更加惡化。這也是造成戰後勞工不安定現象日漸增加的一個主要因素。”³⁸

羅茂地在其上面所提及的那篇文章中曾經說過：在過去的十年中，各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實際工資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或更多³⁹。對於羅茂地認爲是一個例外的委內瑞拉來說，委內瑞拉政府最近發表的一個報告承認了食物的平均消費數字已經降至一千六百四十一卡路里一天，而食物缺乏的現象“仍在繼續增長”⁴⁰。

委內瑞拉人民極端貧困的情形，可以從納爾遜·洛克菲勒的經歷中看出一個梗概。洛克菲勒集團對於委內瑞拉的貧困狀況是要負責的。它們的煤油托辣斯從這個有五百萬人口的國家中所榨取的利潤比之從它們所有的其他國外產業所榨取的利潤總和還要多。洛克菲勒還曾企圖通過對食品工業的壟斷從委內瑞拉榨取更多的金錢。但在這件事情上，他却自食其果地失敗了。因爲一俟洛克菲勒的漁業公司的生產量達到了每月五十噸，

即每個居民應分攤十分之六克時，產品再也賣不出去了，因為委內瑞拉人民的消費能力已經到了頂點，所以洛克菲勒在這一特殊的冒險事業中却虧了本⁴¹。

帝國主義與當地的反動勢力

帝國主義在附屬國家的統治組織是建立在外國壟斷資本與當地剝削者互相聯盟的基礎之上的。在智利，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六百二十六個擁有五千公頃以上土地的大地主佔有了全國耕地的百分之五十七，而七十九萬個只擁有五公頃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總共所佔土地還不足全國耕地之百分之點六⁴²。地主家族和那些依靠帝國主義的進口貨為生或者以各種不同方式為外國公司服務的商業資本家們就構成了當地的統治階級。這些統治階級及其家族就構成了政府、軍隊和警察。

這些階級和帝國主義者有着共同的利害關係。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不能存在的。如果沒有這些統治階級對人民所實行的壓迫，帝國主義就不能維持其支配地位，也不能向那些被它剝削的工人們繼續支付這種低微的工資。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智利所出的礦產價值只有百分之六十留存於本國。然而，即使在這個百分之六十當中，統治階級還佔了極大部分，餘下的小部分才歸礦工所有。在一九四〇年，外資經營的礦場的生產總值為二十六億三千六百萬比索。在這個總值中，有三億五千三百萬比索是以工資的形式歸智利工人所得，而六億三千五百萬比索則以稅收的形式為智利政府所得⁴³。

這些稅收的主要受益人乃是智利的地主貴族、軍閥以及部分的資本家，他們聯合起來掌握智利政府。這些稅收就等於取得智利統治階級的警察服務的賄賂金。例如，在一九四七年，智利

工人曾經爲了要求增加工資以趕上飛漲的生活費用而進行了一連串的鬥爭。肯奈各特銅公司的總經理就訪問了智利，並與智利總統魏地拉商談。魏地拉隨即撕毀了他對那些協助他贏得選舉的工會與政黨的諾言。他將共產黨排除於聯合陣線政府之外，用軍隊去壓制罷工，在礦區市鎮中宣佈戒嚴，並逮捕和放逐工人中間的工會領袖與政治領袖。於是，那些外國礦業公司的利潤就更加飛躍上升。

在巴西的咖啡種植園中也存在着同樣的關係，在美國的咖啡公司掠奪後餘下的生產價值中，咖啡園的園主和巴西的大銀行取得了大部分。而巴西的“可龍奴斯”，即無地的農民，在咖啡種植園中工作，出賣其勞動却只取得了上述剩餘生產價值的小部分。他們的勞動是如此的苛重，以致使得這些無地農民的子弟不能上學，而要一面在種植園中工作，一面練習舉重，好使得將來成年之後能夠挑起三四百磅重的蘆袋⁴⁴。

在阿拉伯，美國金融資本與當地的統治者間的勾結則更爲可恥。在那裏，一桶煤油值二美元，付給當地工人的工資只有三分美元，而付給奴隸主阿拉伯國王伊本·索歐德的特許費却有二十二分美元。雖然對國王的賄賂是工資的七倍，但其總成本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極龐大的利潤是被掠奪走了。同時，阿拉伯國王仍然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忠實僕從，而石油公司回過頭來又協助他自己在對阿拉伯人民的駭人的剝削制度中保存其封建的與前封建的特權。

在第二章裏我們曾引述過的那本關於石油工業的小冊子甚至還虛僞地裝作要揭露橫貫阿拉伯的油管所引起的反動政治後果：

“這條油管將使得美國政府成爲沙特阿拉伯與科威特這些

地方的特權制度的‘保護人’。……除了軍事行動的問題之外，這種‘保護’還將使美國承担起一些什麼義務呢？我們是不是有責任要去維持這些國家的現存的統治政權呢？如果是的，那末，對於大西洋憲章及四大自由的原則會有什麼影響呢？因為我們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所要維持的乃是世界上兩個最後殘留的絕對專制的王國——這些王國是如此的專制獨裁，以致它們的個人統治者實際上就等於整個國家的所有者，對他們統治下的臣民及其財產有任意處理的極權。”

甚至當這本小冊子在作這樣描述的時候，一些石油公司代表及其在美國外交界的同盟者却進行着一種週密的活動，要求以金錢支持這個“世界上最後殘餘的專制王國”，緊接着這個運動，美國政府就撥出了成千萬美元去維持這些阿拉伯君主。

四年之後，當美國已經在中東建立起霸權，而所有首要的美國石油壟斷資本已經插進了阿拉伯輸油管之後，出版這本小冊子的這個美國石油學會早已把它以前所說的政治上的躊躇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在西南非洲，華爾街與當地統治階級的利益相結合的形式與在智利或阿拉伯所流行的形式是不同的。當地的統治階級乃是南非洲的少數白種人，他們把西南非洲當作他們的殖民地。由蘇麥布礦務公司所納的賄款是以繳納百分之十七點五利潤稅的形式出現的，而這一筆稅收佔了西南非洲收入的大部分。美國同時又在聯合國內對這個鼓吹白人優越論的南非馬蘭政府繼續給予外交上的支持，反對西南非洲人民為其民族獨立所作的呼籲^①。

華爾街與當地最卑鄙的反動派相勾結的結果造成了新的矛盾。對被統治的人民加深剝削在經濟上的後果是使這些人民更

爲貧困，在政治上的後果則使這些人民加倍從事於爲爭取改善生活所作的鬥爭，並且使這種鬥爭高漲到使這些帝國主義的同盟者再也不能應付的地步。

對美國殖民地的超額剝削

在一九四九年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曾向聯合國提供有關其所屬殖民地民情況的報告⁴⁵。雖然這些報告在文字上是盡可能地把情況說得最好，但是一層粉飾得很厚的外衣並遮不住基本的事實。一九四九年一般的殖民地政權其殘暴和剝削程度並不下於在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以前的殖民地政權。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權和英國、法國、比利時或荷蘭的臭名遠揚的殖民地政權在本質上是毫無差別的。在這個關於“非自治地區”的報告書中，就揭露出一些關於美國對其殖民地統治的典型例子。

這些殖民者盜竊了當地人民賴以生活的土地。例如，在夏威夷，“在一九四〇年的農業調查中，有一百一十四個擁有一千英畝或更多土地的農場共佔了整個生產蔗糖、波蘿與牲畜的農耕地的百分之九十六。剩下的百分之四的土地則分割成爲四千八百八十一個農場，生產各種作物、肉類、家禽、和乳酪產品以供應當地的消費需要。”（見該報告第六四二頁）^① 但這個報告並未提

① 在一九五〇年七月時這種行動更爲顯著，當時聯合國正在爲美國藉口拯救李承晚傀儡政權而企圖征服朝鮮的行動進行辯解。據美聯社報道：“南非聯邦完全蔑視聯合國及國際法庭而要將西南非洲併入其版圖。”（見“紐約時報”，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三日倫敦電。）不用說，美國政府不會爲這件事情而召集一個安全理事會的特別會議，也不會派軍隊或要求聯合國派軍隊去保衛西南非洲的獨立。

② 所有本節所引的頁數，均爲聯合國關於“非自治領地區”報告書第二卷的頁數。

到另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即這一百一十四個大農場是由五個美國的和英美聯合的所謂“五大家族”所控制的，這五大家族實際上在各方面控制着整個夏威夷的經濟。其次，在關島：“雖然關島的大量土地是用於軍事目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經經常地用於耕種用途的土地中，仍然有百分之七十五可以備作農業耕種之用。”（見第六二五頁）這等於間接承認了這些軍國主義者已經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比第二次大戰之前多盜竊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

這些殖民者還曾經企圖用各種方法去摧毀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文化。在所有公共機關和當地的設備不完善的學校中，他們都強迫殖民地人民使用英語。當地人民都反抗這種“美國化”的做法。例如在夏威夷，“雖然在所有公衆學校中都是以英文作為唯一的教學媒介，但由於事實上學生在家裏所習慣採用的却是另一種語言，如夏威夷話、日本話、中國話、朝鮮話、葡萄牙話及西班牙話，因此就引起了一個特殊的問題。”（見第六三八頁）

種族隔離與歧視現象在殖民地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顯而易見，這個報告是企圖遮掩這種現象的。例如在阿拉斯加，這個報告說：“種族歧視是非法的。至於印第安人與愛斯基摩人的子弟之所以要入他們自己的學校，這主要是由於地理與健康的條件所致。”（見第五〇九頁）又如在波多黎各，“對於黑人由於膚色與種族關係而引起的歧視是比較少的。……除了通婚問題之外，這種在種族間所存在的歧視主要是由於社會或經濟地位的關係”（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一九四八年在薩摩亞島海軍兵站和美國政府機構中所僱用的當地職工的工資是：普通工人每小時一角六分美元至二角四分美元，汽車司機每小時二角六分美元至三角五分美元，而水管工人每小時四角六分美元至六角

美元（見第六〇八頁）。但這個報告還恬不知恥地說：“美國屬下的薩摩亞島的公民和非土著的居民一律都是受到平等的待遇的。……當地實行的原則是同工同酬，並且對於合乎條件的薩摩亞人更予以優先僱用。”（見第六〇八頁）

美國的殖民統治使得被統治的人民日趨貧困，並且同時慢慢地淪於饑餓。在波多黎各，“一般來說，食物是不夠的，食物所含的卡路里是有限的，蛋白質是不夠的……而且所能吸收的維他命……就少得可憐。由於營養不良而得疾病的人數多得令人不安，極大多數的人民長期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態下。”（見第六五〇頁）在維爾京羣島，“一個中等家庭的收入，在聖托馬斯約為四百三十美元，在聖大克盧斯則為三百三十九美元。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政府的調查報告認為在聖托馬斯維持一個‘普通生活’的最低費用是：一家三口的家庭每年的費用，食物要七百一十七美元，全部費用要一千三百九十八元九角八分美元。”（見第六七一頁）

爲了將阿拉斯加變爲一個進攻蘇聯的軍事基地，美國已經花費了數萬萬美元。但阿拉斯加整個的地方預算却只有一千五百萬美元。在這個一千五百萬美元中，沒有一分一毫是用於滿足愛斯基摩人民和印第安人民的基本需要的。例如，“比起原定的最低水平來，阿拉斯加的自來水供應還差百分之八十，下水道還差百分之九十，清除垃圾的設備還差百分之八十”（見第五九九頁）。在阿拉斯加有人口九萬四千人，而只有十個醫生，即每九千四百人有一個醫生（見第五九六頁及第五九九頁）。而在美國則大約每七百五十人有一個醫生。由於這種基本衛生條件與醫藥照顧的缺乏，阿拉斯加人民的健康都被摧殘了：“肺病成爲阿拉斯加最嚴重的健康問題。在一九四五年，因肺病而致死亡的比率

是每十萬人中有三百五十九人，即大約三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比率（亞利桑那州是全美國肺病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因為它是美國各州肺病患者所必到的療養地）。”（見第五九八頁）

夏威夷的原有居民實際上已經幾乎等於絕種。“在一七七八年夏威夷羣島的居民……為數約三十萬人。由於歐美人的到來而帶來的新的疾病與社會組織的破壞，原有居民的數目就更加迅速地減少。其後，夏威夷人的數目繼續不斷地下降，到一九四八年時只剩下了一萬人左右……純種的夏威夷人好像命定要絕滅了。”（見第六三〇頁）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帝國主義“科學”的“進軍”情形。早期的美國殖民者曾經在一百五十年中用比較緩慢的方法如梅毒、酗酒、及煽動部落間的內戰來消滅夏威夷人。最近的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則企圖在數年之內用毒氣室這種較快的方法來消滅猶太人。現在，提倡所謂“防禦性戰爭”的戰爭販子正企圖在數天之內以原子彈和氫彈去滅絕整個民族的人民。

關於給聯合國的這個報告，我們就談到這裏。美國主要是在特別重要的軍事基地採用殖民地統治方式。因此，在一些這樣的殖民地中，重要的活動是由軍事當局直接主持的。在這裏，金融資本所掌握的國家機構使得各有關金融資本集團的種種掠奪方法以及它們的目的變成事實。

我們可以以巴拿馬運河區為例。老羅斯福任職總統期間的美國政府從哥倫比亞手中奪取了巴拿馬的領土，製造了一個巴拿馬傀儡政府，並且建立了對巴拿馬運河區的正式殖民地統治。為了取得這個運河區，美國支付一千萬美元給巴拿馬，後來又支付給哥倫比亞以二千五百萬美元作為補償金。

美帝國主義即從這個廉價得來的專利品上大賺其錢。在二

十八年當中，它收入了五億五千四百萬美元的過境費，而其中利潤即達二億七千二百萬美元。這條運河乃是巴拿馬及其鄰近國家人民的勞動建築與維持的，但這些人民過去以及現在所受到的待遇是什麼呢？可以看看美國公用事業工人聯合會所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裏說的話：

“當我們的政府在建築這條運河時，主持其事的將軍們制定了一個對白種監工與有色人種‘勞工’有區別地支付工資的制度，他們以金幣付給白種工人，而以銀幣付給有色人種工人。

“此外尚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差別。

“拿銀幣的當地工人所得的工資少到每天只有九分美元。

“而拿金幣的白種工人却按美國國內當時的工資標準付給……

“在過去四十二年中，這個‘金銀’制度已經演變成爲種族歧視的一種經濟與社會的制度。

“在過去四十二年中這個種族歧視的‘金銀’制度乃是根據最瘋狂的種族優越主義者的想像而建立起來的。”⁴⁶

現在，美國政府規定的官方工資比率表是這樣的：做完全相同工作的“銀工”所得的工資比率只有“金工”工資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在一九四九年會計年度中，對八千個當地土著工人所壓低少付的工資其總數就超過了向通過運河所收取的各種船隻過境費二千萬元的收入這個數字⁴⁷。

組織工人並領導他們爲爭取提高工資而進行過勝利的鬥爭的美國工會領袖們，都被運河區域軍事統治者拘捕入獄。

這就是由代表着金融資本家並充當先鋒隊伍的美國軍隊所實施的超額剝削與壓迫政策的典型。

波多黎各以人口來說乃是美國最大的一個正式殖民地。波

多黎各除了被美國用作軍事基地之外，其人民還受美國的糖業公司和那些工資低微而工作日漫長的小工業的經營者的瘋狂剝削。一九五〇年波多黎各民族主義者的起義就反映出人民大眾普遍對外來統治者的反抗。它顯示出，殖民主義在西半球，正如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了。

第四章

歧視黑人制度對於華爾街的利害關係

今天的美帝國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世界各個地區吸取利潤的。但是，華爾街超額利潤的原始基礎却是加在美國國內黑人身上的壓迫，這種壓迫比起任何單一的國外來源來，至今仍然是一個較大的利潤來源。

在南北戰爭剛結束的數年內，黑人曾獲得許多勝利。他們被選入國會和州議會，能與他們的白種同伴一同參加管理南方若干州的州政府。爲了取得土地所有權、選舉權、攜帶武器權、受教育以及充當陪審官的權利，爲了反抗各種各樣的歧視，他們進行過鬥爭。

但是這個第二次美國革命並沒有完成。除非黑人能夠贏得他們世世代代耕種的土地的所有權，從而奠定經濟基礎，使其能擺脫奴隸地位，要不然這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南北戰爭時期控制着聯邦政府的北方工業家們並不願意黑人獲得真正的解放。他們的目的是篡奪南方奴隸主的地位，成爲黑人的主要剝削者。共和黨和在南方的軍隊所採取的政治路線是與過去的奴隸主結成聯盟，以便重新置黑人於奴隸地位。這就是後來的金融資本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動地主結成聯盟的前驅。他們的經濟路線就是阻止黑人獲得土地，在新局面底下保全種植園制度，使北方的銀行家、大商人、製造商由種植園的經營中取得絕大部分的利潤，而南方的地主則變成他們的小夥伴與管理人。

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當新興的銀行及工業獨佔企業的擴張力量在南方找到了第一個巨大的出路時，這種過程發展到了最高峯。也就是在這十年以及其後的幾年中，頒佈了南方歧視黑人的法律，通過了新的州憲法剝奪黑人的選舉權，黑人被逐出了地方政府機構和美國的國會。在十三年中，有記載的私刑處死黑人的事件就差不多有二千件。黑人與貧苦白人間的同盟被恐怖與宣傳所完全破壞。象徵着這一同盟的人民黨，其影響也被剷除殆盡¹。

與恐怖手段同時並行的是對黑人的經濟壓迫。南北戰爭以後佔南方熟練工人中大多數的黑種工人都被有計劃地逐出高工資的工作，並且被排斥於整個工業之外（例如棉紡織工業）。他們被拘捕起來用鐐銬鎖在一起去從事營造工程，或是成爲南美松脂油勞動營中的奴隸，或是成羣地被趕赴鋸木場和礦場²。據哈利·海伍德說：還採用了許多特別措施，來使得黑種人不能佔有田莊，強迫越來越多的黑人到種植園去從事勞役³。

同時北方的銀行家和工業壟斷企業加緊了他們對南方經濟生活的控制，從被壓迫的黑人身上榨取超額利潤，而榨取南方白種工人及分益農的程度則較輕，因而這些白人，在經濟上的拉攏和種族歧視的宣傳之下，就與黑人切斷了關係。鐵路、棉紡織業、煤、鐵、鋼及烟草等工業都擴張了，在不同程度上均被北方資本所控制。華爾街的銀行和保險公司或是直接奪取了大部分種植園，或是用壟斷信用貸款和控制商品交易等方法對它加以控制。到一九〇〇年，北方在南方的投資已達十億美元，比它當時的海外投資要多一倍⁴。在以後的數年中，這樣的產業又增加了許多倍，並且發展到其他新的工業——石油、電力、人造絲及化學工業——北方資本對這些新工業的控制，較之對舊有的工業更爲

徹底。

南方就這樣實際上成了華爾街的半殖民地，而以黑人供給絕大部分的殖民地勞動力。

由於黑人人口的增加以及北方工廠對勞動力需要的增加（特別是在戰時），數以百萬計的黑人被鼓勵移居北方。在北方，同一批金融巨頭用比較不露骨的形式對黑人進行與在南方同類的超額剝削與壓迫，用同樣的離間黑白及種族歧視的方式來分化黑種與白種工人。

對黑人的超額剝削

和殖民地的人民一樣，黑人幾乎完全不佔有工業。他們在任何資本的所有權中只佔有微不足道的一點點。同時，他們却提供了從比例上說很不相稱的大量勞動力，而金融資本正是藉此而獲取利潤。在一九四〇年，受僱傭的非白種男子之中，約有四分之三充當農民、勞工以及侍役。而在白種人中的相應比例却只有三分之一^①。

這樣，美國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所過的多種多樣的寄生生活以及熟練工人相對的高工資，在不小程度上都是建築在農場上和城市裏黑人彎腰折背的艱苦勞動之上的。

一九四七年，白種工薪勞動者的平均工資或薪給是一千九百八十美元。非白種人的是八百六十三美元，或者說，只相當於

^① 在一九四〇年，受僱傭的非白種男子在歸類時被稱為非農場的業主、經理、官員的，只佔百分之一點六。而受僱傭的白種男子之中却佔百分之十點六。總起來說，受僱的非白種男子之中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只佔總數的百分之五點六，以白種人而論則佔百分之三十點三（一九四〇年美國第十六次戶口調查，見“人口、勞動力、職業特徵”第二表，第五頁）。

白種人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六⁵。

這種每年一千一百美元以上的差額，大約相當於僱主們從一個普通黑種工人身上所取得的超過一個白種工人的正常利潤以上的額外收入或超額利潤。白種民族優越論的宣傳聲稱，黑人是劣等民族，黑人不能生產同樣多的東西，因此他只配比白種工人掙得少點。自由主義者的論點也反映這種宣傳。自由主義者往往認為黑人工資低僅只是反映黑人受教育機會少，得到熟練工作的機會少。這種觀點接受了黑人工資低乃是黑人生產力低的反映的看法，因此默認了黑人目前的貧困是理所當然的。

誠然，黑人被剝奪了他們應得的受教育的均等機會。但是即便是黑人受了教育，他們也不能因此而免於受特殊的剝削。政府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在一九三九年，在大學唸過四年或四年以上的在美國出生的白種人，其平均工資是二千零四十六美元，而受同等教育的黑人的平均工資却只有一千零四十七美元。受過中等學校教育的在美國出生的白人，不但比受過同等教育的黑人掙錢多兩倍，而且比大學畢業的黑人還多掙百分之四十。所受教育不超過小學的美國出生的白人，比大學畢業的黑人還掙得多，而與受同等教育的黑人比較，則多掙百分之七十⁶。

在就業機會上對於黑人的歧視本身固然已經足夠卑鄙的了，但這還不是事實的全部。不論從那一方面來說，黑人所得工資較低並不是由於其工作量少。無論從數量與質量上說，他們的勞動都是相等於或超過白人的勞動的。

黑人遭到隔離，只許從事某些特定的工作。但是這些工作決不是最容易的或僅需要最少技術的工作。相反地，黑人的工作的特徵，往往是最緊張、最危險、最不愉快、最不衛生的。把黑人的工作如鑄造廠內的切割工列為非技術工作，給予非技工的待遇，

是沒有客觀理由的。這個工作，如同許多旁的工作一樣，事實上是高度技巧的工作，特別困難，需要非常的忍耐力和對不正常的溫度的抵抗力等。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對於這類工作酬以特別高的工資，規定較短的工作時間和較長期的休假，並且努力在科學與技術方面研究如何使這類工作成爲不需要。在帝國主義的美國，這種工作被列爲“非技術”工作，這不過爲了使黑人的低工資“合理化”而已；這是傳佈白種優越論神話的一種詭計，其目的是把對黑人的超額剝削“合法化”而已。至於所謂美國工業部門中維持同工同酬原則的這套謊言，其卑鄙不下於他們在殖民地報告書中所鄭重宣稱的“平等”原則（參閱第三章）。

根納·米達爾所著“美國的一個難題”一書說過，大多數黑人的工作是戶外工作，因而受失業、季節停工等影響最大。這類工作中有若干種，其特點是“高度的生理上與心理上的毀壞性”和“長時間的緊張的肌肉活動”。由於這些情況，據這位著者說，這類工作普遍地被認爲比最單調的工廠工作還不如。某些主要的黑人職業，具有下述的種種不利條件：

“在伐木業中，主要危險是意外事故及疾病；在鋸木廠，意外事故及吵鬧；在肥料工廠，灰塵及臭氣；築路工作，過分的風吹日晒等等。”

這本書說，在福特汽車公司的機器間內，工資是十分高的，工人之中黑人連百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在需要同等技術、而工作又遠較前者緊張危險的福特鑄鐵廠內，工資低得很多，工人之中百分之四十七是黑人⁷。

羅伯特·斯·魏弗爾在他所著的“黑人勞工，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一書中寫道：“大多數在北方的黑種工人在鑄鐵廠作工或做其他極熱的、很不舒適的、或工資較低的工作。”⁸

關於黑種人的工作情況，可以從英國“生產力調查小組”所作的報告⁹中得到一些暗示。這個英國調查小組在一九四九年訪問了美國的若干個煉鋼廠，其目的是要以“美國生活方式”作為馬歇爾計劃的一部分來教育歐洲人。這個英國小組發現在七萬五千工人之中，百分之五十五是黑種人，百分之十五是“其他工人，如歐洲人包括波蘭人、捷克人和意大利人”；百分之三十是“美國的白種工人”。這些英國訪問者所說的最後一類是指具有英吉利或蘇格蘭血統的美國人。他們發現，這一類人佔有大多數工資較高的職位，如擔任領導工作和模型設計工場裏的工作。

在這些鑄造廠裏佔工人中絕大多數的是黑人，他們每人的生產量比英國鑄造廠裏的工人要超過百分之五十至九十。這些人的情況又是怎樣呢？這份報告書裏提到黑種工人“用沉重的鎚子做着極端勞累的工作”，而且工作緊張到這種地步，以致於“當午間休息的汽笛聲一響，他們就在工作的原地躺下酣睡起來。”報告書說，工場裏缺乏防止吸入砂土致生肺病的設備，“只顧速度，不顧安全”，“車間裏光綫陰暗”和“廠房失修的情況十分普遍”。報告書還指出，僱主故意製造極高的工作溫度，它說如果是在英國，工人會覺得這是不能忍耐的。

這個英國小組把這一切情況都歸諸於僱主的“殘酷”——為的是要從工人身上榨取最高的產量，甚至在不景氣的時候也是如此。那麼，為什麼黑人肯接受這種為大多數白人所拒絕的工作呢？這批十分熟悉怎樣剝削非洲黑人的英國訪問者聲稱：那是因為黑種工人從這類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樂趣”，他們工作時“滿不在乎，不怕疲勞”，“習慣於”高溫下工作。可是，真實的原因則是他們利用隔離與歧視黑人的政策，迫使黑人為了免於餓死而接受這些工作。據這報告說，他們工作的強度是僱主規定的，一個

新來的工人，必須在最初的三十天到六十天使工作進度達到僱主所規定的一個很高的標準，否則就要被解僱。

黑種工人必須十分熟練於某些特別困難的或危險的工作，他們得不到任何專門的訓練，只能從嘗試和錯誤中學習，依靠互助的方法去完成僱主交下來的艱巨的任務。由於這些情況，在北方他們的工資一般都比產業工人工資的正常標準低，甚至比遠不如其緊張、也不需要實際技術、也不那麼危險的勞動所得的工資還低。在鑄造廠工人中佔少數的外籍工人，所處的情況與此相仿。這一事實更有力地說明了對黑人進行的殖民地式的超額剝削是富有傳染性的。這種剝削必然傳播到一定數量的缺少保護的白種工人頭上。

這裏是從一九四七年“製造業調查統計表”中選出來的幾個例子，雖然還不够全面，但已經可以看出在某些工業中對於黑種工人的超額剝削情況^①。

	每小時工資(單位:美元)
1.俄俄岡州的鋸木廠(幾乎全部為白種工人)	1.61
亞拉巴馬州的鋸木廠(大部分為黑人)	0.63
2.亞麻仁油廠(主要在明尼蘇達州,幾乎全部為白種工人)	1.28
棉籽油廠(南方的工業,大概黑人佔大部分)	0.73
3.北方的肥料製造業(黑人佔相當的比例)	1.13
喬治亞州的肥料製造業(大部分為黑人)	0.76
4.賓夕法尼亞州的煉鋼廠及軋軋廠(有若干黑人)	1.54
賓夕法尼亞州的鑄鋼廠(大部分為黑人,這裏的工作特別困難)	1.40
南方的灰鑄鐵鑄造廠(絕大多數為黑人)	1.09
5.捲菸製造業(主要是白人)	1.12
菸葉去梗及烤菸(絕大多數為黑人)	0.75

在農業方面，對黑人的殖民地式的壓迫更趨極端。在田地上工作的黑人，大部分是分租佃農和分益農，他們須以收成的一半

交租，並且在出售產品的價格上又受到重利盤剝及其他種種的欺騙。黑種人充當農業勞動者的為數更多，這些沒有土地的人受剝削最深。一九四七年七月，在很少僱用黑人的偏西北中部各州，一個農業勞動者的平均工資是每天六美元五角二。在偏東南中部各州，一半農業勞動者是黑人，他們的平均工資是每天三美元二角四¹⁰。以農村所有的白種農戶的收入論，一九四七年一戶的平均收入是二千一百五十六美元，非白人一戶只有一千零二十六美元。兩者之間相差一千一百美元，這數目與前面所講的非農業工資勞動者的差額大致相同¹¹。

美帝國主義從對黑人的額外剝削上所獲得的超額利潤究竟有多大呢？如果把黑人的平均工資與白人的平均工資的差額一千一百美元算作額外利潤，把這數目乘從事農業和工業生產的黑人人數¹²②，就可得到一個差不多的答案了。在一九四七年的六百萬有收入的黑種工人中，約三百五十萬在農場或工業裏從事生產勞動，把這數目乘以一千一百美元，就得出超額利潤的總數：差不多達四十億美元。新近的數字說明一九四八年獲得類似的結果。

這個計算僅僅限於商品生產者。譬如說數十萬被迫放棄自己的家務到別人家裏充當傭工的被剝削的黑人婦女，就沒有計

① 這裏所舉的例子，許多是地區之間的比較。不得不如此比較，是因為缺乏完備而詳盡的關於黑人工資的材料。但是不同地區之間的工資差異並非主要問題。例如棉紡織業，南方北方一樣都是幾乎全部用白種工人的，地區差異只達百分之十一。另一方面，如捲菸工業與菸草去梗工業同屬一個地區，但是由於以不同人種組成其勞動力，於是二者工資差異却很大。

② 此地所指的黑人生產工人在戶口調查表中歸類為：農民和農莊管理人、農業勞動者和監工、工匠和類似的工人、製造工人和類似的工人、農莊和礦場以外的勞動者。

算在內。她們在南方每週工資只有十美元，在北方是二十到二十五美元（紐約市除外）。

我們說，帝國主義從對黑人的壓迫中獲得的利益每年達四十億美元，這還是一種保守的估計，因為這完全沒有把另外一種形式的重要的超額利潤包括在內。像許多附屬國裏的人民一樣，美國黑人購物時所付的價格要比國內一般的壟斷價格還高。在南方的農村中，黑人農民就得在鄉村商店、種植園的糧食店付出超額的價格。在城市裏，黑人被隔離到特殊地區，如紐約的哈蘭姆區。在哈蘭姆區，品質較劣的貨品與鄰區比較，其售價反而高些。最突出的是住房租金的昂貴。主權屬於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和抵押公司等的新約最糟的貧民窟，即在哈蘭姆區。那兒的租金比起其他工人階級居住區的房租，要貴百分之五十。

美帝國主義一個特殊的“清理貧民窟”的方法是替中產階級的白種人和熟練工人的家庭建築一些廉價的住房，逐步把那不會萎縮的貧民窟改變成與日俱增的城市黑人的特定區域。金融資本與國家機構用聯合的力量來保持這些特定區域，正如都會人壽保險公司與紐約市政府就曾聯合起來，迫害居住在這家由洛克菲勒控制的保險公司所擁有的住宅區內的白種房客，因為他們想破壞該區白種清一色的性質。

任何統計數字都沒法概括數百萬美國黑人在半奴隸、半農奴壓迫下所遭受的痛苦。分益農簽訂租田契約時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所以一家老小男女包括五歲以上的小孩，都被迫從黎明到黑夜在田裏工作。通過對債務的操縱，通過以勞力償還債務這類改頭換面的奴隸法律，這些佃農家庭差不多成了囚犯。如果他們企圖離開田地，就有被逮捕的資格。南方的種植園不再需要的移民，成了北方資本家的勞工招募人的奴隸。“忿怒的葡萄”一書內

所描寫的種種痛苦，他們是完全能夠體會的。在南方，每年有數萬黑人遭到逮捕，並不是因為他們犯了什麼罪，而是爲了要把他們關在監獄似的農莊上或道路工程中去從事強迫勞動，他們的無償勞動所得的果實，均變成幾家食品公司及承辦商人的利潤。

政治方面的壓迫

黑人在美國所處的地位，更加證實了馬克思的名言：“當黑種勞工依然被蓋上受罪的烙印時，白種勞工也就不可能使自己得到解放。”這句話一般地適用於帝國主義對附屬國人民的超額剝削。但是，就黑人而言，此種情況正是在美國國內發生的，而且對白種工人的地位產生着最直接的影響。

可是，美國的工會領袖們，除了極少數幾個進步的以外，對壓迫黑種工人這一制度是採取合作態度的。若干熟練技術工人的工會簡直就直截了當地拒絕黑人參加。其他一些工會則間接地通過學徒制和執照制等等辦法，對黑人加以排斥。更有一些把黑人隔離起來，使他們只能加入權利較少、工會條件較差的黑人工會。重要的產業工會沒有辦到給黑種工人以平等權利，未能反對提升與僱用時對黑人的歧視，沒有制止施之於黑人頭上的“最後受僱，最先解僱”的規律，沒有阻止黑人常被指派到事情最苦、工資最低的職位上去，沒有允許黑人擔任工會工作等等。這些現象對於一般勞工所引起的不良影響，可以從下面這件事看出來：當產聯在南方進行發展工會組織工作時，由於採用了歧視黑人的組織方法，乃使這運動遭到失敗。於是，使得南方的工人，黑人白人全包括在內，都得不到工會的保護。

沙文主義的毒素已經遍及全國，並且已滲入了一切美國生活的潮流。主張種族歧視的統治階級教導一般美國人民用侮辱

性的名辭去稱呼黑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從建立歧視黑人的制度開始，一直力圖把美國的勞動人民根據不同的民族分化成爲許多互相隔離的集團。在這方面，他們已經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儘管盛行所謂美國是一個“大鎔爐”的說法，但是政客們在競選時，還是提出各種各樣的呼籲，以爭取“愛爾蘭人的選票”、“波蘭人的選票”、“猶太人的選票”、“意大利人的選票”和“黑人的選票”。

這種現象還有其更廣泛的涵意。凡是能容忍帝國主義在國內對整個人民進行壓迫的人，大約是不會反對帝國主義在南美、亞洲或歐洲去從事同樣壓迫的。支持在美國國內歧視黑人的人，就必然會進一步在海外支持帝國主義的擴張及侵略戰爭，而擴張與戰爭所造成的災難性的後果是整個美國人民都要承擔的，特別是美國的工人。因此，那些客觀上支持國內歧視黑人制度的工會領袖們同時公開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全部擴張計劃，這是毫不足怪的。

對黑人的壓迫是美帝國主義致命的弱點。這是不能像海外半殖民地那樣用形式上的獨立來加以掩蓋的。凡是訪問過美國的人，都可以一眼見到這種情形。這種壓迫使得美國對亞洲和非洲有色人種的福利表示關切的外交幌子簡直成了一種諷刺。它極度強烈地揭露了“美國生活水平”的宣傳的實質，因爲美國的一千五百萬黑人公民顯然是被排斥在這種“生活水平”之外的。

爲了應付這一着，美國的金融資本利用願意爲帝國主義點綴門面的黑人，給予他們那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平等。這些黑人被安置在沒有實權的而能引起公衆好感的位置上，特別是能引起他國人民好感的位置上。譬如任命拉爾夫·朋區和依廸斯·桑普孫夫人擔任聯合國工作，就是很好的例子。杜魯門總統假裝贊成

用保障人權法案來改進黑人的生活情況，也是爲了達到類似的宣傳目的。他責備國會對這法案不採取行動，但是他自己却甚至連爭取一下的企圖都沒有，也沒有去動員他自己的黨爲這綱領作主張，也沒有和他自己黨內的反對這項法案的人決裂的意思。這一切事實，與杜魯門和民主、共和兩黨趕忙通過種種立法以便利備戰及海外擴張時的那股熱勁兒，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

那個名義上由杜魯門指揮的帝國主義政府機構，繼續充當着壓迫黑人的機關。在軍隊裏和政府機關裏對黑人所採取的“正當”方式的隔離和壓迫，在杜魯門總統治下依然有力地繼續着。杜魯門的聯邦政府並沒有去阻止加於黑人的越來越厲害的警察暴行，也沒有去阻止北方和南方對黑人所進行的“合法的”私刑。美國政府憑藉失業保險制度以及美國職業介紹所的活動，加強了對黑種工人的超額剝削。以一九四九年九月的數字爲例，美國職業介紹所替非白種人介紹的工作，屬於侍役工作的人數二十八倍於工資較高的熟練技工、僱員、店員、專門職業者和管理人員的人數。給白人介紹的工作，工資較高的工作比侍役工作爲多。紐約州雖然據說爲了防止歧視黑人訂有“公平就業實施法案”，但是類似的事情就發生在紐約州¹³。

在對付意大利、菲律賓這樣的國家時，由於那兒的人民威脅着要全盤終止帝國主義的控制，美國政府就假裝贊同有一個土地改革綱領，想藉此轉移人民的真正的土地改革運動。在美國南方的黑人對土地同樣地飢渴，地主對他們的剝削一樣地野蠻，但是對這問題美國總統却是完全沉默的，甚至連羅斯福總統當政時代通過移墾總署這類機關發放的爲數甚微的農村救濟金也被放棄了。

從新聞記者阿瑟·克魯克訪問杜魯門的談話中，可以知道

黑人從杜魯門那裏可以希望得到些什麼(克魯克問,杜魯門答):

“問:‘你是贊助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的立法的。……黑種人的情況以及他們從事某些職業時所受的能力不夠的限制,你是熟知的。許多人相信,在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即使是在自願基礎上能起作用之前,就需要對黑人進行教育。那麼爲什麼要用命令方式加以推行,使僱主承擔這試驗的担子呢?’

“答:‘總統不支持或不繼續支持任何立法,如果那立法將剝奪一個公民按照他本人認爲最好的方式去處理他自己的事務的權利,而對這事務,他是負有責任的。總統不同意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的立法會發生任何這樣的結果。假如總統認爲那樣,他就不會贊成了,而且在他手裏也不會付諸施行。’”¹⁴

美國總統毫無問題地接受了黑人是“低劣種族”的帝國主義的沙文主義的理論。他說得很清楚,他將不作任何干預壟斷資本按照上述理論行事從而獲取超額利潤的事情。他暴露了他的真正意圖,原來他誇誇其談的吹噓是爲了欺騙黑人,爲了欺騙知道美國歧視黑人的醜事的其他國家的人民。

最近十五年間,爲了消滅種族隔離與歧視,爲了消滅貧窮、超額剝削以及選舉權的被剝奪,黑人進行了鬥爭,並且達到了重要的高潮。這個鬥爭配合着全世界反帝運動的不斷增長。美國的黑人在這樣做的時候越來越多地採用聯合白種工人及一般進步力量的方法了。爲了美國全體人民的利益,白種工人必須採取主動,實現這樣的聯盟。

當黑人與白人的團結在南方得到進展時,他們的敵人就以武力來替代政客手腕。美國共產黨領袖但尼斯在一九五〇年以“蔑視國會”罪被判入獄,因爲他指出衆議員蘭金之當選,是由於密士失必州的違反憲法的歧視黑人的法律,他責問蘭金是否有

坐在衆議院的權利¹⁵。

本章指出一九四八年由黑人勞動中取得的額外利潤至少達四十億美元。這是壟斷企業從相同數目的白種美國工人身上取得的平均利潤之外的數目。加上由海外掠奪的七十五億美元(參閱第三章),美帝國主義者每年從被壓迫人民的勞動中取得的超額利潤總數達一百一十五億美元。

第五章

被阻滯的附屬國的開發

帝國主義的贓物主要是從附屬國家來的。“西方文明”的科學、技術以及生活水平對於受這種文明支配的國家內的十五億人民是不存在的。這些國家是落後的，或者，用聯合國有禮貌的外交辭令來說，是未充分開發的國家。

這種落後性是故意造成的。它是帝國主義強加於附屬國並且要繼續加以維持的。它是維持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軍事力量與奢侈生活所必需的條件。沒有它，美帝國主義就不能得到每年一百一十五億美元以上的貢禮，英國和西歐的金融資本也不可能每年榨取幾十億美元。沒有它，也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下的美國生活水平。

已經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把世界分成了少數幾個統治國家及很多的被統治國家。“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的野蠻規律，原來是支配一個國家內資本家之間競爭的規律，但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它被推廣到了所有的國家。多數國家的落後成了少數國家在技術上先進的條件，殖民地人民日趨貧困成了帝國主義國家裏統治階級極端富有的條件——帝國主義國家緩和國內被壓迫人民的抵抗的條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武力鎮壓，成了阻擋帝國主義國家本身的社會主義鬥爭的條件。

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從一國到另一國的資金流通與貿易有

時是能同時促進技術與經濟的發展的。當現代國家在歐洲形成時，工業發展隨之而來，若干國家出現了程度多少有點相似的工業成長。雖然英帝國主義曾經想出種種方法去阻撓美國的經濟發展，但是美國資本家還是利用英國資本為工具，加速了美國工業的成長，並且在美國獲得正式獨立以後，粉碎英國繼續把美國當作經濟上的殖民地的企圖。

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帝國主義扼殺了這種新資本主義中心的成長，並且很熟練地運用資本輸出來從經濟上奴役其他人民。帝國主義打破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有的社會形態。由於受到壟斷的扼制，在一些先進國家內已經開始停滯起來的資本主義，在附屬地區內却很快地發展起來，巨大的採礦工業及農業企業成立起來了，有時還具備了最近代化的技術。鐵路及電力廠修築起來了。過去與世隔絕的地區也被捲入了世界貿易的洪流。

但是這是一種片面的發展，完全受着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的控制，同時是為它們的利益服務的。它們把當地人民的資源、土地及勞動力據為己有。它們破壞了當地以往的經濟形式，阻礙了為本民族提供新的生活資料的當地工農業的齊頭並進的、全面的發展。

以往自種自食的人民，現在必須在外國公司所佔有的土地上耕種，為其種植出口所需的單一的農作物。這樣，他們就不得不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糧食，而取得這種糧食的苛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長期地處於半飢餓狀態中。

往往在一個為出口而生產的高度發展的石油與金屬工業地區，只有原始的手工業式的金屬作坊來為當地生產物品，因而使那裏存在着長期缺乏金屬用品與燃料的現象。一方面我們看見

聯合果品公司的廣大的種植園，還有高架的灌溉系統、鐵路、出口船隻上的機械化的裝載設備，可是就在它的旁邊就普遍應用着木製的農作工具——而且即使使用這種工具耕作的土地面積也正在縮小中。

世界金融中心在積聚着大量的從殖民地榨取得來的財富，但與此同時，殖民地本身却長期缺乏資金，越來越依附於帝國主義的銀行家。美國商務部的一位官員對這個現象曾經這樣說過：

“拉丁美洲的人民常常說，他們的國家仍舊停留在殖民地發展的階段，也就是說，他們的經濟還停留在殖民時代的形態，在經濟上和財政上他們依附於高度發展的國家。他們的所謂殖民地地位，主要的幾個顯而易見的標誌是：第一，拉丁美洲國家是債務國家，並且國內許多主要企業為外國人所佔有；第二，對外貿易主要是以拉丁美洲的原料去換取工業國家的製成品。例如，大多數鐵路的發展是爲了運輸原料到海岸，而沒有一國具有一個真正全國性的運輸系統。大多數重要的公用事業及交通系統受着外國的控制，主要的礦業也在外國人手中。”¹

一九四八年，全拉丁美洲生鋼的產量約一百萬噸，亞洲大陸（不包括中國的東北和蘇聯）約一百五十萬噸，非洲不到一百萬噸。以上三洲住有世界大部分的人口，但其鋼的總生產量只約略相當於美國的鋼生產量的三十分之一和資本主義歐洲的鋼生產量的二十分之一。

機械的生產則更加不發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能生產比最簡單的工具略勝一籌的機械的，爲數很少。

在這些地區內，實際上沒有重工業基礎可言，而沒有重工業基礎，要發展經濟與提高生活水平都是辦不到的。

紡織工業是半殖民地區內能够稍有一些發展的僅有的幾種

工業中的一種。所謂發展主要是以工廠生產替代以往的家庭紡織，就像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最早階段那樣。

但是，即便是紡織工業也還是未能充分發展的和落後的。拉丁美洲在一九四五年有四百四十萬紗錠，但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有二千八百一十萬紗錠。印度比英國人口多八倍，印度只有九百七十萬紗錠，而聯合王國則有四千一百四十萬²。

工業如此，農業也是如此；而在落後國家裏農業至今還是絕大多數人口生活的來源。帝國主義的公司從最肥沃的土地上榨取最高的利潤，而當地的農民却只能在封建地租下掙扎，沒有肥料，缺乏灌溉，使用着最原始的工具耕種那土力已經十分衰退的土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巴西每人每年生產的穀類豆類的噸數，與美國每人每年的相比，只當後者的五分之一³。雖然糧食生產那麼不足，但是咖啡，棉花及可可——三樣以出口為主的農作物——的總值却等於為國內人民消費用的農作物的總值的二分之一強⁴。

由於經常播種單一的農作物，特別是經常播種咖啡，許多最適於耕種的肥沃土地却變為貧瘠。至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美國—巴西委員會的一個報告曾經這樣說過：

“巴西僅僅開始脫離‘鋤頭農業’經濟的階段。除了簡單的手用器具外，只有四分之一的農場有機械。甚至到一九四七年，耕種用的犁只有九萬九千三百二十六把（一九三〇年該國土地所有者就有六十三萬戶——著者）。至於拖拉機，各種報告說明在農田上使用的為數尚不足三千五百架。”⁵

這個報告指出了造成農業技術落後的許多因素，其中有兩

個是值得提一下的。第一，“很多農莊耕地面積很小”，另一方面，少數幾個農莊，其面積又十分遼闊。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帝國主義設法保全的封建土地制。第二，“進口的拖拉機、其他裝備、以及汽油和煤油等售價奇昂。”這是美國壟斷企業強加於巴西的情況。保持巴西農業的落後狀態，把商品高價出售以吸取超額利潤，是對美國壟斷企業有利的。

土耳其的情況也差不多。在那兒，美國的金融資本已大部分取代了德國銀行的地位，成爲那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力量。“紐約時報”的一個國外特派記者寫道：

“廣泛地說，土耳其的發展進入了很不正常的階段。它的農業大部分還應用着近乎原始喜泰族移民者的古老的耕種方法。但是，與此同時，土耳其政府却又按照噴氣式飛機及原子時代的要求在計劃着一些其他的設施。”⁶

這就是說，杜魯門主義對土耳其的興趣是把它變成一個轟炸蘇聯的軍事基地，變成保障近東石油礦藏的“硬殼”——而並不在如何改進迄今仍用木頭工具刨地的農民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資本主義總危機不但影響了帝國主義國家本身，也波及了附屬國家。在帝國主義的畸形基礎上的附屬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一九二九年也達到了不能再前進的限度。在接着而來的經濟危機、長期不景氣和世界大戰的整個時期內，附屬國也被捲入了帝國主義國家本身普遍的停滯現象中去。這可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八年二十年中各洲的鐵路貨運的發展來加以說明，因爲貨運總量一般標誌着經濟活動的水平。

鐵路貨物運輸量⁷（單位：十億噸公里）

	1928年	1948年
全世界(蘇聯未計算在內)	1,024	1,392

北美	703	1,031
歐洲	221	220
亞洲	61	78
非洲	15	29
南美	18	23
大洋洲	7	11
蘇聯	81	438

在一九四八年，四大洲貨運總和只相當於歐洲的三分之二，北美的七分之一。但是比這絕對的懸殊更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落後地區缺乏相對的進展。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八年間，南美貨運與北美貨運相比，從比率上說，是下降了，從早期的百分之二點五降到後期的百分之二點二。如以人口計算，南美的貨運量更是絕對地下降了。北美的貨運與亞洲和歐洲相比，相對的超出數量也增多了。的確，從西歐貨運的絕對下降上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歐洲在經濟上的衰落，這也就是過渡到從屬於美國的第一個階段。在未開發的幾洲之中，唯有非洲顯示出有“顯著”的增加，在二十年中比那原有的一點微小的貨運量增加了將近一倍。

政治上與文化上的控制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資本主義的政治發展，像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一樣，是畸形的，不完整的。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中，工人階級所贏得的民主權利——諸如選舉權、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權利、不受警察恐怖壓制的某些保障、組織工會的權利以及罷工的權利——在附屬國家還沒有。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只有富有階級才有選舉權。除了極少的

暫時的間斷以外，共產黨、工會和農民運動總是非法的。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對付人民的那種毫無節制的警察恐怖行動是普遍存在的。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罷工都遭到武力的干預。

不僅如此，附屬國內的議會及選舉，即使對於富有階級而言，也並不能產生什麼真正的民族國家的權力。在殖民地國家，例如在波多黎各和某些英國屬地，立法機構只能在嚴格的限制下活動，而且還得受統治它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公開監督與否決。

在半殖民地國家，例如拉丁美洲和中東國家，選舉的目的主要是爲了要使那些依仗武力篡奪政權的獨裁政府“合法化”，議會的功能也就是使這些獨裁者的命令在形式上更加莊嚴而已。拉丁美洲的武裝政變和宮廷革命成了帝國主義政治的必要部分。當英美帝國主義爲了統治拉丁美洲而進行的鬥爭發展到最高峯時，這些衝突有時擴大成爲曠日持久的血腥內戰，有時甚至越出國界（如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玻利維亞與巴拉圭之間的察科之戰）。在這些戰爭中，許多都是在某種掩蓋之下帝國主義勁敵之間的爭霸戰。

今天，拉丁美洲的政變一般說性質有了不同。它反映着當地不同的統治階級集團爲了爭取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買辦的權利而進行的鬥爭。而且，人民鬥爭的高漲有時也會暫時產生一個企圖減少對帝國主義的依賴增加民族資產階級權力的政府。然而，這樣的政府最後必然要遭受到以美帝國主義爲後台的集團的武裝攻擊。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樣性質的攻擊曾經在巴西、哥斯達黎加、委內瑞拉等國發生過。一九五〇年時，又在危地馬拉策動過。在其他的國家，如智利和墨西哥，正式的政變是不需要的。曾經作過一點兒努力企圖減少帝國主義控制的那些統治集

團現在都投降了，或多或少成了美帝國主義的甘心情願的走卒。

當然，我們常聽到美國否認它參預了建立拉丁美洲反動政權的活動。但是，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證明美帝國主義在這些事件中是起着決定性作用的。幾乎沒有例外，這些政府都是由軍人直接獨裁的，而這些軍隊的軍火是美國供應的，人員是受美國軍事代表團訓練的。在這種情況下，北美的將軍們顯然能夠決定什麼時候拉丁美洲需要一個“革命”。

美帝國主義怎樣統治那些名義上是“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紐約時報”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發自尼加拉瓜的一篇通訊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例子：

“在四千二百名國家禁衛軍的槍桿下，二十萬尼加拉瓜人民將於星期日投票選舉索摩薩總統的繼任人。在所有的人民都解除了武裝的情形下，國家禁衛軍成了唯一的仲裁人。……

“國家禁衛軍顯然就是尼加拉瓜的警察。它於二十年代後期開始建立，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佔領該國後的產物。索摩薩將軍最初贏得華盛頓方面的青睞，也是由於他能有效地發展並領導這支禁衛軍。一九四〇年以來，尼加拉瓜的國立軍事學校一直是在一個美國軍官的領導下工作的。”⁸

就像這樣，這個從一九〇九年就開始的變相的美國軍事獨裁一直繼續到如今，當一九〇九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初次侵略尼加拉瓜時，它把一個受僱於美國的記賬員捧出來當了尼加拉瓜的總統。

從政治上去控制這些拉丁美洲共和國不只限於一般地控制這些國家的奴顏婢膝的統治者，而且包含對這些國家生活中重要方面的仔細規定。因此，當秘魯內地發現了豐富的新的石油礦藏，秘魯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就僱請美國胡佛^①—柯蒂斯—魯貝

公司替它起草法律，在這種法律之下，這些礦藏就得轉手給美國的石油公司。法律草案規定很低的採礦稅，而且修訂了秘魯的稅法使石油托辣斯可以免付所得稅。秘魯政府然後把這草案送到美國的石油公司直接加以認可。唯一的障礙是秘魯的國會拒絕批准此項法案，這反映出秘魯人民對迄今仍然統治着秘魯政治的帝國主義的反抗。

菲律賓政府和立法機關對於本國內政是全然不能控制的，這可以從一九五〇年到菲律賓去的美國經濟考察團所作的報告中得到證明。那份報告為菲律賓的經濟立法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計劃，而且還規定派遣一個由美國官員組成的工作團到菲律賓共和國去起草法律。

英美代理人之間的角逐曾經一度是拉丁美洲的一個特色，現在正在以往是英法控制地區的中東展開着。一九四九年中，敘利亞就發生過三次政變，捲入政變的有相互競爭的英美石油利益的代理人。每次宮廷政變之後，必定有一番產權轉手的事情。

從歷史上看，附屬國家政治發展的畸形化和所遭受的壓制，是與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中帝國主義國家內部資產階級民主的凋敝互相吻合的。附屬國家在取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一些權利方面，儘管是很不完整的，總是最後才輪到，但是當最殘酷的法西斯壓迫來到時，它們總是首當其衝的。一般的用以反對勞動人民的武裝暴力之外，它們還得忍受法西斯褐衫黨的陷害，秘密警察式的酷刑，沙文主義的挑撥煽動，以及像發生於蔣介石中國、巴西、以及某種程度上發生於阿根廷的那種極端形式的國家壟

① 此公司的胡佛係前胡佛總統之子。該公司於一九四三年曾為委內瑞拉政府做過類似的工作。關於秘魯法案的詳情，見“世界石油”雜誌（一九四七年八月號）所載拉斯末斯著“秘魯石油將大加開發”一文。

斷資本主義。

德、意、日法西斯的軍事挫敗使法西斯主義在附屬國以及全世界遭受到嚴重的打擊。但是，今天，美帝國主義，而不是德帝國主義，正在加速地把法西斯主義強加於附屬國的頭上。希臘和智利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帝國主義除了壓制殖民地半殖民地，不許其作任何獨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以外，還摧殘着這些地方的民族文化。爲了把那垂死制度的思想意識灌輸給受它剝削的人民，美帝國主義還使用了一套特別的方法——電影、連環畫、黃色雜誌和其他刊物、無線電、大量而強烈的廣告。這些方法不但是爲了要摧毀半殖民地的反抗並在那裏贏得支持者，而且某些主要金融資本家還藉此坐收鉅利。好萊塢的電影片把美國繪成一幅鉅富之鄉，坐的是流綫型的小汽車，住的是高樓大廈，歌頌着匪盜行爲及暗殺事件。可口可樂的廣告使得從加拉加斯一直到開羅的風景都變了色。這些就是今日帝國主義文化的標誌。

美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是和它的文化侵略共同進行的。美國電影片的輸出，以長度計，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八年增多了百分之九十。一九四九年年中，美國商務部曾經誇耀過，資本主義世界裏“上演的故事片幾乎四分之三是美國出品”。好萊塢宣稱它佔據各地的演出時間是：歐洲的百分之五十六，南美的百分之六十四，加勒比海地區的百分之八十二，非洲的百分之六十二等等。國外生意的收入佔好萊塢電影公司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實際上也就是除了成本以外所賺到的全部純利。這些宣傳與金融資本的利潤追逐是二位一體的，這一點可以從商務部官員們所寫的下面這一段話中得到說明：

“好萊塢一直是在宣揚着美國的生活方式，毫無疑問，它是

阻擋極權主義侵入的一支有效力量。……當外國的電影顧客看到我們人民穿的衣服、主婦在她的佈置整潔的家庭中所用的節省勞力的電氣設備以及那舒適講究的傢具時……美國出口商的道路就已經給鋪平了。”

寫這段話的官員們却毫不介意電影中所描寫的富人及匪盜的生活，是與大多數美國公民的生活迥然不同的，而且大多數的外國觀眾都是買不起電影中的那些奢侈品的。他們所宣佈的新口號是：“生意跟着電影走”⁹。

附屬國的人民不但被迫去購買美國貨和按照華爾街的願望去思想，而且甚至還得放棄自己原來的飲食習慣，以便適應主子們謀利的需要。一九五〇年“華爾街日報”宣稱：“美國的飲料像奔騰的潮水似地注入外國人的喉嚨。”這篇文章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美國的飲料坐了美國作戰部隊的坦克、卡車、吉普車、飛機和輪船深入到數十個它從未到過的地區。……當美國人從這些地方撤回本國之後，可口可樂、薑汁啤酒和果汁飲料就開始排擠德國啤酒、意大利葡萄酒和日本米酒，爭取成為當地食客的嗜好。在非敵國裏，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可口可樂在美國、加拿大以及古巴以外地區的裝瓶工廠，已由一九三九年的六十五家增加到一九五〇年的二百七十五家。其他非酒類飲料公司也有類似的發展¹⁰。

“經濟學家”周刊描述下的委內瑞拉是：人民中普遍存在文盲現象、惡劣的健康狀況、可怕的生活情形以及石油公司對該國工業的破壞，與上述種種現象同時存在的就是到處可見的美國的影響。按照這個雜誌的說法，對委內瑞拉油礦的殘酷榨取“已經形成一個畸形發展的經濟狀況，並且將一種人為的半好萊塢

式的‘文明’強加於一個差不多是原始的社會之上。”¹¹

幾乎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今天都可以說發生了相似的情況。事實上，被摧殘的文明之中包含着資本主義社會過去產生的某些最先進的部分。

發展遲緩的原因

阻礙附屬國家經濟發展的唯一因素就是帝國主義——也就是說：構成列強與“落後”國家間帝國主義關係的那一整套經濟、社會、政治以及軍事的條件。

許多專家所寫的關於落後國家的研究報告總是強調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是缺乏資金。一點不錯。但是何以會缺乏資金的呢？這些落後國家主要收入的來源既都被美國、英國、荷蘭的壟斷企業所佔有，那麼，不可避免地積累資金的當然是這些企業，而不是那些弱小的民族資本家了。

以拉丁美洲為例，可具體表明上面的說法。第三章裏也已經提到過，美國的金融資本從拉丁美洲榨取的超額利潤達到了拉丁美洲的商品生產量的五分之一之多。或者，換一種說法，那就是按資本主義標準計算，榨取了當地國民收入的大約百分之十四。除此以外，歐洲的帝國主義還要從這裏掠走另一批財物。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私人投資淨額超過國民收入百分之十是很少有的事情。如是，通常應當使用於擴充生產力的收入以及應用於換置陳舊設備的大部分收入，都從拉丁美洲被榨走了。這就是阻礙工業化的所謂資金缺乏的基本原因。

其次，附屬國家所積累的有限的資金，又大部被當地統治階級投入土地房產和奢靡的生活上去了。只要看一看當地統治階級收入的主要來源在那裏，就不難明白這一層道理。農村與城市

地主剝削制度、商業、政府賄賂和薪金等，對他們來講是比民族工業更重要的收入來源。資產階級中大部分在這種或那種方式下依賴着外國公司。他們有的依靠這些公司付給政府的稅款和特許費爲生，有的依靠充當帝國主義國家進口貨的代理人爲生，有的依靠這些外國公司所促成的貪污受賄方法爲生，這種貪污受賄的行爲已經使得拉丁美洲的勞工法、關稅條例等等形同具文。

資本主義早期的發展曾經克服過這類的障礙。但是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情況下，這些障礙便成了決定性的障礙。

發展工業的另外一個障礙，就是帝國主義強加於附屬國人民羣衆頭上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貧困。固然不錯，資本主義是建築在階級結構之上的，一端是鉅富，另一端是赤貧。但是帝國主義，由於加緊貧富的兩極化，由於整批地逐出小產業者（其規模之大超過了英國的圈地辦法），由於規定勞工的半奴隸式的工資標準，由於殘暴地鎮壓勞工組織，已經使人民的消費力萎縮到這一地步，以致爲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所必需的廣大市場無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存在。

再一個理由是帝國主義托辣斯掌握了工業設備的壟斷權與專利權。即使落後國家的資本家們能積累起足夠的資金，即使他們願意建設基本工業，他們常常發現，要獲得必需的裝備與取得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專利權，實際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以工業裝備輸出給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是被公開禁止的，同時，以建立民族工業所必需的工業裝備輸出給附屬國家也是被禁止的，雖然後者採取的是非公開的隱蔽方式，但是其效果却未見得小些。

第二章曾經提到過的那些國際工業器材卡特爾，它們陰謀

阻止附屬國家基本工業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鋼鐵卡特爾粉碎了挪威、希臘及土耳其的民族資本家建立煉鋼廠的一切努力，帶頭阻擋他們的發展的是企圖征服這些國家的德國托辣斯¹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取代德國人而變得最富於侵略性的美帝國主義就出來帶頭。十年前德國鋼業托辣斯只敢暗地裏進行的事，如今馬歇爾計劃的頭子霍夫曼則公然承認，承認他要阻擋希臘鋼鐵工業的發展¹³。

阻止半殖民地國家工業化的另一方法是用來自帝國主義國家的入口貨，去摧毀當地的工業。美孚石油托辣斯在有競爭的地區，暫時停止以壟斷高價售貨，竭力削價競爭，這種醜事，在美國是盡人皆知的。在國際間，它也採用了相同的手法。爲了便於美孚油公司應用這樣的手法，國務院十五年來一直在推行它的貿易協定政策，以強迫弱國減低它們的保護關稅，減少對美國壟斷企業的進口貨的限制。

美國的資本主義工業，是在一道保護關稅的壁壘之後創設起來的。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弱小國家想要築一道有效的關稅壁壘就受到阻撓。在一九四五年的查普爾特匹克協定中，拉丁美洲國家被迫接受一項同意限制運用關稅稅率的決議；隨後在協商貿易條款時，他們又不得不大大減削關稅稅率^①。

最後，政治制度的落後也形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用黎巴嫩

① 前國務院官員，已故的德根對拉丁美洲的工業化態度是曖昧的。但是，在談到查普爾特匹克協定時，他也不得不承認：“關於關稅的條款對於美國比對於拉丁美洲國家更能令人滿意。對於後者而言，美國在保護關稅之下建立起自己的工業之後却不讓別國採取同樣的行動，這似乎是不公允的……有些實業家和勞工領袖如倫巴多·托列達諾都表示震驚，他們譴責美國蓄意阻擋工業化是爲了避免競爭，是爲了保持拉丁美洲成爲附屬的原料供給地。”（德根著：“美洲”，一九四九年紐約版，第一五五頁到第一五六頁）

的一個外交家喬治·哈金的話來說，落後國家需要“……一個社會革命，把一個半封建的反動社會秩序轉變為一個新的工業制度，在這制度之下，生產力能夠發展和自由地擴張，從而普遍地提高生活水平。”¹⁴

附屬國家內試圖工業化的努力

雖然在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中很大部分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買辦，但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在一定限度內——即在保留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又不完全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的條件下——是想設法發展他們的民族經濟的。當民族解放運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落後國家展開時，這些分子會努力去贏取對這種運動的領導權，他們想把運動從革命的路綫轉移到包括與帝國主義合作的發展經濟的綱領上去。印度、埃及和若干拉丁美洲國家的民族資本家就曾經提出過所謂“五年計劃”和“開發公司”等等。

在委內瑞拉，羅穆洛·貝坦科爾特一九四五年被工人階級擁護上台掌握了政權。他的政綱並不是號召驅逐外國石油公司，而是主張建立委內瑞拉自營的石油公司與前者競爭。可是，在三年的時間內，他的政府在建立它自己的石油工業上却得不到絲毫進展。貝坦科爾特政府的“民族解放”行動只限於增加石油公司的課稅——但對這些公司也不是沒有報償的。關於這一點，美國“外交政策協會”曾經指出：

“爲了補償它所徵收的較高的賦稅，委內瑞拉政府運用了它的權勢——不惜與共產黨控制下的工會進行尖銳的鬥爭——使油礦的勞工保持平靜無事。這些年裏，這個工業的生產無可比擬地提高了，本身也擴大了。公司方面以盈利中將近五萬萬美元作

再投資之用以擴充資本。”¹⁵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賄賂越多，對於當地工人的剝削與鎮壓也就越厲害。

貝坦科爾特的民主行動黨這類團體在半殖民地所擔當的角色，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社會民主黨所擔當的角色是一樣的。他們使人民脫離根本的鬥爭，他們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高潮中分裂工人運動。然後，他們的任務完成了，他們也就被拋棄，替代他們的是公開反動的、完全順從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委內瑞拉右翼的政治領袖洛貝·康脫拉斯跑到美國，在那兒組織過五次反革命活動，最後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民主行動黨的政權被推翻了，過去一批地主和帝國主義的直接代理人又恢復了他們的軍事獨裁。洛貝·康脫拉斯、米弟那·安加利塔及其他反動官吏，以及這些人的家屬所得的報酬是二千一百萬美元¹⁶。這是抵償他們被貝坦科爾特政權所“沒收”的財產的。所謂被沒收的財產，就是說在康脫拉斯這一幫人下台的那段時期中，他們這個暫時被驅走的集團本來可從石油托辣斯在危地馬拉榨取的數以億計的利潤中分到的那點殘羹剩肴。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長期的不景氣時期，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必要再採取任何直接的行動去阻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業發展，因為殖民地原料價格之低賤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普遍停滯已經足以阻止其任何發展了。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美國和英國都需要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幫助。對於任何有強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地方，帝國主義者都作出了諾言以便取得自願的合作；或者，在那些不可能取得自願合作的地方，例如在印度，那就爭取減少那裏的抵抗。他們允許印度與菲律賓在戰爭結束之後獨立。對拉

拉丁美洲，他們允許在戰爭結束之後由進出口銀行貸給大宗款項以協助其經濟的發展。那麼，爲了酬答這些諾言，這些國家就必須立即供給軍事基地、廉價的原料、以及在有些情況下甚至武裝力量。

在大戰期間，拉丁美洲國家經濟開發所需要的一切裝備幾乎都被拒絕了，理由是需要這些裝備以繼續進行戰爭。實際上，這却遠非真情。大家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很大一個數量的機械被移作非必需的用途，有更大一部分則被用於只有在增加一般的工業基礎的意義上才算是必需的用途，即電力設備、煉鋼廠設備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有足夠的儲備力量把產鋼量提高一千萬噸，但是煉鋼廠的設備却幾乎一點也不分給拉丁美洲。供給美國農民的拖拉機有數十萬架之多，可是給拉丁美洲的却爲數極少，而拉丁美洲，由於戰時糧食進口量少，差不多生活在飢饉之中。拉丁美洲戰時工業的發展主要是限於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這是由於歐洲及北美貨品退出了市場，使得當地民族資本家即使以效率低的舊裝備也還能夠從事擴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出現了新的藉口來阻礙拉丁美洲、印度以及其他落後國家的工業化。美國“太忙”了，它整天忙於馬歇爾計劃，忙於干涉希臘、土耳其、中國等等。拉丁美洲還得靜待進出口銀行的信用貸款。

拉丁美洲的資本家如果要把他們戰時積累起來的黃金美鈔去購買昂貴的汽車、冰箱和其他奢侈品，那是可以的；但是一說到購置新的工業裝備，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國的工業裝備製造商的訂貨簿上早已“結結實實地登滿了”好幾年的國內的預約訂貨單，再也沒有接受國外訂貨的餘地了。

真正的障礙却是另一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整個期間，美國機器製造業的生產活動，比起戰時的最高生產率來低得很多，接受外國訂貨應該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

真正的問題在於石油商人與開鑿油井裝備的製造商之間，煉鋼商人與煉鋼廠裝備的製造商之間的密切的財政關係。簡單地說，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基本政策就是要防止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美國壟斷公司的海外分公司所需要的裝備，在出口時就從來不發生缺貨的情形。相反地，一九四七年就曾發生過一樁醜事，那就是美國鋼鐵公司拒絕出賣油管給國內的競爭者，但是却同意以大量的油管供給阿拉伯的石油托辣斯。只有在輸出工業裝備給競爭性的工業集團——落後國家的資本家——時，缺貨的問題就來了。對於發展得很快，威脅到美國金融資本在工業上的優越地位的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缺貨問題就更嚴重。

讓我們看一看委內瑞拉的例子。花旗銀行登廣告說：“委內瑞拉用石油償付開發資源的美國機器。”¹⁷

不錯，但是請問是些怎麼樣的機器呢？

一九四七年美國對委內瑞拉輸出的主要的一批“機器及車輛”價值一億七千八百萬美元。對於這麼一個小國家，這數目可算相當大。但是這個數目之中，有一億一千一百萬美元是用以購買大石油公司使用的開採、鑿井、抽油唧筒等機器，或是用以購買這些石油公司的職員和當地統治集團使用的小汽車。至於用以爲那些至少部分主權屬於委內瑞拉人的工業所需要的物品的，則僅有一千一百萬美元。這個國家本國生產的食糧日益感到不足，但是全部輸入的農業機械却不到一千萬美元¹⁸。

再舉一個例子：一九四七年美國輸出到委內瑞拉的鋼鐵產

品中包括價值一千七百一十萬美元的油管，這些油管是石油公司用來輸送掠奪品的。但是其中鋼軌及零件的總值却只不過六十萬美元，而爲了發展一個爲本國使用的適當的運輸系統，鋼軌等是這個國家所最迫切需要的¹⁹。

對墨西哥石油工業實行禁運政策，恐怕應該算是拒絕出售工業裝備的行爲中最可恥的一樁。一九三八年，加德納斯政府把爭取墨西哥民族獨立的鬥爭比所有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更向前推進了一步，它出價徵收了英美石油公司的財產——但是並未徵收那更重要的美國金屬工業的財產。雖然這些石油公司所得到的利潤比起它們的投資來已經超過幾倍，墨西哥政府還是遵照美國政府替這些公司所訂的條款，以優厚的價格償付了它們。

但是這並沒有使美國的石油公司滿意，它們是下了決心要奪回墨西哥的油礦與煉油廠的，包括以前爲英國壟斷企業所佔有的油礦在內。直接或間接受英美石油公司控制的油船就拒絕在公海上運送墨西哥的石油，於是使墨西哥的石油幾乎失去了全部海外市場。鑿井設備、油管、以及其他使現有設備維持正常進行工作和鑽探新井所需要的各項器材則全部遭到禁運。

墨西哥的工人與工程師的技能以及他們對於祖國的忠心耿耿是值得頌揚的。他們以難以置信的創造力，利用各種替代辦法，使石油工業能繼續開工，並且保持了一九三八年的生產水平，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後期，產量還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加德納斯退職後，墨西哥政府又轉向右傾。對本國工人存着懼怕心理的墨西哥資本家們走上了日益依賴美帝國主義的道路。

一九四七年墨西哥政府與美國資本家進行談判，要求後者

的協助以獲取新的開鑿油井的裝備，否則墨西哥的石油工業就要完結，因為原有的油井都快枯竭。有一個名叫瓊斯所開的公司，是得克薩斯州一家很大的勘察與鑿井的公司，它同墨西哥國營石油壟斷公司庇墨克斯簽訂了一個合同。這合同規定瓊斯可以從他所開鑿的新井中獲得百分之三十的石油。但是那個合同結果却變成毫無價值。

瓊斯突然發現他的供應品來源都枯竭了。他沒法為他的墨西哥工程買到一件裝備或一碼油管。下一年底墨克斯公司和美國的幾家大石油公司簽訂了合同。這並不是說墨西哥人自己不會勘測油礦和鑿井，其實他們會得很，但是只有這樣做墨西哥才能獲得輸入鑿井裝備。不過庇墨克斯公司得付出代價。和它訂合同的公司從新油井的產品中提出百分之十五作為利潤，加上百分之五十抵償一切費用，或者說，總共從出產的石油中取走了百分之六十五。這個代價所換來的只是一些陳舊的鑿井器材和輔助裝備被允許輸入墨西哥。

簽訂了這些合同以後，庇墨克斯公司的總裁、參議員安托尼奧·貝爾慕台，親自到美國去商請一筆政府貸款和在美國購進鋼鐵及裝備的自由權。交涉辦了一年之久。國務院每天都和那些大石油聯合企業磋商並取得指示。這是很清楚的，僅僅高價替墨西哥人開鑿油井是不能滿足這些公司的慾望的，如果不能獲得墨西哥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它們是不甘心罷休的。國務卿艾奇遜克盡職責地傳達了這些條件。參議員貝爾慕台值得稱道地拒絕了這些條件。

因而墨西哥的石油工業仍舊無法從帝國主義國家買進適當的供應品^①。

在某些極少數的情況下，為了保證自己取得某些原料品的

供應，美帝國主義也不得不對於拉丁美洲的基本工業化作一點兒讓步。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巴西的伏爾塔·瑞唐達煉鋼廠。爲了酬答一樁曖昧的買賣——通過這樁買賣，里約—杜斯的鐵礦從英國人手中轉到幾乎是公開的美國控制之下，也爲了換取重要的巴西錳礦，美國才以進出口銀行的貸款、裝備、工程“服務”供給巴西的這個國營煉鋼廠。

這個煉鋼廠成立於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該廠生產鋼錠三十萬噸，軋鋼二十二萬七千噸。建設伏爾塔·瑞唐達煉鋼廠所需要的資金在一億美元以上。在美國，這樣大一筆資金足夠買到一個能產一百萬噸鋼的廠子，並且附有生產相應數量的生鐵及簡單加工的裝置。

這種差別之所以產生，主要是美國公司在裝備、工程等方面漫天要價的結果。

但是，這個新的煉鋼廠還不能就此萬事大吉。它還得繼續聽美國的擺佈。爲了取得進出口銀行的四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就得把工廠的五人董事會中兩個席位讓給進出口銀行的代表。這筆貸款的利息使每噸軋鋼要負擔八元。十幾個美國專家佔據了主要的技術工作的職位。這些專家強迫公司改變計劃，由採用巴

① 當墨西哥以出讓鑿井權使美國公司放鬆對它的供應之後，美國在一九四九年輸出的油管樞架和油管如下：

（單位：百萬磅）

委內瑞拉	255
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	254
加拿大	145
墨西哥	29

對運往墨西哥的這些有限的供應品所索取的價格，較之運往某些由英美聯合企業經營石油的特定國家所索取的價格，要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美國商務部：一九四九年對外貿易報告，外貿第四一〇號，第二部分）。

西國產煤轉為採用三分之二的美國煤。他們還故意使巴西鋼的成本提得如此之高，以致進口的美國鋼售價能比它低百分之三十，從而使北美鋼鐵托辣斯能夠隨心所欲地壓倒伏爾塔·瑞唐達工廠²⁰。

由於智利以源源不斷的鐵砂供應給伯利恒鋼鐵公司，由於智利當局為安那康達和肯奈各特公司在採銅工業中鎮壓工人，美國不得不同意“幫助”智利去建立鋼鐵工業，作為報酬。然而華爾街對於智利的康賽普辛鋼鐵廠的控制比伏爾塔·瑞唐達還要徹底。

這個廠的修建和管理都在梅隆控制下的柯布爾斯公司掌握之中。整個工程的“卓越”施工，使其所費款項比一九四七年預算的數目竟超出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智利政府必須向進出口銀行乞求更多的貸款以償付這個差額。現在計算下來，年產量每噸要費資金五百美元，比巴西的還高。柯布爾斯不但控制它的業務，而且還是該廠的最大的私人股東。美國的幾家銅礦公司在這個智利“國家”煉鋼廠裏，也掌有股份²¹。

說到墨西哥，梅隆控制下的阿姆可鋼鐵公司和新成立的墨西哥阿爾托斯·霍爾諾斯煉鋼廠訂有十五年的合同。至於墨西哥的第二大公司固本，則早被美國資本家從墨西哥人手中買過去了²²。

總結一下拉丁美洲鋼鐵工業所取得的微小收穫，我們可以看出：當那些被大肆炫耀的帝國主義工程師的“技術”被應用於拉丁美洲時，就變成了巧妙的怠工，使成本的負擔重得無法忍受，使拉丁美洲不得不繼續依賴美國原料。事實證明，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是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手段，謀求本國發展的工程都變成了為美國金融資本所控制，為某些特定的北美壟斷企業

所操縱的工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落後國家曾經獲得一些發展的輕工業，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最新式工廠的競爭，業已遭到很大挫折。讓我們來看一看巴西紡織工業的情況，在巴西“主要的紡織廠已開工六七十年了，多數的機器是舊的，與新式的裝備相比，它的效率是低的。”²³

巴西的棉布生產，一九三八年每月是七千萬公尺，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增至每月一億二千五百萬公尺，但是到一九四七年則下跌到每月八千八百萬公尺。巴西出口的棉織品，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每年是三千公噸，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期間一躍而為每年二萬四千公噸，但是到一九四八年的頭十個月裏又回跌到六千公噸²⁴。

出席聯合國的智利常任代表克羅茲曾經指出，雖然拉丁美洲沒有直接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有利的事實，可是：

“工業生產，按人口計算實際上仍舊停留在一九三八年的水平，十年之中拉丁美洲在工業化方面並沒有獲得絲毫進展。……農業生產的增加主要限於專供出口用的農產品；為國內消費的農業依舊使用落後的方法經營……對人民的糧食供應簡直就沒有什麼令人欣慰的改進。”²⁵

拉丁美洲的資產階級企圖不要工人階級，不要爭取民族解放的一貫鬥爭而謀求經濟發展，其結果只是加深了它對帝國主義的依賴性。

在遠東，情形也未見得更好些。根據聯合國“一九四八年亞洲與遠東的經濟調查”，遠東的工業生產停留在該地區的戰前或戰時水平²⁶。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與帝國主義完全切斷關係的基礎上，復興了經濟，並且開始了真正的工業化。

關於伊朗的情況，“紐約時報”記者蘇茲柏格的報道提供了很好的說明：

“小企業的破產每星期都在增加着，工人每週受僱的日數越來越少，失業總數正在擴大。

“雖然德黑蘭正在大興土木，同時人們還可以看到在這個擁有約一百萬人口的城市裏有許多新型的美國汽車——那是極少數的富人階級的財產，可是資金却在逃赴國外的‘安全’銀行。鼓勵外貨入口的政策損害了本國的工業……莫斯科出版的‘新時代’雜誌正確地寫道：‘伊斯法罕、伊斯得、布什爾、大不里士等地數十家工廠已經關閉或正要關閉。數百中小手工業工廠已經破產或行將破產，成千成萬的伊朗工人、工匠及小職員都沒有工作。’”²⁷

這就是華爾街爲了“把伊朗從蘇聯侵略下拯救出來”而給予軍事援助後的收穫。這就是“強硬派外交家”喬治·艾倫駐留在伊朗的收穫。這就是由美國主要的工程公司聯合組成的“海外顧問團”替伊朗政府擬就的七年計劃的初步成績。

今天，在整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世界內，想不和帝國主義堅持鬥爭而求得民族發展的一切企圖，都會得到同一結局——本國的開發計劃都爲侵略的美帝國主義所操縱，所閹割。美帝國主義強使殖民地接受更多的爲華爾街所操縱的企業（或英美合營的企業）。這些企業應用效率極高的現代設備和半奴隸式的勞動爲供應世界市場而生產，同時殘酷地打擊着那些業已陷於停滯或萎縮狀態的、在低得難以令人置信的發展水平上爲求存而掙扎的當地民族工業。

“大胆的新計劃”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杜魯門曾經在一個民主黨婦女的集會上說過：

“在技術知識上，我們是頗有一點名望的。……我要建議的就是，把我們的技術和我們的知識奉獻給全世界人民……為當地居民造福而不是為了剝削他們。這就是第四點計劃的意義。

“……我站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凝視着艾森豪威爾將軍送給我的地球儀……就是那個他用以贏得歐洲戰爭的地球儀。

“我看見遍佈世界各處的廣大而未經開發的河流與山谷，這些地方都可以實行類似田納西和哥倫比亞河谷的開發計劃。

“幼發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可以重新變成伊甸的樂園。在尼布甲尼撒時代，這個河谷在整個期間維持了一千二百萬到二千五百萬人的奢華的生活——這是可以重新辦到的。……”²⁸

這不是帝國主義對附屬國人民所作的第一個諾言，雖然它可能是最誇口的一個。在整個帝國主義的歷史中，統治者總是戴着關心被剝削者福利的假面具來進行剝削的。

墨金萊總統把併吞菲律賓說成是一種責任，為的是使菲律賓人“提高”，“得到文化”和“信奉基督”。實際上，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唯一“提高”了的正是那些取得了菲律賓經濟控制權的美國公司的利潤。

當亞克龍城的橡膠大王哈維·法斯通在一九二五年進入利比里亞時，他就大肆宣傳他的所謂福利計劃就是為了把文明帶給利比里亞的人民。但是二十五年後，在法斯通橡膠園以外，唯一增添的文明就是美國的海空軍基地及“共和鋼鐵公司”的一個鐵礦。橡膠園的工人是用非洲強迫勞動的老方式從土人中徵來的。他們得到的是典型的非洲工資，每天只有一角八分錢。一九五〇年，當這些工人為了要求每天增加工資三分錢而罷工時，他們

遭到了槍擊。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時，羅斯福總統的拉丁美洲專家孫納·威爾斯，推行了一個“睦鄰政策”，據稱要撥棄“金元外交”，而以“大公無私的援助”給予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外交記者柏萊爾·鮑勒斯在一九三九年正確地寫道：“實際上美國政策一貫是爲了要控制整個拉丁美洲，從格蘭得河（部分流經美國與墨西哥邊界的河流——譯者）起直到火地島（位於南美洲南端——譯者）爲止。現在，威爾斯的工作就是要設想出一套方法，把美國的政策掩飾起來，讓人看來好像這個半球有更高度的合作似的。”²⁹

這種虛偽的手法有兩個目的。一方面買辦政客們可以用以緩和或者擾亂其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另一方面，華爾街的政客可以用以阻止美國的勞動人民與附屬國勞動人民之間的團結的發展，用以矇蔽一般的老百姓，使他們在自己的錢袋被人扒去用以支付爲華爾街利益服務的血腥的海外冒險事業時，仍然以爲自己道德高尚。

從倡議第四點計劃的人的言論中，可以看出這計劃的真面貌來。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國務卿艾奇遜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陳述理由，說明何以主張推行第四點計劃。他說，附屬國內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已經不會再忍受貧病交加的生活方式了。他警告說，資本主義必須拿出解決辦法來，不然人民就會走共產主義的路。他的恐懼是有根據的，因爲這些人民已經看到了共產主義方式在蘇聯中亞細亞等區域的卓越成績；這些地區過去是沙皇統治下的貧苦的殖民地，而今天已經成爲蘇聯幸福生活裏的一個繁榮的、工業化了的、而且完全居於平等地位的成員。

可是艾奇遜是否能提出一些切合實際的辦法去與那經過考驗的共產主義方案競爭呢？當他接觸到具體問題時，他總是使那些指望在經濟發展中獲得華盛頓援助的人們感到失望。他說：“我想，相當普遍地存在着一種想法，以為我們將替那些落後國家的人民建立大工廠，礦場，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

假如這種想法很普遍，那就是因為華盛頓的官員，再加上落後國家的傀儡一年來一直在宣傳着一個神話，說美國將實行一個真正的開發計劃。那麼，如果對工業化沒有認真的援助，這個開發計劃還談得上什麼呢？

實際上，僅有的“援助”就是美國技術人員的“援助”。艾奇遜曾舉例說明過這個“援助”是怎樣進行的。一位美國專家把硝酸鈉肥田粉介紹給一個農民。接受了這個建議之後，這農民的收成提高了三倍。但是，對於絕大多數沒有購買肥田粉的能力的貧農，對那些在封建地主和帝國主義公司的種植園裏勞苦操作而本身無地或幾乎等於無地的農民，這是沒有什麼幫助的。顯然，那真正反帝的綱領——耕者有其田，更能打動落後國家的農民階級的心，而且它也是唯一的切合實際的綱領。

艾奇遜曾經提出過另一個例子：“舉個例說，我們能够在人口調查和統計方面給予這些區域的人民以技術援助。做這些事是不需要投資的。”

誠然，這種“技術援助”是十分“廉價”的。這些所謂專家“不必全是他們本行內最有權威的人士。這種工作頗能吸引一些尙能稱職和略有經驗的年輕人，我想我們將能從各州政府、市政府、田莊、普通學校、大學、工廠以及私人研究機構找到大量的優秀人員。問題只是要去找這些人，給他們一點額外的訓練，並且說服他們出國去為國家服務。”

艾奇遜提議用幾百個青年人去滿足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的需要，去抵擋他們的民族解放運動。艾奇遜警告說，除了某些特殊情況以外，他的計劃“可能需要五年、十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產生具體的結果。不過，對一個國家來說，十年只不過是一分鐘而已——而對人類的文明來說，它還不到一秒鐘呢。”

然而，對於千千萬萬的人民，這五年或十年却是一個生存或死亡，是吃飽還是挨餓，是有健康的保障或只能等待疾病來殺人，是戰爭還是和平的問題。

人民是不能等待的，他們決不採用艾奇遜的“幾分鐘”與“幾秒鐘”的哲學。他的計劃的宣傳價值充其量也是可以懷疑的。爲什麼要這樣大肆渲染呢？在空洞的諾言背後是怎麼樣的現實？

這兒有一例子，可以說明“技術援助”如何在起作用。艾奇遜宣稱：

“巴西政府也邀請了三位美國政府的地質專家去幫助他們本國的專家勘探新的戰略原料的礦藏。由於這個比較微小的投資，結果發現了西半球兩個最大的錳礦，有無法估計的價值。”

但是艾奇遜先生謙遜地避免提到一個事實，即這“無法估計的價值”是爲伯利恆鋼鐵公司所有而不是爲巴西人民所有。技術援助計劃的本質就是對殖民地原料的加緊掠奪，爲了華爾街壟斷企業的利益，也爲了他們的軍國主義者囤積戰略物資。

但是對落後國家的技術援助僅僅是第四點計劃中最小的一部分。艾奇遜說過：“我們的重點首先要放在鼓勵私人投資的向外擴展，使這種投資不但供應資金，也供給伴隨資金而來的技術及管理才能。”

其實，這還是老一套，政府協助壟斷公司輸出資本，爲了使附屬國家落後和貧窮化過程的加劇。政府怎樣給予這種協助呢？

艾奇遜回答道：

“投資者必須要能相信：他們的財產，沒有公平的報償，是不會被沒收的；他們能夠獲得合法的利潤，並從該國收回資金；在遵守對人人同等適用的當地法律這個條件下，能有合理的自由去處理他們的業務。……簡單地說，這就是投資問題的本質，你們可以看出，這就是一個信心問題。”

這裏所謂信心就是說，相信華爾街的公司攫取超額利潤是不會受到任何阻礙的，相信民族解放運動將來不會要求收回它自己的財富，相信美國公司能在海外為所欲為。

這就是第四點計劃的真正目的。與堂皇的演說不同，實際的辦法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設計的，其中包括：（一）與他國商訂條約以保證美國壟斷企業可以放手做去^①；（二）美國政府通過立法，保證這些公司的投資和利潤；（三）通過立法削減對這些國外投資的利潤的稅收。

即使這樣，還是不夠的。

“但是如果把這些事綜合起來看，我想你們將發現，一個保證投資萬無一失，使投資者不遭受他們在今天世界上許多地區所面臨的危險，這種方法是沒有的。”

①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已經談判了七個這樣的新型條約了。可以把對烏拉圭的“友好通商經濟開發條約”作一例子，這條約規定美國的公司事實上在經營任何企業時都能得到烏拉圭的“國民待遇”。這就是說，美國的公司所付的稅不比烏拉圭公司的重，與烏拉圭公司比較，不受任何不利的法律的約束，其財產不受政府的徵用，除非烏拉圭的資本家的財產也在徵用之列，等等。烏拉圭政府就這樣地同意不採取任何保護烏拉圭資本家的辦法，任他們去面對比他們強一千倍的美國壟斷企業。這條約也給烏拉圭的資本家在美國享受國民待遇的權利。但是，由於沒有一個烏拉圭的資本家有足夠的資源到美國去競爭，這個“互惠”條款是毫無意義的。

因此，艾奇遜說，我們必須設法培養一個適於投資的“有利氣候”。什麼是“有利氣候”呢？那就是被馴服的人民，不敢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的人民；那就是要粉碎解放運動，要消滅任何地方存在的社會主義。

艾奇遜的言論中還透露出金融資本的基本的、真正的企求：“我們花費了億萬鉅資從事軍事防禦——這是我們必須做的。我們還花費了億萬鉅資從事於歐洲以及遠東的主要地區的經濟復興，這也是我們必須做的。我們正在通過北大西洋公約和軍事援助計劃組織聯合的防禦。”

加緊進行帝國主義式的剝削所必需的條件是永遠不變的——以棍棒統治被剝削者。這個必需條件的性質是不變的，但是從數量上說，則增加了許多倍。艾奇遜所透露的整個第四點計劃不是別的，就是宣傳戰綫上的掩護砲火，在這掩護之下美國金融資本進行着它的世界性的外交、經濟及軍事攻勢。

對於附屬國的人民，杜魯門的諾言裏的無數的“類似田納西流域的開發計劃”、“豪華的生活”等等，變成了用幾個二流技術專家來耍弄的小玩意兒，而真正的經濟發展却被扼殺了。

不過，在紙面上擬定一個計劃以加緊對殖民地的剝削從而攫取無限利潤，並且以這剝削為基礎進而從事戰爭，這是一回事；實現這個計劃，却是另一回事。傀儡政權簽訂賣國契約是一回事，把它的國家交付出去却又是另一回事。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曾經是最早與國務院簽訂第四點計劃類型的條約的一個，根據這個條約，國家的經濟主權都被斷送給了美國的壟斷企業。但是中國共產黨立刻否認了這條約，並且趕走了國民黨，使這條約成為對華爾街毫無用處的東西。

附屬國家的買辦統治者，從印度一直到智利，都已經為迎接

華爾街的第四點計劃作好了準備工作，但是他們都害怕走蔣介石的老路。金融資本也對他們的恐懼抱有同感，可是却找不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找一條出路的確也不容易。由於人民爭取合理生活和爭取真正民族獨立的運動在全世界範圍發展着，任何進一步奴役人民的陰謀都必須以虛偽的諾言作為外衣。然而這種諾言以及必不可免的背信棄義只能更加刺激人民來奮起抵抗，便於帝國主義資本發展的馴順的風氣和頹喪的民族精神，則日益渺茫。

最後，政治手腕不行了，只能讓位於武力。各種經濟會議及計劃孕育出軍事同盟、反共協定以及像在朝鮮那樣的美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

全世界爭取改善生活的運動如此強大，並且具有如此堅強的領導，這不是任何政治手腕或者武裝力量所能挫敗的。全世界的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本國買辦的鬥爭中一定會贏得經濟發展的權利。

第六章

控制世界的戰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民爲了挽救自己和其他國家免受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摧毀，支持了反軸心國家的戰爭。美國總統和國務卿會不斷強調“我們的”大公無私的動機和“我們”對他國人民的領土和財產沒有任何野心。如果所謂“我們”是指美國人民，這種說法是很正確的。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民是不會、也從來沒有對征服外國感到興趣。可是，如果所謂“我們”指的是控制着石油業與金屬業的托辣斯以及華爾街銀行的那些統治家族，那麼這種說法就完全是騙人的了。這些壟斷資本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努力掠取空前未有的利潤，他們對於這種掠取也很少加以掩飾。他們用戰爭的方法奪取國外資產與勢力範圍。我們可以看到，由於他們在國家的重大事情上具有決定性的發言權，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政府已經大大地更加助長了美國壟斷資本日益增長並已成爲漫無止境的貪婪慾望。

自從德、日帝國主義發動的戰爭開始以後，美國金融資本就已經看出：它自己將是主要的勝利者。爲了使侵略者能夠發動戰爭，這些紳士先生曾經以大批石油、機器工具、有色金屬、廢鐵輸送給他們，並且以一九三七年美國國會所通過的中立法案作爲外交上的信號。當時，這些紳士已經在期待着良機的到來。

他們預見到，這次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是一個長期的

消耗戰爭，他們可以從中取得龐大的利潤，並且可以從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在世界各地的產業中奪取更多的產業，特別是是從英國手中取得最多的財產。

但是納粹很快地侵佔了西歐大陸，有了擴大的工業基礎，他們威脅着要進犯英倫，英帝國主義爲了謀取生存，就需要巨大的美國物質支援，而且主要是美國的軍事支援。

華爾街於是開口要價錢了，他們的條件的要點見於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主席維吉爾·喬丹的一篇著名的演詞中：

“不論戰爭的結果如何，美國在世界事務中與在其本國生命史上的其他方面都已經開始了帝國主義的生涯。……在新的盎格魯薩克遜帝國主義中間，英國將來最多只能充當一名小夥伴，而美國的經濟資源及海陸軍力量將成爲一切的重心。”¹

羅斯福總統曾經表示過反法西斯的情緒，他曾經提議過要改善殖民地人民的境況，他也曾經提議過和蘇聯建立友好的關係，可是這些事情都不是他個人能作主的，他並不是一個真正人民政府的總統，而只是華爾街的國家機器的首領。而在這個國家機器之中，所有主要的軍事、外交與政治勢力都爲金融資本所控制，羅斯福不過是這些勢力的一個領隊，一個聰明而溫和的領隊，但卻永遠要服從於統治階級的要求。

羅斯福總統雖然是總司令，但戰爭的指揮是依照美帝國主義的基本擴張主義戰略進行的。羅斯福曾堅持主張採取迅速擊潰希特勒的軍事戰略，但美帝國主義的將領却與英帝國主義的將領勾結起來執行着另一種軍事戰略，企圖首先耗盡蘇聯的力量，然後使英美軍隊能佔領最有戰略價值的地區。羅斯福曾經告訴他的兒子說，他是反對殖民制度的，並且起草了保證所有人民都有民族自決權利的大西洋憲章，但梵蒂岡—國務院政客羅伯

特·墨菲却挑選了一個法國的殖民將軍，要扶植他成為法國的統治者。羅斯福和邱吉爾的爭論就是起因於這兩個帝國主義列強爭執着要以自己的傀儡來治理法蘭西帝國——是羅斯福的“問題兒童”吉羅德將軍呢還是邱吉爾的“問題兒童”戴高樂將軍呢？羅斯福譴責帝國主義向殖民地榨取財富，談論過對拉丁美洲的“睦鄰政策”，但華爾街的人物——孫納·威爾斯、納爾遜·洛克菲勒和傑瑟·瓊斯——指揮戰爭的方式，正是爲了在這個戰爭中加強對拉丁美洲財富的榨取，使拉丁美洲進一步貧窮化^①。

只要美國在金融資本驅使之下，那麼美國就必然要走着力謀帝國主義擴張的道路，同時必然要將它的當前的戰略去和一定期間內足以影響美帝國主義和世界帝國主義的各種特殊情況相適應。維吉爾·喬丹曾就這一點作過如下的解說：

“我們可能怕用‘帝國主義’這個生疏的和帶有禁忌性的字眼。……很多人更喜歡那時髦的美國方式，以‘西半球防務’這樣含糊的詞句去加以掩飾。但是，有意地或者無意地，不僅在近幾年中而且自從本世紀開始以來由於美國的性格、能力與資源，以及由於世界事物發展的傾向，美國已經命定走上了這條道路。……（這些事件）驅使我們走上了這條道路，不但供給我們以時機，還供給我們以經濟的工具、社會的風氣，而現在還供給我

① 羅斯福的“進步的”帝國主義的夢想，和他作為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元首所採取的行動，兩者之間所表現的矛盾，在他兒子伊利奧特·羅斯福所寫的“羅斯福見聞錄”一書中有着露骨而生動的描述（一九四六年紐約出版）。關於這個矛盾及其必然的結果，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接見赫·格·威爾斯時就早已很清楚地預見到了（參閱：“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一篇訪問記”，一九三五年紐約出版）。

們以近代帝國主義的政治作風與習慣。……老實說，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有沿着我們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曾經走過的道路走去，向着我們在征服古巴與菲律賓和我們參與上一次世界大戰的方向走去。”²（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

美帝國主義的戰時擴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爾街眼前的主要的目標就是在西半球上消除所有其他帝國主義對手，獨享太平洋上的支配權，並在遠東大部分地區建立一個唯我獨尊的支配地位^①。

在西半球，這個目標是達到了。曾經深入拉丁美洲，特別是阿根廷與巴西的德帝國主義的勢力，在第二次大戰一開始時就被剷除。德帝國主義所有的近十億美元³的投資也被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奉美國之命加以沒收。意大利與日本的較小的產業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後來，其中較重要的產業便在華爾街金融資本的控制之下加以改組。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各航空公司——例如在巴西的德國康多爾航空公司和意大利拉蒂航空公司，在哥倫比亞的由德國人經營的史加達航空公司⁴。拉丁美洲是十分仰仗於航空交通的一個大陸，這一步驟就大大地增強了北美洲的帝國主義對南美洲的控制。

較弱的“同盟國”法帝國主義也同樣地被削弱了。法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在一九一三年曾達十六億美元，但在第一次大戰後便大大減少，而到了第二次大戰之後，剩下的還不足一億美元⁵。

^① 喬丹對這些目標曾作如下的公開說明：“在我們這個西半球上南進，在太平洋則西進，這就是‘美利堅大帝國’所走的道路，用經濟權力和政治誠信的近代名詞來說，霸權已經落到美國手中。”

但是在西半球遭到最大攻擊的是英帝國主義——這個華爾街的有史以來的敵手和戰時的盟友。

爲了換取驅逐艦，英國被迫放棄其加勒比海及沿加拿大海岸的重要軍事基地；爲了換取軍火，英國被迫讓出很多他們在美國、拉丁美洲及加拿大的投資。以拉丁美洲的情形來說，這種投資的轉手並不一定直接轉到美國資本家手中。不過，即使一些英國的投資是賣給了拉丁美洲政府，但這仍然等於使得一批勞工到最後還是受到華爾街資本的剝削。

在加拿大，英國的投資從一九三九年的二十五億美元減少到一九四七年的十六億美元，而美國的投資則從一九三九年的四十二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四七年的五十二億美元⁶。在拉丁美洲，英國的投資從一九三九年四十五億美元減少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六億美元，而美國的投資則由一九四一年的三十七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四八年的五十二億美元⁷。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英國與加拿大之間，舊日的特殊關係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特惠關稅待遇一項。加拿大的經濟、外交與軍事政策完全從屬於美國，英國現在與加拿大交往等於面對着另一個“美元”國家。加拿大成了美國軍隊的練兵場，它的新近發現的油田與鐵礦砂資源也就自動地轉移到美國壟斷資本手中。

在拉丁美洲，剩下來的英國投資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更進一步遭到減削，因爲受華盛頓指揮的拉丁美洲政府收購了英國的產業。實際上，在拉丁美洲，再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勁敵能繼續保有其重要地位，特別是在南美洲最大的一個國家巴西。戰時遍佈於拉丁美洲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和軍事基地不但仍舊保持，並且還擴張了，而武器標準化的計劃更把任何一點點剩下的獨立性

也都掃除殆盡了。

戰後的景象是整個拉丁美洲都在華爾街的鞭策之下，從巴塔哥尼亞到巴芬地區整個西半球都掌握在華爾街手中。

以上是關於在西半球上向南擴張的情形。那末，在太平洋上向西擴張的情形又怎樣呢？

遠在美國積極參加戰爭之前，美國壟斷資本已經暗示了它的目的：要繼承那些屬於歐洲國家的遠東帝國。美日談判的關鍵問題——即華盛頓所說的“不容再進”問題——就指當時的法屬印度支那。當美國國務院告訴日本的外交人員，說侵略印度支那即被認為是對美國的敵對行為時，蓄意吞併整個遠東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就已經知道戰爭是必然要發生的，因此就先下手襲擊了美國軍隊。

美帝國主義在整個戰爭過程中佔領了太平洋上所有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島嶼，而且隨後還繼續緊握不放；菲律賓又重新成為美帝國主義掠奪的地區和進一步向外征服的跳板。

雖然事實上在戰前英國在中國的投資比美國資本家的投資要大很多倍，但英國的軍隊却完全不許在中國從事任何軍事活動；而在戰後，中國——曾經一度——在傀儡蔣介石統治之下成為美國的附庸。

至於日本，美國對它所實行的單獨佔領，不僅是爲了對付蘇聯和日本人民，而同時是爲了對付重要的英國商業與投資利益集團。美國壟斷資本不顧英國的抗議，奪取了所有重要的商業與投資陣地。日本財閥與華爾街建立了一個新的聯盟，要不是因爲日本人民（他們將是有最後決定力的），這同盟已經肯定地把日本變成美帝國主義的一個馴良的殖民地了。

掌握了太平洋、菲律賓、中國與日本以後，美帝國主義等於

取得了對遠東一半以上的人民的直接控制，並且取得了征服其餘地區的基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一個加利福尼亞州國會議員曾公開宣稱太平洋“肯定地是我們的海洋”⁸。喬丹所說的在西半球南進和在太平洋上西進的目標基本上已經達到了。

以上所述是美帝國主義在戰時擴張的主要區域，但是美帝國主義在其他方面也有同樣的進展。它對於大西洋及大西洋上各島嶼的控制並不下於它對太平洋的控制。它在西非與北非佔領了一連串的軍事基地，在中東則由於從英國手中收買了阿拉伯國王伊本·索歐德而擴大了其軍事與經濟的據點。它和英帝國主義共同掌握了一些流亡將領與政客，在西歐的大部分地區、意大利和希臘，這批人重新被安置在當權的地位。

削弱英帝國主義——使它降為美帝國主義的附庸——這件事情已經如華爾街所希望的那樣充分實現了。

無限擴張的目標

當喬丹所說的目標真正達到的時候，這些目標又馬上會成為過時的了，在戰爭仍在進行的時候，這些“溫和的”野心就已經被一個無限制的統治世界的目標所代替。同時，這個目標也並不是一個長期的最後的目標，這只是緊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一段時期的戰略目標。這個戰略的經濟基礎是美國生產力在戰時的增長，和第一章所敘述的擴張主義者的龐大利潤的壓力。這個戰略的軍事基礎是：重轟炸機隊方面的不平衡的和過度的發展，為這些轟炸機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基地網，特別是發展了原子彈，到現在為止，這是侵略人民大眾的最殘暴的武器。

實施這個戰略的方案是取得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與

軍事支配權，在美國金融資本的領導下，動員全世界各處所有反動勢力，而最後則是發動反蘇戰爭。

這樣一個戰略，在第二次大戰後期是由大企業與軍界人物中一批最反動的和沙文主義的集團加以鼓吹與推動的。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間，這個戰略已成為一個最有力的和被實施着的戰略，並且得到金融資本中最有決定力量的集團的支持。

這個戰略在外交方面的徵象是：（甲）早在一九四五年，美帝國主義就帶頭企圖在歷史上曾經是進犯俄羅斯的通道的波蘭，扶植起一個反動的反蘇政府；（乙）一九四五年春季，美國策動強使阿根廷加入聯合國，侵犯了“敦巴頓橡樹會議”中所體現的反法西斯原則，這些原則是當時爲了準備組織聯合國機構而議定的。

這個戰略在經濟方面的徵象是：（甲）在擊敗日本以後馬上停止對蘇聯的租借法案協助；（乙）拒絕給予蘇聯的重建工作以任何經濟協助；（丙）從一開始就破壞關於從西德裝運賠償品到蘇聯的協議。

這個戰略在軍事方面的徵象是：（甲）將第二戰場的開闢延遲到一九四四年，希望由於這種延遲會嚴重地削弱蘇聯的力量；（乙）向日本投擲原子彈，投擲原子彈對於日本在當時已經是一種毫無軍事意義的行動，它的真正目的可用替杜魯門作傳記的但尼爾士引用的一段話來說明，杜魯門在波茨坦和蘇聯領袖舉行會議時曾表示過：“如果原子彈像我設想那樣爆炸了，那我就確確實實有一把鎚子對付那些傢伙了。”⁹

自此以後，所有的發展都是隨着這個戰略而來的。我們必須了解這個戰略，方能詳盡地了解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侵略戰爭等等政策。所有這些發展，在這個征服世界的戰略中都有

其一定的作用，所有這些發展，在爲了這個計劃的最高階段而做的動員工作中，都有其一定的作用，所謂最高階段就是發動侵略蘇聯、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的戰爭。

這個戰略從未向美國人民提出來過。金融資本的官方發言人曾經刺刺不休地對美國人民宣傳他們應該擔負起“領導世界”的使命。爲了制止美國人民反對以國家作爲征服世界企圖的工具，爲了使得美國人民甘心充當原子彈炮灰，這種“領導權”還被渲染成爲具有最高的道德意義。

這位來自密蘇里州的、語調平板的政客口中（指杜魯門——譯者）所充滿的“高貴的”情感，全部是爲了煽起沙文主義與侵略的情緒，下面就是他經常反覆重彈的老調：

“今天全世界都仰望着我們的領導。……我們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和平。”¹⁰

“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渴望從美國得到善意、力量和明智的領導。……我們沒有任何領土野心，我們也從未以我們的意志強加於任何人，我們從未要求過任何我們所不肯給予別人的特權。……在我們的計劃之中將不再有舊式的帝國主義——爲私人利益而進行剝削的舊式帝國主義。”¹¹

“在未來的創造中，美國人民將起領導作用。……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人人都平等地享有生活、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我們是從來不能容忍任何壓迫與暴政的……我們必須堅決主張一切人民都應獲得更多的自由與更美好的生活……這正是萬能的上帝賦予我們今後爲人類謀幸福的偉大的機會。”¹²（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

不是帝國主義，而是“領導”。不是剝削，而是“自由與更美好的生活”。不是一個計劃好了的征服戰爭，而是“和平”。這番陳詞

調調還夾雜着對蘇聯的反覆不斷的誹謗，杜魯門把蘇聯描繪成一個障礙物，阻擋了他所有的所謂善意的體現。

壟斷資本家們用上帝和人權宣言去裝璜杜魯門的演說，可是在他們內部，他們就說實話了。

征服世界企圖的本質曾經由一個最適宜於執行這個工作的人物加以最尖銳地說明，這個人物在擴張美國金融資本一舉中所起的作用是首屈一指的。這個人物，就是李奧·狄·惠爾滋，他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財務主任。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曾經有十億美元的國外投資經過他的手——而又早已由他經手收回了約近十億美元的利潤。

一九四六年年底，正當決定着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綱領的時候，惠爾滋也曾經提到“領導”問題，而且他把這問題提得更為直截了當。他說：

“這個責任是指對世界大事——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加以積極的和有力的領導，我們必須根據‘責任’一辭的最廣義的解釋來加以實行。作為一個最大的生產者、最大的資本供應者和一個對世界機構的最有貢獻的國家，我們必須確定步驟，在這個‘世界’大公司中負起大股東的責任。……這並不是一個有一定限期的職務，這是一個永久的責任。”¹³

希特勒說的是一個千年的德意志帝國，而惠爾滋所說的則是華爾街的永久統治，對於這樣的妄自尊大，我們不要發笑。惠爾滋正替金融資本制定政策，這些政策一直被忠實地執行着，而且包含着引起毀滅性世界戰爭的危險。

惠爾滋勸告他的金融家同僚們從昏睡狀態中清醒過來，不要坐待資本主義的崩潰，而要發動進攻。他說：

“因此，美國的私人企業面臨着這樣一個選擇：它或者是打

出去，在全世界挽回它自己的地位；或者是坐而待斃。……在將來，我們的外交政策將較之以前任何時候更為關懷我們國外投資的安全與穩定。使得我們國外資本受到適當的尊重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並不亞於使得我們的政治原則受到尊重；爲了國外投資，正如像爲了政治原則一樣，我們必須表現同等的謹慎與手腕。”¹⁴

惠爾滋用一種比白宮人物那套假仁假義的花言巧語較低的調子，說明了帝國主義的邏輯。他說，帝國主義必須運用其全部的國家力量去從事擴張，否則由於其內在的矛盾必然走向毀滅。

構成這個無限制擴張的主要成分是什麼呢？早在一九四〇年喬丹就分析過這個問題。他說：

“根據過去英國的經驗……我們知道，一旦我們肩負起這個‘白人的重任’，這對我們就意味着什麼。我們知道這意味着一個巨大的責任：要負責去集合、使用和保存用以承擔這個重任的金融資源。”¹⁵

國家必須動員數百億美元，正如馬歇爾計劃那樣，以促進美國金融資本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征服。但事情還不止此：

“從過去一個世紀英國的痛苦經驗中，我們知道這包含着要擴充和維持一個龐大的人力、機器與裝備的組織的巨大工作，不僅爲了國防，而且爲了有效地和繼續不斷地行使國際權力以便維持和平與秩序。”¹⁶（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

美帝國主義，作爲一個最有勢力的帝國主義，必須在軍事方面控制全世界。它必須組織一支巨大的武裝力量，不是爲了國防，而是爲了侵略，爲了強迫全世界各地接受美帝國主義的統治。

喬丹在一九四〇年尚未能預言這支美帝國主義的軍隊將用

以對付那一個主要的敵人，但六年之後這就毫無疑問了。惠爾滋向他的一些大企業家聽衆說，他們所面臨的障礙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與要求走向社會主義的鬥爭、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競爭者爲保護其財產免於落到華爾街手中時所作的抵抗。但在他的心目中，最主要的敵人是誰却是十分明確的，他說：“所有這些力量如果拿來和蘇聯與西方國家的大鬥爭的陰影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這個大鬥爭的影響力正遍及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¹⁷

鞏固國內的戰綫

當喬丹向從事投資的銀行家們陳述進行帝國主義擴張所需要的財政上與軍事上的必要條件時，他又加上了國內動員這個必要條件，他說：

“在我們的各種帝國責任中的這一部分（即軍事侵略）能够完成之前，必須有內部團結和國內繁榮作爲這些責任的堅固與廣泛的基礎，這意味着當前的戰爭行動結束後，對於我們的經濟與政治生活必須明智地與勇敢地加以改造。”¹⁸

對於這樣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動分子來說，所謂本國經濟與政治生活的“改造”，只能是指取消羅斯福總統任期內的溫和改革，取消羅斯福總統任期內工會與進步力量所贏得的民主權利。所謂“內部團結”，只能是指調解各個金融資本集團之間的分歧意見，壓制人民對華爾街團結合謀的任何反抗。在對希特勒德國作戰時美國金融資本所標榜的“全國團結”的口號，又準備使用於帝國主義侵略的新課題中。這個所謂“內部團結”採取了“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的形式，同時又進一步成爲“兩黨一致的國內政策”。由於金融資本的代表們取得一致，由於壟斷資本屬下的

兩大政黨消除了其所有的嚴重分歧，美國國會已經失去其作為一個爭辯問題和起草立法議案的機構的任何意義，國會變成了一個使一切金融資本與軍事當局所發佈的命令合法化的橡皮圖章而已。

金融資本的首腦集團既然在本質上同意這個無限制擴張的戰略，就不能不加緊控制國家機構，惠爾滋曾經這樣地說明這個問題：

“勞工領袖、自由主義政客和左翼宣傳家已經篡奪了商人的地位，代替了商人對於國內與國外的事情發展趨勢所具有的影響力。……要挽救海外的美國資本，讓我們首先從國內開始，第一個步驟就是使美國商人轉移其精神和志向，決心在我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生活中重新恢復其應有的地位。”¹⁹

金融資本從來就沒有失去過對於像國務院、軍隊及聯邦調查局這些主要政府權力機構的控制。當惠爾滋說出上述的話時，他所屬的集團早已從內閣中把像華萊士、伊克斯和摩根索這樣的自由主義閣員排除出去，但這還不夠，自由主義者、勞工領袖和進步人士還必須被剝奪一切對公眾事務的獨立發言權。任何不願俯首聽命於金融資本命令的人，必須加以清算和迫害。這麼一來，華爾街的人物就不能不親自動手了：

“這就要……接受政府職位的任命，而這些職位是需要穩健與經驗的，同時還得忍受隨之而來的相當程度的犧牲。這就要老闆們甘願將他們的傑出人物個別地或整批地安插在那些財政上可以擋得住風險的位置上。換句話說，當我們國家正在開始展開全面的戰後外交政策時，私人企業也必須展開它們的外交政策，由它們能辦到的最大貢獻開始——‘將人員安插在政府中’。這一點同時也適用於國內政策。”²⁰（着重點是我加的——

著者)

大企業直接控制或通過其代理人來操縱美國政府，這原是一個普通的現象。在過去，大金融資本家直接參加政府一事，在戰爭期間更爲加緊了，那種時候，華盛頓就充斥着所謂“年俸一元之人”^①。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要的華爾街家族却並未放鬆其對政府的直接控制，甚至組織得更嚴密，以便加緊其征服世界的計劃。

一羣華爾街巨頭佔據了華盛頓的要職，像福萊斯特、路易士·詹森、馬歇爾將軍、貝爾納斯、杜勒斯、哈里曼和麥克洛埃等人的背景我們可以在勞工研究協會出版的“今日的壟斷資本”一書和康恩所著的“反人民的陰謀”一書中找到充分的記載。較低職位的任命則完全適應於直接有關的某些特定金融資本集團。這些任命的恰當，從一九四九年任命主管世界三大主要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人選上可以看得出來。

管理美洲各國事務的是愛德華·米勒，他是蘇里文一克朗威爾律師事務所的一員；他的父親是實際佔有古巴與波多黎各的六個最大的美國糖業公司的總經理——爲了鞭策拉丁美洲的種植園工人與礦工，這的確是一個傑出人物。

管理近東、亞洲及非洲事務的是喬治·麥克基，他是一個石油技師和資本家，在委內瑞拉和摩洛哥擁有油礦的財主，過去曾經與洛克菲勒和摩根的煤油公司合夥——是一個促進共管中東和非洲石油利益的理想人物。

^① 在形式上，美國政府官員是不能夠一面拿政府薪俸，一面取得其他收入的。因此，有些大資本家官員乃放棄政府有限薪俸只取“年俸一元”作爲象徵以保持其取得本身企業收入的權利。一般稱此類人物爲“年俸一元之人”。——譯者

管理歐洲事務的是喬治·柏金斯，他是一個企業公司的首長，花旗銀行的董事，花旗銀行是華爾街的一個首要國際銀行。爲了使得歐洲成爲美元的禁巒，還有誰比這位先生能够更好地完成這個工作呢²¹？

像上述這些人，一個個代表着金融資本的上層寡頭政治，都是實際上統治着美國的人物。對於他們來說，選舉不過是一種無足輕重的玩意兒，而國會不過是個累贅，間或會打亂國家政策的時間表，但却永遠不會阻撓國家政策的主要路綫。他們征服世界的整個計劃已經一步一步地付諸實行，他們對美國人民的意旨完全加以藐視。

在一九四四年，美國人民投票選舉了羅斯福，贊同與蘇聯維持和平期間的合作。到一九四八年，美國人民雖然受了多年的反宣傳，却仍然這樣投票。

一九四八年，杜魯門總統害怕競選失敗，曾經向美國人民提出羅斯福的政綱，並且說要派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文生爲全權使節，去訪問斯大林。他又對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聽衆說：蘇聯與美國同樣都有一個提高生活水平的重大工作等着去做。並且還說：“歷史證明幾個勢均力敵的強國是可能在世界上和平相處的。”就在選舉前一星期，他還說：

“現在讓我們看看某一些人，他們通過集中的經濟力量，正危害着美國民主政治的前途。……歷史一再告訴我們，經濟力量如果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將會招致自由的喪失。

“當少數人控制了一個國家的經濟，他們就找出一個‘出面人物’去替他們管理國家。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國經濟的控制權已經落在一個包括製造商鉅子、銀行家和地主的小集團的手中。

“這些人決定德國必須有一個強暴兇狠的獨裁者去執行他們的計劃，以擊潰德國強大的工會；因此，他們以金錢和勢力支持希特勒，然後呢？下文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也知道，意大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有勢力的意大利商人支持着墨索里尼；而在三十年代，日本的金融巨頭曾經協助東條的軍閥黨羽去攫取日本政權。

“今天在美國，也有一個日見增長的——並且是危險的——趨勢，使得龐大的經濟力量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幾個人手中。”²²

杜魯門以這樣的演詞矇混過關，並且獲得了選舉的勝利，但前面我們所列舉的位據要津的政府官員，却大多是在這次選舉之後任命的。

當杜魯門早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在芝加哥發表上述演說時，他已經是他所譴責的利益集團的忠心耿耿的“出面人物”。自此以後，他所擔負的這個任務更加擴大了。杜魯門常常喜歡在客人面前耍來耍去的那個艾森豪威爾戰時所用的地球儀，正象徵着征服世界的野心——即惠爾滋之流、阿德里治（美國大通銀行）之流、列菲因威爾斯（摩根公司）之流以及其他替金融資本決策的小集團中的其他人物的征服世界的野心。

第七章

將歐洲殖民地化的企圖

在華爾街征服世界的計劃中，西歐是一個最重要的地區。西歐擁有發展完備的工業與熟練的勞工，因此一旦帝國主義者能够把它降到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地位，它就是帝國主義巨大超額利潤的可能的來源地。通過那些老牌帝國作為跳板，它是征服亞洲非洲大部分地區的一把鑰匙。由於它的位置，它的工業和運輸系統，以及它在工業與軍事方面的人力，它是侵蘇計劃中很自然的一個主要基地。

列寧在很早以前就指出：帝國主義者不但要力求吞併農業地區，而且要吞併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已被瓜分的世界，帝國主義者找尋着任何可以榨取超額利潤的地方。工業化國家，正如落後區域一樣，都能够成爲進一步進行征服的基地¹。

希特勒對大部分歐洲的征服也具有這樣的雙重性質。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軍事佔領之下變成了殖民地，銀行機構被轉移到德國財閥手中，主要工業不是直截了當地被接管，就是受新的德國股東所控制。法國、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意大利等國的工人都被降到奴隸勞動的境地，以便德國金融資本榨取超額利潤。同時，歐洲工業被變成了德國軍事機器吸取戰爭物資的來源，而被佔領的領土變成了威脅進攻英國，實際進攻蘇聯的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與結果造成了美帝國主義的特殊地

位，使它能企圖替代德帝國主義，不僅要做大部分歐洲大陸的主人，而且要當英國的主人。

華爾街在歐洲投資並不是新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就使用過好幾十億美元，幫助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去扼殺匈牙利、波蘭與芬蘭的革命，防止西歐的革命，並妄圖摧毀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一俟資本主義的統治在大部分歐洲地方暫時穩固下來——這是指在一九二三年左右開始的情況——美國金融資本便在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及其他歐洲國家作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包括購買各個有戰略性的企業公司的股票。

當時美帝國主義雖然有強大力量去滲入歐洲，但是還不足以試圖統治歐洲。美帝國主義的投資仍不足以使華爾街有充分力量去控制歐洲的主要工業。歐洲國家仍然保留其強大的軍隊與其自己的政治生活。第一次大戰之後，美國軍隊並未長久駐留歐洲。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新的均勢，美帝國主義超越了滲入歐洲的階段而進入企圖使歐洲殖民地化的階段。遵循着上面維吉爾·喬丹所陳說的美國金融資本的訓令（參閱第六章），美國政府動員了千百億美元的資本去資助這個企圖，把這筆資金以貸款或贈與方式給與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却告訴美國人民，說這些金錢是用以拯救飢民、挽救自由制度和保護一些國家獨立以免受侵略的。但是真正的目的却正相反。

美帝國主義正以各種不同的策略企圖征服歐洲，其中包括與個別國家簽訂財政協訂，在希臘與土耳其推行杜魯門主義，實行涉及整個資本主義歐洲和花費美元一百五十多億之鉅的馬歇爾計劃，以及簽訂還在不斷擴大其活動的規模與範圍的北大西洋公約。

所有這些方案都具有以下一系列目標：

1. 控制歐洲的政治；
2. 控制歐洲的經濟；
3. 奪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
4. 準備侵蘇戰爭的基地。

逐步征服

所有這一系列複雜的協定、計劃、公約，顯示着美國逐漸增強其控制能力以達到上述目標。譬如，以英國為例，一九四五年所簽訂的貸款協定不過是以一些一般性的要求加諸於英國而已。但這些要求足夠削弱英國的獨立而至於接受馬歇爾計劃下那種遠為苛刻的條件。而馬歇爾計劃又進一步削弱英國政府，使得它要去接受北大西洋公約及其附帶的美援協定，從而把聯合王國變成了五角大樓戰爭計劃中的一艘巨大的歐洲航空母艦，並把英國經濟隸屬於這些戰爭計劃的需要之下。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曾經陳述過這個逐步征服的方法，並且實行了這個方法去傾覆很多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在今天，同樣的方法正在被使用着，“經濟學家”周刊也曾承認這個事實，並且還對之表示贊同。這個英國雜誌指出美國的控制使得它的歐洲同盟國徒具主權國家的形式。至於實際如何，它問道：

“但是，我們能不能肯定地說，主權只有在受到正面攻擊時才算被侵犯呢？在這一連串無止境的、和往往形成一種信任與讓步氣氛的‘合作’行動中，難道主權就不會受到減削嗎？所有曾與歐洲經濟合作組織（一個馬歇爾計劃的機構）在一起密切工作過的人都認為：在很多很多方面，一九四七年時會被認為不可想像的所謂聯合行動，現在却成爲可能了。北大西洋公約理事會所培

養起來的合作習慣，將慢慢地引導大家走到最低限度也像現在存在於大英聯邦中那種程度的團結與了解，而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到底不是一件小事情呢！”²

其實如果把英國描寫成“美國聯邦”的一員也不算十分言過其實，只不過是：今日的英國或者比之在舊日英帝國中的印度有較多的獨立，但比之當日在舊英帝國中的澳洲則還不如。的確，這對於昔日曾為海上之王的英國，確實不是一件“小事情”。

本章下列各節將就上述第一個目標、即政治上的控制來加以分析，從而可以看出歐洲逐步殖民地化的過程。

扶植反動傀儡

美帝國主義對西歐的政治控制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於歐洲各國人民來說，反對德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同時也是一個反對“他們自己”的帝國主義者的鬥爭，這些國內的帝國主義者將國家出賣給希特勒，無恥地和侵略者勾結起來，協助他們去奴役自己的人民。

在法國，受廣大民衆支持的反希特勒的解放武裝力量曾經起草過一個計劃，準備打倒壟斷資本的勢力，保衛國家的獨立^①。在意大利，六個政黨聯合組成的民族解放委員會曾共同議定一個廣泛的計劃，內容包括基本工業的國有化和根本的土地改革。在這些以及其他國家中，共產黨獲得人民廣泛的支持，人民認識了，並且接受了他們在反侵略鬥爭中的富於自我犧牲精

① 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七年底所發行的關於法國的“國家研究”一書中，曾經承認過：“要求將若干基本工業國有化的運動發源於抵抗運動時期，而且在解放初期曾獲得人民廣泛的支持。在通過國有化法案的國民會議中，在原則上反對國有化的議會代表為數不足五分之一。”

神的領導。爲了在解放武裝力量中實現工人階級的領導，工人們鞏固地團結起來。毫無疑問，這個反帝的聯合陣綫在法國和意大利是比那些不受人民信任的壟斷資本集團及其同盟者梵蒂岡與右翼民主社會黨是更爲有力量的。

在東歐國家中有類似的幾種力量存在。蘇聯軍隊在這些國家中以真正的解放者的姿態出現。他們允許反帝的武裝力量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政權，允許他們懲罰那些與法西斯主義者勾結作惡的人。蘇軍給當地人民以經濟援助及武器，使得人民可以鞏固他們的政權。

英美軍隊所起的主要與有決定性的作用恰恰相反：阻止他們所佔領的國家的解放。他們進入希臘、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與意大利，那正是蘇聯軍隊在東綫消滅了德國的最精銳的軍團之後進一步進行最後殲滅的時候。這些西方國家所遭遇的主要是德國的殘餘軍隊，而且在進攻中他們得到人民抗敵武裝十分有力的協助，這些人民武裝主要是由共產黨領導的。

英美軍隊所到之地，必堅持解除抗敵游擊隊的武裝。他們帶來的是由反動流亡政府所糾合的軍隊，這些軍隊是在海外受訓的，同時由美國供應軍火的。英美軍隊使流亡政客與資本家，連同在資本家與政府官吏中的投敵分子粉墨登場，位據要津。這樣，被解除武裝的人民抗敵運動就無法對付這批投敵分子，沒有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權和實現其本國的真正解放。

在希臘與比利時，英國軍隊用武力解除了人民的武裝，而且在希臘還用暴力建立了一個法西斯君主政權。在法國與意大利，人民同意放棄武裝，舉行了選舉。但反動勢力不顧戰後初期的選舉結果，仍然佔據着有決定性的職位^①——而這些可恥的政權還得到財力的資助，以建立用以對付人民的軍隊和警察。

在英美的縱容與安置下而恢復政權的資產階級政府並不是自由獨立的。他們受到倫敦，特別是華盛頓的控制。如果沒有軍火與裝備來供應他們的軍隊，他們是不能維持其政權的。他們不願動員人民力量去進行重建工作，却依賴華盛頓的財政援助去恢復他們的工廠，爲了企圖恢復其殖民地帝國，他們更需要美國給予軍事與經濟上的援助②。

在西德，英美佔領當局無恥地放棄了對納粹首要分子的懲罰。相反地他們却恢復了納粹工業家在工業企業中的管理地位，並且讓納粹的嘍囉們繼續控制着行政機關、學校、法庭與警察。

英美佔領軍不但保護着德國法西斯分子使德國工人階級不能奈何他們，並且還衛護着德國法西斯分子，使他們不遭受到各國人民義憤的譴責，這些人民就是曾被德國法西斯分子蹂躪過的人民。因此，德國資本家比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及其他國家的

①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法國大選中，共產黨贏得最多的票數，“根據傳統與憲法的規定，共產黨享有提名總理和優先選擇重要內閣職位的權利。但戴高樂拒絕他們這兩種權利。一個最嚴重的危機產生了。……這個危機之得以度過，乃是由於共產黨的讓步。在新的聯合內閣中屈居次於天主教黨（指人民共和黨——譯者）領導者的第二位。這加強了共產黨的一種信念，那就是：憲法的原則是適用的，但並不包括共產黨在內。”（見霍華德·史密斯著：“歐洲現狀”，一九四九年紐約版，第一五四頁）

② 英國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在英國，人民用選舉工黨政客們（這些英國金融資本手下的飽有經驗的奴僕）的辦法來表示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熱望。這些工黨政客，把政府機構，特別是外交部與軍事部門完全放在保守黨人的外交政策的掌握下。這些工黨政客將若干工業實行了“社會主義化”，僅將若干企業公司在名義上變爲政府所有，但控制權則全部在舊時的資本家手中。這樣，在英國，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的重要職務仍然要由英帝國主義者本身負擔起來。但華盛頓的援助對於他們是愈來愈顯出其重要性了，因爲英國人民正加緊要求工黨去實現其諾言。工黨政客們藉口向人民推託說，因爲他們需要華盛頓的財政援助，所以不能不依照美國資本家們的規定去搞政治。

資本家更加依賴於英美帝國主義。

恢復帝國主義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權力一舉，是由英美聯合武裝來執行的。在執行過程中，又發生了英美兩帝國主義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不過很快局勢就很分明了。英帝國主義缺乏足以將歐洲殖民地化的財政與軍事資源。它不能不向它的美國對手屈膝。在德國，英美兩佔領區在一九四六年合併，合併的條件造成美國更大的統治權，這恰恰符合它在財政方面的統治地位。英美對意大利的共同佔領漸漸變成了美國的單獨佔領。而英國對希臘的佔領，則被杜魯門主義所代替（參閱第九章）。

杜魯門主義不但是美帝國主義公開用暴力對付一個歐洲國家的開端，而且是華盛頓對西歐加緊政治統治到達一個新階段的信號。緊接着對希臘的干涉，杜魯門政府就命令其附屬國家，將共產黨排除於聯合政府之外。有一件事說明這一措施的世界規模和中心策動者：一九四七年春天，在兩個月期間之內，在所有比利時、法國、意大利與智利的政府中，共產黨員都被排擠出來。隨着這一個步驟就開始了公開對工會的全國性恐怖行動和使用武裝軍隊去鎮壓罷工等等暴行。在沒有得到美國援助去建立軍事力量以前，這些暴行都是西歐資本家所不敢嘗試的。

隨着馬歇爾計劃一道來的是腰纏萬貫的美國工會貴族，他們的工作就是瓦解歐洲的工人運動。他們在破壞意大利與法國的工會聯合運動中是有些成功的，他們倚仗右翼社會黨與梵蒂岡的勢力，製造所謂“第三種勢力”，以分裂工人運動，也有一些成功。同時他們成功地迫使英國、比利時與荷蘭的工會中央以退出世界工聯的舉動去破壞勞工的國際團結。

對歐洲工人階級的打擊是和對美國工人階級與進步人士的打擊相配合、相呼應的。一九四七年當用武力鎮壓罷工在歐洲已

成慣例的時候，塔夫脫—哈特萊法案就被強加在美國工人頭上。當莫萊、加萊、路德、格林及其同夥們在進行分化美國的工人運動的時候，在歐洲他們的走狗則以馬歇爾計劃官員和美國國務院勞工參贊的身分去進行分化從而削弱西歐的工會組織的勾當。在一九五〇年，當美國國務院煽動警察以暴力去對付美國的和平戰士時，它也策劃着同樣的行動去迫害歐洲的和平戰士。隨着美國的麥卡倫—尼克松反共法案的通過，特種反共警察武裝也在西歐各重要國家中組織起來，並在這些國家中進行對共產黨領袖們的襲擊、逮捕與暗殺。

通過對西歐各國共產黨與工會的打擊，美帝國主義企圖削弱工人階級及其政治領袖們的力量。這些工人階級及其政治領袖們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用事實證明了他們自己就是保衛歐洲各國的民族獨立的最可靠的力量，因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妨礙華爾街統治的主要政治障礙。

在美國，這一連串的對工會、對和平戰士以及對各種政治色彩的進步人士的打擊，其用意就是防止美國勞動人民與歐洲及世界上任何華爾街企圖征服的地區的勞動人民之間建立任何聯盟。

宣傳與恐嚇

殖民地化歐洲的企圖包含着想把歐洲的全部文化生活從屬於好萊塢，美國的連環圖畫欄，“讀者文摘”和可口可樂廣告的水平，正如第五章中所描寫的附屬國家內的一般情況那樣。爲了換取財政援助，馬歇爾計劃國家的政府被迫要減少或放棄抵禦這些謀利的宣傳品的入侵。然後，馬歇爾計劃本身就保證了美國影片、雜誌、報紙與出版商的美元付款，給予這些公司在滲入某些

歐洲市場時以很大的便利。

英國電影製片工業所受到的影響，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看到美國影片滲入的趨勢，英國政府在一九四八年曾規定所有在英國放映的影片至少必須有百分之四十五是英國片。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這個規定減為百分之四十，而在一年之後又減為百分之三十。但即使是這樣有限度的保護，也因為英國貿易部所批准的千萬種不受限制的例外而變為無效。有些英國製片廠倒閉了，其餘的則裁員減薪。沒有倒閉的找美國公司購買其產權或加入成為股東³。好萊塢又藉着一九四六年法美兩國財政協定的勢力，更迅速地削弱了法國的影片製造業。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九年間，美國對德國的影片輸出增加了四倍，而對意大利的輸出則增加了十七倍。

法國國會通過了禁止可口可樂進口的立法，因為它威脅着法國的傳統飲料——酒。這個行動曾被附庸的法國政府置之不理，但它却反映出歐洲人對這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外來的、破壞性的文化，幾乎是全體一致地憎恨的。同樣的，誣淫誣盜，煽動種族仇恨與反勞工情緒的美國連環圖畫，也激起了要保護其本國文化及青年道德的歐洲人士的強烈反對。

爲了謀取利潤而進行的私人宣傳，受着大規模的美國政府宣傳的支撐。而這些美國政府宣傳費又大部分是從歐洲國家爲答謝馬歇爾計劃及其他財政援助而撥交美國政府的基金來支付的。在德國，則以繳納佔領費的基金來支付。這些宣傳是用來左右這些國家的選舉的。

美國政府對歐洲國家的選舉所採取的公開與大規模的干涉行動，使得歐洲傳統的議會制度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東西。它曾經不惜舉行海陸軍大示威和使用成百萬美元去進行欺騙與恐

嚇性的宣傳來阻止左翼聯盟在一九四八年意大利大選中取得勝利。

下面一段話是描寫美國政府在意大利替反動派爭取選票的一些戰術，這是從戈登·加斯基爾的一篇文章裏摘錄出來的，該文原載於華盛頓的馬歇爾計劃行政機構出版的一本雜誌內，它說：

“意大利的孩子們突然接到一種叫做‘狄奧卡’的玩具，這種玩具是一種遊戲，一種競先到達目的地的遊戲。有許多美國的飛機與輪船的棋子，其中並沒有什麼巧妙的地方。不過，在一個畫着美國‘自由神’的空格下面寫着：‘不喜歡這個象徵的人，就要命定遭受饑餓與迫害。’而在所畫的美國國旗之下，它寫着：‘在這個旗幟的蔭庇下，你們將永遠享有自由與安適。’”⁴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歐洲辦事處負責人霍華德·史密斯在其所著“歐洲現狀”一書中承認，如果沒有美國的干涉，左翼聯盟是會在競選中獲得勝利的。他評述道：

“西方對意大利內政所加的干預，令人不能不有充分理由去懷疑到美國所宣稱的尊重他國主權獨立的政策。在意大利它與那些毫無民主氣息的社會階層結為聯盟，而由於這種聯盟却增加了這些階層的勢力。”⁵

宣傳不僅限於競選運動。美國政府還通過馬歇爾計劃執行機構，發動了誹謗蘇聯的巨大宣傳運動，也替美帝國主義的“慈善慷慨”大做其廣告。加斯基爾先生在他的上述的文章裏曾經解釋過宣傳策略應該視各國國情不同而有所不同。他描述了在法國所採用的策略，通過他的敘述也暴露出美國統治集團對於法國人民是如何地極端鄙視。他說：

“例如，法國乃是馬歇爾計劃中的女主角。……法國人對於

他們過去的光榮、最近的淪陷、在戰爭中的失敗記錄以及長期的混亂，是過分敏感的，他們很想忘記外國人正在如何援助他們。可是……雖然他們有着這些矛盾，還是值得我們慇懃追求。因為法國不僅是我們的傳統的朋友，而且還是我們在歐洲的主要軍事堡壘。”⁶

因此，據這篇文章說，在法國宣傳馬歇爾計劃的任務就交給了一位“了解情況”的、曾經擔任軍事情報人員的約翰·布朗來担負。

“布朗立刻就取締那些喧嘩的美國宣傳方法，他命令：‘在播音車上不准再奏“星條歌”這首曲子。’他記起了一句古老的法國諺語，‘誘姦勝於強姦’，法國人既懷疑我們要將‘美麗的法蘭西’變為美國殖民地，布朗就開始驅散這團疑雲。”⁷

政治控制的進展

不管你稱之為誘姦或強姦，依靠馬歇爾計劃來維持政權的政府正隨時準備接受華盛頓的命令，出賣其人民的獨立與自由。出賣的一個方法就是簽訂不平等條約。

法國政府默默地接受了華盛頓所制定的一連串對西德的法規，這些法規都是犧牲法國而扶植其傳統的敵人——德帝國主義的。所有的馬歇爾計劃國家都與美國政府分別簽訂了協定，將處理國內事務的主權大量地割讓給美國。

這些協定容許美國設立享有外交官階與特權的特別代表團。代表團團員、美國國會議員及其隨從官員都有權去任何地方，視察任何事物，並且可以向馬歇爾計劃國家政府要求他們所需的任何協助。美國官員與商人雲集於西歐國家中，其情形正如過去納粹“遊客”進出於德帝國主義所計劃要征服的國家那樣。

這些協定又使美國政府能夠有效地控制馬歇爾計劃國家的財政政策，同時通過各國為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物資而撥出“對等基金”的辦法，直接控制了他們的大部分貨幣供應。歐洲國家的政府如果要去保護其本國資本家免受美國壟斷資本的競爭損害，那是不容許的。

由於懼怕激起對於民族獨立自由有高度關懷的法國人民的憤怒，法國政府曾經企圖隱瞞它所簽訂的馬歇爾計劃協定的條件而不加以發表。

任何一個根據馬歇爾計劃派到歐洲去的最卑小的美國官員，對於在他管轄下的歐洲附庸國政府，都可以任意拍案大罵。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執行着馬歇爾計劃的命令的意大利政府，在不惜犧牲意大利人民利益的情況下平衡其預算並穩定其貨幣，同時採取了“通貨緊縮”方法，使得失業增加，使得自己的國家門戶洞開，任憑美國貨與美國資本入侵。但到了一九五〇年秋天，華盛頓為了刺激意大利的軍事生產，需要採取與前不同的政策，駐意大利的馬歇爾計劃代表團團長利安·丹頓先生，就把奉行美國過去指令的意大利政府攻擊得體無完膚。但意大利政府並不因此而要求撤換丹頓，它只滿足於為它過去的行爲辯護，它申辯說它已經開始執行丹頓先生現在對它所要求的事情了，因而已經有充分準備使自己能適應美國政策上的新轉變⁸。大約與此同時，華盛頓威嚇希臘說：如果希臘政府不中止其在執行某些馬歇爾計劃指示時所存在的“懈怠”情況的話，它要減削運往希臘的馬歇爾計劃物資。在幾個星期內，希臘就趕忙起草了一些法案，體現了美國的要求⁹。

在直接軍事佔領下的德國，在軍事與民政“顧問”控制下的希臘，政治控制已經擴展到公開決定首相、部長及軍事首長個別

人選的地步。美英法三國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一個分立的西德“國家”，這個“國家”要受佔領法規的管轄，這個佔領法規賦予佔領軍軍事當局對西德的重要立法有絕對的否決權，對西德的國際貿易、外交政策及國防有控制權。同時，軍事佔領被加強了，佔領費的徵收竟達每年十億美元以上。即使是那些美國一手挑選出來的“西德共和國”的“內閣閣員”們也對美國控制之嚴密表示不滿。這個新“國家”建立七個月後，“紐約時報”曾經這樣報道過：

“在波恩的德國人，對於他們認為是侵犯他們政府職權的一連串事情和對德國內政不應有的干涉，表示嘩然憤怒。……一個波恩政府發言人曾經這樣說過：‘蘇佔區的報紙將我們描寫為波恩傀儡共和國，而這正是他們（西方盟國）把我們一手造成這樣的。’”¹⁰

有些西歐統治者已經變成了“美國黨”如此忠誠可靠的代表，對於華盛頓決定的重大決策，他們很能“採取主動”，積極完成。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在馬歇爾將軍以美國國務卿的身分宣佈其“計劃”的概要之後，緊接着就有英國外相貝文提出其詳細的綱領，作為一個“歐洲的”建議。在一九五〇年，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剛一呼籲大西洋公約國家應在經濟、政治及軍事方面團結起來，緊接着就有法國總理皮杜爾提出適應這個目標的“法國”計劃。同樣，華爾街的動員歐洲重工業去準備第三次大戰的計劃是由法國外長在“舒曼計劃”的名義下宣佈的。

美帝國主義對資本主義歐洲的政治控制隨着一九五〇年春季所加強的軍事控制而達到了最高峰。北大西洋公約理事會的建立是爲了對這個公約的成員國家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生活加以控制，由美國人擔任主席；並且有一項諒解：理事會不根據多

數表決而作出決定，而是主席有權通過協商作出決定。

歐洲的“統一”

美帝國主義統治全歐的企圖是在歐洲“統一”的口號下進行的。美帝國主義者的理由是：各個歐洲國家太小了，光靠其本身是不能够存在的；它們必須合併在一起，將它們的主權交給一個較高的“大西洋”機構，而在這個機構當中，有決定性的發言權是在大西洋的彼岸。反動頭子邱吉爾及其他歐洲的類似人物，都響應着華盛頓關於組織一個“歐洲合衆國”的要求。

將這個“歐洲合衆國”來與當時美洲各邦聯合組成美利堅合衆國相比是錯誤的。美利堅合衆國成立於資本主義初期，當時擁有共同的地域、語言，文化與經濟生活的人民，形成一個單一的民族，並進而合併、建立一個民族國家。那是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在很早以前各個歐洲國家也會經過類似的階段，其中有的先於美國，有的後於美國。

成立“歐洲合衆國”的建議與這個歷史發展並無任何共同之處。這個口號曾在第一次大戰期間被提出過，而在當時列寧就會加以分析並指出其錯誤。這個口號所涉及的不是有共同語言與生活方式的人民溶合而成爲一個政治單位，而是將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經濟生活的國家硬以武力“強迫成婚”，去組成一個政治單位。在帝國主義制度下，不同的民族國家混合成爲一個國家並不是一個進步的步驟，而是一個反動的步驟。它必然使得弱國爲強國所征服，成爲一種變相的殖民地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已經有過很多的要把資本主義歐洲統一起來的姿態——如廢止關稅壁壘的談判、建立“歐洲委員會”和“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等等。所有這些努力都觸了礁，

碰在歐洲各資本主義集團彼此矛盾的現實上，碰在歐洲各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的現實上。

作為華爾街獨霸世界計劃的主要策劃人之一的杜勒斯，對這些失敗大肆抱怨，他曾經表示過，美帝國主義有決心去吞沒這些歐洲國家。他自稱有這種“權利”，因為“我們在西歐曾投下巨額的投資”；因為，“我國的人民與歐洲人民有着血統的關係。”¹¹他堅持以“強硬壓力”¹²去鎮壓歐洲人民對於這個希特勒“協調”計劃的翻版的反抗。當歐洲的傀儡政客們告訴他，他們的人民不容許他們策動歐洲的統一而“美國必須來推動我們”的時候，杜勒斯對他們表示諒解。其實他已經準備照辦，準備去騎在歐洲人民的頭上，他甚至連官方宣傳的虛偽民主外衣也準備拋棄，他說：

“在這種嚴重關頭，我們不能再固執虛禮。在西方，我們戰後的努力並不是去討好歐洲人民，‘德孚衆望’這四個大字即使我們可以用金錢買得，也值不了二百億美元。何況現在我們並不能德孚衆望。……我們在西歐要完成一件功德圓滿的工作，好使得我們能夠把它放下來，而將我們的注意力及物質援助轉移到別的情況更為緊迫的地方去，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及遠東。”¹³

關於杜勒斯和艾奇遜所擬定的關於歐洲統一計劃中的經濟與軍事內容，我們將在以下各章加以論述。在政治方面，它的基礎在於恢復那些有侵略性的德國金融資本。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使他們復活一樣，不過這一次有一些不同點：這一次，華爾街並不以協助恢復魯爾區為滿足，而是決心要成為魯爾區的主人，由此再進一步成為整個資本主義歐洲的主人。德國在美國金融資本的計劃中所佔的中心地位曾經由它的下列幾個發言人明白表示過，這幾個發言人在一九四六年是胡佛，一九四七年是艾

奇遜，一九五〇年是杜勒斯。

他們對於德國之所以特別感到興趣有好幾個理由：公開的軍事佔領使得德國可以成爲一個控制周全的作戰基地。美國資本家在西德的投資在第一次大戰以前即超過十億美元，略多於美國在英國的投資，而比起在任何其他歐洲國家所作的投資要高出好幾倍。通過這些投資及其建立已久的卡特爾組織，華爾街與魯爾區的銀行家及工業家是有着特別密切的關係的。由於這個理由，而且由於魯爾的經濟力量，魯爾區就成爲將整個歐洲大陸殖民地化的理想基地。再者，西德是一個未經改造過的法西斯主義獸穴——這裏藏有納粹官員和衝鋒隊員，這些人都渴望着要報復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遭遇的失敗，他們都是執行美帝國主義進行反蘇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忠心走狗。同樣，魯爾區又是進行這樣戰爭的任何歐洲兵工廠的中心。此外，一個復活的俯首聽命的德國資本主義，可與英帝國主義勢均力敵，美帝國主義就可在這個均勢中實現其使兩方面同時受其控制的陰謀。如此，通過統一歐洲的方式，就使英帝國主義處於一種境況：它必須去和德國金融資本競爭，去爭取充當華爾街小夥計的“特權”！

在第三章中我們曾敘述過美帝國主義和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最反動的階級之間的聯盟情形，而在西歐，美帝國主義的主要同盟者乃是金融資本家，也就是已經得到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最大的壟斷資本家。基本上，這些人在歷史上一向是英國、法國、德國及意大利等國的統治集團，現在已經被降爲美帝國主義的買辦，與拉丁美洲的統治集團的地位差不多了。對於這些人物中的大多數而言，這也並不是什麼新經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在戰前，他們都曾替德帝國主義担任過這種角色。但却沒有這一次所做的那麼普遍和徹底。

在馬歇爾化的歐洲，各個統治集團都是一些傀儡人物。在他們之中，許多人是躲在美國的星條旗後面，以防避其本國工人階級的進攻。這些絕望的人們對其本國人民和現在仍受其局部控制的殖民地人民極盡其榨取之能事，這樣就更助長了美帝國主義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摧毀。

下面是詹斯登這個有名的資本家對於法國被摧毀的情形的描述：

“這是一句老話，要想發大財有兩個時機是最適宜的，一個是當一個國家剛在建立的時候，另一個則是當它正在趨於衰敗的時候。現在法國工業家的行爲與作風就好像他們都相信他們的國家正在陷入一個深淵，他們儘快地將利潤轉移到‘安全’地方，轉移到摩洛哥、到瑞士、到南美洲；如今在法國有一個流行的說法，就是說，工業家們的一隻脚踏在法國，而另一隻脚却越過了阿爾卑斯山或者已經遠渡重洋了。”¹⁴

法國是如此，希臘的輪船主們也是同樣情形，這些希臘船主們正在將他們在杜魯門主義下所得的利潤存放在紐約的銀行中。這種情形同樣也存在於那些正在將其財富轉移到華爾街的英國資本家以及所有那些可憐的馬歇爾計劃下的其他人物。歐洲國家所實行的看來像很嚴格的外匯管制，其實是一些有漏洞的篩子，不但可以使得美國的企業公司能夠將他們的利潤帶走，而且還使得歐洲的大老闆們可以將他們的資金逃避到這個資本主義最後的堡壘去。

有一個聯合國的報告書曾經作過一個估計說，在一九四七年，“越過歐洲國家及其他國家的外匯管制而逃出的非法的資本轉移，會嚴重地助長了經濟危機，在該年的頭九個月中，其總額可能達到十億美元之鉅。”¹⁵

在其後兩年中，據這個報告書說：這種資金逃避的速率還要更高些。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這個歐洲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結構最後終於被毀滅時，美國的城郊產業一定要大為漲價，其漲價情形一定超過當蔣介石的狗黨挾其國家黃金逃到美國，在威徹斯特和佛羅里達大買其房地產的時候。

但在華盛頓對西歐的日漸增強的控制中却存在着一個“微小”的弱點。當西歐這些附庸資本家及政客們變得愈為卑鄙阿諛的時候，他們的人民就變得愈為憤慨。美國關於“民主”的詭譎宣傳所能起的作用比之較早的德國關於“種族優越”的庸俗宣傳所起的作用是大不了多少的。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經濟與政治“顧問”們、腰纏萬貫的商人們、勞工參贊們、無孔不入的旅行家們、妄自尊大的美國將軍與飛行員們，都是外來的統治者，都和他們的納粹老前輩們是差不多的。

在馬歇爾計劃國家中對美帝國主義統治的普遍憎恨的怒潮正在日益高漲澎湃，正在搖撼着那企圖統治整個歐洲的周密計劃，正威脅着要粉碎那企圖利用歐洲作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基地的陰謀。

第八章

對西歐的經濟控制

美國金融資本對西歐的日漸增强的政治控制是與其經濟控制齊頭並進的。

從旨在將馬歇爾計劃國家置於美國統治之下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協定、計劃與交易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點：

(一)每一項交易的安排都是爲了使得某些特定的美國壟斷企業可以立即獲得巨額的利潤。

(二)每一項交易都是用以削弱和傾覆歐洲的經濟，增加對歐洲工人的剝削，減少華爾街在佔有歐洲工業與對歐洲工人進行超額剝削過程中所遭遇到障礙。

(三)其最終的趨向就是要把西歐的工業變成爲一個受華盛頓控制的兵工廠，以備一旦新的世界大戰到來時加以利用。

我們現在就這個過程中的一些主要的步驟加以探討。

超級的大量傾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千百億美元的美國贈與和貸款使得西歐成爲美國工農業剩餘產品的可靠的傾銷市場。一九四九年頭九個月中，在美國的玉米、花生、銅製品、油籽、小麥、麵粉、棉花與煙草的全部輸出中，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是輸出到馬歇爾計劃國家。

這些貨物之所以運去，並不是因爲歐洲需要它們，而是因爲

美國壟斷資本要將它們脫手。駐德國的美國陸軍日用品供應部糧食採購處的負責人安德魯斯上校曾經這樣作證過：

安德魯斯上校：“事實上是你們不能夠在美國出售這些花生，因為它的價錢定得太貴。……這些花生是一種良好的食品，它可以榨出優美的油脂，可是如果不是由我們來購買它，這些花生在這個世界上簡直就毫無出路。”

衆議員秦柏（紐約州）：“是按那樣的價格的麼！”

安德魯斯上校：“是按那樣的價格的，如果不輸到德國（就沒有出路）。陸軍方面實際上沒有辦法不要這些花生。”

衆議員加里（弗吉尼亞州）：“你是不是說商品貸款公司不願售給你其他東西，除非你購買剛才你所說的這種東西嗎？”

安德魯斯上校：“爲了要從農業部裏得到一些油脂配額，我想我們實際上真的不能不這麼說：‘好吧，我們就接受你們一部分花生吧。’我曾經乞求配給我們豬油等物，但他們說：‘我們不會讓任何數量的豬油出口的，你可以要花生呀。’所以我就說：‘那麼就把花生給我們吧。’因爲我們不能沒有一點油脂啊。”²

在一九四八年當中，傾銷到德國的剩餘產品包括有：二億三千六百九十一萬四千零八十六磅的花生仁，四億四千三百一十萬零九千零七十八磅的晒乾的與烘乾的梅子、葡萄乾、無花果、桃與杏，再加上一千零八十萬零一千四百二十四磅的蜂蜜去調製這些果品。但是，即使這個數字仍不足以滿足在一九四九年年初就到華盛頓提出要求的那些果園園主們，他們威脅政府說，如果馬歇爾計劃當局不增加乾果品的輸出，他們就要把他們的果樹砍伐掉百分之二十八。

輸出到德國英美佔領區去的乾果品數量相當於美國每人平均消費量的兩倍半。輸出到奧地利的花生足以使得每一個維也

納市民每天能有一袋價值五分美金的花生³。

美國政府的宣傳把指斥這種活動為傾銷的輿論硬說成是“共產黨的宣傳”，並且反而不顧事實地把這些活動說成是一種“慷慨的援助”，而且是美國的“重大犧牲”。

事實上呢，所有這種傾銷不僅沒有幫助，而是損害了馬歇爾計劃國家的人民。這種傾銷，再加上其他的行動，使得歐洲當地的生產降低，並且使得可以從其他國家輸入的供應量受到削減。因而，這便使得西歐依賴美國的壟斷資本以取得總數量業已較前為少的輸入貨品。同時，歐洲的人民大眾是買不起美國貨的。這是由於華盛頓和歐洲壟斷資本聯合安排下來的政策，已經使工人的購買力低到買不起價錢高昂的馬歇爾計劃貨品。

這裏就是一個實例：由美國裝向意大利的糧食輸出特別集中於一九四八年四月意大利大選前的一段時間。船到時由美國大使與意大利官員在港口點收，並且大肆宣傳，說這是供應饑餓的意大利人民的。

一九五〇年一月紐約“商務日報”的一條電訊却揭露了這批糧食的命運。在這個方案實施的頭一年又三箇月中，意大利所接受的馬歇爾計劃物資有百分之四十到本期末尾尚未售出，某些物品，包括穀物與藥品，其不能出售的百分比就更大。“商務日報”曾這樣評論過：

“意大利人民之沒有能力去購買由經濟合作署所得到的大部分貨物這件事情，已經給意大利政府造成了一個推銷問題。”

這篇文章指出：這種困難大部分歸咎於馬歇爾計劃安排下來的經濟政策，因為它禁止減低馬歇爾計劃項下物品的價格，堅持要不惜犧牲人民的利益去實行“通貨緊縮”。這篇文章下了這樣一個結論，似乎故意諷刺地說：

“據說，從經濟合作署的心理學觀點來看，使得直接參加歐洲復興計劃的個人愈多，那麼，就愈能使意大利的普通人民知道美國援助計劃的重要性，而現在一般意大利人民所接觸到的‘美國人的慷慨’，主要還只是靠報紙、招貼和電影新聞片而已。”⁴

美國壟斷資本從這些傾銷中獲得特殊的厚利。通常在傾銷中所慣見的是減價求售，而這次是抬高了價格出售。更為重要的是：國外傾銷的規模如此之大，使得壟斷資本能夠在美國國內維持一個人為的“缺貨”現象，以便它們可以將價格提高到戰時最高峰之上並繼續維持數年，然後使得這些價格經常保持在接近於戰時的最高峰，一直到日益增加中的軍費支出再次造成新的通貨膨脹高潮。

美國的唯一犧牲者乃是美國人民。美國人民必須繳納賦稅去支持這個將歐洲殖民地化的企圖，又要支付因此而來的高漲的物價。

削減工資

將歐洲殖民地化的一個重要步驟乃是將歐洲工人的實際工資大大削減，並加強其勞動強度，把剝削率提高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區域的水平。這樣美國的投資者就能獲得他們在一般國外企業中所能得到的超額利潤。

華盛頓一再要求多多“節約”，減少一些像社會保險、修建房屋之類的“奢華”，這已說明其要降低生活水平的本意。這位馬歇爾計劃執行人霍夫曼在美國國會屬下的一個委員會內作證時曾經很坦白地說明了這個目標：

“如果我們企圖以美元供給歐洲，而歐洲却企圖要達到一種在我們看來是錯誤的生活水平，那末，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所

以，我們會試圖規定生活水平的最高限度。”

他的助手里察·比塞爾對“最高限度”，加以如下的定義：食物——“我們可以以一九三八年的水平作為最高限度，就是如此”；房屋——“比之戰前水平要低得多，換句話說，就是大部分的人須住在更小和……更舊的房屋中”；衣服與消費品——“對於這種商品的消費在大部分情況下應該削減到低於戰前的水平，雖然在戰時一直累積下來的匱乏程度是相當嚴重的。”⁵ 歐洲的工人階級，曾經飽受了十年經濟危機和五年戰爭的痛苦，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一定還要遭受到更深的苦難。

壓低生活水平的方法包括：規定工資的最高限度（必要時以槍桿來強制實施）、物價的高漲、對歐洲工人階級徵收重稅、削減建造房屋和社會事業的經費、大量的軍費以及在美國政府專斷下的屢次的貨幣貶值。美國的工廠佈滿了來自馬歇爾計劃國家、由資本家和右翼的工會官僚組成的“提高生產效率考察小組”，來學習最新式的施用於美國工人身上的所謂“趕快制度”的方法。

這些方法給英法等國的當地資產階級帶來了更高的利潤。但是如果單靠他們本身的階級力量，這些當地資本家們是永遠不敢使用這些方法的。美國資本禁止他們向工人妥協，強迫歐洲資本家對勞工進行打擊，如果沒有華爾街的支持和敦促，這是他們所不敢輕易嘗試的。

讓我們分析一下英國、這個美帝國主義的“小夥伴”的結局，英國在今天還從其殖民帝國範圍中榨取不少的贓品。執行“馬歇爾計劃”的官員曾經考證過一九四九年初，即在英鎊貶值之前和在一九五〇年受華盛頓命令進行軍事動員之前，英國勞動人民的情況。馬歇爾計劃的農業專家菲茲格羅維特博士，曾經這樣描

述過英國的糧食情況：

“雖然這也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正如所有西歐國家的情況一樣，考查一下個別食物項目的變化就可以反映出飲食質量上的變化。與戰前比較，英國每人平均馬鈴薯的消費量增高了百分之六十五、麵包的消費量約增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而肉類、糖和油脂，特別是肉類，則每人的平均消費量降低很多。以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度整個情況來說，肉類的消費量僅及戰前的每人平均消費量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自四月初以來，則每人平均消費量比起戰爭開始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低些。”⁶

據里察·比塞爾說，房屋情況也惡化了。戰後增加了二百萬人口，但房屋較之戰前並沒有增加，而房屋建造計劃也被減削到低於戰前的水平，這是由於美國壓迫英國，把預算集中使用到“生產”也即軍事項目下去了。

如果英國的工人階級在馬歇爾計劃下所遭受的節衣縮食的痛苦比之他們在戰時所受的還要更深的話，那麼在比英國更弱的歐洲大陸國家內，其情況就更壞了。

在西德，根據一個曾被大加竄改過的生活指數來看，一九四九年六月的實際工資較之一九三八年的水平要低百分之十三點五⁷；而一九三八年的水平實際上由於希特勒的凍結工資早已低於一九三二年經濟危機時期的最低數字了。

下面的話是對於法國生活特點的描述，摘自前面引過的詹斯登的文章：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利潤很少低於百分之五十，且常常高過百分之百，但是大多數人民却幾乎一貧如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其結果可能是暴動——混亂——共產主義。”⁸

馬歇爾計劃執行當局的一個官方報告書承認：在一九四

八年秋天巴黎區域的實際工資較之戰前水平要低百分之五十，在各省，其情況比巴黎還不如。食物的平均消費量下降了百分之十八，而對於工人們來說，則下降得更多。房屋情況低於戰前水平，而且在繼續惡化中⁹。在描述了法國工人們的貧困情況之後，這個報告書下了這樣一個結論：“這就造成了工人們的不滿，同時，這很能說明為什麼共產黨在政治上和在全國工聯兩方面繼續保有力量。”

這個報告書的作者簡直為這些事實所支配而竟忘記了他們的宣傳路綫——共產黨的力量是建築在莫斯科的黃金和蘇聯的“心理侵略”的基礎之上的！

保守的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曾將意大利統治階層的奢侈生活與工人農民的收入作過對比，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每週四美元五，而僱農一年所得，是一百美元或比這更少¹⁰。

把美國與歐洲的工資率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白這種貧窮與美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有多大關係。在一九三八年，英國、德國與荷蘭的工資約等於美國工資的一半。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後期，英國的工資，以美元計算，則僅及美國工資的四分之一；德國的僅及五分之一，而荷蘭的則僅及六分之一^①。

自從一九三八年以來，美國資本家付給歐洲勞動力的相對代價，已經被削減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歐洲的具有經驗和有高度技術的工人的工資已經被減削到接近於、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低於傳統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工人的工資。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莫萊先生提出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要求援外計劃所應遵循的十大原則。這些原則包括援助一切需要

① 上述數字引自美國勞工統計局、聯合國及美國駐德軍政府的幾個不同的出版物。

援助的國家、不附帶政治或經濟上的條件、在歐洲創造一個健康的和獨立的經濟、保護美國人民、不使物價因外援而高漲、勞工應充分參與這個計劃的執行工作等等。

所有這些原則全部都遭受破壞。但是莫萊先生和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其他領袖們並不因此而有所躊躇。他們不但支持馬歇爾計劃，而且以最大熱情，去完成在執行外援計劃中所分配給他們的一項任務——就是把這計劃推銷給美國與歐洲工人階級的任務。

這些大人先生們還通過了宣傳、分裂工會和“技術顧問”等方法，協助馬歇爾計劃的策劃人削減工人工資百分之五十，規定歐洲工人階級最高生活水平，催促歐洲工人加速工作。這些恬不知恥的人物，他們竟自甘與歐美兩洲勞工的不共戴天之仇敵為伍，那末他們在本國（美國——譯者）的行動越來越明白地顯露出他們與僱主間也締結了相同的同盟——反對增加工資、反對減緩趕快制度、反對和平運動、反對美國工人階級取得任何獨立的政治地位，這一切又有什麼奇怪呢？

美國勞工部長莫里斯·托賓在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年會上說過，他們的杜賓斯基和他的右翼工會的同僚們，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作用是“抵得上一百師軍隊或國務院全部穿大禮服的外交官的”。他說得真是一點不錯¹¹。

壓制其他國家的國民經濟

華盛頓的發言人宣稱，他們的用意是協助歐洲提高生產。實際上美國金融資本却竭力去削弱和摧毀歐洲的整個民族工業與農業（在這方面已獲得部分功效），以便為獨霸市場、為集中歐洲勞動人民替美國企業從事生產開闢道路。

傾銷農產品和停運農業裝備兼施並用，以阻止歐洲農業從戰爭的破壞中恢復過來。馬歇爾計劃國家要求在計劃的第一年度中從美國取得價值三億七千萬美元的農業裝備¹²，美國國務院只提供一億三千三百萬美元資金。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實際裝運的總值只有四千萬美元。在同一期間，馬歇爾計劃名下所運出的煙草却總值一億一千一百萬美元¹³，即約三倍於前一數目，而煙草的運出主要是侵佔了希臘與土耳其煙草的正常市場^①。

由於傾銷美國剩餘農產品、拒絕真正協助歐洲的農業機械化以及阻止土地改革這些政策的配合運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耕種年度中馬歇爾計劃國家內每人平均農產品總產量約比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間的平均數字降低了百分之十五¹⁴。歐洲人民因此只能得到更少的糧食，更須依賴進口糧食，因此造成了國際金融收支上更為惡化的不平衡，加深了對美國的依賴。

歐洲的工業遭受到同樣的境遇。壓制歐洲民族石油工業與煤礦工業的發展和強迫歐洲依賴美國的石油公司，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第二章我們曾敘述過美國的企業公司對石油生產，特別是在中東方面，大加擴張。為了從這個擴張中掠取利潤，美國的企業公司必須犧牲歐洲的，主要是英—荷聯合企業的利益，奪取歐洲的煉油廠和市場的控制權。需要以杜魯門主義去鞏固其中

① 希臘前任首相亞力士·第奧米地寫道：“直到最近還是成爲主要出口貨的煙草，使希臘大約九十萬人依此爲生。戰前的出口數字每年爲四萬八千噸——二萬噸輸出到德國——共值九千三百萬美元左右。可是現在美國的弗吉尼亞煙葉已在德國取東方煙葉之位而代之，希臘的出口降落到每年二萬八千噸。”（見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倫敦“經濟學家”周刊讀者來信欄）

東地位的美孚石油公司的惠爾滋先生及其同僚，更需要馬歇爾計劃，以便進一步加強他們在歐洲的地位。在一九四八年夏，美國的石油聯合企業面臨着一個生產過剩的嚴重危機。馬歇爾計劃就在十八個月之內給了他們十億美元左右的買賣，扭轉了這個危機。

這些石油，大部分來自成本低廉的中東油井，却以美國得克薩斯州石油的價格在歐洲出售，保證了這些石油聯合企業在銷售中獲得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超額利潤。利用馬歇爾計劃所保證的市場，美國的石油公司把它們在歐洲的煉油設備與銷售機構擴大了四倍以上。它們預計到一九五三年就可以經營一千九百七十萬噸，超過歐洲各國全部的煉油廠在一九四八年全年的出產量。

同時，美國的石油公司和美國政府却設法阻止其歐洲敵手所訂下的遠為渺小的擴張計劃。華盛頓拒絕售予歐洲廠家美國所獨有的專門設備，另一方面却要求美國的公司有權不受限制地取得那些在歐洲製造的設備。他們公開地和暗中地警告歐洲人士不得“過分擴張”。這些壓力迫使英荷殼牌石油公司，這個歐洲最強大的石油聯合企業，將其新設的英國煉油廠的計劃中的生產力減削了三分之一。

歐洲大陸各國很快地就屈服於美國石油公司的完全支配之下。較強的英帝國主義者起而反抗，並在一九五〇年年初企圖限制美商石油入口。美國的參議員，在來自產油之州的參議員湯姆·康納利的率領之下，對於這種“歧視”大加攻擊。美國政府隨即採取了經濟報復手段。在幾個月之內，英國就屈服於美國公司所提出的條件。他們不但容許美國公司打進聯合王國的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市場，而且還對他們開放英鎊區域中過去不開放的

市場。

美國石油的泛濫還蹂躪了歐洲的煤礦工業。歐洲雖然缺少石油，却有大量的煤。爲了恢復獨立，合理地使用其資源，歐洲各國應該節制其日益增加的石油用量，而特別致力於充分利用其煤礦資源。但相反地，歐洲的馬歇爾化却以空前的快步，加緊以石油代替煤。馬歇爾計劃國家在一九四九年所產的煤比之一九三七年要減少百分之十二¹⁵，如以每人平均分佔量計算則約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且生產過剩的象徵已經出現。英國的煤礦工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私營之下已是一個“病態”工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工黨政府接收，在馬歇爾計劃下，更見衰落。

以石油爲燃料的工業就無法採用那些失業礦工可以生產的煤炭；同時，如果它們不更深地依賴美國金融資本，並且對它作更多的讓步，就無力攫取需以美元換取的石油。

此外，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足以說明爲了美國進口貨與投資的擴張，他們對歐洲本國工業作種種壓制。例如，意大利的航空業受到一家美國公司的控制，法國被迫使用美英兩國的軍用與民航飛機，這兩件事情在實際上已經摧毀了法意兩國的航空工業。又如規定馬歇爾計劃物資的百分之五十必須由美國輪船裝運，歐洲的造船工業就蒙受損害。全世界都知道意大利需要更多的工業，才能使得它的千百萬長年失業工人有工作。但由於馬歇爾計劃的政策，意大利政府被迫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宣佈關閉了一個大的汽車廠、一個飛機工廠和一個造船廠，這些工廠會僱用着二萬五千個工人。意大利政府還警告說隨後將有更多的工廠要關閉¹⁶。

馬歇爾計劃所帶來的“復興”，可以由下述事實加以說明：一

九五〇年初的每人平均工業生產量僅較一九三八年經濟蕭條時的水平高出百分之十，雖然軍需工業的過度刺激在一九五〇年早已發生影響。商品生產總量，包括農業、建築與製造業，差不多相當於戰前經濟蕭條時期的水平。經濟停滯與經濟危機的徵象日見增多。差不多在所有的馬歇爾計劃國家中失業人數均不斷上昇。

對美元的依賴

華盛頓的宣傳聲稱：美“援”的目的是要協助歐洲平衡其國際貿易，穩定其金融。而實際的目的却是進一步使歐洲的國際貿易失去均衡，削弱歐洲的金融，強迫歐洲接受美元為唯一有效的通貨，接受華爾街銀行為歐洲金融老闆，因而也就變成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老闆。

歐洲國家金融的被削弱，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英、法、荷等國為了換取軍火，被迫放棄他們部分的黃金和大部分的國外資產。在同一期間，德、日、意金融資本的國外資產，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被美國政府及其附庸國所奪取，其中大部分是永遠也不會退還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的時候，美國軍隊踏進歐洲，削弱歐洲金融的辦法就更推進一步。美國軍官及一部分士兵把軍用物品賣給那些亟需各種供應品的歐洲人民。這些商品以貶值的歐洲通貨為媒介，以極高的價格出售。而美國政府為了酬勞這批作黑市交易的人，將他們售貨所得，按照官價外匯比率折成美元。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奴顏婢膝的政府，被迫承認這項數以億計的美元是對美國的一種債務。其後，美國政府又用撥款償“債”，和取消部分“債務”的辦法，換取重要的政治與經濟特權。

在戰後的一兩年間，歐洲帝國主義者因為要在十分高昂價格下向美國購貨，自己又缺乏足以償付貨價的工業生產，就不得不把他們所餘無幾的儲備金都耗費殆盡^①。

美國對各國的貸款和馬歇爾計劃，其目的都是為了防止歐洲國家自己採取任何有效的補救辦法。為了平衡國際貿易，歐洲國家應該少向美國購貨，而多向有意向西歐購貨同時向西歐銷貨的其他國家購買貨物。但是作為接受美國信用貸款的條件，歐洲國家必須參與由美國壟斷資本所發起的關稅與貿易談判。談判的結果，使得美國資本家得到了三倍於他所給予別人的特權¹⁷，因為他們藉此侵入了歐洲市場以及過去為歐洲資本家所支配的其他國家的市場。美國資本家所給予別人的有限的特權也還是有名無實的，因為美國海關規則和“美國人要買美國貨”的特殊立法，繼續把大部分歐洲製造品排除在美國之外^②。華盛頓雖然口口聲聲敦促馬歇爾計劃國家向美國銷售更多的商品，但這主要是一種笨拙的宣傳手法，用以催促歐洲工人加緊生產，同時在“減低成本”的名目下減削他們的工資。

更重要的是，美帝國主義阻止了資本主義歐洲與社會主義歐洲間貿易關係的適當發展。由於歐洲帝國主義者已經失去了他們大部分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市場——或為美帝國主義所

① 這些商品都是用在不正當的用途上，不是供資本家的奢侈揮霍，就是用於鎮壓殖民地。但這對於我們所說這個中心論點並無影響。

② 一家英國公司，曾投標為美國西雅圖市承裝一個電力廠的設備，其標價遠低於任何一家美國公司。但西雅圖市市長却批駁了英國投標，而接受了標價第四位的“通用電氣公司”。為了使得這種決定在將來能有一個合法的根據，西雅圖市議會隨後即通過了一個法令，禁止今後採購任何外國製造貨品，除非該等貨品比之同等美國貨品低廉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見“商務周刊”，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

奪，或因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而喪失，他們就企圖將貿易對象轉向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日漸增大的市場。在這些國家中，很多個國家不僅向來是西歐的物資供應者，而且因為他們的計劃建設需要大量設備與原料，現在已經成爲一個廣大的市場。當然，這種貿易再不是過去那種舊的交易性質。帝國主義者與東歐及東南歐國家的交易再不能藉不平等條件來獲得超額利潤。可是，與社會主義國家在平等條件下進行貿易，對於西歐的資本家們來說，實在遠勝於與美國在迫使歐洲淪爲殖民地處境的條件下去進行貿易。

作爲馬歇爾計劃的一個條件，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被迫要接受華盛頓所強迫它們接受的對社會主義世界的大部分禁運條例。這些條例禁止它們出售包括從藥品到打字機的所有各種東西，莫須有的理由是：這些物品都是“軍用物資”。但是生意究竟還是生意，就有許多歐洲資本家終於還是想法規避了華盛頓的禁運。然而禁運仍足以有效地阻撓了東西歐之間的貿易，使之不及戰前貿易量的一半，這樣就實現了它進一步損害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目標。

聯合國“一九四八年歐洲經濟概覽”報告書曾尖銳地抨擊美國對東西貿易的干涉。這個報告警告說：“如果政治分歧不能讓位於更有積極性的合作行動，則其在經濟上的後果，將不可避免地要促使歐洲進一步分裂，使得那些互利的貿易關係不能發展，這些貿易關係是可以幫助各國經濟去克服它們目前的弱點，消除它們對外援不正常的依賴的。”¹⁸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執行秘書根納·米達爾先生是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他顯然不明白這些限制的主要目的正是要保持和增加歐洲國家“對外援不正常的依賴的”。

試以消息靈通的紐約時報駐日內瓦記者霍夫曼的一篇文章爲例來看，這篇文章這樣寫着：

意大利拖拉機在官府積壓下生鏽

論禁止對東歐輸出戰略物資及爭奪西方市場的鬥爭

“正當美國資助西歐，在本年內輸入二萬五千架以上的拖拉機的同時，一千架全新的完整無缺的拖拉機却在意大利工廠外生了鏽。……

“在禁止對東歐輸出‘戰略物資’的政策之下，美國政府一直在阻擋意大利向東歐發展拖拉機市場，東歐對拖拉機的需要量是龐大的。在歐洲慣用的雙邊貿易制度之下，東歐乃是意大利的正常出路，因爲意大利可以使用東歐國家用以交換物資的煤與木材。……

“法國的計劃專家對於法國一旦有幾千架拖拉機則將如何使用這件事，說得有聲有色。但是實際上，法國本年度從歐洲經濟合作署將獲得約值一千一百萬美元的拖拉機。……

“在今日之歐洲，單憑買主願意買進製造商願意賣出的拖拉機是不夠的。……

“美國的拖拉機出口商，在歐洲經濟合作署代表團的支持下，正成功地說服了法國及其他西方各國政府，不要拋開美國產品去購買意大利產品。在歐洲產業界中，這種指責很普遍，雖然很少見事實的證明。”¹⁹

由此看來，所謂“保護歐洲使不受共產主義的侵入”這句話，說穿了不過是一種爭奪市場的方法，用這個方法來對付反共的法意資本家和對付人民民主國家及蘇聯，都同樣的迫切，所不同者，對付法意資本家做得更有效果罷了。

華爾街用吸取歐洲的黃金儲備和擾亂歐洲的國際貿易等手段，已經成功地削弱了歐洲的各種通貨。只要予以更沉重的打擊，就能破壞這些貨幣的信用，強迫它們一再貶值，讓美元成爲在資本主義世界唯一通行的貨幣。

一九四七年年底美國國務院出版的一個公開報告書可以用來說明這些策略：

“現在，據說法國政府正在考慮採取補救辦法，不是採用直截了當的貶值形式，就是制定一種不固定的匯率以待法郎趨向穩定。……法國政府毫無疑問地認識到，法郎目前的匯兌率是定得太高了。”²⁰

這樣，那些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恐慌中富有排擠國內小銀行的經驗的美國財閥們，就成功地製造出一個不利於法國的“銀行擠兌風潮”。外國買主取消了訂購法國貨品的訂單。法國的輸出量，在一九四八年頭兩個月中，就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因而法國政府被迫繼一九四五年貶值百分之五十八之後，再度貶低法郎價值。

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對英鎊開始發動了猛烈的進攻。那時候，“商務日報”報道說：

“美國正利用美國經濟衰落的威脅作爲一個巨大的武器，去再度壓迫別的國家實行貨幣貶值。……它利用經濟合作署作爲它的代理人，通過這個機構首先向西歐國家發動一個正面攻擊。”²¹

美國大通銀行（洛克菲勒系）的阿德里治，旅行到倫敦向英國的工黨政府提出條件。美國人不僅削減了向英購貨量的一半，並且已經交貨的商品，也停止付款。在六個月時間內，英國損失了價值六億元的黃金，等於它的黃金儲備的三分之一²²。到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英國將英鎊的價值從美元四元零三分貶至美元二元八角。英鎊集團的其他通貨也按比例貶值。隨後不久，大部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也跟着實行了貶值。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兩年間，爲了償付同樣數量的進口貨，英國要輸出較戰前多六分之一的商品²³。可是到了一九五〇年二月英鎊貶值之後，爲了償付同樣數量的進口貨，英國却要輸出較戰前多四分之一的商品²⁴。

這樣一來，英國雖然一面還保持着對英鎊區域的片面貿易條件——賤買貴賣，但另一面當它與美國和其他受美元控制的國家交易時，它自己却日益遭到殖民地式的差價待遇。

這些貨幣貶值，使得歐洲工資折成美元時變得低廉了，使得目前爲歐洲人所有的工廠，以美元折算，也變得低廉了，這就使美國人更容易把它們購買過來，同時又進一步破壞了歐洲貨幣的信用。

馬歇爾計劃下的每年數十億的“贈與”，據說是用以填補資本主義歐洲的財政虧空。實際上它們把歐洲的外匯管制變成一個篩子，篩出來的美元是馬歇爾計劃所灌入的美元的兩倍。

正如前兩所指出，歐洲的資本家每年最少取出十億美元，存放在西半球的“安全地方”中。美國的資本家可以提出利潤不受任何有效的阻抑。投資收益和其他“服務”項下收入淨額，每年流入美國及其他美元國家的數字超過五億美元^①。另外每年有十億美元用作殖民地投資和歐洲各石油托辣斯中的國際投資。此

① 資料來自國際貨幣基金會所編的“一九四八年國際收支年鑑”。這個報告書指出有九個國家在一九四八年共有五億五千萬美元的淨轉移額流入美元區域，包括加拿大及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在內。關於其他八個馬歇爾計劃國家，該書未提供資料。

外每年又有五十億元是用於鎮壓殖民地人民的戰爭，以及用於償付歐洲為美國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作的貢獻。

摧毀了歐洲的對外貿易、貨幣和外匯管制究竟產生了一些什麼長遠的影響呢？雖則有各種“緊縮節約”，各種實際工資的削減，各種為恢復財政上獨立而作的表面上很緊張的努力，但是一個聯合國的報告書却告訴我們：“因此，歐洲在一九四九年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須依賴美元的資助來彌補其對外的赤字。”²⁵

一九五〇年中，英國經過了幾個月的抗拒之後，仍然不得不跟隨其他馬歇爾計劃國家，參加了以美元為資本主義歐洲主要清算貨幣的“歐洲支付同盟”。西歐財政的殖民地化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階段。

把歐洲工業轉移給華爾街

所有各種使歐洲殖民地化的辦法，都便利於美國企業公司收購歐洲的工業。但這還不是全部事實。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勾結是如此緊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如此高度，以致大多數特種投資都得到美國政府的有力援助。

有一些交易是作為與個別國家的財政談判的一部分來提出的。如在一九四七年，意大利政府曾要求豁免十億美元的佔領費和黑市活動的罰金。經過幾個月的談判，這筆無法償還的“債務”被勾銷了，但却不是毫無補償的。然而，這筆補償的款項却並不是補償給在意大利作戰陣亡的美國軍人家屬，而是給予那些控制美國及美國政府的華爾街集團。政治特權與經濟特權總是接踵而至，這已經成為規律。當意大利談判代表抵達華盛頓那一天，共產黨的內閣閣員就被非法地撤職了。

意大利政府同意發行新的公債，按照其票面價值百分之一

百五十來替換那些已經毫無價值的墨索里尼公債，這些墨索里尼公債是在二十年前由摩根公司、狄隆·李特公司和花旗銀行發行的。這筆交易的現值，據估計就達一億三千六百萬美元。

此外，在這項“債務”被豁免之前，意大利政府還須進行幾個個別的協議，來滿足各英美石油公司的要求。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紐約美孚油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被允許去接收原屬意大利的煉油及配油設備，同時還取得對意大利原油及天然煤氣的開採權²⁶①。

最後，意大利政府還要同意簽訂一個“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即第五章所討論過的那種類型的條約。這條約使華爾街能不受限制地侵入意大利的經濟。雖然這個條約是在兩年後才實際簽訂，但其財政協定所製造的“氣氛”就鼓勵了那些美國公司去進行購買意大利經濟的主要部分。泛美航空公司和奧第斯電梯製造公司完成了此種交易。南方鐵路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也完成了一些較小的交易。關於各主要工業的控制權的談判，則是由通用汽車公司和一幫美國保險公司來達成的²⁷。

幾個月後，“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個記者曾經就意大利石油情況這樣報道過：“這裏，在意大利國民生產事業最重要的一個部門中，我們首次看到美國在財政上佔有壓倒優勢。”（摩里斯·費爾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馬歇爾計劃提出了三億美元的基金，作為在馬歇爾計劃國家中的美國新投資的擔保。美國的大公司按這個擔保的條款，在

① 意大利代表團首席代表右翼社會民主黨伊凡·麥地奧·倫巴多，在該協議書的附件上宣稱：“意大利石油總公司（意大利的石油壟斷企業）與各外國石油公司之間，對市場的分額已經達成協議。這個協議使得意大利石油總公司方面受到相當大的犧牲。”（見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國國務院文告”）

六年之內就有權提回它們的全部資金加上百分之七十五的利潤^①。直到一九五〇年年中，在這個規定之下進行的投資數量不見得多，可是却替好幾個重要的美國聯合企業打開了路子²⁸，包括在意大利，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威斯汀豪斯氣閘公司；在法國，勝家縫紉機公司、邁厄製粉公司和赫頓化學公司；在英國，明尼波立·霍尼威爾調節器公司、標準商標公司、愛迪生公司和雅各製造公司（大機器製造廠）。

第一個真正巨額的担保為數一千二百萬美元，担保的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對兩個意大利煉油廠的投資，它根據上述的意美兩國財政協定取得了一半的股權。美孚石油公司很謙虛地宣佈，它無意於去充分利用這個担保所給它的方便，它只希望把頭十二年經營所得的紅利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七千五百美元滙回美國²⁹。

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馬歇爾計劃機構就着手與馬歇爾計劃國家的政府一同佈置特種工業計劃。根據它們的安排，這些工業計劃不是由美國公司直接經營，就是以美國設備、工程、專利發明為基礎，使美國公司能有效地加以控制。

美國政府不但協助這些工程計劃的談判，而且還貸予大部分的資本。到一九五〇年七月初，若干美國壟斷企業就依據這些條款，在歐洲進行了重要的投資³⁰，包括在英國投資的福特汽車公司；在法國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紐約美孚油公司和國際收割機公司；在意大利的愛迪生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和艾里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佔有百分之四十的產權）。

① 這些擔保“僅僅”保證各種利潤一定可以兌成美元，保證公司方面不致因對方國家沒收而遭受損失。這些保證並不包括“一般的商業風險”。但是，上面所保證的風險却正是資本輸出者所關心的風險。

在華盛頓的這種或他種方式的協助之下，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兩年間馬歇爾計劃國家中美國私人新投資共達一億美元左右³¹。此外，還將所得的一億五千萬美元或比這更多的利潤再投資下去³²。這些投資，加上從前在歐洲工業的投資，尚不足以使美國金融資本直接控制歐洲工業中的有決定性的部門。但是它却代表一種重要的滲入，並且一旦歐洲跟隨美帝國主義者的戰爭計劃而動員起來，這就為取得直接控制權作了準備工作。

歐洲的經濟“統一”

一九五〇年四月，經濟合作署署長霍夫曼寫道：“在西歐的現存經濟結構中，生產已經恢復到最大可能的限度。”³³

這的確是一個真實而根本的供認！通過使西歐在愈來愈惡化的資本主義總危機中維持着一個附庸的、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制度，美國的干涉就為歐洲工業佈置下絕對的和平時期的障礙，並且確實造成了經濟的停滯與衰落。

馬歇爾計劃的這種失敗不但給美帝國主義製造了嚴重的政治危機，並且阻礙了使歐洲全部殖民地化的計劃。華爾街資本的投資門路可能是打開了，但是如果生產出來的貨物却因為缺乏歐洲市場而不能銷售，那麼這種投資也沒有多大意思。同時，在發展中的歐洲經濟危機已經造成美國商品輸出市場的激劇收縮，加深了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的嚴重性。

美國金融資本必須努力尋求一個解決辦法。但是這種解決辦法不可能使歐洲得到真正的復興，也不可能用提高歐洲人民生活水平去恢復歐洲市場。它必然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解決辦法，其結果將加強對歐洲的殖民地化，同時並進一步加深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美帝國主義的答案是將西歐經濟合成一個單一的、由壟斷資本控制的兵工廠，服務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計劃。利用馬歇爾計劃來壓制西歐的為和平服務的工業，而刺激戰爭和為戰爭服務的工業。對西歐一般企業的投資，採取審慎遲疑的態度，但却在適當時機進行大量投資以奪取對可獲暴利的歐洲兵工廠的控制權。

將這些投資滙合起來由華盛頓與紐約在後面加以操縱，這就是近年來經常聽到的關於“統一”歐洲的種種議論的經濟方面的主要現象^①。

在華爾街的支配下改組歐洲的重工業，在華爾街的支配下將西德的軍事生產加以恢復與擴充，這一切都已經有了準備。

德國以外，各種計劃主要是通過馬歇爾計劃來實行的。到了一九五〇年三月底，經濟合作署已經同意貸出一億八千八百一十萬美元³⁴以便將馬歇爾計劃國家的煉鋼廠加以現代化和重新裝置。在電力廠和其他主要工業方面，還投下數目較小的資金。這些貸款使美國政府在歐洲的主要重工業聯合企業的工廠中佔有一種有勢力的、甚至有時是有控制權力的資本所有權³⁵。例如：

	美國的投資 (單位：千美元)	佔新投資總 額的百分率
亞爾柏因·孟丹公司(奧地利)	9,025	49
馬里海因公司(比利時)	7,650	45.5
蘇萊克公司(法國)	49,360	37.1

① 但這並不是唯一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剷除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界限，以便使美國工廠利用它們的大規模生產方法，能夠佔有一個足以吸納其產品的西歐的整體市場。為了達成這一點而單獨進行的一切企圖都失敗了。只有將歐洲完全殖民地化之後，才能達到這一目的。歐洲殖民地化是歐洲完全轉變為五角大樓戰爭計劃的軍火與人力的來源地的一個副產品。

依爾華公司(意大利)	24,058	21.7
荷蘭皇家石油公司(荷蘭)	23,500	50
威爾斯鋼鐵公司(英國)	27,000	11.2

這些煉鋼工業的工廠是屬於第五章所描述過的拉丁美洲類型的。美國的聯合企業供應各種設備，管理工程技術，而對於各種煉製方法則保持其專利權等等。歐洲的煉鋼中心不但一般地要依靠美國的金融資本，而且要依靠控制着它們的設備與煉製方法的某幾個美國工程公司^①。

在魯爾區的重工業中美國勢力更為強大。在一切重要的企業公司中，像聯合鋼鐵廠、克虜伯煉鋼廠、依爾賽特公司等等，美國人擁有大批股權。華爾街經營者依曼尼爾與杜魯門總統的密友喬治·艾倫等等共同佔有着雨果·斯丁尼斯工業公司，這是一個魯爾區中較小的聯合企業。自一九五〇年六月開始，官方正式准許美國資本家將他們從現存的德國企業中累積起來的利潤一億馬克去購買更多的股權，同時，在美國控制的盟國銀行委員會的許可下，還可以向德國輸入新的資本。在兩個星期之內，由於外資吸購的影響，德國重工業的股票價格躍升了百分之十。

在直接軍事佔領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華爾街對主要企業的絕對控制。

在一九五〇年五月，舒曼計劃正式公佈而將煉鋼與採煤工業聯合經營，這就等於採取了一個有決定性的步驟，使美國操縱

① 試分析最大的蘇萊克公司。蘇萊克就是由八家在洛林的鋼鐵公司和一家在薩爾的鋼鐵公司在戰後組成的托辣斯，在這個托辣斯中聲名狼藉的溫特爾集團佔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壟斷。通過了馬歇爾計劃中的工程計劃，這個托辣斯將裝置連續式煉鋼廠，而這種機器設備主要是由聯合工程鑄造公司擁有專利權的(參閱第二章)。這樣，梅隆家族就控制了今天是全歐洲最大的一家鋼鐵托辣斯，而溫特爾集團則成爲這托辣斯中的小夥伴。

的若干西歐重工業中心連結在一起。從表面上看來，這不過是戰前歐洲鋼鐵卡特爾的重建，在這卡特爾體系中，法國的重工業再度服從於德國重工業。

但是實際上，由於美國金融資本支配着所有參加的成員，這個新的卡特爾乃是企圖要使歐洲重工業資本家之間的各種衝突，都服從於它們新主人的需要^①。

這些需要究竟是些什麼，很快就了熟了。舒曼宣佈這個卡特爾計劃的當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和他會談。緊接着，大西洋公約國家就在倫敦舉行會議，會議中同意了在美國控制之下將經濟、軍事和政治加以統一的種種政策。協議的中心要點就是決定加強資本主義歐洲的軍火生產。兩個月後，當美國軍隊在朝鮮發動了真正的戰爭後，這個決定就更加緊地被推行着。“商務周刊”曾解釋說：舒曼計劃將在“這個聯營事業中提供充分的鋼鐵生產能力來供應西歐所需的大部分新武器。”³⁶

正如北大西洋公約最高理事會的成立象徵西歐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動員，舒曼計劃就是象徵西歐在美帝國主義的指揮下，為這個預謀戰爭而作的經濟動員。

甚至在更早的時候，軍需物資的生產就在西德加緊進行着，而完全無視於波茨坦協定。到一九四九年年中，化學重工業的生產已經超過一九三六年的水平，以氯氣與燒鹼來說，竟超出百分之一百以上³⁷。製造飛機所必需的原鋁的生產也超過一九三六

① 法國總理舒曼曾這樣吹噓他的計劃：“這樣獨立起來的生產團結將使得任何法德之間的戰爭不但成爲不可想像的，而且在物質上也是不可能的。”

這簡直是荒謬的說法。誠然，舒曼的煤鋼聯營正與戰前的卡特爾異常相似。過去德帝國主義者與法帝國主義者在戰場上干戈相見之前，正是在那些卡特爾中以互相欺詐來爭奪地位的。

年的生產率^{38①}。

當所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西德的消費品生產量比起希特勒在進行其第二次世界大戰動員時限制極嚴的生產水平還要低得多。

到一九五〇年秋天，利用德國工廠作為北大西洋公約軍隊裝備的主要歐洲供應者的企圖，已經不再加以隱瞞了。

正如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紐約時報所宣佈的：“馬歇爾計劃的官員，在與波恩政府合作之下，正在將該處善後復原的努力，轉變到公開地將西德經濟配合西歐防禦需要這一計劃上去。”

將西歐轉變為美帝國主義的一個兵工廠，並不能減輕歐洲資本主義在經濟上與財政上的不可救藥的不平衡狀態。相反的，它將加深一切經濟與政治矛盾，特別是帝國主義者與歐洲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大炮代替牛油”政策的重演，首當其衝的就是歐洲的工人階級。

① 爲了補充波茨坦協定，盟國管制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曾經協議規定：基本化學品的生產量應不超出一九三六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十，而原鎢的生產是完全被禁止的。

第九章

大帝國的迷夢

將歐洲變為殖民地的企圖，並不只以歐洲大陸的疆界為其限度。美國征服歐洲各國的一切計劃都是包括這些國家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內的。美帝國主義在歐洲每進一步，都使歐洲國家對其殖民地的控制放鬆一步。反過來說，也是同樣真實的。華爾街在各殖民地每進一步，也就使得它對資本主義歐洲的控制更加便利。

正如拉丁美洲曾是美帝國主義的主要戰略後備地區一樣，非洲與亞洲也曾是歐洲列強與日本的主要戰略後備地區。在英國、法國、比利時及荷蘭的進口貨中，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依靠其國外投資、保險業務、銀行業務及對航運業的壟斷所獲得的收入來抵付的。官方對這種收入，也肯定承認。歐洲資本主義政權的寄生性的經濟結構及其社會基礎就是建築在這種掠奪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重新瓜分這些殖民地的控制權。德國暫時奪得了東歐與北非的一部分。日本暫時奪得了英、法、荷、美在亞洲的一部分最富裕的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時，後面這幾個列強（英、美、荷、法）就企圖恢復其昔日的地位，同時還企圖從他們的被擊敗的敵人手中，和從彼此的手中損人利己地奪取更多的東西。

可是，沒有一個歐洲列強能夠完全恢復其過去的帝國。唯一

的帝國主義獲利者就是美國。正如第六章所指出，華爾街利用這次戰爭奪取了某些同盟國的海外基地與投資，並且它後來更得寸進尺地犧牲了它昔日的盟國和敵國以自肥。

但這次戰爭最重要的結果並不是這種權力的轉移。更重要的却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所獲得的進展。這些進展已經使得好幾個東歐國家和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永遠擺脫了外國的剝削。這些進展又使得在若干正在進行武裝鬥爭的國家中，如緬甸與馬來亞（英），越南（法），朝鮮和菲律賓（美）等地的可劫掠的東西大為減少。

英國、法國與其他歐洲帝國主義者缺乏應付所有這些問題的力量。美帝國主義乘機而起。它利用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和其他種種方法，給予它們以重要的援助，使其能維持和恢復殖民地的統治。但作為一個交換條件，美帝國主義要求並取得了殖民地掠奪品的一大部分。

共和黨的一位保守的參議員喬治·馬隆（內華達州）曾經在參議院中譴責過這個陰謀的前一半。他說：

“主席先生：美國已經墮落到支持世界各地殖民地奴役統治的卑鄙勾當裏去了。

“我們納稅人的金錢正被經濟合作署用來達到一個罪惡的目的，也就是用來在那些被帝國主義霸主所統治和驅使的許多原始民族中加強其束縛與奴役。……我們簡直是在將自己變為遠東和非洲人民的敵人，他們一定會與任何幫助他們解除這種枷鎖的國家攜起手來。

“北大西洋公約只不過是保證了亞洲與非洲殖民地制度的完整性而已。”¹

可是，由於馬隆本人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參議員，他是不能再

深入一步下去的。其實他主要不滿之點，不過是因為：美國的企業要對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所出產原料償付高價。他的具體建議也是由此而來，他說：“在由我們防衛的區域內，我們應該要求對其市場享有同等權利。我並不是說我們要求他們放棄他們的殖民地。”²

讓我們看看，給予擁有殖民地的歐洲列強的援助，是怎樣被利用來實現馬隆的意旨的，是怎樣為華爾街在殖民地的奴役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歐洲經濟對於美元的倚賴性削弱了歐洲銀行家對其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金融上的壟斷性。到一九四九年年底，荷屬西印度羣島、希臘、挪威、以色列、伊朗和埃及都已經脫離了英鎊集團。而在不同的程度上，已經由倚賴倫敦的金融勢力，轉而倚賴紐約的金融勢力。其他一些國家正被迫作同樣的轉移。這意味着倫敦的銀行收入將要減少。更嚴重的是，這意味着很多國際支付的清算要用黃金或美元，而不用英鎊或其他歐洲國家的通貨。舉例來說，到一九五〇年，英荷石油托辣斯就要在它們的全世界業務活動上每年開支總額五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和淨額兩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費用，對英國庫存的黃金與美元來說，這是一項嚴重的消耗³。

如是，由於在殖民地世界的金融統治地位的喪失，歐洲資本主義對美元的全面倚賴也就進一步加深了。

歐洲經濟對美國供應的倚賴性，削弱了歐洲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商業方面的與投資方面的獨佔地位。這種趨向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歐洲列強為了取得租借法案的供應，必須接受“自由與平等”地獲得原料這一原則作為條件。由於美國優越的經濟力量，歐洲列強只有憑藉一些特殊屏障，才能排除美

國的競爭。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出現了打破這些屏障的特殊方法。

第八章談到的馬歇爾計劃下的各種協定也包括了殖民地的特權。歐洲帝國主義者同意將殖民地的原料免費交給美國作為軍用儲備^①。他們還同意商訂各種條款，“對於美國的公民或公司，在獲取原料的權利方面，予以適當保護……使其在開發這些物資（產於荷蘭或其殖民地）時，與荷蘭人民享有同等的待遇。”^{4②}

這樣，亞洲與非洲的舊日統治者，替他們的殖民地簽訂了本質上與菲律賓、烏拉圭等國在華盛頓壓力下所簽訂的商務條約相似的協定。在第二章裏已經提到，這種及他種特權曾促進美國與歐洲的殖民地之間貿易的收益。顯然，把殖民地原料的一部分交給美國再加上由此而來的超額利潤，就更進一步加深了歐洲經濟對於美國的依賴。

歐洲各國離開了外援就無法壓制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這個事實使華盛頓得到一個最有力的操縱槓桿。為了進行殖民地戰爭，英國、法國與荷蘭都需要美國的財政援助、軍火、最後是美

① 經濟合作署（馬歇爾計劃的執行機關）誇口說：“經濟合作署已經從馬歇爾計劃國家中購買了足供生產七百萬個汽車輪胎的橡膠……這些都變成了美國政府的儲備物資……這些橡膠，一旦使用起來，預定是要用來製造飛機、軍用卡車、吉普車及其他軍用裝備的。

“橡膠和稀有物品如西沙爾蘇、工業用金剛鑽石、鐵礬土、棕櫚油、石墨、鉛、鯨腦油和冰晶石，正以每月價值二百萬美元的比率，注入美國的儲備庫存，而美國納稅人只付一點，或完全不付代價。這些採購是由經濟合作署使用其在‘對等基金’所佔的百分之五的金額來支付的——這個對等基金就是馬歇爾計劃國家為經濟合作署的美元補助金而存放的相等數目的外匯。這個百分之五的數目是規定由美國單獨使用的。”（見經濟合作署新聞電訊第一六二七號，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 這裏只是用荷蘭作為一例，所有馬歇爾計劃協定中都有類似提法。

國的軍隊。但是，如果由美帝國主義單獨去進行這些戰爭，它也不能取得勝利。因此華盛頓的戰略並不是立即取得對所有殖民地的直接控制權。相反地，它的目的是把大部分的殖民地在名義上置於歐洲軍隊統治之下，並由其維持秩序。而同時把這些歐洲資本家降低為華爾街的小夥計，在歐洲如此，在殖民地也一樣。

最後，美國以外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將被轉變為一個整體的大帝國，成為策劃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廣大的戰略後備區，而美國金融資本正是希望通過這個戰爭來統治全世界。在這個陰謀之下，英法等國家都被降低到像過去帝俄那樣的地位；帝俄在當時起着亞洲的憲兵作用，自己本身却又是西方金融資本的半殖民地。

杜魯門主義與中東

當李奧·惠爾滋替那些煤油大王們向全世界提出他們的要求時，唯命是從的美國政府就在中東這個最重要的油區中製造出實現這些要求的條件。幾個月之後，當時的美國總統便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宣佈了他的“杜魯門主義”。他硬說不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美國政府將參與其事，以“協助自由人民依照自己的方式來安排他們的命運”。同時，他對蘇聯又照例極盡誹謗之能事。

這個“主義”剛一應用，就暴露出它的流氓手法。杜魯門要求撥款支援希臘與土耳其的政府，而這兩個政府却都是法西斯的獨裁政府。

杜魯門主義使美國的人民目瞪口呆。英國兵和希臘法西斯軍隊對希臘人民的暴行，曾經引起廣泛的憎惡。在一九四五年，當時的國務卿史退丁紐斯曾經宣佈，美國在希臘人民軍（民族解放陣線部隊）與希臘保皇法西斯—英帝國主義同盟兩者之間

保持中立。杜魯門主義發表前數星期，當美國應否干涉希臘的問題首次被公開提出討論的時候，參議院某些領袖還堅持說不接濟希臘君主，不給予任何軍事上的援助，也不協助英國的中東政策。至於新聞界方面，由於當時尚未取得充分“配合”，所以對於希臘人民軍的同情反較對保皇黨的同情為多。希臘法西斯反動分子的暴行被視為是英帝國主義的一種殖民政策，對於這種政策，美國是不屑參與的。

實際上，杜魯門主義正顯示出美帝國主義在整個中東已取得軍事上與經濟上的支配地位。

杜魯門主義提出之前，英軍對於在中東方面的英國企業投資和日益增長的美國企業投資，曾經盡了保護者的責任。但是英帝國主義是再不能繼續幹下去了。兩年中，英國在希臘耗費了三億四千八百萬美元，在巴勒斯坦耗費了三億二千八百萬美元。可是，不論是金元，不論是駐在希臘的八千英軍，不論是由英國裝備起來的法西斯軍隊，不論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美國供應品，統統無法阻止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

到二月底，英國政府通知美國政府，說它再也鎮壓不住希臘人民了。美國答應英國之請，予以援助。美帝國主義者在必要時是隨時準備着自己担任起警衛工作來的。同時在這過程中，將奪取了英國的地位以增加其本身的利潤。

從軍事觀點來看，希臘與土耳其支配着中東的廣大的石油富源，正如美國在加勒比海的軍事地位支配着中南美的石油與糧食一樣。

“紐約時報”記者蘇茲柏格曾無意中洩漏了這個詭計的秘密，他說：

“美國對希臘的興趣並不單純是情感上的。希臘控制着東部

地中海的戰略地位。如果希臘轉向共產主義，土耳其就在政治上受到包圍，因而就將再也不能抵抗一種早已是十分沉重的壓力。失去了土耳其，伊朗也將同歸於盡。

“美國對中東異常關懷，因為在中東有沙特阿拉伯，而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蘊藏量可能比已知的美國石油蘊藏量還要多。”⁵

爲了強調這個密切的關係，杜魯門在幾個煤油大王達成侵入阿拉伯石油寶庫的協議的第二天，就宣佈了他的杜魯門主義，這幾個煤油大王包括洛克菲勒石油帝國中的煤油大王，新澤西州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

然而，希臘與土耳其並不僅僅是保護中東石油帝國的“硬殼”。它們同時又是進行征略的基地，是爭取控制蘇聯以南全部海陸地區的企圖的一部分，而這個企圖也就是侵蘇戰略計劃的一部分。

因此，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曾向參議院一個委員會供認：石油的攫奪雖然是一個重要的理由，但却並不是“唯一的理由”，他解釋說：

“我認爲這只不過是對於一個事實的承認而已，這個事實就是：由直布羅陀至印度洋的整個區域對於美國都是具有重大的利害關係的……我的意思是指軍事上的關係，其次才是指在相當程度內的經濟上的關係。”⁶

英帝國的傳統“生命線”正漸漸轉讓給了美帝國，這主要是爲了戰爭上的目的。

上述這些廣泛的動機所造成的血腥後果，就是把希臘變成了希臘人民的集中營，同時變成了美國企業公司攫取殖民地的超額利潤的另一泉源。

美國的公司實際上壟斷了希臘的市場，壟斷了範圍寬廣的、作為部分軍事活動的各種工程的合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接收了整個通訊系統；美國煙草公司霸佔了煙草這個希臘的最重要的產品的加工業務和出口業務；環球航空公司霸佔了各航線；御蘭公司佔有了對雅典與比里猶斯兩城市的自來水供應；谷柏建築公司取得了建築水力發電工程和進行採礦的特權⁷。到一九五〇年中，依巴士可公司（電業股份證券公司——屬摩根集團）又辦理手續去承建一個價值兩億美元的希臘發電設備⁸。

對於勞工的剝削率已經提高到殖民地的標準。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工資實際上是凍結了，但生活費用指數却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三百。工會被宣佈為非法，但同時在美國的工賊與過去曾經侍候過德國佔領軍的流氓們的同謀之下，却建立起法西斯的勞工組合。美國人一踏入希臘，共產黨立刻就被正式宣佈為非法組織，恐怖行動日益猖獗。

美國的代表團公開命令希臘的內閣應如何組織，公開決定其經濟政策，並建立了一個由美國人監督一切的制度，這些監督人實際上變成了希臘政府的實際構成人員。代表團的歷任團長，從葛利斯伍德到格蘭第，都以希臘的獨裁者著稱。他們審閱並批准對於希臘愛國志士的處決，包括那些因為過去反抗德國侵略而被現在的希臘政府處決的愛國志士。以范佛里特將軍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從中央到戰地，指揮着希臘的軍隊，供給全部武器，並決定其戰略與戰術。在希臘“每日新聞”報上刊載過的合眾社駐雅典記者的一篇報道說：

“所有在希臘的美國人都認為，把希臘直接轉變為殖民地——由美國來掌握希臘的行政權——是使希臘恢復元氣的最簡單的與最實際的方法。可是這樣一來，就會很明顯地違背美國

對待他國的傳統態度。因此，採取‘顧問’或‘提議’方式，往往就犧牲了效率。”⁹

但是即使美國運用一切資源與領導權，也不足以替希臘的法西斯主義者帶來迅速的勝利。在起初，人民游擊隊好像在幾個月之內就要被擊倒似的；後來又認為最遲是在一九四八年。但是游擊隊却越戰越強。在地區有限而又沒有外來武器的情況下，人民的武裝却仍能在杜魯門主義實行之後，抵抗住那些傀儡軍隊達兩年半之久。最後，直至一九四九年秋，由於外來的援助，人民武裝才在軍事上受到打擊，而停止軍事鬥爭。但他們並沒有投降，只是轉換了鬥爭的方法。

從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的三年間，美國政府又拋出七億九千七百萬美元，為征服希臘人民之用¹⁰。這還不包括通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付出的費用及上述英國在較早以前所使用的費用。

但是杜魯門主義的勝利是如此的不穩固和短暫，以致在一九五〇年二月那樣的毫不自由的選舉中，雅典城的大多數選票還是投向約翰·蘇菲諾普羅士的政黨，而這個政黨是在希臘合法活動的政治團體中最左傾的一個。

美國金融資本家們並不以希臘為滿足，他們利用巴勒斯坦猶太人民的解放鬥爭，來建立另一個攫取利潤的要塞。同樣的，在這個地方，衰弱的美帝國主義也是負擔不了為了壓制別人而必須付出的費用。但是由於種種環境關係，在這裏美國還不能像在希臘一樣地取代英國的直接的軍事控制。

猶太人民在美國，是有着特別廣大的羣衆支持的。法西斯分子在這個猶太人社會中也太弱了，不足以構成一個反革命的基礎。而蘇聯又在聯合國之內對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和猶太

人民兩者的民族解放運動都給以有力的支援。

結果是：聯合國通過了分治的決定，創立了獨立的以色列。

很多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對於美帝國主義在希臘的行爲表示悲痛，但對於在巴勒斯坦的同樣的帝國主義行爲却反而加以讚揚。但是事實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在以色列爭取自由獨立的武裝鬥爭中，美國政府禁止軍火運往以色列。可是，與此同時，在一個英國人率領下的外約旦武裝部隊和在美國石油公司控制下的沙特阿拉伯軍隊却向以色列實行進攻^①。

經濟援助又怎麼樣呢？美國的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送了數以億計的美元到以色列去協助以色列的發展。這筆錢被美籍猶太資本家控制着，在他們的操縱下，並不是用來發展以色列的經濟，也不是用來改善生活條件，而是用來鞏固華爾街和華爾街的猶太代理人在以色列的地位。

以色列人民的主要思想感情是傾向於社會主義和謀取獨立的經濟發展。但是來自美國的億萬美元却一直是用於鞏固以色列的資本主義附庸分子的勢力。爲了答謝這些美元，以色列政府犧牲了以色列人民的利益，給予美國的投資者以特惠稅收待遇和外匯特權，同時還將貨幣貶值，並實行了馬歇爾計劃型的節約辦法。

① 一九五〇年五月底，在美國有十二個人被判處罰款一萬一千美元及（或）三個月到十年的徒刑，罪名是違反美國的出口管制。根據商務部的報告，另外還有二十五件案件正待判決。這些人爲什麼被控告呢？這個報告書說：“極少數是爲了裝運物資到蘇聯。這些犯罪行爲的大多數是因爲以色列的同情者，當以色列正在進行爭取獨立的戰爭時，替它努力謀取軍火而造成的”（見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

馬吉爾在他的近著“危機中的以色列”一書中曾揭露出華爾街各種集團如何利用這種形勢，從英國資本家手中奪取對以色列經濟中主要部分的控制權，如何在以色列的銀行業、航運業、公用事業和鉀碱企業中購得了大部的股權。這樣的投資，對於以色列來說，不是走向真正經濟發展的道路，一如這類投資對拉丁美洲一樣。這些投資只能使以色列人民受到超額剝削。“美國民主行動會”方面的一位重要經濟學者羅伯特·納丹，他也是猶太人社駐巴勒斯坦的一個代表，曾提出三年之內為以色列取得二十億美元外資的目標。如果這個目標能夠達到，同時按照以色列政府批准的辦法，外人投資可以每年提回百分之十的利潤，那末它加於以色列人民的負擔就達到每個家庭一千美元的數目。

但是事情還不止此而已。以色列的邊界上經常發生邊境事件，在經濟上以色列又受到阿拉伯各國的抵制。由於以色列的統治者是一批不尊重阿拉伯鄰邦民族權利的資本主義分子，再加上其鄰近各國的統治者是一批依靠煽動反猶活動為生的封建分子，戰爭就成了經常性的威脅。猶太民族主義者領袖路易士·立普斯基，曾指責美國國務院不斷在以色列及其鄰邦之間煽動戰爭，並把這歸咎於英國的影響¹¹。其實並不是英國的影響，應當負責的却是操縱美國國務院的華爾街。巴勒斯坦的新老闆所玩弄的詭計就是：煽動中東各地人民之間的民族仇恨。

在中東的石油帝國中，以色列僅僅是一個次要的棋子。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路線就是與該地區的封建與封建前期的統治者結成同盟，來對付該地區的人民。像伊本·索歐德和阿布杜拉之類的反動君主，如果沒有沙文主義的煽動將人民的鬥爭轉移開，使之不去對付其真正的敵人的話，他們的統治地位是不能維持

下去的。每當石油公司的地位顯得不穩固而需要煽動民族衝突爲出路時，美國政府不但不去阻止，而且必定暗中慫恿對以色列發動新的攻擊。五角大樓所指使的反以色列人民的暴行，很可以像反希臘人民的暴行那樣“自然地”發生。

此外，由於它的地理位置，以色列又是反蘇戰爭的中東軍事基地的一部分。它在經濟上與外交上對美國的倚賴意味着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這個新國家一定被拖入漩渦。當備戰已經進行到相當程度，杜魯門政府就將它的對中東軍火禁運政策一變而爲對中東各國“公平地”加以武裝的政策，目的是全部利用它們。以色列政府正在唯命是從地跟隨着美國國務院的外交領導。

控制希臘和以色列，只是石油聯合企業及其政府在爭取中東控制權的整個戰役中的兩個方面。帝國主義政府是經常爲它們的公司而行動的。當勢力均衡狀態轉變到一個相當程度時，這些行動就採取一種侵略的擴張方式。

英帝國主義的削弱和美帝國主義相對的增強，不可避免地引起重新瓜分中東。英國政府必然設法延緩，如果可能的話，設法阻止這個重分的過程，而美國政府則企圖促進這一過程。

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德士古公司的羅傑士先生曾向美國內政部長伊克斯提出一個備忘錄，其中有一節說：

“有人對於英國經濟勢力在沙特阿拉伯的迅速增長表示憂慮，因爲它會影響戰後純粹美國企業的繼續經營。由美國政府直接援助沙特阿拉伯政府以代替目前的通過英國的間接援助，將能阻遏這種趨勢，同時能在相當程度內保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資源繼續受美國人的控制……美國政府對沙特阿拉伯政府的直接援助，可能採取一個方式，就是通過‘租借法案’辦法。”¹²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六日，伊克斯先生曾和總統磋商此事，在二月十八日，羅斯福總統就對“租借法案”的行政長官史退丁紐斯先生作了如下指示：

“爲了使你能夠進行佈置對沙特阿拉伯政府的租借援助事宜，茲特奉告，我認爲沙特阿拉伯的防務對於美國的防務是具有特別重要性的。”¹³

這樣，羅斯福總統就在反法西斯戰爭進行中，成爲沙特阿拉伯的奴隸主皇帝的支持者，不是爲了任何與戰爭有關的目的，而只是爲了美國石油公司能夠戰勝英國石油公司。

這是第六章裏所述事實的又一個例證，那就是說，本質上羅斯福只是帝國主義國家機關的掌理人，他不論在戰時或和平時期都是爲促進美帝國主義利益而行動的。羅斯福一切行動後面的真正動力，乃是直接鼓動這個行動的石油公司和那些擠滿在戰時政府重要職位上的這些公司的代理人。

滲入非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金融資本大部分被歐洲壟斷資本所排斥，未能參與對非洲人民的剝削。在非洲對外貿易中，對美貿易額僅佔百分之五。外人在非洲的投資中，僅百分之三爲美國人所持有。美國投資非洲大陸的二億美元中，最主要的屬於統治利比里亞的法斯通橡膠資本集團和在南非與羅得西亞銅礦公司中處於小夥伴地位的投資者。

以領導世界自居的人，是不會容許這種情況繼續存在下去的。在有利於美國公司的條件下重分世界這件事情已經把大部分可能染指的地區給了美國。如果要對世界再作進一步的重分，如果要把它推進到能夠支撐美國的不平衡的壟斷經濟，那麼非

洲就是億萬剩餘資本的最好的出路，就是各種豐富的戰略物資的最好的新的來源地。

一方面，美歐資本家相互勾結將其資金混合起來對非洲進行剝削，但是另一方面，美國資本的加入立刻與歐洲的，特別是英國的野心發生衝突。英國金融鉅子極不願意將這最後剩餘的根據地讓較他們更為強大的美國夥伴所分享。他們雖然在壓力下不斷屈服，但仍然設法用各種方法延緩及阻撓美國的滲入。因此，在一九五〇年一月，英國殖民地開發公司曾拒絕接受華爾街操縱下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撥給的一筆用於開發非洲的貸款，拒絕的理由是：這筆貸款的條件將成為“這個銀行控制或否決借款人的活動的開端。”¹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採取了嚴厲措施來打擊這種抗拒，那個時候，美國在非洲的軍事行動為建立軍事基地與商業關係製造了機會。這種基地與關係在戰後又被抓住不放。從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八年間，美國對非洲的貿易由一億五千萬美元增加到十二億美元，十二億美元這個數字約佔全非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五¹⁵。

馬歇爾計劃和第四點計劃等等都是華爾街用以撬開非洲門戶的槓桿。用馬歇爾計劃的資金支付美國探險家的費用，依照地道的殖民主義傳統，派遣他們去替那些採礦公司和遠征軍隊鋪平道路。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經濟合作署就居然能夠這樣宣稱：“通過馬歇爾計劃的協助，美國專家正在從阿特拉斯山脈到好望角勘探非洲的農業與礦藏富源。”¹⁶

這些勘探和購買美國採礦設備的貸款是與容許美國人投資這個條件分不開的。經濟合作署曾經這樣報告過：

“在法屬北非的鉛礦、法屬喀麥隆的錫礦、法屬剛果的鉛鋅

礦、新喀里多尼亞的鎳礦、西里伯斯的鎳礦以及蘇門答臘的錫礦開發和生產事業中，都展開了美國投資的機會。”¹⁷

下面這個交易是帶有典型意義的：一方面經濟合作署貸款給摩洛哥一個鉛礦公司——柴里達鉛礦公司，但另一方面美國的紐蒙特礦務公司買進了這個公司的一部分股票，並且就接手經營。

一九四九年強加於歐洲各國的貨幣貶值是一種榨取更多的殖民地特權的方法。一九四九年九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美—英—加金融會議決議：首要事務就是建立一個包括這些國家大銀行家的委員會，以促進美國在英屬殖民地的投資。

兩個月後，由法國與美國大銀行家組成的類似的委員會也成立了，其目的是爲了“刺激和促進法蘭西聯邦海外領地的開發。”¹⁸爲了強調這個委員會的重要性，法美兩國首要銀行的首要人物都被任命爲委員^①。

這些銀行家極力設法加緊對非洲人民的剝削。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必須建築公路、鐵路和海港設備，以便運出更多的原料。但這麼一來，就更增加了華爾街的股份，因爲歐洲的金融中心都缺乏足以進行這種計劃的資本，必須接受美國的援助。

在一九五〇年六月這一個月裏，經濟合作署就撥款購買了美國的築路裝備，以供比屬剛果、三個法屬非洲殖民地和五個英

① 美國方面的委員：美國大通銀行(洛克非勒系統)的董事長阿德里治、保證信託公司(滙根系統)的總經理克萊文、花旗銀行的總經理席伯特、摩根—斯坦萊公司的哈羅特·斯坦萊、庫恩—羅比公司的斯契夫、狄隆—李德公司的道格拉斯·狄隆。

在法國方面是：東方匯理銀行的總經理艾密爾·米諾斯、巴黎荷蘭銀行的蒙尼克、巴黎聯合銀行的阿達、歐洲工業聯合銀行的波羅修、西非銀行的波阿萊、拉薩爾兄弟銀行的瓦倫西、烏爾姆銀行的美尼亞爾。

屬非洲殖民地之用。但這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美國正計劃修築一個擴大的鐵路網。美國勘探家，除了進行其他活動之外，正在準備建立一條長達一千英里的鐵路，將羅得西亞、坦噶尼喀、怯尼亞和東非洲海岸連結起來。據一個英屬非洲的刊物報道，經濟合作署正計劃使用約十億美元以發展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運輸業¹⁹。美國科羅拉多州參議員約翰遜建議美國政府，在第四點計劃的名義下，投資數十億美元以開發非洲。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非洲的種種活動與計劃，連假惺惺地裝作是爲了非洲人民的利益這一點，都不屑去做。這種開發只是更加加深了殖民地式的掠奪，一方面對原料採取有效的榨取，另一方面維持當地最落後的經濟。

美國資金的大量流入，還有待於預備工作的完成，但新的重要投資却早已投下了。

美國在南非洲和羅得西亞的大部分的擴張是通過英美的持股公司來供給資金的。其中歷史最悠久之一是英美企業公司。它的經理就是爾·赫·維·史密斯，就是我們在第二章曾經談到過的那位摩根公司倫敦辦事處的人物。富有的奧本海邁家族就是英屬南非洲方面的主要利益集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這些持股公司的財產會大有增加。到了一九五〇年它控制着四十二個南非洲和羅得西亞的公司，並佔有各公司大部分的股權，而其他無數較小的產業則尚未計算在內。通過它的分支機構，它又投資到許多新的金礦公司和八個鑽石礦業公司²⁰。

一九四六年，另一個以重新瓜分非洲爲目的的資本組合又建立起來了，這就是美國英屬德蘭士瓦投資公司。這個公司的資金爲二千萬美元，美國銀行界參加的是拉登堡—達爾曼公司和

拉薩爾兄弟公司。英國方面合夥的為拉薩爾兄弟公司和亨利·施羅德公司。到一九五〇年時，這個組合已經在南非十個重要公司中取得大部分股權，此外還在很多其他的公司裏佔有較少的股權。

一九四八年成立的、在肯奈各特銅公司(摩根)控制下的肯奈各特——盎格魯瓦爾開發公司已經購置了金礦及其他礦業的產權，這些產權主要是在橘河自由邦。

美國資本集團如何取得西南非洲銅礦的控制股權一事，在第二章已經討論過。另一個英美組合美國金屬公司也同樣在非洲擴大了它的產權。

固特異、通用汽車、法斯通、福特和司蒂倍克各公司的分支機構正在南非洲擴展它們的製造與裝配業務，以供應白種統治階級的需要。

法美合資經營的金屬與礦產公司正以馬歇爾計劃的信用貸款開發法屬西非的康納克里鐵礦。在一九四七年，美國金融集團就取得了摩洛哥阿特拉斯礦務協會的控制權，這個協會實際上壟斷着阿特拉斯山脈的鉛礦礦藏。海灣石油公司(梅隆)，在法屬突尼斯的一個特許開採的石油礦中，取得了百分之六十五的股份，其餘的百分之三十五則由法國資本提供。

共和鋼鐵公司取得了利比里亞的鐵礦控制權，也就和法斯通橡膠公司一同佔有這個傀儡共和國。海灣石油公司在葡屬東非洲的莫三鼻給取得石油開採權，辛克萊石油公司則在阿比西尼亞取得開採權，這些地區過去都是由英國資本支配着的。

阿比西尼亞國家銀行的總裁是傑克·班納特，他過去是克萊將軍在西德時的財政顧問。阿皇在外交、財政與商務等主要部門的顧問都是美國人。通往阿京亞的斯亞貝巴的三條航空線中

有兩條是美國人經營的。羅夫·却普曼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中曾經引述這些事實：

“美國勢力——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近日正支配着這個以錫屋頂為特色的阿比西尼亞都城的生活。這些影響反映在去年十二月設立後即風行一時的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閱覽室，一直到一批流氓騙子的活動，這批騙子是一些希望在最短期間之內犧牲阿比西尼亞人民的利益來發財的人物。”

有六家美國大壟斷企業已經進入了另一個英國的舊屬地——埃及。埃及政府正以下列的廣告來吸引更多的美國投資：

“埃及，永遠陽光普照之邦，人力低廉，勞工從不開糾紛，稅收又低微！”²¹

一副蓋革氏計算器就是那些在非洲的美國探險家的標準裝備。軍用物資，特別是用於原子彈的鈾礦就是他們最有價值的發現。在比屬剛果的辛可羅威有世界上最富的鈾礦，而差不多所有這個鈾礦的產品都落在美國手中。

華爾街取得這個重要產品的獨佔權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同時由於美國對比屬剛果貿易日增（參閱第二章），其結果將分佔剛果的礦產。

一九五〇年，美國資本收買了各礦區通往外面的鐵路的大部分股份並買進採礦公司的少數股份²²。參與這些交易的人物包括與英屬德蘭士瓦聯合集團和洛克菲勒的國際基本經濟開發公司有關的幾家華爾街銀行。這樣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洛克菲勒系和摩根集團對非洲的重新瓜分，都是染指很深的。這個交易的前途，可從下列事實顯示出來：在一九四八年一年中，豪特·卡且加聯合礦業公司從五千九百五十萬美元資本額中，就獲得了三千三百三十萬美元的毛利²³。採礦工人們却在以七年為期的

奴隸勞工合同下被僱用，每月工資只有二十五美元²⁴。

美國資本在非洲的廣泛滲入，正足以最清楚地揭穿美國“反殖民主義”的神話。無論在那個地方，美國企業公司都是按慣例以每天由二角到一元的工資付給僱工，同時它還支持極力壓迫人民的非洲殖民地政權。

但是非洲的人民已經不再是一籌莫展和毫無組織的了。正如亞爾法士·亨頓所指出的：

“富於鬥爭性的工會，其中多數是世界工聯的會員，正在發動羣衆的力量，提高工人的真正自覺；這些工會的罷工行動就是非洲工人與農民所要求的自由新生活的一種顯而易見的先鋒表現。”²⁵

孤立的部落正在團結成一個巨大的非洲民族國家，包括了非洲大部分土地。英、法及南非軍隊在馬達加斯加、黃金海岸、羅得西亞、尼日利亞和南非等地的大批屠殺並不能阻擋這種運動。一切加緊對非洲工人剝削的企圖，只能增強和擴大非洲的民族解放鬥爭。倫敦的“經濟學家”月刊曾這樣警告說：

“開發非洲其實並不像某些人所想像那麼簡單。非洲人的政治覺醒，加上糧食與勞工的缺乏，正迫使歐洲列強小心緩步地來推行他們的計劃。如果非洲是一個梅子，要想吃的話，只消摘下來就行，那它早就被摘下來了。事實上，美國人所預見的發展，其道路上還是困難重重的，並且是不容易克服的困難。”²⁶

英國的發言人之所以指出這些困難，是要強調說明他們是熟練的殖民地管理者，因此美國有必要與英國繼續合夥。但是即使美國資本與英國的殖民技術聯合起來，也壓制不了非洲人民日益澎湃的解放運動，這些運動一定會粉碎美帝國主義的野心。

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前途

五十年來美帝國主義一直計劃着要支配中國的貿易。在一九〇〇年，利用其新征服的菲律賓作為基地，美國政府參加壓制義和團起義（中國反帝國主義的一次起義），同時宣佈了“門戶開放”政策——即是說，要求美國金融資本能與其他帝國主義共同參與對中國的劫掠。在其後的十五年中，美國的公司積極參與爭奪各種的特權。雖然有美國國務院的支持，但這些公司的大部分努力在英日兩個遠東列強居優勢之下，却歸於失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在中國仍享有治外法權。它的公民也正如英國、法國與日本的公民一樣，稱霸稱王地橫行於中國。它的砲艇同樣在長江上巡邏，還協助鎮壓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間的中國革命。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雖然數目仍低於英國和日本，但却在增長着。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在中國得到比英日帝國主義遠為優越的軍事地位。美國軍隊入駐中國港口，美國轟炸機停放在中國飛機場上，並且美國人指揮着蔣介石的軍隊。中國的國庫完全依附於美國的國庫——甚至鈔票也是在美國印刷的。美國的官員決定中國可以購買什麼、應該賣什麼、和按照什麼條件來買賣。

五十年的“門戶開放”政策，最後證明了它的確是名副其實的“門戶開放”，那就是：對美國金融資本是門戶大大開放，對其他一切國家則雙門緊閉。

但這個勝利却來得太晚了。中國人民已經走在它的前面。爲了反對所有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已經建立了一支不能再被擊破的解放力量。

美國政府花費了六十億美元，妄圖拖住中國而不讓它前進，

但是完全失敗了。

在日本投降後的一年半中，一方面馬歇爾將軍在與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力量進行協商談判，但另一方面美國陸軍部方面却同時在裝備和訓練蔣介石的軍隊。

到一九四六年年底，馬歇爾在中國的備戰工作已經完成。談判就宣告破裂，馬歇爾返美就任國務卿。於是，杜魯門主義登台，其結果在歐洲就是對希臘人民的襲擊，在亞洲則對中國人民展開公開的全面進攻。杜魯門主義在希臘雖然得到一些不太可靠的成就，它在中國方面所遭遇的最後的決定性的失敗却使這成就黯然失色。中國人民徹底地擊敗了蔣介石傀儡政府。在憤怒之餘，這些金融資本的代表們變得毫無顧忌了。

公開議論“我們”如何“失去了中國”，竟成了一時的風氣。官方發表的關於中國的白皮書也供認，蔣介石的失敗是中國人民表現其意志的結果——“這是中國內部力量的產物，這種力量我們美國曾試圖影響，但未能做到。”²⁷ 談到國民黨政權，這個白皮書說：“事實證明，它的領袖不能應付他們所面臨的危機，它的軍隊已經失去了戰鬥的意志，而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民衆的擁護。”²⁸

華爾街並沒有放棄它在亞洲的野心，它只是調整其策略來對付這樣一個不可抵抗的事實，即遠東的十億人民已經追隨着中國人民的先導，正展開一個爭取民族解放的最強大的鬥爭。因此美帝國主義正集中其主要力量，來設法挫敗這個鬥爭，想利用優於其他帝國主義對手的條件，乘機掠奪。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使得曾被日本佔領過的東南亞各殖民地曾一度得到暫時的與局部的解放。由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武裝曾協助擊敗了日本軍隊，並且在戰後樹立起政權。

但是，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美英帝國主義者就已經在準備着恢復殖民統治。它們運送大量軍械到印度與澳洲。其中大部分從未用於對付日本，而是保存下來後來用於對付人民的戰爭。千千萬萬荷蘭、法國士兵都會在美國和英美聯合的海外基地受着準備進行殖民戰爭的訓練。

到了大戰的末期，帝國主義者實行分工合作來摧毀遠東的新生的人民政權。美國軍隊担負在菲律賓和朝鮮的任務；英國則担負在馬來亞以及當荷蘭尚未準備就緒以前在印度尼西亞的任務。法帝國主義者則進行攻擊越南。所有各地的日本佔領軍仍駐留原處，以便儘量協助其帝國主義夥伴，這與五十年前西班牙的殖民者在菲律賓的所作所爲是一樣的。而在每一個地方，這些重返舊地的統治者都接受這種協助，來對付那些他們號稱要去解放的人民。

所有這些征服殖民地的戰爭都是用最殘暴和最野蠻的方式來進行的。美國政府對所有戰爭都給予武裝、金錢和外交上的支持。

但這並不是沒有交換條件的。作爲使亞洲重行殖民地化的代價，華爾街加緊了它的“門戶開放”的傳統要求，打破了過去那些舊老闆們的壟斷，而參與掠奪品的分肥。

在東南亞的有些地方，美國資本家早已侵入。例如，英國對泰國經濟生活的壟斷，就已經被駐在該地的美國軍隊所佔的優勢與戰時英美分佔錫礦供應的卡特爾協定所打破。一旦進來，這些美國生意人就再也請不出去，並且自此以後他們就控制了泰國商業的主要部分。

但是美帝國主義者在亞洲——日本除外——所得到的實際收穫與世界其他地區比較，仍然是微小的。福特汽車公司的行動

典型地說明這種情況。福特汽車公司曾取消了它原來在新加坡設立汽車裝配廠的計劃，理由是“政治情況不穩定”。的確，如果人民在短期內就能將其奪取過來，那末設立工廠、開設礦場和種植園就實在沒有多大意義了！其實，帝國主義眼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阻止這種形勢的到來。

美帝國主義在絕望的冒險中，乃計劃使用武力發動一個對全亞洲的戰爭。英帝國主義者在馬來亞的軍事與財政已經走上了絕路——而它所對付的還只不過是五百萬人民。華盛頓正等待着有一天英國人將宣告退出，正如他們在希臘那樣，而邀請美國人來承擔這個“白種人的負擔”。

印度支那的情形最爲接近這種境況。法帝國主義者仍然壓制不了印度支那的人民，儘管它動用了十五萬的軍隊（其中百分之四十是納粹德國人）和每年五億美元的費用。他們乞求美國給以軍火與財政的援助。艾奇遜承受了這筆抵押印度支那的買賣。他答應供應鎮壓當地人民的軍火，但是是有條件的。美國要派軍事代表團與馬歇爾計劃代表團到印度支那去監督這些軍火供應。他們一方面與法國官員談交易，同時也直接和法國的傀儡，號稱“夜總會皇帝”的保大打交道。保大的“獨立性”是被增大了——也即是說保大對法帝國主義者的依賴性被減低了，但他對於美帝國主義者的依賴性當然相應地增加了。

在保大的“合法的”政府背後，美帝國主義還支持那些已經在與越盟民族獨立運動交戰的勢力。美國“商業周刊”承認，越盟運動“已經贏得大多數越南人民的支持——包括該國大約百分之九十的非共產黨員的支持。”²⁹ 這個雜誌還承認：對民族解放運動這樣壓倒多數的支持，是亞洲的普遍現象。

在企圖阻擋這種羣衆性巨潮的徒勞無益的嘗試中，安排給

日本扮演的角色正如德國在歐洲所扮演的一樣。日本是一個最
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適合於作兵工廠。美國金融資本與日本金融
資本早在第二次大戰前就有相當緊密的聯系，從那時開始，華爾
街的大公司就已經大量購入股權，參與日本財閥的托辣斯。麥克
阿瑟一方面加強它對日本的無限期的軍事佔領，另一方面重新
武裝起日本軍閥黨羽。羅歐說出了所有亞洲國家的疑懼，他在印
度孟買“民族旗幟報”這樣寫過：“東京方面都假定，一旦發生
大的戰爭，日本的軍隊將在世界各地作為‘美國的廓爾喀’（英國
的尼泊爾僱傭軍——譯者），替美國作戰。”³⁰

這篇文章又指出，美國操縱下的吉田政府，為了將麥克阿瑟
的戰爭計劃強加在日本人民頭上，“正肯定地在恢復日本的警察
國家的性質”，而嚐受過原子彈的襲擊的日本人民，絕大多數是
反對將來再從事任何軍事冒險的。

侵略朝鮮

美國軍隊以公開戰爭反對亞洲人民的新階段是在朝鮮開始
的，時間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由美國軍
隊佔領的朝鮮南半部，帝國主義者安插了全亞洲最臭的傀儡之
一——李承晚。李承晚唯命是從地把凡是有價值的東西都奉獻
給美國軍官與美國企業公司。他組織了一支地主—法西斯軍隊
來鎮壓朝鮮人民。

這個偽政權是如此不孚衆望，縱然在恐怖政策與操縱的選
舉制度下，李承晚在一九五〇年五月的大選中還是以三比一慘
敗^①。他抗拒新國會，繼續其獨裁政治。這個華爾街傀儡的末日
顯然快要來到。作為最後的手段，美國老闆發佈了攻擊命令，企
圖以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動侵略來挽救李承晚的命

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五年建立於全朝鮮，但只被容許在蘇軍佔領區執行政權工作。

美國駐朝鮮軍事代表團團長羅伯特准將在李承晚軍隊發動戰爭前三星期曾說過：

“在朝鮮，美國納稅人有一支軍隊，它像一隻可靠的看家犬似地看守美國在當地的投資。……美國駐朝鮮軍事代表團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說明聰明而有力地投入五百個受過戰爭鍛鍊的美國官兵，就能訓練出十萬個替我們放槍打仗的傢伙。”³¹

李承晚政府的前內務部長官金孝錫曾這樣說過：

“盡人皆知，李承晚在本年春天接受麥克阿瑟的召見，曾去日本一行。麥克阿瑟命令他一旦進擊北朝鮮戰爭見諸行動時，他的軍隊就要接受麥克阿瑟的指揮。……李承晚也得到保證，一旦他發動北進戰爭，他將得到美國空軍與海軍的支持，同時在日本方面一定將有志願軍開出，因此他就必定可以立刻取勝。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曉，李承晚發出命令，開始進擊北朝鮮的戰爭。”³²

亞洲人民都被美帝國主義對朝鮮的公然干預所震動。敘利亞一家通訊社曾這樣說過：

“公衆輿論毫不隱瞞其對北朝鮮武裝力量的同情。……他們，作為亞洲人民，都同情朝鮮人，希望美國干預行為遭受失敗，因而減輕戰爭危機。”³³

印度的“勒克瑙先驅報”這樣說：

“(美國)已經認真地從英國手中承接了‘白種人的負擔’，而

① 李承晚禁囚了九十個反對他的候選人，同時只允許百分之三十以下的人民參加投票。可是雖然如此，仍然只有四十八個他的候選人當選；另一方面，“獨立派”當選的却有一百六十二人之衆，其中大多數主張與北朝鮮和平統一。

正經常地揮動它的屠刀。美國（在朝鮮）的行動不僅不是世界和平的保證，而肯定是對和平的威脅，全世界人士愈早明瞭這一點就愈好。所有關於弱小國家的自由與獨立的這種談話，都不過是宣傳而已。……”³⁴

如是，美國在亞洲的公開侵略，一開始就使華爾街遭遇到最嚴重的政治失敗。軍事上的結果更徹底粉碎了白種優越的神話，這個神話至今仍然是煽動種族優越感的一個工具。爲什麼朝鮮士兵能够以拳還拳，打擊裝備更好的、有海空軍支持的美國軍隊呢？

基本原因是十分明顯的。他們是爲祖國獨立自由而戰，爲自己和祖先世代耕耘的土地而戰。而美國的士兵，對於這個海外戰爭，這個他們看不出目標是什麼的戰爭，是不感興趣的。麥克阿瑟傾全美國的陸軍與海軍陸戰隊的作戰部隊於朝鮮，曾贏得短暫的軍事進展，但想真正征服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想佔領重要城市和交通線以外的地方，他是沒有希望的。他的處境一如今天在印度支那的法國殖民者一樣，或一如一百七十五年前鎮壓美國革命的獨立戰爭中的英國殖民者一樣。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不得不向依賴他們的歐洲僕從求援。慘重的傷亡名單使人回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子。軍事預算也增加了一倍。

而造成這一切的，只不過是對遠東百分之三的人民的戰爭而已。

如果美國容許其統治集團將戰爭擴展到中國、印度支那、菲律賓，對東南亞所有人民作戰，美國將付出怎樣的代價呢？

第十章

軍事控制與戰爭

帝國主義就意味着戰爭。自從列強最初瓜分世界以來，它們彼此之間的戰爭、備戰以及戰後的重建，幾乎是一直持續不斷的。至於替帝國主義各個集團打前哨的二等國家之間的戰爭和鎮壓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戰爭，那就更加頻繁了。最後，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以來，最尖銳的鬥爭是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間以及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所進行的干涉這個革命的戰爭。

在這些過去的歲月裏，沒有一年沒有發生過有成千成萬傷亡的戰爭。兩次重分世界的大戰把人類的大多數都捲進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直接準備時期、大戰本身以及戰後的初步重建，這整個階段是從一九一二年一直延續到一九二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與此相應的一個階段至少是從一九三六年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總和起來，帝國主義戰爭支配了幾乎全世界人類的生活整整的二十六年，也就是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大部分。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死了一千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了四千萬人；已在大肆動員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其結果還不知道將造成多少人民的死亡。

美帝國主義的發展成爲戰爭危機的主要來源，可以從後面說明幾個時期的軍費支出的附表中看出來，在這幾個時期內，美國本身並未公開參加戰爭¹。

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間，也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以前，每年的軍事費用大約增加四分之一，可是每人平均支出的軍事費用，實際上是跟着物價的跌落而在減少。

帝國主義時代給美國帶來了軍國主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這二十年中，軍事費用增加了四倍。在這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又增加了四倍。這時候，美國差不多已和它的主要競爭對手並駕齊驅。一九一三年時，美國的軍費比英國略少一點，到一九二九年時即顯著地超過了英國，一九三六年時則又略少於英國。

年份(到每年六月三十日爲止的財政年度)	每年平均軍事費用 (單位: 百萬美元)
1871——1875	63
1891——1895	80
1901——1905	220
1911——1915	333
1926——1930	745
1936——1939	1,235
1948——1950	11,726

雖然美帝國主義從前並不是像它的辯護者要我們相信的那樣是個和平天使，也不是天真的毫無戰爭準備，然而它也還不是軍國主義和挑撥戰爭的主要中心。它雖然和它的帝國主義對手一起煽動過戰爭並參加過戰爭，但是，和後來的情況比較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美國的軍國主義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期間，每年軍費平均約爲十二億三千五百萬美元。而到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期間，軍費則每年平均約爲一百二十億元。這就是說，在十年多一點點時間中，一下

子增加了十倍。而這還只是事實的一部分而已，實際上官方發表的“國防費用”略去了數以十億計的隱蔽的或間接的軍事支出。

在杜魯門總統一九五〇年一月所發表的預算咨文裏，他估計一九五一年財政年度軍事費用和有關軍事的費用總數將達三百億美元，換言之，相當於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七十一。

而且，軍事費用是逐年增加的。在一九四八年財政年度到一九五〇年財政年度期間，“國防”費用從一百零九億美元增加到估計的一百三十億美元，大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這同一時期裏，並未包括在“國防”費用項下的原子能支出（即製造原子彈和氫彈的費用）從四億六千六百萬美元增加到六億七千三百萬美元，而且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即已預定要在下一年增加到八億一千七百萬美元。一九五一年財政年度，單是原子彈一項的費用即預計將超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每年全部軍費總和。

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美帝國主義的軍費是最具有危害性的。美國在一九五〇年財政年度的軍費比英國的要大四倍多，而英帝國主義自己這一年所花的就已經差不多相當於它在一九三六年的軍費的四倍。美國這一年度的軍費差不多兩倍於所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軍費的總和。

杜魯門總統所說的三百億美元直接和間接的軍事費用等於英國整個的國民收入，超過了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總收入。美國軍事費用的規模是過去任何和平時期所未有過的。在絕對數額上，它甚至於超過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戰爭預算。而所有這些還只是美國干涉朝鮮實行局部動員以前的情況。在那以後，杜魯門總統提出了一個“擴大動員”的預算，建議在一九五二年財政年度的訂貨合同上使用九百四十億美元，實際現金支出為七百二十億美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一九四三年度實際支出相差不到百分之十。

基地與同盟

在帝國主義的實力政策中，軍事力量並不是放在國內作防禦用的。無論是在和平時期或者戰爭時期，它都是經常地向外推進，擴大實行直接軍事統治的領域。美帝國主義利用着它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控制以及由此優勢力量而產生的強大軍事力量，在全世界所有重要地區安置美國的武裝部隊。

在五角大樓和國務院官員的口頭上，說什麼“我們的”防線是在易北河上、是從直布羅陀到蘇彝士運河、是從日本到菲律賓，這已經是家常便飯了。由於他們經常地重複這樣的說法，許多美國人已經習慣於接受所謂“巡邏世界是我們的責任”這類觀念了。

這種思想的發展，很自然地就產生了一九四七年“明尼阿波利斯明星報”發表的伽斯塔斯的那幅漫畫上所表現的結論，在這幅漫畫上畫的是山姆叔叔身為一個警察騎在地球上揮動着警棒。標題是：“他的巡邏區域——全世界”。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的一期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美國的防區：全世界”。在這篇文章裏附有一張地圖，以灰顏色表示着“美國的防區，……在這裏，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佔統治地位”。按照這張地圖，這個地區包括：整個南北美洲；西歐的大部分；北非的一部分；除了蘇聯、中國和阿拉伯聯盟國家以外的整個亞洲；整個大洋洲和北極地區。這一片灰色的地區所包括的地方擁有足足超過十億的人口。

但是，即使這張圖也還並不完全。它略去了佛朗哥所統治的西班牙，因為當時國務院還否認在那裏佔有軍事基地。它還略去

了非洲的利比里亞和的黎波里脫尼亞、亞洲的沙特阿拉伯，這些國家裏都有美國的軍事基地，並且都是很明顯地處於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和經濟控制之下。

這張地圖把蘇聯、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看作是一個單位，這單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陸地疆界都算作“美國防區”的一部分。至於海上疆界，凡所有四面八方與蘇聯以水為劃分界限的鄰近地帶，都被視為這個“防區”的一部分。這張地圖顯示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其本土以外均無防區或經濟控制範圍，並且它們的領土沒有不是遠在美國本土幾千哩以外的。

這篇文章發現，要使“俄國相信大西洋公約的真正目的是防禦而不是進攻”確實是一個“問題”，那又何足為怪呢？

這本雜誌的地圖並不是什麼藝術家的夢想。在這巨大“防區”裏，滿佈着美國的空軍、海軍和陸軍的基地。這個地區以內的各國的軍隊都正在轉變或者已經轉變成為美國軍隊的輔助部隊。按照一九四七年“美洲防禦公約”，所有西半球國家的武器都須依照美國的式樣“標準化”，軍事訓練則須由美國軍事顧問按照五角大樓的規定來加以改組。到一九四七年時，希臘、土耳其、伊朗和菲律賓都已歸美國直接統治。一九四九年的大西洋公約則建立了美國對於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的統治權。

所有這些擴張軍備、基地以及片面的同盟條約究竟用來幹什麼的呢？用來反對蘇聯嗎？當然是，但並不單是如此。它們同樣還要用來反對其他的犧牲者，而且事實上這些犧牲者還是首先遭殃的。

進行殖民鎮壓的武裝

在前面第三章內所引用的一篇演講辭裏，福特國際公司的

財務主任波格丹曾經評論過英國在十九世紀時用某種投資方式大賺錢的“輝煌成績”。他說，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英國有“一個壓倒一切的艦隊，……隨時準備着而且能够駛入外國港埠，而且只消搖搖艦上的旗幟就可以取得外國政府的合作。”

至於美國，照波格丹的說法，是用投資條約來代替武力。這種條約“用一種很不相同的東西代替了五十年到一百年前的英國艦隊。外國政府不把它看做是一種武力或者威脅，而是一個穩定的基礎和澄清的因素”。

這簡直是胡說！這些投資條約除了說明美國軍事力量的統治權以外沒有說明任何別的，正是這個軍事力量強迫着外國政府簽訂條約把本國的資源斷送給華爾街的壟斷資本家。

在第一章裏，我們業已看見，美帝國主義的地位也是在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掩護下建立起來和保持下去的，在這一點上並不亞於英帝國主義。我們可以看見，在美國金融資本新滲入的某些地區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戰後加緊了經濟統治的地區，軍事力量都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它直接佔領下的西德和日本，這種軍事力量與經濟統治的關聯是很明顯的。實際上，在其他地區這種關聯性也並不含糊。

在英屬西印度羣島，美國不僅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名的以基地交換驅逐艦的辦法取得了海軍基地，而且美國的公司還取得了對於石油和鐵礬土的特權。要是英帝國主義在這些島上仍能保持其軍事力量的話，難道它會不為它自己的托辣斯保持對這些原料的壟斷權？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美國在紐芬蘭、拉布刺達和格陵蘭取得了新的軍事基地。美國軍隊用加拿大的領土來作為他們軍事演習的地盤。加拿大所有新發現的鐵礦和石油礦藏都已

落到爲美國所控制的聯合企業手裏，却沒有聽見加拿大的資本家有一聲怨言，說什麼他們要用這些鐵礦和石油來發展獨立的加拿大的工業。難道誰還能懷疑這件事情與美國的絕對軍事控制之間的關聯嗎？

美國政府在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的海軍基地取得九十九年租借權以後，接着就是在利比里亞大肆擴張它的投資活動。同樣，它在法屬北非及其鄰近的地中海地區建立了一連串的軍事基地以後，緊接着美國的貿易和投資即迅速在法屬北非展開。

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共同開拓阿拉伯石油的擴張政策，直接地違反了與英國以及法國的公司所訂立的“紅線協定”，因爲，按照這個協定，沒有一個簽約公司可以不邀請其他簽約公司而逕自進行對中東石油的採掘。而事實上那些被排斥的公司的抗議也僅限於打打空頭官司而已。當然，假如在達蘭擁有空軍基地的不是美國，而是英國或法國；假如是英國或法國控制着希臘和土耳其的軍事力量；那末，違反這個協定的就會是英國的或法國的公司了。

甚至那些投資條約的締結也往往是緊跟着絕對軍事控制權的建立而來。這在菲律賓和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表現得最爲明顯。意大利也是同樣的情形，意大利政府在一九四八年選舉時是憑藉着美國軍艦的光臨和美國飛機的威脅才保持了它的政權。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那些在美洲防禦公約和北大西洋公約的陰影下與美國簽訂了類似的條約的其他國家。

帝國主義對於附庸國家進行剝削，主要的和最後的條件就是軍事控制。這樣的情形在今天不僅沒有稍減，而且比任何時候都加劇了。因爲，這是製造壟斷資本所經常需要的“氣候”的唯一可恃的力量。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落後國家人民對於帝國主義剝削的抵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堅強，而且都更好地組織起來了。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當地的資本家，雖然他們是和帝國主義妥協的，可是他們也利用着外國控制中的每一個弱點，利用着每一次統治者的軍事力量調離本地的時候，來推進他們自己的企業和限制帝國主義者的掠奪。因此，美國軍事力量的擴張就遭遇了嚴重的抵抗，甚至在西半球它也吃過一些敗仗。巴拿馬的僕從政府簽訂了一個條約准許美國在巴拿馬土地上維持它的戰時空軍基地。但是，巴拿馬的議會在人民力量的壓力下拒絕批准這個條約。

紐芬蘭用投票加入加拿大的辦法擊敗了華盛頓企圖完全控制紐芬蘭的計劃。為加入加拿大而派出的紐芬蘭代表團團長布拉德萊說：“紐芬蘭的人民對於這些基地感到憤怒。他們所憤怒的是他們的財產未經他們的同意就被取走了。他們的主權受到了損害。”²

這種經濟的控制不僅是由美國武裝部隊來強加於別國，而且由於附庸國家的政府在財政上與五角大樓的戰爭計劃牽連在一起，也便利了這種控制。好幾年來，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就不斷要求華盛頓給予他們經濟援助以酬答它們在戰時所作的物資供應。但是，在每次國際會議上，經濟援助總是被拖延，而軍事和政治控制却加強起來。一九四七年，在里約熱內盧，拉丁美洲國家被迫簽訂一個軍事公約；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它們又被迫簽署一個反共同盟；但是，經濟援助却仍然遲遲不來。

美國這種“保護”對於拉丁美洲經濟所造成的影響，從下面一封信中可以顯示出來，這封信警告說，“美洲防禦公約”將要帶來下述“十分不良的”的後果：

“我們鼓勵其他美洲國家增加軍備開支，這樣就會削弱它們的經濟，也就會影響它們政治上的穩定；那些較貧困的國家將會要求我國政府費很大代價去津貼它們的擴軍計劃。

“鼓勵拉丁美洲國家增加軍備開支，是與我們的經濟及政治基本政策背道而馳的，因為我們的基本政策是提高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與經濟福利。

“拉丁美洲國家在擴軍計劃下所要作的犧牲，一定會嚴重地限制與推遲它們工業化計劃的實現、運輸的改良、美國所需的戰略物資的生產，以及公共衛生、教育和社會福利的簡陋情況的改善。”³

這封信寫於一九四七年三月，是當時的副國務卿艾奇遜在國務卿馬歇爾的指示下執筆寫的。這是艾奇遜的“總體外交”時期以前發生的事情。有些政府官員，不論由於什麼原因，曾以很認真的態度來看官方關於協助其他國家發展經濟的聲明。這個文件立刻受到陸軍部長柏德遜的攻擊，而三個月後馬歇爾就公開支持通過“美洲防禦公約”⁴。

擴軍備戰的公約對於美帝國主義的價值正是在於這個公約在經濟上與軍事上削弱拉丁美洲國家，並使之成為美帝國主義的附庸。

在一九四九年內，美國向拉丁美洲國家輸出價值八千八百萬美元的“特種”物資，即軍火及其他軍用品。每一個拉丁美洲國家都曾購買一些。美國同時又向西歐的大西洋公約國家輸出同樣多的“特種”物資，而更多的數量則輸往亞洲及中東的傀儡政府。總之，美國在一九四九年所輸出的軍用物資共達五億零六百萬美元⁵。這·個·數·字·等·於·一·切·國·家·間·戰·前·每·年·軍·火·貿·易·額·總·值

的十倍⁶。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即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後的第一個月，軍火輸出躍升到價值每年八億三千萬美元的比率（當然，這並不包括駐在海外的美國軍隊的軍火供應在內）。擴大的備戰預算還要在總數上每年增加數十億美元。

希特勒曾使用軍火輸出作為其取得東南歐國家控制權的主要方法。但比之今日五角大樓與華爾街集團的活動，希特勒的方法真是小巫見大巫！

對西歐的軍事控制

在佔領柏林五年之後，美國軍隊在歐洲領土上能夠自由活動的地區較之一九四五年五月時更為擴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仍繼續保有它在英國的空軍基地，而且在一九四九年還加以擴充。這些基地之中，有三個還配備着最重型的轟炸機，成為對整個歐洲的原子彈轟炸的威脅。同樣，在一九四九年，美國駐德主要武裝部隊，已經由維持內部治安的任務轉變為戰術戰鬥的任務，而且裝備了“驚人的火力”的武器⁷。駐德美軍在一九五〇年宣佈進一步擴充，而同時又企圖打破軍區劃分的障礙，以便美軍能夠直接佔領魯爾區。到一九五〇年春天，美國已公開承認在西班牙建立美國空軍與海軍基地的計劃，而在一九五〇年末，美國陸軍已開始駐防法國與英國的土地。

美國的軍艦可以任意訪問歐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海港，美國的飛機可以任意飛越它們的領土。歐洲的西方入口要道都被建立在英國、格陵蘭以及亞速爾羣島的美國海空軍基地所控制。歐洲的南方入口要道則被建立在地中海周圍的一連串美國基地所控制，這些基地使得地中海變成了美國的內湖。如果北大西洋公約的軍事計劃能夠完全實現的話，環繞歐洲的鐵環將通

過挪威的基地在北部合圍。

這種軍事的控制是在大西洋公約名義之下以特別快的速度進行着。根據這個公約，歐洲各國的軍事計劃都要受美國五角大樓的控制，軍火的傾銷代替了馬歇爾計劃的傾銷，估計最後將高達二百億美元。成千成萬的美國軍事專家，以訓練各國軍隊使用美國武器為名，滲進到歐洲的武裝部隊中去了。

大西洋公約表面上是爲了要保護資本主義的歐洲，來防止虛構的所謂“蘇聯侵略”的危險。這個公約的起草人是深知蘇聯不是一個侵略國家的。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國家內沒有要求進行國外投資的資本家，沒有一個人要從國內或國外對勞動者進行剝削去取得利潤。不像資本主義國家，軍火是壟斷資本利潤的最好來源，軍費支出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很大危害的，因爲它減少了可以用來進行計劃化社會主義建設的財源。因此，“蘇聯帝國主義”的神話在邏輯上就是荒謬的。蘇聯歷來都努力要達成國際裁軍，要求禁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建立反侵略的集體安全制度，它在這些方面的長久努力並不是一種外交手法，而真正是構成其內政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爲了將西歐變爲一個兵營而作的辯護是似是而非的。它的推論是這樣的：（一）蘇聯要侵略資本主義歐洲，它也有足夠的軍力這麼做；（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缺乏足以抵抗這種侵略的軍備；（三）因此，必須用數年的時間去建立資本主義歐洲的軍事潛力，到足以抵禦蘇聯“侵略”的程度。

如果這個推論的前提是正確的話，蘇聯一定不會讓西歐有一個機會去重整軍備而早已侵入西歐了。難道這不够明顯嗎？在西歐軍事毫無辦法的時候而蘇聯並未侵略西歐，這正足以證實蘇聯不是一個侵略國家，這也難道還不够明顯嗎？

大西洋公約的真正目的乃是使得美國軍隊能够實實在在侵入西歐，以便完成西歐的殖民地化，以便建立美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基地。

大西洋公約助長了資本主義歐洲的殖民地化，因為它建立了用以對付工人階級的軍隊，削弱了各國的經濟，使歐洲人民日益貧困，同時加重了歐洲國家對美元的依賴。這個公約名義下的美國軍火與武力，是用以對付歐洲人民的。這一事實已經從諸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言論中暴露出來。艾奇遜曾經強調需要這個公約去對付“間接的侵略”和“內部混亂”⁸。罷工、和平示威，甚至選舉左派政治集團都可以被指為“內部混亂”而招致美國軍事干涉或者使用由五角大樓指揮的歐洲軍隊去加以鎮壓，這個意圖在美國政府最初送交國會的“軍事援助法草案”中更明顯地暴露出來。這個草案規定，美國總統有權去援助他所選擇的任何國家，而且

“‘國家’這個名詞的意義是指任何外國政府或國家或該外國的任何集團，或任何國家的人民的任何代表或集團，不論其成分為何，經總統為完成本法之目的而指定其為一個‘國家’者。”⁹

這一條款在共和黨人的堅持下刪去了，因為當時他們反對賦予總統以這樣大的權力。但美國的統治集團將會而且實際也正依據這一條款行事，雖然這個條款並未見於法案的文字中。這樣，蔣介石就成為“中國”。紐約也就成為由東歐來的形形色色的間諜及破壞集團的中心，在那兒，他們被當作自己“國家”的代表而受到援助。華盛頓就成了過去資本主義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那些在十年前便被其人民逐出的種種“外交人物”的庇護所。

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選擇傀儡政府的方法，在歷史上，美國在拉丁美洲使用過，英國在中東使用過，希特勒在歐洲大陸使用過。

究竟大西洋公約如何在經濟上削弱歐洲呢？英帝國主義者在一百多年內一直強迫印度人民負擔佔領軍的費用。而現在呢？美國正強迫英國作同樣的事情。空軍基地的部分費用是由英國國庫負擔的，而這些基地使得英國成爲主要的轟炸目標。大西洋公約規定的所有美國駐英國或其他國家的軍事顧問的費用，必須由這些國家負擔。這些國家的窮途末路，可以從目前西德的經驗中看出來，在西德，每年十億美元的佔領費用在一九四九年就平均吞嚥了一個普通公民的一年收入的十二分之一，這項重稅正在上升中，因爲美國駐西德的軍隊及其軍事設施正在增加着¹⁰。

在華盛頓日益增長的壓力下，歐洲國家不得不再增加已經成爲嚴重財政危機的原因的軍事預算。美國的“商業周刊”曾經說過：一九五〇年五月英法美三國外長會議的結果將使得馬歇爾計劃的重點從牛油轉移到大砲，由消費品生產轉移到軍事生產¹¹。荷蘭政府曾經訴苦說：“在未來的北大西洋防禦公約的規定下，如仍須照目前比率開支軍費，結果將使荷蘭的經濟生存的一切希望‘全部落空’。”¹²法國政府曾警告說：如果再增加其業已臃腫的軍事預算，就有危險造成“通貨膨脹，因而使法國共產黨大得其手”¹³。侵略戰爭後，加於歐洲各國政府的壓力增加了，使它們同意將軍事預算增加百分之四十至一百。英國政府在接受華盛頓增加軍費開支的命令時所提的備忘錄中曾訴苦說：

“它將使得在支付必要的美元及其他進口物資時，付出重大代價，招致出口的損失及國內必需的投資的減少，……它將造成

英國人民的真實而巨大的犧牲。它將耽誤恢復工作，延遲英國人民生活境況的改善，而這個境況的改善，乃是戰後英國人民所久已希望能從他們自己的努力中求得的。”¹⁴

正如拉丁美洲一樣，這些後果正是華爾街所追求的。進口貨代價的增加，就是對美元更深的依賴。這種依賴由於下述事實而更為加深了：美國的企業公司和軍事機構爲了囤儲而以壟斷方式預購全部原料，使得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向華爾街及五角大樓妥協，才能取得維持其工業的主要供應品。爲了戰爭工業的需要而犧牲出口市場，也正合乎美國壟斷資本的心願，美國壟斷資本正希望重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搶奪別國的國外市場的經驗。英國及其他大西洋公約國家的人民的實際工資下降，就意味着替那些與美國兵一同開進歐洲的銀行家及工業家提供更廉價的勞動力。

總之，美國陸空軍之分佈於歐洲，再加上政治與經濟控制的加強，就創造了大資本家們所常常談到的“具有信心的氣氛”。其結果，正如在第八章所說明的，就是華爾街資本的大量投資於歐洲的重工業，並將其轉變爲軍事生產。

如何才能強迫西歐各國參加反蘇戰爭集團呢？不僅馬歇爾計劃化國家的人民大眾衷心反對侵蘇戰爭，就是統治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害怕這個戰爭的。他們知道他們的國家將被轟炸，將變成戰場。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這樣一個戰爭就必然會造成一個革命的局勢。

一九五〇年五月時，這種情況所表現的顯然矛盾，可以看得很清楚。當時，公認爲是法國外交部的喉舌的法國“世界報”連載許多篇文章，敦促法國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但過了一個星期之後，法國的外交部長舒曼却參加了與貝文及艾奇遜的會議，與美

國作進一步的軍事合作。

這個矛盾的解決方式，就是西歐資本主義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依賴。爲了作爲資本主義國家而生存，它們需要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援助。爲了作爲帝國主義強國而生存，它們需要美國的軍事與財政的援助，以對付殖民地的人民。這樣，馬歇爾計劃帶來了大西洋公約，而大西洋公約却不是一個局部的東西。凡是需要大西洋公約來對付自己的人民的國家，自己就必然被迫放棄其主權，同時也必然被迫成爲策劃中的反蘇戰爭的工具與犧牲品。

這樣，愈來愈深的依賴所引起的一連串的後果又要重新出現了（參看第七章）。因此，馬歇爾計劃的執行人霍夫曼說：“我想……是馬歇爾計劃替大西洋公約奠定了基礎。”¹⁵而反過來說，大西洋公約所造成的軍事支配地位，又爲華爾街實現馬歇爾計劃的目的所必需。

最後，在北大西洋公約之下，“統一”歐洲的口號就在組織一支歐洲大陸上的單一的由美國指揮的資本主義軍隊這件事情上，達到其合乎邏輯的必然高潮。這件事情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各大西洋公約國家的布魯塞爾會議上正式達成協議。美國的艾森豪威爾將軍成爲“統一的”歐洲軍的總司令，而實際上，它只是美國陸軍的一些附屬部隊而已。這與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西方國家的聯盟毫無相同之處，因爲該兩次聯盟只是將各個相對獨立的軍隊配合作戰而已。第二次大戰後仍繼續存在的英美聯合參謀總部，現在則併入到這個新的、片面的大西洋公約軍事機構。美國軍事家單獨決定軍事戰略和軍隊數量的大小與調遣，法國、意大利與英國等國家只能使用華盛頓所規定的武器，而這些武器又都是在華爾街控制下生產的。至於原子彈與重轟炸機，則仍然是美國五角大樓所獨佔的武器。

正如在經濟方面“統一”的口號是用來進一步削弱歐洲國家的工業並加深其不平衡狀態，在軍事方面“統一”的口號亦是用來進一步削弱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並加深其不平衡狀態。這些國家保衛自己和反對美國佔領與干預的能力因而就減低了，它們被派定要當美帝國主義計劃中的侵略戰爭的炮灰。歐洲國家的軍隊被轉變為像尼加拉瓜的禁衛軍（參閱第五章）和李承晚的南朝鮮軍隊一樣的東西，不過只是規模較大而已。

西德在計劃中的歐洲資本主義軍隊裏佔着重要的地位，正如它在計劃中的華爾街歐洲兵工廠所佔的重要地位一樣。有人要欺騙美國人民，告訴他們說，為了應付蘇聯的“威脅”，特別是為了對付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在東德組成的警察，西德的重整軍備是必需的^①。事實上，西德從來沒有完全解除武裝過。希特勒的國防軍的消滅乃是杜魯門的國防軍秘密開始成立的訊號。德國的將軍們被美國佔領軍所僱用，供給如何對蘇聯作戰的情報，構成了復活中的德國參謀總部的核心。西德的僱傭兵和流亡的東歐法西斯分子都被僱傭到外國軍團中，編入西方佔領區的佔領軍。這些軍隊在名義上偽裝為“勞動服務團”，但實際上都是一些武裝的與受過訓練的人，“在佔領的初期便已募集”，他們“能夠形成西德軍隊的一個堅固核心”¹⁶。一九五〇年末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大西洋公約國家外長會議曾經唯命是從地蓋章通過了五角大樓加緊進行美國操縱下的重新武裝西德的決定。

美帝國主義需要一支復活的德國法西斯軍隊作為它的主要歐洲警衛軍。全歐洲都反對和抵制德軍的復活，全歐洲都不希望

^① 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出版的一期中承認：“東德軍隊的內幕證明，它百分之九十是神話故事傳說……，約有十萬人數的人民警察，並不是什麼軍隊。”

在數十年之中再經歷到來自德國的第三次侵略。爲了對付這種反抗，美國陸軍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開到法國，他們自己承認的目的是要對付法國人民，以保護其通過法國運至西德的軍火。資本主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化國家，在同意了布魯塞爾的計劃之後，正重蹈着慕尼黑時代的悲慘覆轍。

但是，現在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雖然同樣地面臨着反動的德國軍隊復活的威脅，但比之一九三八年時蘇聯單獨面對法西斯威脅的當時，是遠爲強大多了。它們已經宣佈，它們將不能容忍這個破壞波茨坦協定及第二次大戰期間的英蘇及法蘇條約的行動。美帝國主義蔑視這個警告，而恫嚇着要將西德變爲侵略蘇聯及其盟國的新的世界大戰的起點。

反蘇戰爭的計劃

美國的將軍、外交家及大商人很希望消滅蘇聯，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一個秘密。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如此公開地吹噓其侵略別一個國家的長期戰略這種事情，如果有的話也是很少見的。美國的報紙都載滿了說明如何陰謀用原子彈襲擊蘇聯的地圖和文章，將軍們、商人們及政府官吏們都爭先恐後地表示其對於這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如何仇恨和決心要毀滅它^①。所有

① 下面是在一九五〇年當中發生的美國在文字上和軍事上進行反蘇挑釁的一些例子：

一九五〇年二月，美國國防部長詹遜曾說過：美國必須準備好隨時能够“把赤色分子送進地獄”（見一九五〇年二月三日“紐約時報”）。在四月，美國“幸福”雜誌的出版人傑克遜，曾在洛杉磯演說稱：蘇聯是不可能被挑撥而去發動一個戰爭的，因此美國必須首先發動戰爭。他說：“在我們生存的世界，勝利的軍事行動將是最能得到普遍諒解的以和平爲目的的挑釁

蘇聯提出的和平談判、裁軍、禁用大量殺人武器種種建議，都立即被誣為“和平攻勢”而加以拒絕。

的確，美國人民在被強迫去相信美國的軍事與政治戰略只是用以“反蘇”，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它更直接的目標，却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的工人階級。不過，無疑的，如果一旦它的軍事、外交及國內政治的準備完成之後，它必然會發動一個對蘇聯的軍事襲擊。

爲什麼蘇聯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最終敵人和最終目標呢？當然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要想恢復它已經失去的特權地位。美國的銀行、公用事業投資公司及煤油公司仍希望再度剝削中國。那些採礦及煤油公司仍希望再度剝削波蘭與羅馬尼亞。或者哈里曼還夢想有一天可以重獲其恰士里的錳礦特權而杜勒斯則夢想有一天能得到蘇聯的貝柴摩鎳礦呢。

但這並不是瘋狂煽動反蘇的唯一的理由，甚至也並不是主要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畏懼蘇聯的存在。當然，這點是不會告訴美國人民的。美國人民聽到的却是，美國正在準備防衛所謂蘇聯的“侵略”。但在提出這個理由時所用的詞句中，就暴露出它的真相。美帝國主義的發言人像艾奇遜與杜勒斯之流，都被迫不能不承認這個明顯的事實：即蘇聯對美國並沒有侵略的威脅，也沒

行爲。”（見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工人日報）在六月，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格利菲士曾公開透露他在兩年前就已經催促過杜魯門向蘇聯投擲一個原子彈（見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紐約時報”）。

在一九五〇年春天，一架美國軍用飛機曾侵犯蘇聯的波羅的海邊境，並且顯然是被擊落了。在美國進行侵略朝鮮過程中，美國也承認有一架美國飛機曾侵入蘇聯領土約六十哩，並曾襲擊一個飛機場；另一方面，美國與英國的軍艦則在接近海參崴蘇聯海軍基地的朝鮮海岸上巡邏。

有侵略任何其他國家的威脅。艾奇遜所能找到的只有兩種“威脅”：一個是“內部顛覆”的威脅，一個是蘇聯經濟力量超越美國經濟力量的威脅。¹⁷

頭一個指的是宣傳，但還不是指蘇聯的宣傳，而是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中關於社會主義的宣傳和關於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宣傳；但像這樣的宣傳、這樣的鬥爭，在一個世紀以來，正有增無已地進行着；在蘇聯成立之前，就已經普遍地在全世界展開了，它們乃是剝削與民族壓迫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威脅，正如第一章所述，確實是真正的威脅，其道理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保證它在經濟力量上一定會超過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只有患神經病的人才會在這個和平的競賽中找到侵略的意味。然而這正是帝國主義者們主要的恐懼，這種恐懼正緊密結合着他們對全世界人民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恐懼。蘇聯在戰時，特別是在和平時代的偉大的成就，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大鼓舞，同時又是先進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鬥爭的最大鼓舞。國與國間的友愛合作，強國對弱國的協助，這些實例每天正以愈來愈明顯的姿態出現於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中。對於所有被壓迫的民族，這些實例就是永恆的鼓舞力量，就是最有力的“宣傳”，就是他們能夠取得勝利的保證，同時也就是指示着走向勝利大道的路標。工人階級佔有工業、終止了人對人的剝削和所有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等等實例，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有力的“宣傳”，就是全世界工人通過反資本主義鬥爭過程而到達最後勝利的保證。

如果這個社會主義的堡壘能被摧毀，那末全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就會受到挫折，就會讓金融資本再苟延幾十年，就會造成一個華爾街的無限制的擴張與掠奪的時代。

這個戰爭計劃是聯系着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進攻的。美帝國主義一切的軍事部署和軍事干涉都追逐兩個關係密切的目標：第一個是征服其他國家的人民，使之隸屬於美帝國主義；第二個是準備進行對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對希臘及土耳其的軍事干涉，用意是一方面對付中東的人民，另一方面是準備進一步使用這些國家作為最後進攻蘇聯的基地。對拉丁美洲的軍事控制也有兩個目的：一個是保持對拉丁美洲人民的鎮壓，另一個是保證對蘇戰爭中的戰略原料的儲備。對日本、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的干涉和在那裏建立軍事基地，北大西洋公約及其歐洲的基地，都抱有同樣目的。

爲了在美國人民面前遮掩事實真相，杜魯門總統不斷向美國人民保證，備戰不會引向戰爭而會導向和平。很明顯的，這只是對於一些容易上當的人的欺人之詞，比之一九一六年威爾遜總統的競選口號：“他使我們避免了戰爭”或者是張伯倫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口號“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好不了多少。

事實上，在一九五〇年春天，當華盛頓指令它的官員“在‘冷戰’演詞中，強調說明美國對和平的願望與努力”¹⁸時，戰爭的時間表却在加速進行。中國人民的勝利，世界和平運動的高漲，以及歐洲資本家之間的愈來愈嚴重的衝突，美國失業人數的增加，社會主義世界經濟的加速進展，都是在改變世界的均衡，使之越加對帝國主義不利。不管是多大的冒險，戰爭時間表必須提前，否則也許就不可能進行戰爭了。

爲了迎接這一個新的階段，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宣佈了“總體外交”的政策，這就是：爲了戰爭，全國作法西斯式的全面總動員。通過了對印度支那的干涉，杜魯門主義擴展到了遠東。一九五〇年五月大西洋公約國在倫敦的集會加速了歐洲的備戰。美

國副總統巴克萊在美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前一個月就宣佈過：“我們必須在全世界維持武裝力量，而在冷戰結束之前，我們或者需要佔領更多的國家。”¹⁹ 美國“商務周刊”警告其讀者說，如果美國當局利用一種虛假的戰爭危機，來獲致某些外交政策法案的通過，是不必大驚小怪的²⁰。

一系列主要的“虛假戰爭危機”中的第一個就是美國對朝鮮的干涉。它是一個藉口，以便進入一個新的、更高的動員階段，即發動全面戰爭前的一個階段。杜魯門恫嚇蘇聯說：任何地方若有一點動向，即是說：任何地方的人民如為其自身利益而採取了任何行動，就會成為燃起第三次大戰的火星。

美國參議員塔夫脫，這個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瘋狂的反共仇蘇的人物，曾經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供認過：

“如果我們將各種近代化的侵略飛機放在每一個與俄國毗鄰的國家，那末我們自己就變成一個侵略者了。我所反對的是：簽訂合同去武裝世界各地的、俄國周圍的二十個左右的國家。很明顯，這是一個侵略性的行動。”

他同時供認，蘇聯的防衛性行動並不能改變這個戰爭的性質。他說：“因為俄國人很自然地會想到他們（美國）正在建立一個環繞他們的軍事大包圍圈，如果他們等到這包圍圈完成，美國就一定要向他們進攻。”²¹

但塔夫脫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參議員，他只有在為達到政治目的時才發表這樣的言論。六個月之後，當美國已經用戰艦包圍了中國的領土台灣之後，當麥克阿瑟的飛機飛越中國東北領空數百次，進行轟炸與掃射和平居民之後，當麥克阿瑟指揮下的軍隊到達中國邊境，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入朝鮮去援助其鄰邦和保衛自己，抗禦這顯然要把侵略擴張到中國的企圖之後，很清楚的

這就是塔夫脫演詞上所說的形勢了。但塔夫脫却早已忘記了他自己的演詞，也大聲附和着“中國的侵略”的虛偽喧嚷了。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五日，當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奧斯汀否認美國對台灣的侵略的時候，美國的海軍部長弗蘭西斯·馬休士却公開地催促美國應該準備和應該發動一個侵略戰爭。他聲稱，這個政策將會：

“使我們成爲一個真正民主國家所未扮過的新角色——一個侵略戰爭的發動者——它會給我們贏得一個值得驕傲的和衆望所歸的稱號——我們將成爲第一個爲和平而戰的侵略者。”²²

帝國主義道德的淪喪，沒有比這更明顯的了。

征服世界戰略的破產

美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戰略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軍事控制和準備第三次大戰的動員。但這戰略在這方面的發展已經徹底暴露出它整個計劃的破產。美帝國主義早期由戰爭中所得的成功，乃是因爲這些戰爭主要是由別的國家去打的，受到嚴重物質破壞的也是別的國家，而美國金融資本則奪取了重要的權位，增強了工業力量，但很明顯的，現在重溫這種舊夢的努力是失敗了。好幾年來美國人一直幻想着讓歐洲的與亞洲的軍隊去進行所有地面作戰，讓他們去死亡，而美國人則發號施令，接着奇異武器的電鈕，浩浩蕩蕩地航行在各大海洋上，讓敵人胆戰心驚，同時以充滿死亡恐怖的原子彈轟炸機統轄天空。

但這個幻想已經在朝鮮完全粉碎了。亞洲的與歐洲的傀儡軍隊不願替美帝國主義送死。李承晚的南朝鮮部隊在第一次軍事打擊下就垮下來了。許多國家在聯合國投票同意依樣畫葫蘆地承認美國侵略朝鮮的既成事實的決議。但這些國家所提供的

軍隊只佔麥克阿瑟所統率的非朝鮮的地面部隊的十分之一，因此在這些干涉軍隊之中，美國兵必須承擔大部分的地面作戰與死亡。

遍及全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使得利用一個被征服國家的僱傭兵一事變得愈來愈困難。這種企圖可能帶來與原來的願望相反的結果。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一個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領導摩洛哥北海岸土人戰爭的保守派民族領袖阿布德·克林曾抨擊西方列強及聯合國，說它把“靠貪污與壓迫而生存的傀儡政府”強加於人，他警告說，人民必定不會替這種政府打仗的：

“這就是今天在南朝鮮所發生的情形。對於印度支那的人民，情形也是同樣的，他們不願和那些要從帝國主義及保大傀儡政權中解放其國家的兄弟們作戰，如果西方列強要繼續他們對朝鮮的壓迫政策，那麼在我們這個地方（即指北非——著者）必然會爆發突然的革命起義。”²³

在北大西洋公約軍隊中的歐洲士兵中也日益發生同樣情形，這些歐洲士兵在一個替他人征服的戰爭中將不會努力作戰，特別是當他們自己也在被征服之列。在美國統一控制下的軍隊中的英、法、意的部隊，其將來對蘇作戰的效能，一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意大利的部隊效能更小。他們的效能之所以會更小，是由於現時在歐洲的和平力量和各國共產黨的力量，比之當年希特勒僕從國家中的和平力量和共產黨力量增大到不知多少倍。

現在誰都看得明白，五角大樓的不可避免的趨勢就是儘量在世界各個角落裏找尋最反動的法西斯軍隊的殘餘來加入他們的陣營，但這種做法，在一個反對蘇聯及其盟國的第三次世界大

戰中，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西德近來的政治趨勢證明了，作為美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德國將軍們，已無法再度利用德國小資產階級對於侵略的盲從和狂熱。一個新的西德軍隊僅僅是希特勒匪軍的一個影子而已。至於佛朗哥，如果他真敢把他的軍隊調出西班牙，這將是那些長久受壓迫的西班牙人民起來革命的信號。至於伊朗、土耳其、希臘的傀儡軍隊和正在企圖建立中的日本傀儡軍隊，同樣的情形也將發生。

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士兵必然要為帝國主義者負擔陸海空三面作戰的主要責任。

在對抗帝國主義的這個陣營裏，有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的八億人民及其第一流的軍隊。連麥克阿瑟這樣頑固的沙文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以人對人來說，中國兵與美國最好的軍隊同等優越。要戰勝以蘇軍為首這樣品質的龐大軍隊的不可能性，已經顯然是有目共睹的了，連胡佛這樣的反動分子也是這樣看法。與這八億人民站在一起的，還有幾乎總數在十億以上的、生存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民。站在同一個陣線上的，還有西歐的大多數工人階級，以及和他們共同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反對美國佔領而鬥爭的大部分城市及農村中的中產階級。

這樣，美帝國主義將要同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作戰。因為它在大多數國家中要受到人民大眾的反抗，它將沒有安全的後方，而要在同一個時間內，對來自不同方向的人民作戰。

士氣這個對於任何戰爭都如此重要的因素，是特別不利於美帝國主義的。朝鮮的經驗再度證明：一個為祖國、為民族生存而戰的人民就是最優越的軍隊；而另一方面呢，一些被派遣遠離家鄉而進行征服的士兵則不能有效地使用其武器裝備，只會是一心想着如何脫離這個無謂的戰爭。

美國唯一有利條件是在它的工業潛力。但即使這個有利條件也將是有限的，因為侵略者要運輸足夠的裝備到遠隔重洋的前線去是有困難的，同時，侵略者要找到足夠的人去使用這些裝備也是有困難的。而且，戰爭性質的發展將使美國工業得不到物質上的安全。在另一次大戰中，美國工業將不再可能有迅速的增長，而相反的，它將成爲破壞的目標。

因此，在第三次大戰中雙方力量的對比對於美帝國主義是非常不利的。帝國主義者的答案是一個瘋狂的軍事戰略，即對於反抗的人民大眾大規模地濫加屠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有一定限度目標的戰爭。參戰雙方都想削弱對方而奪取其財富，但德國並不想消毀法國的資產階級或推翻法國社會的構成，而法國對德國也有同樣有限制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爲一個德帝國主義侵犯蘇聯的戰爭來說，乃是一個企圖大量殺害蘇聯人民，企圖滅絕民族的屠殺戰爭。

五角大樓的戰略家現在正計劃一個以最低限度要包括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爲目標的屠殺戰爭，證明了他們已經從德國法西斯主義者承繼了帝國主義的日益加劇的道德墮落。華盛頓的負責官員吹噓他們的主要武器將不僅是原子彈，而是，如果他們真能得到的話，氫彈，甚至細菌、毒氣和力量十倍於過去所知的新的“腦神經”毒氣^①。

在美國前任國防部長、現在的飛機製造事宜的主管人詹遜

① 下列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報紙標題：“美國加速對細菌戰的研究”（見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原子能委員會推行下的放射性毒品的武器”（見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紐約時報”）。

新聞內容載稱：“這些武器藏有精煉凝結的放射毒品，如果投於大城市中，足以屠殺大量人口。”

當美國駐西德高級專員麥克洛埃聽到杜魯門已決定製氫彈時說道：

看來，這些計劃還含有科學的進步意義。他說：

“我向諸位保證，我們對於存在於生物學上、化學上和無線電學上的種種可能性是同等注意的……我們將使用我們最有力的科學武器對敵人作全力的襲擊。”²⁴

用來對付誰？詹遜的答覆是：“原子武器不再是只有一種類型與大小的、只有在戰略上必需時才用於經過慎重選擇的目標的一種為數很少的炸彈。”²⁵ 這就是說，它們將被用於無限制的殺戮和破壞，忘記了反對使用毒氣的日內瓦公約，忘記了反對人種毀滅的聯合國公約。

無怪這些研究殺人“科學”的超人竟寬待那些用俘虜去作恐怖試驗的納粹博士。無怪他們竟拒絕檢舉那些用細菌戰爭來襲擊中國人民的日本戰犯。無怪他們自己迫害、同時還誘使其僕從政府去迫害凡是主張禁用原子武器，主張斥責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政府為戰犯的人士。

自從美國空軍對朝鮮人民進行大規模屠殺之後，奧夫斯蒂海軍少將曾經指責過這種大規模屠殺的基本形式：

“然而，戰略轟炸到現在已被公認為不可避免地包括濫殺敵國的平民婦孺……我確信我們人民的道德力量是強烈地反對這種與我們的基本理想背道而馳的軍事方法的。現在是我們從這角度正確對待戰略轟炸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在合乎人類的公論下加以審查。”²⁶

“我很高興杜魯門總統作了這樣一個決定。如果有一種氣彈比氫彈更為有力的話，我也要製造它。”（見一九五〇年二月三日“紐約時報”）

當參謀總長布萊德雷被詢問他對氫彈有什麼意見時，他說他只願作一個評論：“我想我們應該把它丟下”（是一個雙關語，意即我們應該投擲氫彈，或者是意即我們不如不要談氫彈這個題目。——譯者）。對於這樣一句“謔語”，那些全無心肝的新聞記者們竟然大笑。

爲什麼這種無人性的戰略竟被採用呢？原因之一就是美國還存着獨佔原子能的那種幻想。現在，很明顯的，美帝國主義正如其前輩德帝國主義一樣，是大大地過低估計了蘇聯。蘇聯不但能够製造原子彈，而且在發展原子能於和平事業方面，遠走在美國前面。

但主要的關鍵是這個預謀的戰爭的性質：這個戰爭要與二十億人民爲敵，與全人類爲敵。如果人民是敵人——那麼就毀滅他們！氫彈與細菌武器對於五角大樓戰爭計劃之重要性不下於奧斯威辛毒氣室對於納粹反對全世界人民陰謀之重要性。

對於發動這種巨災的人，其結局是同樣不幸的。美國人民不再能够一面過着舒適的生活，一面按着殺人的電鈕去大規模屠殺他國人民，他們自己將成爲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米·安·蘇斯洛夫^①在一九四九年末時曾在共產黨情報局的會議上的報告中說過：

“不管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其幫兇們怎樣拼命撒謊宣傳，而美國的普通人已是愈益了解到：假如戰爭挑撥者一旦發動戰爭，那末，結果只會使他們這些普通人編入軍隊，在遠離家鄉的海外國家內去送死；並且戰爭也會出現在美洲大陸上，帶來駭人聽聞的現代轟炸，使許多世代的勞動成果歸於毀滅。”

歷史證明這位蘇聯領袖的這番話並不是誇大之詞或威脅，而是對於現實情況的冷靜的估計。當斯大林預言在一九四一年蘇軍將在其本土上擊潰希特勒的軍隊時，美國的軍事專家及政客們竟大事嘲笑。但是正確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杜魯門或馬歇爾。當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說原子彈的獨佔是沒有多久了，而當

^① 米·安·蘇斯洛夫是出席這次會議的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代表，現在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譯者

莫洛托夫說在明年原子彈的秘密將不再存在的時候，這批美國專家一樣地不相信，而繼續將其戰略建立在假定原子彈可以獨佔的基礎上。又一次，歷史證明他們是錯了。

德國和日本的統治者，以其國家的福利為賭注，去從事野蠻的征服戰爭。德國與日本——包括其人民與國家——都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美國的統治者，力竭聲嘶地要以對外戰爭來維持其權力，竟願以美國整個國家及其所有財富來作賭注，去作更大的賭博。他們辯護說，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充其量最壞的情形就是誰也不能戰勝誰，全世界都成為一堆瓦礫，剩下的少數人生活在原始的生活境況中。

但他們又錯了，威廉·福斯特在他最近所著的“美洲政治史綱”中，分析過在這種戰爭中雙方力量的對比，他的結論說：“華爾街的戰爭計劃完全是一個狂妄而沒有希望的資本家的惡夢。社會主義絕不可能被軍事(或其他的)的方法所擊敗。如果兇暴的華爾街冒險家竟然把世界推向一個新戰爭，那末這個戰爭，一方面給人類造成恐怖混亂的浩劫和不必要的殺戮，但同時另一方面一定替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制度敲了喪鐘。”²⁷

但恰恰是保證這樣一個結果的力量在竭盡一切努力，想種種方法避免這個戰爭。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領導着這個爭取和平的世界鬥爭。和平運動規模的廣大顯示於斯德哥爾摩宣言上宣佈原子彈為非法的五億個簽名上。在這五億個簽名中，有五千萬個是居住在西歐的人們，而西歐乃是美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戰略中最重要地區。一九五〇年八月，歐洲政策研究國際委員會，一個反動的歐洲組織，曾發表一個報告，說美國或許必須使用原子彈。一個親美的法國記者塞凡·席瑞伯曾經這樣寫過：

“民意是如此的憤怒，以致這個委員會的主要委員們爲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向委員會辭職，裝作事前並不知道這個報告的內容。自此之後，道德上的宣告原子彈爲非法就非正式被認爲是一個在歐洲的公認的政治事實。”²⁸

甚至在西德，這個被希望成爲反蘇戰爭狂的堡壘的地方，大多數在美佔區的選民，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的大選中也投票反對重整軍備來打擊戰爭計劃，法蘭克福“晚郵報”在一次民意測驗中，發現百分之六十八的德國人反對任何方式的重整軍備。而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贊成原則上應重新建軍。²⁹

普遍於歐洲各階層的和平願望，在工人階級中有最強大的基礎。工人階級都支持法國共產黨的口號：“法國人民將永不對蘇作戰。”

最後，戰爭之迫近正加劇了美帝國主義和英、法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種種潛伏的衝突。最重要的是，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看到，他們的傀儡角色並不能靠犧牲自己的國家挽救自己的階級地位，而只會使其國家及其階級地位同歸於盡。很顯然，美帝國主義並不能通過反蘇侵略戰爭而把它們從人民的手中挽救出來。

人民要求和平的壓力正對抗着華盛頓要求戰爭的壓力。在屈服於美國的要求和抗拒這些要求之間，歐洲國家的政府正在猶豫搖擺不定。究竟要加入反蘇的狂暴行爲呢，還是採取慎重的試着走的步驟，沿着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所提倡的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可以和平共處的道路去走呢？他們也在搖擺不定。這樣，華盛頓不但不能牢牢地掌握着資本主義的歐洲，而且面臨着甚至與歐洲國家在形式上的同盟都要喪失的危機。同樣的矛盾情形也正發生於半殖民地各國，特別是亞洲各國。

當杜魯門加緊戰爭動員之際，這些背道而馳的力量正威脅其整個戰爭計劃；而創造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這也將粉碎華爾街統治世界的迷夢。和平不僅意味着社會主義世界將更有不斷的進展，而且意味着要把西歐殖民地化的企圖的失敗。在西歐，一旦美國的戰爭駐軍離去，前面數章所說明的馬歇爾計劃的失敗，就一定導致美帝國主義統治的終止。和平意味着民族解放力量、特別是在亞洲，將取得更大的勝利，而因此進一步縮小帝國主義攫取超額利潤的領域。

雖然有愈來愈多的證據足以說明美帝國主義不能贏得另一次世界戰爭，但它却更瘋狂地走上這條道路，它寧願走這條道路而不願在一個和平世界中漸漸失去其地位。和平與戰爭，究竟那一條道路取勝？這個問題只能由美國人民作最後的答覆。

第十一章

帝國主義和美國人民

帝國主義的擴張給美國人民帶來了什麼“生活方式”呢？帝國主義者怎樣用從國外得來的貢物試圖解決他們國內的問題呢？他們怎樣試圖使工人階級對他們的國外冒險保持中立並使他們支援這種冒險呢？最後，帝國主義把我國的人民引導到什麼命運呢？

美國工農業的巨大生產能力與大多數美國工人的低下的生活程度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海勒爾社會經濟委員會所編的“一個工薪勞動者的家庭預算”¹ 提供了真正的美國生活程度的一幅大略的情景，跟官方宣傳所描繪的不同。這是加里福尼亞大學專家們每年所作的計算，根據工人養活他們家庭的實際費用來得出一個“公認的”生活程度^①。

這裏是一九四九年預算中的幾項：每人每週八分之一磅的牛油；每人每週兩磅半的肉類或魚類；對於主婦，每兩年一件價值十美元九角一分的毛織品盛裝，每年一件價值九美元九角五分的人造絲出客服裝，每年兩件價值二美元九角八分的家常布衣；不上戲院或音樂會，每月看二輪電影兩次；不買書，每天一份報紙，勉強買些雜誌；不作假期旅行；部分的醫藥費，因為“很明顯的，如果想準備一筆足夠請私人開業醫生的醫藥費，支出就會

^① 有三種生活程度，第一種是體力勞動者的，第二種是薪水生活者的，第三種是行政管理人員的，這裏所說的是體力勞動者的預算。

大增，那對於只有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是空想而做不到的”。

一九四九年，根據海勒爾預算，四口之家的花銷共達四千零四十美元又五角四分。那年全日工作的工人每年平均所得是二千八百六十九美元，即為海勒爾預算的百分之七十一。那就是說，在那年不受失業影響的一個工人的平均工資遠不足以維持妻子和兩個子女的中等生活。

因此，對於大多數人民說來，“美國的生活水平”不是高的生活水平，而是和他們的勞動成果相比起來低得可笑的生活水平——雖然有從亞洲、拉丁美洲等地得來的贓物，也還是一個很低的生活水平。

美國的工人一方面停留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時却為壟斷公司製造不斷增加的財富。根據官方的統計，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九年，每個工人的物質生產量增加了一倍²，而每個工人的實際工資（大大地誇張了的）只增加了五分之二³。這就是說，到一九三九年，僱主不僅在每個工人身上獲得了比四十年前多一倍的生產量，而且他們還在產品中為自己保留了比以前大得多的一份；他們從每個工人身上攫取的實際利潤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以上。

總之，勞動的剝削率急劇地增加了。工人們必須工作得更緊張，他們必須應付高速運動的工作過程並管理更多的機器。他們的勞動壽命縮短了，許多人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上時即不能再行工作。安全措施的缺乏引起了許多工業事故和疾病，在美國由此所引起的死傷比戰爭所造成的還多。

在美國由於生產能力和對工人的剝削達到了極高峯，壟斷資本主義就造成了大規模的勞動力過剩，即大量的失業羣衆。由於失業人數隨着帝國主義制度的腐朽而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

美國工人連就業工人的那樣不足的生活水平也可望而不可即。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的經濟危機造成了比過去任何一次危機多一倍的失業者，但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却使一九二一年看來倒像是一個繁榮時期了。

在連續的四年之中，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人的工業生產量一直低於一九一三年（約二十年前）的水平。幾百萬農民和城市小業主被消滅了。幾千家銀行，甚至大企業都破產了。一千四百萬工人陷於失業，而且在整整十年之內，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勞動力沒有工作。饑餓、搶奪、胡佛區（當時，美國大量失業人民被迫遷出原來居住的房屋，臨時在郊區蓋搭簡陋的木房棲身，這些由於經濟危機而形成的貧民窟一般稱為“胡佛區”，因為當時美國總統是胡佛。——譯者）、救濟豬肉和救濟豆等對一大部分的美國人民成為家常便飯的生活方式。

美國人民屢次抵抗在富饒生產中過可憐的生活，抵抗不斷增加的剝削，抵抗失業現象。他們比過去任何時期更猛烈而且更有力地向造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苦難的壟斷資本家作鬥爭。

從這些鬥爭中，工人們在美帝國主義和平時期的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獲得了實際工資的顯著增加、勞動條件的各種改進和政治的讓步等，例如華格納法案和初步的社會安全法律。此外，黑種和白種工人一起參加新的工會，削弱了那分裂工人階級的民族壁壘。

這一時期的教訓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工會組織的繼續增長上，反映在美國人民的要求充分就業、社會安全以及過得去的生活水平上。這引起了羅斯福總統四大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口號，甚至強迫國會通過了認為可以防止嚴重失業的法律（一九四六年

的就業法案)。

這一切情況都是對華爾街大亨的嚴重威脅，他們害怕美國工人會加深他們的認識並堅持結束那帶給他們如此無意義的苦難的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暫時解除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工廠全部開工，失業實際上消滅了。但是戰爭增加了美國工廠的生產力和效率，這樣一來就擴大了生產能力和人民大眾償付消費商品的能力之間的鴻溝。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一段和平時期，那麼至多在短期的拖延之後，比三十年代更厲害的崩潰，必將不可避免。

另一次經濟危機所包含的政治危機嚇壞了金融資本的領袖們。因此保羅·霍夫曼力主實行“有節制的資本主義”，把未來的工商業活動的下降限於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因為“那樣我們還能活下去；如果發生像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那樣的崩潰，營業額下跌百分之五十以上，那末我們就活不下去了。”⁴

自認為忠心於資本主義不亞於霍夫曼先生的菲立浦·莫萊曾經警告說：“五百萬人(失業者)是險惡的。七百萬人就是不景氣。一千一百萬人就意味着騷亂和流血了。”⁵

杜魯門總統曾經斷言：“一九三二年，私有企業制度瀕於崩潰。美國人民可能轉向其他制度的真正危險曾經存在。如果我們要在自由與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得勝，我們必須確信，我們決不能讓這樣的不景氣再度發生。”⁶

寄生與“有節制的”資本主義

美國的統治者怎樣來應付經濟危機呢？在帝國主義階段，暫時支撐不穩定的資本主義結構的一個方法，是靠大大地發展寄

生性的上層建築的。幾百億美元利潤與超額利潤的一部分被壟斷資本企業的各种助手所吸取了。在美國，這些人包括數百萬為大公司作分銷代理人的小業主；還有幾百萬從事推銷、廣告等活動的僱員；還有幾百萬公務員、士兵和警察；還有幾百萬從事服務的人員；銀行及其他大資本的金融機構的僱員；還有靠不斷增加的聯邦公債為生而同時是大公司的小股東的那些食利者^①。

這個上層建築起着兩重作用。首先，它在那些依靠超額利潤作為收入的人們中間為帝國主義提供一個社會基礎。幾百萬依靠替主子計算、保護或賺取來自國內外的壟斷利潤為生的人，都勢必把他們自己的利益和金融資本的利益合為一體。他們形成一支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在某種限度內，它抵消並僵化了工人階級逐漸組織起來的力量。其次，受上層建築僱用的人們獲得越來越多的收益，他們以此購取市場上不斷增加的商品的一部分。

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寄生狀態在美國生活中已經大為發展，並被魏勃倫那樣的作家和社會主義作家們加以揭露。這一趨勢，可由從事商品生產的人口比例之逐漸減少一事上，約略顯示出來。在一九二九年，每有一百個從事商品生產的人^②，就另有七十四個從事商品生產以外的工作的人。在一九三九年，每有一百個從事商品生產的人，就有八十七人幹他種工作的。而到了一

① 政府辦事員、商店推銷員、小業主等通常是動勞工作的人們，他們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受害者，而且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所做的工作在任何社會都是必需的。把這些人們歸入帝國主義的寄生性的上層建築決無中傷他們之意，不過說明他們的職業在一個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盡的經濟職能而已。

② 包括農業、採礦、建築、製造、運輸、交通和公用事業的僱員以及農場經營者在內。這個範圍比政府機關所用的商品生產工業的定義廣泛些，並包括一些難以分類的和混合性的行業在內。

九四九年，每有一百個從事商品生產的人，就另有一百零六個幹他種工作的⁷。

雖然做非生產性工作的人增加了，寄生狀態並沒有為帝國主義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危機證明，寄生狀態可能延緩危機，却不能阻止危機。此外，嚴重的危機影響了上層建築和生產工業，使問題更加難於解決。當大資本家的利潤猛烈削減時，他們不僅解僱生產工人，而且也解僱推銷員、服務員、廣告代理人和政府公務人員。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的萎縮，不僅由於生產工人工資的減低，而且也由於上層建築消費力的減低。

此外，受僱於上層建築中的人們，知道賜予他們的比生產工人多一點的好處，是不足道的和暫時的。他們受過削減工資、失業、饑餓等等帝國主義所帶來的一切苦難。因此，他們越來越趨向於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成立自己的工會，削弱帝國主義的社會基礎。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當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初獲卓越成就的時候，資產階級的領袖和他們的辯護者也在尋求資本主義下的計劃方法。他們希望改變他們制度的明顯的腐朽性，用以對抗人們對社會主義計劃的嚮往。

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注定了這種企圖的必然失敗。資本主義的一切特徵，諸如生產資料的私有、利潤是生產的主要推動力、只有強者和最殘酷者才能生存、對工人的剝削等，都是與為公共利益而計劃的思想矛盾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帝國主義決不能減輕那種矛盾。壟斷企業只是擴大了資本主義所依據的基本特徵而已。龐大的公司是生產資料更大的私有主，為攫取前所未聞的利潤的貪慾所驅使。各壟斷企業，儘管有着彼此間的卡

特爾協議，無論在一國之內和在國際上都是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對工人的剝削一般地都加強了，而且在這之上還加上對被壓迫民族的超額剝削。

因此資本主義“計劃”的一切方案，歸根到底只是一些手段，使最強大的壟斷資本藉此利用政府機構來消滅那些早已削弱的競爭者，使對工人的加緊剝削和他們本身更大的利潤合法化。其結果就不是計劃而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了。這不但不能緩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制度所遭遇的問題，反而使問題終於更加嚴重。

“有節制的”資本主義的計劃起源於歐洲，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危機期間才在美國風行一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大戰結束以後，政府節制受到特別的重視。美國的這種資本主義“計劃”的中心活動，是設法銷售壟斷企業所擁有的商品，這些商品是大多數人民買不起的，因為他們在資本主義下變得窮困了。如果彌補生產能力與銷路之間不斷擴大的鴻溝的種種努力遭到失敗，經濟危機及隨之而起的政治混亂就必定接踵而來。若干例子證明，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採取的這類主要措施結果竟是騙人的戲法，它只會使將來發生的危機更形惡化，而同時在這過程中使最強大的壟斷企業賺得更多的美元。

爲了鼓勵勞動人民購買他們買不起的商品，政府的貸款條例改變了。這種貸款的過分擴大被公認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加劇的原因之一。但是單單在一九四九年一年內分期償付貨價的貸款的增加就差不多等於一九二九年年底的全部未償的貸款⁸。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間未償的國內抵押貸款，其每年平均增加數爲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這十年間每年平均增加數的三倍⁹。當然，市場是暫時靠這些方法維持住了。但

是，到一九四九年年底，全部薪水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只好用來支付消費者貸款的本利，這是勢必要破壞消費品市場的一個重負。

在第八章裏曾經指出，馬歇爾計劃是如何被用作向國外傾銷剩餘商品的一種工具。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的整個期間，全部輸出品的五分之二左右是靠政府傾銷來供給資金的。可是，製造這種人為市場所用的方法，使其他國家陷於貧困，切斷正常貿易等等事情，對美國商品市場的破壞，却超過了政府傾銷所製造的市場。雖然和以往比較，現在美國商品生產中靠出口銷售的比例是更大了，可是以實際的輸出佔商品總生產量的比例而言，却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百分之十跌落到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八·五¹⁰。

至於資本的輸出情況也是如此。以資本輸出來緩和資本過剩的壓力以及緩和與投資一同找銷路的商品的壓力，原是帝國主義慣用的方法。如以上幾章所述，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在許多方面為美國金融資本尋求出路的。但是世界人民對帝國主義超額剝削的日益增長的反抗、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矛盾，使得華爾街不可能從它所授意的擴張政策上得到充分的好處。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全部純粹私人投資中約有五分之一是國外投資，這個比例在一九四八—四九年度減少到十五分之一¹¹。私人的資本輸出已不大有安全活門的作用，縱然實際上需要的是一個更大的活門。

以戰爭來逃避經濟危機

戰爭經濟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最腐朽、最寄生性的形態。它逐漸成為“有節制的資本主義”主要的、繼續發展的特徵。它為商品供給了唯一“可靠的”市場。它暫時解決了普通的經濟危機，但

這種解決方法不但沒有穩定資本主義，反而創造了一整套加速資本主義制度死亡的經濟與政治矛盾。

希特勒把失業的德國人送進軍火工廠。這就是他能夠藉以轉移德國工人對自身階級利益的注意力，換得他們的容忍，以及在許多情況下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支持的物質基礎。效法希特勒征服世界的全國的美國金融資本家們，也走上了他在國內經濟政策上的道路。

雖然如上所述，“有節制的資本主義”有過許多其他方式的嘗試，但是，事實上，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作為防止嚴重的經濟崩潰的手段而付諸實施的主要“節制辦法”。如果美國不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戰爭每年支出三百億美元，它早就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了。如果不是遠在一九四八年起就有六百萬工人和士兵受僱於軍事工作^①，那麼大規模失業就早已發生，莫萊先生所不勝憂慮的解除失業的羣衆行動也早已發生。

自一九四七年起，軍事預算逐年增加，一方面為的是避免國內的災禍，同時也為的是促進對外擴張。為了這兩個目的，每年在必要時機，就發生一次外交上的新挑釁。

請看保守的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是怎樣敘述這種瘋狂的“計劃”的：

“政府的策略家以為自己已經找到了奇妙公式，幾乎可以保持無盡美景。他們現在已開始懷疑，到底有沒有所謂‘無窮動力’的妙事。……冷戰是一服觸媒劑。冷戰是一架自動打氣筒。活塞一扭，公衆便叫囂要求更多的軍備費用。扭一下另外一個活塞，

^① 武裝部隊一百四十萬人，武裝部隊所僱的平民八十五萬人，接受軍事訂貨及對外援助訂貨的私營工業的僱用人員四百萬人，總共六百二十五萬人。

叫囂就停止了。杜魯門的信心和趾高氣揚，就是以這個‘杜魯門公式’為基礎的。有人對總統說，良辰美景的杜魯門時代在一九五二年以後還能夠維持很久。冷戰的需要，如果充分加以利用，幾乎是沒有限度的。”¹²

這就是吹噓“世界領導權”的人的冷酷無情的公式。當然這是一個妄想的公式。實際上每次活塞都朝着同一方向扭的，就是扭向更高的軍備預算，扭向戰爭。在上文發表後一個月，總統把塞門大開而在朝鮮進行干涉戰爭。

備戰與戰爭，不僅可以減輕壟斷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反失業行動的恐懼，而且還能特別滿足他們追求利潤的無限貪慾。他們曾作過笨拙的努力，企圖掩飾這點。爲了答覆蘇聯對美國壟斷資本企業靠第二次世界大戰發了大財的指責，國務卿貝爾納斯常常說，美國在那次戰爭中耗費了三千億美元的巨款。但是那三千億美元却給金融資本帶來了五百億美元的公司利潤（除稅）、每年五十億美元償付戰債利息的固定收益以及各種其他方式的非法收入。這些報酬是太誘人了。那就是“老政治家”巴魯區的言論的經濟基礎，他說在戰時就覺得和平不好，而在和平時候就覺得戰爭好。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在尼埃調查的時候，抨擊軍火製造商，罵他們是爲追求利潤而引起戰爭的“死亡販子”，這是很流行的。但是在近代“總體”戰爭中，死亡販子不僅包括槍砲和軍火的製造商，也包括所有的壟斷資本。

各種靠大批屠殺平民（亦即五角大樓戰略的精髓）發財的資本家起着一種特別邪惡的作用。一九四七年，當飛機製造商在和平時期營業中虧本時，聯合飛機公司和詹森的伏爾第聯合公司發動了一次擴大空軍力量的宣傳運動。這兩家公司是分別担任

製造B—三十六型超級重轟炸機的引擎和機身的。經過宣傳運動及附帶的收買議員活動後，這種飛機就得到了價值幾億美元的訂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用的B—十七型轟炸機每架政府付款二十三萬八千美元，而政府為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購買的B—三十六型轟炸機則每架付款五百七十五萬七千五百八十美元¹³。

在整個美國歷史過程中杜邦家族是一貫依靠製造軍火而建立起它的財產和它的化學品壟斷公司的。現在它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製造業中，居於領導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杜邦公司在華盛頓州的漢福特生產製造原子彈的鈾。之後，他們在一九五〇年獲得了製造更加厲害的氫彈的第一個合同。他們原來就在一般爆炸藥的生產上佔統治地位，而且又是雷明頓軍火公司的最大的股東。他們在戰時與負責原子彈設計的格羅夫斯將軍關係良好，所以他在退役後就被聘為雷明頓軍火公司的一個主管人員。

當杜邦公司進而製造氫彈的時候，摩根電氣設備托辣斯、通用電氣公司從它那裏承接了漢福特工廠。通用電氣公司在一九五〇年宣佈，它放棄了發展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實驗，以便把它的全部人員轉向軍事工作。

生產消費品的公司則取得了最強大的壟斷企業所照顧不到的溢流出的利潤。早在一九四八年，內衣製造商就為軍事生產而動員起來，其所生產的男用服裝，被定作軍用¹⁴。

金融資本家全都分享到備戰的利潤，不管是直接通過軍事訂貨，還是依靠馬歇爾計劃的傾銷政策，還是靠國家公債中不斷上升的利息付款。對於輕工業和重工業，對於大金融業，這種紅運提供了出售過剩產品的市場，有錢可賺的經營，也讓過剩的資

本有了投資的機會。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和二次大戰相比，是更加有利可圖。其所以產生這樣的結果，是由於和奪取世界霸權相聯繫的反動勢力獲得了普遍的進展。這種進展削弱了工人的階級地位，並使壟斷資本有可能增加其剝削率。公司的純利（除稅）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間的每年平均約四十億美元躍升到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間的每年平均一百億美元，更躍升到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的每年平均一百九十億美元。一九五〇年的後半年，每年平均率達到二百四十億美元¹⁵。

難怪哈佛大學教授斯力希特的話使許多普通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大吃一驚，因為他說出了他的大資本家聽衆們所熟知的事情——即對蘇聯的“冷戰”從帝國主義經濟觀點看來，乃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們要感謝俄國人，他們幫助美國資本主義進行得比歷來更好。”¹⁶

代表軍國主義經濟學的一篇特別厚顏無恥的言論，就是麥克格勞·希爾國際公司的副總經理約翰·却普曼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對出口經理人協會的演說：

“我們商人一定不能忘記，斯大林所最不要的事情就是戰爭。……所以在政治上，讓我們認清未來的實際情形：沒有真刀真槍的戰爭；會有更多像經濟合作署那樣的買賣，不過這次是在遠東；國內會有逐漸擴大的國防計劃，以應付來自莫斯科的威脅。這雖不是我們所要的那種悠閒自在的光景，但是也決不是有勇氣的出口商所吃不消的事情。以往四年的經驗證明，這筆生意既有利可圖而又令人興奮。……我們的政府在冷戰中暫時失去了主動，而且我們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中國）。……一種特殊的責任目前落在你們出口經理人的肩上……我們可以用我們最熟習

的武器來跟日益增劇的危機作鬥爭。而且，讓我們不要忘掉我們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我們應付今後五年的挑戰越是成功，那麼對於我們的事業和對於我們自己將愈為有利。”（重點是我加的——著者）¹⁷

在這裏，盛氣凌人的買賣人，用庸俗的狂妄態度暴露了關於“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拯救各處自由人”的偽善口吻，這些口吻是從官方和報館主筆那裏產生的。而且同時，關於“蘇聯侵略”的謊言也不知不覺地暴露出來而承認蘇聯是要和平的；從指望在遠東有更多的像經濟合作署那樣的商業這一點也暴露了美國帝國主義正在成熟中的對亞洲的侵略計劃。

使工人捲入戰爭漩渦中去

資本家在自己同道之間談論時，都不諱言他們的擴張運動是超額利潤的來源。但對美國人民，却另有一套說法。列寧曾說，由於美國人民的自由傳統，美國資本家必須煞費苦心地對工人隱瞞他們的戰爭目的。這種欺騙不限於“靠實力來求得和平”的虛偽諾言以及反蘇的宣傳。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重要的是利用美國人民對於失業的恐懼心理，他們對工人們說，對外擴張會給他們工作機會。起先戰爭的意圖是隱瞞着的。工作是“和平的”工作，靠馬歇爾計劃來“餵飽饑餓的人民”。這個諾言不久被拆穿了。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馬歇爾計劃旨在使歐洲人民陷於貧窮，它減少了出口市場。此外，對社會主義各國進行的經濟戰，又割斷了那擁有八億人民的日益擴大的市場。

在日漸縮小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範圍內，資本的輸出沒有建立新的市場，只是把生產從美國的高工資企業移到其他國家的低工資企業中去。美國的石油工人和煤礦工人失業了，因為

石油托辣斯用他們從擴大了的國外財產上所得的進口貨，來代替了國內的石油和煤。到了一九五〇年初，雖然銅的用途大增，而在美國僱用的銅礦工人却比一九三九年為少，因為銅礦的大老闆轉到智利及其他外國的銅礦去了。雷明頓—蘭德公司在一九四八年把它在美國的五個廠的僱用人員裁減了三分之一，因為它把生產移到在蘇格蘭、英格蘭和印度的工廠去了¹⁸。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和國際收割機公司等巨大的聯合企業的經營中，顯然有同樣的趨勢。

美國工人不但沒有從對外擴張中獲得更多的工作，反而獲得了更多的失業。這種局面，結合了國內市場的惡化，就在一九四九年引起了經濟危機的開端。從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工業生產下跌了百分之十以上。那一年，每八個體力勞動者之中有三個人至少要失業兩個月¹⁹。政府及私人方面的專家一致承認在一九五〇年間將有進一步的惡化。

美國金融資本應付這種危險情勢的唯一辦法是乾脆脫掉遮掩備戰的外衣。因此，國內的挫折和上一章所討論的國外挫折共同加速了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日程表。現在對工人們所灌輸的，是軍事生產會帶給他們繁榮的那種惡毒理論，而不再是什麼藉馬歇爾計劃救濟饑民來維持就業的神話了。當廣泛的失業在一九四九年初出現時，杜魯門的解決辦法是訓令軍事機關對失業者超過百分之十二的地區給予軍事訂貨合同。

原子能委員會也跟着散佈過這種宣傳：“洛薩拉莫的一個普通原子工人的收入是三千八百七十美元左右一年，這也許是任何美國城市中每個工人的最高工資了……全體洛薩拉莫居民的每人平均收入是一千九百七十五美元，當地官員也認為這是一項世界紀錄。”²⁰

製造原子彈就能過豪華富裕的生活！^①

要轉移美國人民爭取四大自由的鬥爭，讓他們去幻想在軍事工廠中獲得工作，要他們去向“蘇聯帝國主義”的妖魔作鬥爭，這個任務是不能直接由壟斷資本家來完成的。美國的工人對於大資本家的貪婪和反人民的暴行，經驗豐富得很。這一工作必須由那些工人們相信得過的人來做，這批人就是右翼的工會領袖們。

右翼工會領袖是些什麼人呢？他們怎麼會受到支持呢？美國的壟斷資本家，正如自羅馬帝國時代以來的他們的同道一樣，在他們無法阻止或破壞被剝削者的組織的時候，就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他們的方法是幫助那些願意以資本主義企業的精神來辦理工會的人獲得領導權。讓工會領袖領高薪水。讓他們的幾個同夥擔任一些不重要的政府職務。這種工會領袖，每年領取至少二萬美元的高薪，他們的生活狀況和觀點和大資本家差不多了。在這種人領導之下的工會就不會在緊急時期給工人以有效的保護。

這種領袖必須在工會內有支援的基礎。這基礎主要是在少數高工資的工人，特別是在熟練的技工當中找到的，他們依靠工會鬥爭，已經取得足以使他們過小康生活的工資。壟斷資本家可以出得起給這一小撮工人高於平均工資的錢，以便在工會中保持“中庸之道”和政治上的平靜。

^① 事實上，軍事工廠的工人往往是特別受剝削的，僱主們利用“保密”條例威嚇工人，不准為他們的要求而罷工。雖然如此，從一九四九年夏季到一九五〇年夏季，勞聯的工人們還是在橡樹嶺原子能工廠進行了三次重要的罷工。在炸藥工廠、運輸軍用物資等方面，更有發生事故的特別危險。一九五〇年春，新澤西州的潘斯·安波城因港內一艘駁船正在裝運出口的炸藥時發生爆炸，損失慘重，死了十四個工人。

列寧曾敘述過一個每年有十億法郎超額利潤進益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怎樣花了一億法郎來賄賂一部分上層工人，使他們支援侵略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壓迫。他指出那些受賄的人就是勞工部長、軍事工業委員會委員、工會官員、範圍狹隘的專業工會會員、公務員等²¹。今天，美國的統治者除了從整個美國工人階級榨取壟斷利潤以外，每年還從國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及國內的黑種人那裏獲得一百一十億美元以上的超額利潤（參閱第三章與第四章），他們自然可以更進一步實行這種方法了。

當美國勞工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強大和更有組織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走上了征服世界的途徑，它對右翼勞工領袖所採取的籠絡手段，正如西瑟爾·羅得斯及其後的英國帝國主義者在五十年的殖民地征服中用以對付右翼英國工黨黨員的一樣。

右翼工會領袖，在勞工運動中，以激進響亮的言詞來掩飾他們替大資本家所作的宣傳。這是社會民主黨人的方法。五十年來他們一直是帝國主義在歐洲勞工運動內部的主要支持者。在美國沒有重要的社會民主黨，但是在有勢力的工會職位上有幾個社會民主黨的集團與個人（例如路德、杜賓斯基、里佛），以及自稱為左翼的叛徒（例如庫蘭、奎爾）。這些人竭力把他們的論調和策略模倣莫萊和格林等領袖。

國務院和經濟合作署就是從社會民主黨人中任用了大多數的勞工參贊和代理人，派到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去分化那裏的勞工運動。除了勞工運動中的社會民主黨人以外，還有如“美國民主行動會”和紐約州的自由黨等中產階級的集團，它們的性質和工作方法多半是社會民主派的，而且在它們的領導機構中有許多社會民主黨人。這些組織在試圖阻止美國廣泛的和平組織

與反戰政黨的成立上，起着特別重要的作用。

美國大資本家，面臨着具有近代戰鬥傳統的大規模工會運動，爲了打破工人對第三次世界大戰計劃的反抗，不得不在美國以空前的規模利用社會民主主義。

美國商會的一本手冊表明了這種趨勢，它勸告“忠貞的”工人怎樣把共產黨員趕出工會，它指出：

“他們可以有些無產階級的集團，如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以及非斯大林派的共產主義集團，作爲他們的盟友。……在工會鬥爭中，這種老練的領袖貢獻出組織能力和領導才幹，雖然他們不同的思想意識可能增加混亂。那些出於愛國或宗教的動機而缺乏經驗的人最初只能貢獻熱情與充實人數，而需一些時間以獲得經驗。”²²

不消說，商會決不是在替社會民主黨人宣傳他們的建立工會並與僱主鬥爭的經驗和領導才幹，而是吹噓他們在分裂工會運動上能堅決運用這些經驗與領導才幹。

在美國像在歐洲一樣，與社會民主黨人狼狽爲奸的是梵蒂岡，它利用天主教會的權威與紀律，努力使幾百萬的天主教工人轉而支持反動好戰的政策，這種政策是和宗教不相干的，但是和梵蒂岡的反蘇、反社會主義運動大有關係。梵蒂岡在美國工會運動中主要的有組織的根據地，是天主教工會聯合會，它和社會民主黨人一樣，僞裝關心戰鬥的工人行動，而實際上却集中全力來腐蝕和分裂勞工運動。

這些力量拋棄了“產聯”的進步與反戰的傳統。直到一九四七年，“產聯”的對外政策決議案還主張一個和平的政策，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原子彈、反對壓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它特別強調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的必要。但是幾個月之內，“產聯”的

領導方向就違背了這個決議而支持大資本家的對外政策的主要計劃了。一九四九年“產聯”對外政策決議案，反映了這個叛變，它支持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恢復在卡特爾控制下的魯爾區兵工廠、加強殖民地壓迫的第四點計劃、囤積原子彈的巴魯區計劃。它特別強調了種種反蘇謠言。

對內政策也一樣。“產聯”的會員都猛烈反對塔夫脫—哈特萊法案並堅決主張工人團結。但是右翼領袖們却乖乖地服從了塔夫脫—哈特萊法案，並利用它做分裂工人運動的工具。他們在反共宣傳掩護之下，把十一個國際性的工會開除出“產聯”，指使工會互相攻訐，廢除了工會內部的民主形式，設法防止工人們爭取增加工資的鬥爭。他們使“產聯”退出了世界工聯。

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的工作，實際上是停止了。工會會員人數減少了。工人的反戰活動在許多工會中事實上成爲非法。因此工人中佔大部分的反對戰爭的工人，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而且整個工人運動在反抗僱主對它的進攻，或反對僱主走向戰爭的發展中，均陷於不利的地位。如果說，右翼工會領袖在他們破壞歐洲工人運動的活動抵得上國務院裏所有的外交官僚的話，那末他們在効勞於美國金融資本這方面實在抵得上美國所有的以破壞罷工爲職業的工賊。

反動派與沙文主義

列寧說，帝國主義就是全綫的反動，在金融資本的本國內如此，在他們的國外勢力範圍內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工人階級的革命與瀕於革命的形勢席捲歐洲的時候，他的話具有更大的意義。若干國家的統治者憑藉了最極端的反動形式——法西斯主義——來打敗工人。民主的制度被廢除，共產黨

人、社會主義者、工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都遭到拷打、監禁、殺害，受津貼的暴徒匪幫進行着恐怖的統治。文化機關被查封。全體人民被奴役，受鄙視，並被教唆去憎恨其他民族的人民和把他們認爲是劣等民族。統治者完成了這些，就可以動員人民來進行侵略的戰爭了。這種方法在法西斯的德國實行得最徹底。

如在第五章已經討論過，美國和金融資本既然走上了征服世界的道路，必然要竭力鎮壓一切國內的反抗。實際上，那就是企圖在美國施行法西斯主義。右翼勞工領袖的分化策略跟大資本家與政府方面走向法西斯主義的這一總的趨勢結合起來了。

在歇斯底里不斷高漲的戰後五年中，政府在右翼勞工領袖贊同之下，迫害共產黨員並逮捕其領袖。這種法西斯式行爲，助長了其他的反動進攻。對黑種人和外國血統的人們的恐怖行動增長了。反對戰爭的人成千地從各種工作崗位上被解僱。宣傳和教育系統大多不准傳播一切進步的和反戰的思想。政治上的拘禁、消滅人權法案的憲法保障的企圖、司法制度對反動勢力愈益屈服、聯邦調查局權力的日益擴大、對十一個共產黨領袖的審判、對付僑民的放逐手段、“緊急”權力之逐漸集中在總統手裏，凡此都表明了走向法西斯警察國家的趨勢。一九四七年塔夫脫—哈特萊法案與一九五〇年麥卡倫國內安全法案的制定，就是這條路上的里程碑。

美國人民越來越聽不到和平與理性的呼聲，他們所能得到的是愈來愈強烈的憎恨人類以及民族優越的宣傳——總之，就是沙文主義。他們用宣傳“黃禍”的同樣方式攻擊俄國人和中國人，稱之爲“亞洲匪幫”。“黃禍”是以前在美帝國主義與日本鬥爭中用來爭取人民的支援的宣傳。

杜魯門自誇說，在美國，我們認爲人的生命是寶貴的，可是

美國的轟炸機却在朝鮮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老弱婦孺。同時，在朝鮮的美國將軍們在提到李承晚軍和朝鮮人民軍時使用了極盡侮辱的辭句。而在華盛頓，一個國會議員竟公然在一個國會委員會裏粗暴地侮辱一個爭取人權的黑種人領袖，並表示要毆打他。

冒牌教育家、陸軍上將艾森豪威爾誇耀說：“我國統一起來就能征服全世界，”²³ 而徵兵局長赫爾舍則要求更多的“殺人者”來試試看。

戰爭與美國人民

許多自由主義者以為，宣傳共產黨為非法、發動一個侵略戰爭，還可能保持美國的民主政治。由於美國人民自由傳統力量的強大，以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反動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內及其後對民主權利的進攻終於受到了挫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公開宣佈的反法西斯目標以及人民的積極參加，使得美帝國主義者在當時不可能發動同樣的進攻，雖然他們有自己的反動的戰爭目標。

很明顯地，這種比較是不適用於計劃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在這樣一次大戰中，美帝國主義將遭到全世界多數人民的反對，美國人將不得不擔當起幾乎全部的作戰任務和死傷。

德國工人所遭遇的歷史，證明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如果企圖領導反對共產主義的世界十字軍，不可避免地將使它的工人階級以及所有那些為進步與人道而奮鬥的人們陷於屈辱、貧窮、最後大批地死亡。

在法西斯德國，到了一九三八年，即完全過渡到戰爭經濟的一年，工會與罷工都被取締；工人們不能離職，而在某些部門還被強制調做別的工作；重工業的工作時間被延長到每週五六十

小時；事故率至少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健康情況惡化了，社會保險金減少了；婦女、兒童和老人被迫進工廠做工；每小時的實際收入比一九三二年危機時期的最低收入至少減低百分之十；越來越厲害的物資缺乏使人們排隊購買、使住房過分擁擠、使人民只能獲得劣質的代用食品和衣料。

多數德國工人從佔領國家的劫掠上所得的好處只是曇花一現——只有從一九四〇年底到一九四一年初的一段時期。然後，在開始進攻蘇聯之後，德國工人的情況，就“從嚴重變到絕望的地步。”²⁴

德國工人只享有一點好處，那就是劫奪到德國來的千百萬奴隸勞動者都備受虐待，以致不是在工作中迅速死亡，就是在他們精疲力盡之後死在法西斯的毒氣室裏，而德國的工人却還吃得飽，不致因力竭而死。在其他方面，德國工人也是受殘酷剝削的。他們中間越來越多的人死在事故與轟炸中。他們成百萬地死在前綫。

法西斯國家使它們的工人——及其全體人民——比資本主義歷史上任何時候生活得更為困苦。

美國正在試行着希特勒德國的勞工政策。但是像杜魯門總統那樣打破紀錄地發佈反勞工的取締罷工的命令，以及使用軍隊來破壞鐵路工人罷工的行動，還不過是開端而已。

動員計劃要使美國工人降到奴隸勞動者的地位。

麥克格勞—希爾出版公司是一個替工業與金融壟斷資本家服務的強大宣傳機構，它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一個專題報告中敘述了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將發生什麼事²⁵：“要是我們不能命令每一個人到哪裏去工作、做些什麼、獲得什麼報酬的話，我們就不能再打一次大戰。”

自然，“我們”是指麥克格勞—希爾所代表的壟斷資本。

“整肅”了共產黨人的工會想要保障會員的利益，也是不許可的；“還有一件事我們必須做的（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做的），就是乾脆取締罷工，把煽動罷工以叛國罪論處。”

把共產黨人與主張和平的人士關進監獄或集中營以後，其餘的美國人想要有任何民主，也是不許可的：“當然，各式各樣的公民權利將受到嚴厲的打擊……各種平時無罪的活動將變為可疑。例如，即使對政府工作的有益而善意的批評也很難和叛國的煽動加以區別，所以要把它壓制。”

至於美國的生活水平，該報告對讀者肯定地說，結合猖獗的通貨膨脹，將來要採取嚴格的限制工資，並對工資課徵重稅。總之，戰爭將是壟斷資本老闆們的好日子，他們將規定一切條件，而享受對美國勞動人民的空前剝削。該報告的結語說：“另一次大戰將加重警察工作。一切甜頭現在都用不着給了。這回除了鞭子以外就不用別的了。”

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僅是針對着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老百姓，而且也同樣是針對着美國的老百姓。

一九五〇年中進攻朝鮮以後，美國政府趕緊實行這項計劃。希特勒的老口號“大砲代替牛油”流行起來了。全國製造商聯合會會長克勞特·蒲南警告說，美國人“將有五年、十年或十五年生活在警備狀態中”²⁶。

他沒有提到他和他的同夥將是警備隊的統治者，從美國人民的苦難中獲得數十億美元。他也沒有提到他的計劃將給美國人民以及各國人民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恐怖、無意義的集體屠殺、城市與工業的毀滅、對一切現代文明的痛心的摧毀。他也沒有提到美國人民必須付出的特別的、長期的代價，好像那自稱為世界

征服者的發源地——德、日帝國主義的人民今天所付出的那樣。

美國人民的特殊任務

在第二章中曾說明美國的托辣斯把它們的勢力擴張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在第十章中又說明了美國的武裝部隊不停地向社會主義世界的邊境進迫，企圖在一次新的大戰中征服這三分之一的人類。正如第六章所證明那樣，美帝國主義在“美國領導權”的狂妄口號下，企圖迅速地建立一個世界帝國——這是一切帝國主義者的目標。別人都失敗了，華爾街就能達到這個目標嗎？列寧曾抨擊“超帝國主義”的理論——即以一個把所有金融資本統一起來的集團，來控制全世界的理論。他證明帝國主義的矛盾和戰爭、以及人民的反帝鬥爭，將在任何個別國家或集團獲得世界霸權之前，早就把這個制度打得粉碎。他的分析在今天看來，更是千真萬確。

在第十章已經說過，追求實現美利堅世界帝國使美帝國主義本身愈益孤立，孤立到使它不能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但光是這種形勢還不能保證和平。只要華爾街相信，它還能依靠住在美國的，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的人民的時分，它就可能把那百分之七的人民投入絕路，向世界其他的人民宣戰。

爲了實現這個政策，杜魯門總統就更急切地壓迫拉丁美洲、非洲、歐洲和亞洲的資本主義國家，使它們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成爲五角大樓戰爭機器的附屬品。杜魯門封鎖了中國領土台灣，並企圖組織一個太平洋公約以進行反對亞洲人民的全面戰爭。他殘酷地企圖把西德變爲一個帝國主義的前哨——進攻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的兵營。他堅決地企圖阻止跟蘇聯和中國舉行認真的談判，儘管全世界都在普遍要求這種談判。他公開恐嚇聯合

國——如果不能成爲侵略的工具，就得垮台。

在美國國內，杜魯門使人民忍受不斷增漲的苛捐重稅，把他們的美金一元票下跌成“杜魯門的二角五分”，用“穩定幣值”的戲法來凍結他們的收入，強把“大砲代替牛油”的政策加在人民頭上。

目前世界所面臨的最有決定性的問題，就是一億五千萬美國人民的態度和行動。擁護戰爭的報業和廣播業壟斷資本，還沒有能使美國人民順從杜魯門的計劃。

右翼工會領袖背叛了羅斯福“新政”時期的目標。他們讓華格納法案遭受破壞，並容許削弱工人戰鬥力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案來蒙混工人。雖然有這些叛變的領袖，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五年中，罷工人數却比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個五年更多，工人鬥爭的浪潮在整個一九五〇年間繼續不衰。通過一個塔夫脫—哈特萊法案以圖破壞工會是一回事，而把它實施却是另一回事。工會官僚不顧高漲的物價與捐稅而簽訂許可凍結工資及無限制的趕快制度的協議是一回事，而工會會員是否接受那些協議却又是另一回事。

對付黑種人的恐怖行動增加了。但雖然如此，每年有更多的黑種人突破南方各州的法律，贏得選舉權，越來越多的歧視黑種人的壁壘在倒塌中，對法律允許的私刑的反抗更英勇了。非常果敢的黑種人民，受了亞洲民族反對殖民制度的鬥爭的激勵，奮起向美國的民族壓迫作全力的鬥爭。美國最進步的力量，黑種人和白種人一起，給予這種鬥爭以更有力的援助，在團結白種和黑種勞動人民上獲得了新進展。

法西斯主義者對爭取美國人民的權利和爭取和平的最進步的戰士加緊打擊。國會制訂了二十世紀的外僑法與危害治安法。

但是制訂這些法律是一回事，要破壞美國人民的民主傳統是另一回事。工會主義者、黑種人民、人民的羣衆組織、幾乎全體真正傑出的知識分子，一致參加反對麥卡倫法案及其代表的一切的鬥爭。

在第六章中曾說明，杜魯門總統爲了要取得一九四八年的競選勝利，曾怎樣利用美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與對蘇友好關係的願望。兩年來肆無忌憚的反蘇宣傳還沒有把人民欺騙得足以打消這些願望，雖然他們的意志表示被壓制了。朝鮮的軍事冒險使這些潛伏的感情表面化了。廣播電台的民意測驗、人民寫給報紙和官員的信，明白表示出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民是要求和平的。甚至在狂妄的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了顧慮與裂痕，胡佛和塔夫脫大肆煽動，企圖誘騙愛好和平的人民接受一個“修正的”帝國主義計劃就是這種顧慮與裂痕的證明。

拯救我們國家的，既不是杜魯門，也不是胡佛，而只能是一個偉大而有代表性的和平動員。世界大戰是可以防止的，只要集中人民的力量來衛護和擴大美國人民的權利；反對美帝國主義在那些人民正在爲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而努力的各國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企圖；反對華爾街在那些人民正在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殖民地維持殖民制度的企圖；擁護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制度和和平共處的原則。

帝國主義體系的崩潰，新的世界帝國迷夢的破滅，正在發展而是不能制止的。美國人民依靠自己的行動，能夠加速和保證民主與愛好和平的力量在克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威脅的鬥爭中贏得最後的勝利。

簡 註

第一章

1.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5頁至996頁。
2. 美國全國資源委員會：“美國經濟的結構”，第1卷，1939年華盛頓版，第317頁。
3. “美國五金市場組織”：“1942年的五金統計”，1942年紐約版，第41頁。
4. 霍柏森(J. A. Hobson)：“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 1938年倫敦版，第77頁至78頁。
5. 霍威(Quincy Howe)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界歷史”(A World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一書第128—129頁曾加引用，該書1949年在紐約出版。
6. 布特勒(Smedley D. Butler)：“常識”(Common Sense), 1935年11月版。
7.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6頁。
8. 阿普塞克(Herbert Aptheker)在“猶太人的生活”(Jewish Life)一書中曾加引用，該書1950年7月在紐約出版。
9. 謝爾茲(Art Shields)著文，載1950年7月25日紐約“工人日報”。
10. 佛布斯(W. Cameron Forbes)：“菲律賓羣島”，第1卷，1928年波士頓版，第23頁。
11. 海登(John R. Hayden)：“菲律賓民族發展研究”(The Philippines, 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1942年紐約版，第486頁。
12. 同上，第604頁。
13. 同註10，第285頁至287頁。
14. 同上，第13頁。
15. 同上，第9頁。
16. 朱納(Daniel Thorner)：“南亞經濟發展的前途”，載“外交政策報道”雜誌1950年4月15日。
17. 海登：“美國對菲律賓的政策”(The Philippine Policy of United States), 1939年紐約版，第22頁。
18. 詹金斯(Shirley Jenkins)：“美國對菲律賓的經濟政策”(United State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the Philippines), 1947年紐約版，第22頁。
19. “生活”雜誌，1950年4月15日紐約版。

20. 穆恩 (Parker T. Moon): “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1926 年紐約版, 第 429 頁。
21. 英國鋼鐵聯合會: “1947 年統計年鑑”, 第 2 卷, 第 334 頁至 337 頁。
22. 同上。
23. 同上。
24. 美國鋼鐵研究所: “1949 年統計報告”, 第 100 頁至 101 頁。
25. “聯邦儲備銀行公報”, 1950 年 3 月在華盛頓發表, 第 273 頁, 386 頁。
26. 根據瓦爾加和孟德森 (E. Varga and L. Mendelsohn) 所著“關於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新論證” (New Data for Lenin's Imperialism), 1940 年紐約版, 第 140 頁; 路易士 (Cleona Lewis): “美國與國外投資問題”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Problems), 1948 年華盛頓版; 以及英美其他出版物。
27. 材料來源: (1) 同註 21; (2) 同註 24, 第 97 頁至 99 頁, 100 頁至 101 頁; (3) “聯合國統計月報”; (4) 馬林科夫 1950 年 3 月 9 日在莫斯科選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5) 古列維奇和巴迪格爾 (S. Gurevich and S. Partigul) 合著“蘇聯經濟的新高漲” (The New Economic Upswing of the U.S.S.R.), 1950 年莫斯科版。
28. 同註 21。
29. 馬林科夫 1950 年 3 月 9 日在莫斯科選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30. 波蘭新聞研究處: “通訊”, 1950 年夏紐約版。
31. 同註 27。

第二章

1. 美國財政部: “美國在國外的資產調查”, 1947 年版, 第 29 頁。
2. 美國商務部: “現代商業調查”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49 年 11 月號, 第 20 頁。
3. 材料來源: (1)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1949 年年度報告”, 第 20 頁至 21 頁; (2) “聯合國 1948 年統計年鑑”, 第一表; (3) “美國統計摘要”, 1949 年, 第 31 頁, 第 41 表。
4. 美國關稅委員會: “工業中的戰時變化”叢書的第 17 種“石油”, 1946 年版。
5. “石油與煤氣雜誌”, 1949 年 12 月 22 日紐約版, 第 170 頁。
6. “穆地氏工業報”, 1948 年 10 月 20 日紐約版, 第 2407 頁。
7. 1950 年 5 月 8 日倫敦“標準晚報”。
8. “聯邦貿易委員會關於鋼業工業的報告”, 1947 年, 第 174 頁。
9. 美國商務部: “對外商業周報”, 1950 年 6 月 12 日, 第 4 頁。
10. 聯合果品公司 1948 年年度報告。

11. 1950年3月26日“紐約時報”。
12. 同註10。
13. 通用電氣公司：“世界貿易中的通用電氣公司”，1948年10月25日。
14. 非利浦·李德(Philip Reed) 1949年12月14日在華盛頓經濟報告聯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作證詞。
15. 斯塔金與華特金斯(Stocking and Watkins)合著“卡特爾在行動中”(Cartels in Action), 1946年紐約版, 第227頁。
16. 歐文·海克斯納(Ervin Hexner): “國際卡特爾”(International Cartels), 1945年北卡羅來納州沙浦山(Chapel Hill)版。
17. 理查·沙蘇里(Richard Sasuly): “法本化學工業公司”, 1947年紐約版, 第133頁。
18. “穆地氏工業報”, 1950年, 第1963頁。
19. 美國控訴“聯合工程鑄造公司”案, 屬民事8926號, 見賓夕法尼亞州西區美國區法院1950年6月26日歸檔的起訴書。
20. “聯邦貿易委員會關於國際電氣器材卡特爾的報告”, 1948年版。
21. 紐約花旗銀行1947至1949年的年度報告。
22. 大通銀行1948年年度報告。
23. 美國商務部: “1946年至1948年美國國際收支”, 第162頁至165頁。
24. 材料來源: (1)同上; (2)“現代商業調查”, 1949年11月號, 第21頁第4表。
25. 聯合國: “1949年歐洲經濟調查報告”, 1950年在日內瓦發表, 第131頁, 第7表。
26. 材料來源: (1)“對外商業周報”, 1950年3月6日; (2)聯合國: “國際貿易方向(1950年1月至3月)”; (3)聯合國: “1949年亞洲及遠東經濟調查報告”。

第三章

1. “現代商業調查”, 1949年11月號, 第20頁, 第1表。
2. 杜魯門1949年1月20日就職演說。
3. “現代商業調查”, 1950年6月號, 第15頁, 第1B表。
4. “1946至1948年國際收支”, 第89頁, 第21表。
5. 同上, 第98頁。
6. 同上, 第97頁。
7. 同上, 第89頁、98頁, 第21表、23表; 又見前引“現代商業調查”。
8. 1949年5月11日紐約“商業日報”。
9. 1950年3月18日“紐約時報”; “對外商業周報”, 1950年5月6日。
10. 見前引“現代商業調查”。

11. 聯合國：“落後國家進出口貨物的相對價格”，1949年，第17頁。
12. 美國勞工：“1943年個別商品的批發價格”。
13. 美國商務部：“1948年對外貿易報告(外貿第410號)”。
14. 1948年1月14日“紐約時報”所載關於弗朗斯·麥克英梯爾(Francis McIntyre)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報道。
15. 材料來源：(1)美國商務部的對外貿易報告；(2)美國勞工部的批發價格報告；(3)美國1947年“製造業調查”。
16. “農產品生產成本與售價差額的利用”(Utilization of Farm Crops-Price Spreads)，第1145頁，見美國第81屆國會參議院農業與森林委員會聽證記錄，第1卷，第2部分，第1145頁。
17. “商業周刊”，紐約1950年7月15日出版，第12頁。
18. “1948年對外貿易報告(外貿第410號)”；“美國統計摘要”，1949年，第307頁，第343表。
19. 同上，第862頁，第968表。
20. 美國勞工部和泛美咖啡局的材料。
21. “農產品的利用”第1140頁至1141頁。
22. 巴西全國咖啡部：“咖啡經濟政策”，第21頁及“1943年的咖啡”；馬西洛·皮薩(Marcello Piza)：“巴西的生產成本”，載“美巴協會雜誌”，1940年8月號，第10頁至16頁。
23. 美國商務部：“1949年12月份對外貿易報告(外貿第930號)”。
24. “美國統計摘要”，1949年，第313頁，第350表。
25. 國際貨幣基金會：“1948年國際收支年鑑”，第272頁。
26. 智利開發公司：“智利的計劃與進展”，1946年法爾巴來索(Valparaiso)版。
27. “1938年—1946年—1947年國際收支年鑑”，第249頁。
28. 估計在全世界總的情況相同。
29. 據聯合國估計，拉丁美洲1948年的國民收入為175億美元(見1949年7月26日STAT/5新聞稿)，其中不到三分之二，即117億美元，代表商品生產。
30. 根據下列材料估計所得：(1)里查·比倫特(Richard F. Behrendt)：“美洲國家間經濟關係”(1948年出版)，第15頁；(2)1950年6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會新聞稿，第137號。
31. 穆尼茲(J. C. Muniz)在聯合國的發言：“1948年重要經濟變化的補充說明”，第48頁。
32. “1946年至1948年國際收支”，第93頁至95頁，第23表。
33. 根據以下材料：“智利開發公司”1946年出的“國民收入”(Renta Nacional)以及美國內政部1944年出版的“礦物年鑑”。

34. “幸福”雜誌,紐約1950年5月號,第149頁。
35. “美國聯邦主義者”,1950年2月華盛頓版。
36. 根據以下材料:(1)“商業周刊”,1950年4月1日,第51頁;(2)1950年4月3日“商業日報”;(3)“現代商業調查”,1950年2月號;(4)美國勞工部:“就業與薪金名單”,1949年12月。
37. “幸福”雜誌,1950年2月號,第168頁。
38. 聯合國:“1948年亞洲及遠東經濟調查報告”,第116頁至117頁。
39. 同註35。
40. 委內瑞拉大使館:“今日委內瑞拉”,1950年3月華盛頓版。
41. “幸福”雜誌,1950年2月號,第83頁。
42. 同註33前一部分。
43. 同上。
44. 同註32後一部分。
45. 聯合國:“非自治的領土”,1950年版,第2卷。
46. 美國公用事業工人聯合會:“危雷運河區美國職工的反黑人種族歧視”,紐約版,第124號小冊子。
47. “1951年財政年度美國預算”,第688頁至690頁。

第四章

1. 同第一章註8。
2. 根納·米達爾(Gunnar Myrdal)等著“美國的一個難題”(An American Dilemma),第1卷,1944年紐約版,第280頁。
3. 哈利·海伍德(Harry Haywood):“黑人的解放”,1948年紐約版,第58頁。
4. 同註1。
5. 美國商務部 P 60 號報告——“1947年美國家庭及個人的收入”,第29頁,第22表。
6. 美國商務部 P 46 號報告第5號——“1946年的教育標準與工資或薪金收入”,第8頁,第5表。
7. 同註2,第2卷,第1079頁。
8. 羅伯特·魏弗爾(Robert C. Weaver):“黑人勞工——一個全國性的問題”(Negro Labor—A National Problem),1946年紐約版,第8頁。
9. 英美生產力理事會:“鑄鋼”,1949年在倫敦發表。
10. “美國統計摘要”,1949年,第199頁,第217表。
11. “1947年美國家庭及個人的收入”,第16頁,第2表。
12. 材料來源:(1)美國商務部:“勞動力年度報告”,1948年,第15表;(2)美國勞工

部美國職業介紹事務局：“1949年4月美國勞動力中少數民族的地位和特徵”，第4頁，第4表。

13. 同上，見附表。
14. 1950年2月15日“紐約時報”。
15. 尤琴·但尼斯(Eugene Dennis)：“他們無法監禁的思想”(Ideas They Cannot Jail)，第13頁、19頁及34頁。

第五章

1. 喬治·威特(George Wythe)：“拉丁美洲的工業”(Industry in Latin America)，1945年紐約版，第4頁。
2. 同上，第16頁。
3. 材料來源：(1)“聯合國1948年統計年鑑”；(2)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1947年糧食與農業統計年鑑”。
4. 美國國務院：“巴西—美國技術聯合委員會1949年報告書”(阿冰克報告)，第6頁，第2表。
5. 同上，第75頁。
6. 1950年3月30日“紐約時報”所載蘇茲伯格(C. L. Sulzberger)的文章。
7. “聯合國1949年12月統計月報”，第1頁。
8. 1947年2月2日“紐約時報”所載米爾登·布萊克(Milton Bracker)的文章。
9. 1949年6月6日“對外商業周報”所載戈登和楊格(N. D. Golden and E. H. Young)的文章。
10. 傑弗科特(A. E. Jeffcoat)著文，載1950年5月23日紐約“華爾街日報”。
11. 倫敦“經濟學家”周刊，1950年1月7日，第27頁至28頁。
12. 詹姆斯·馬丁(James Stewart Martin)在美國眾議院壟斷勢力研究委員會上的發言。
13. “1950年援外撥款法案”，見美國第80屆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記錄，第1卷，第27頁。
14. 喬治·哈金(George Hakim)1950年4月14日在費城的演講。
15. 1949年12月1日“外交政策報告”中奧里弗·霍姆斯(Olive Holmes)著“在拉丁美洲陸軍的挑戰”。
16. 1950年3月13日“紐約時報”。
17. 華盛頓“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1950年3月17日。
18. 根據1947年對外貿易報告F T第410及420號。
19. 同上。
20. 1950年3月13日“紐約時報”。

21. 1947年10月聯合國發表的“幾個特定國家的經濟發展”，第111頁至112頁；1950年6月23日“紐約時報”所載米爾登·布萊克的文章。
22. 勞倫斯·德根(Laurence Duggan)，“美洲”，紐約版，第150頁；前引威特書。
23. 阿冰克報告(Abbink Report)，第95頁。
24. 同上，第11頁、20頁。
25. 聯合國：“1948年重大經濟變化補充說明”，第13頁。
26. 聯合國：“1948年亞洲及遠東經濟調查報告”，第68頁、83頁。
27. 1950年1月4日“紐約時報”所載蘇茲柏格的文章。
28. “幸福”雜誌，1950年2月號，第89頁至90頁曾加引用。
29. 柏萊爾·鮑勒斯(Blair Bolles)，“威爾斯剪影”，載於1939年12月份“斯克里伯納評論”(Scribner's Commentator)。

第六章

1. 喬丹(Virgil Jordan)1940年12月10日在紐約“投資銀行家協會”的演講。
2. 同上。
3. 利比(J. Fred Rippy)1948年4月在芝加哥“商業雜誌”上的文章。
4. 前引勞倫斯·德根書，第85頁。
5. 1949年12月出版的紐約“政治科學季刊”所載利比的文章。
6. “1938年、1946年、1947年國際收支年鑑”，第101頁。
7. 1949年4月11日“對外商業周報”所載威特的文章，第42頁。
8. 1946年12月2日“華盛頓郵報”引述議員艾沙克(Ed. V. Izac)之語。
9. 約納桑·但尼爾士(Jonathan Daniels)，“獨立的人”(The Man of Independence)，1950年紐約版，第266頁。
10. 1949年1月6日杜魯門的國情咨文。
11. 1949年1月20日杜魯門的就職演說。
12.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的國情咨文。
13. 惠爾滋1946年11月12日在對外貿易全國會議上的演講。
14. 同上。
15. 同註1。
16. 同上。
17. 同註13。
18. 同註1。
19. 同註13。
20. 同上。

21. 根據標準指南。
22. 1948年10月25日杜魯門在芝加哥所發表的競選演說。

第七章

1. 前引列寧書,第997頁至998頁。
2. 1950年4月29日“經濟學家”周刊。
3. 美國商務部:“1949年聯合王國的電影工業”,載於“世界商品貿易”第8卷,第4部,第14冊。
4. 紐約“美國雜誌”1949年11月號所載加斯基爾文:“我們馬歇爾計劃的叫賣人”,該文又為經濟合作署所轉載。
5. 霍華德·史密斯(Howard K. Smith):“歐洲現狀”(The State of Europe),1949年紐約版,第207頁。
6. 同註4。
7. 同上。
8. 1950年10月3日及6日“紐約時報”。
9. 1950年9月17日及10月8日“紐約時報”。
10. 1950年4月23日“紐約時報”。
11. 杜勒斯:“戰爭或和平”,1950年紐約版,第215頁。
12. 同上,第218頁。
13. 同上,第222頁。
14. “幸福”雜誌1949年2月號所載艾立克·詹斯登(Eric Johnston)的文章,見該刊第120頁。
15. 聯合國:1950年在日內瓦出版的“1949年歐洲經濟調查”,第125頁。

第八章

1. 經濟合作署:“獨顧問委員會的第18次報告”,1949年12月發表。
2. “1950年援外撥款法案”,見國會聽證記錄第914頁至915頁。
3. 1948年對外貿易報告“外貿第410號”;“美國統計摘要”,1949年,第999頁、1000頁。
4. 1950年1月31日“商業日報”來自羅馬的電訊。
5. “1950年援外撥款法案”,第58頁至59頁。
6. 同上,第308頁。
7. 德國市政府辦公處(美國方面):“軍事總督報告書”,1949年8—9月於柏林,第124頁。
8. 同第7章註14。

9. 經濟合作署：“國家研究——法國”，1949年2月版，第11頁。
10.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1950年3月31日。
11. 1950年5月25日“紐約時報”。
12. 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總報告”，1949年9月巴黎版，第1卷(美國國務院出版物中書目號碼為2930)，第114頁。
13. 經濟合作署：“付款貨運”(Paid Shipments)，1949年6月30日發表，第9頁。
14. 經濟合作署：“對顧問委員會的第20次報告”，1950年2月發表，第5頁；“聯合國統計月報”，1950年4月號。
15. “聯合國統計月報”，1950年4月號，第9表。
16. 紐約安沙新聞通訊社(Ansa News Agency, Inc.)1950年5月14日通訊稿。
17. 1949年12月9日“紐約時報”所載美國國務院公告。
18. 聯合國：“1948年歐洲經濟調查報告”，1949年在日內瓦發表，第164頁。
19. 1949年3月11日“紐約時報”。
20. 歐洲復興計劃組織：“國家研究”，第5章——“法國”，第22頁、63頁，美國國務院未詳明日期(大約在1947年底)的通報。
21. 1949年4月4日“商業日報”。
22. “經濟學家”周刊，1950年4月8日，第782頁。
23. 聯合國：“1948年歐洲經濟調查報告”，第98頁。
24. 材料來源：(1)同上；(2)“經濟學家”記錄與統計附冊，1950年4月1日，第299頁。
25. 聯合國：“1949年歐洲經濟調查報告”，第118頁。
26. 材料來源：(1)1947年8月15日“紐約時報”；(2)紐約“世界石油”各期；(3)1947年8月24日國務院公報。
27. 摩里斯·費爾曼(Feldman)著文，載1947年11月2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28. 經濟合作署新聞稿第1338號(1950年4月5日)及第1462號(1950年5月11日)。
29. 同上，第1462號。
30. 經濟合作署：“對顧問委員會的第22次報告”，1950年4月26日發表，第62頁至67頁；經濟合作署新聞稿第1584號。
31. “現代商業調查”，1950年6月號，第14頁。
32. 同上，1951年1月號，第22頁至23頁，第4表及第5表。
33. 崔夫曼著文，載1950年4月2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34. 同註30前一部分，第60頁。
35. 同上，第62頁至67頁。
36. “商業周刊”，1950年5月20日。

37. 美佔區德國軍政府辦公處：“軍事總督報告書”，統計材料部分，1949年7月，第160頁，第462表。
38. 同上，第154頁，第450表。

第九章

1. “國會記錄”，1950年6月28日於華盛頓。
2. 同上。
3. 英國1950年2月13日的備忘錄——“英鎊石油與金元石油問題”。
4. 經濟合作署：“致國會第一次報告”，附錄，第178頁至179頁。
5. 1947年3月7日“紐約時報”。
6. “國防計劃調查報告”，見第80屆國會參議院特別委員會聽證記錄，1948年，第41卷，第25290頁。
7. 希臘臨時民主政府：“第二藍皮書”，1949年，第23頁。
8. “商業周刊”，1950年7月29日。
9. 1948年10月9日“每日新聞”(Kathimerini)，“第二藍皮書”轉載，第38頁。
10. “現代商業調查”，1949年3月號，第20頁及1950年4月號，第20頁。
11. 1950年5月4日“紐約時報”。
12. “國防計劃調查報告”，“海軍收儲中東石油報告”，第80屆國會參議院報告(II)第440號，第5卷，第11頁至13頁。
13. 同上。
14. 1950年1月3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15. 材料來源：(1)“對外商業週報”，1950年3月6日；(2)“1948年歐洲經濟調查報告”，附表；(3)“聯合國1948年統計年鑑”，第132表。
16. 1949年7月9日倫敦“金融時報”。
17. 經濟合作署：“關於復興進展與美國援助的報告”，1949年2月，第231頁。
18. 1949年11月30日“商業日報”。
19. “皇家殖民主義者”(Crown Colonist)，1950年4月號，引自開普敦出版的“新非洲”雜誌，1950年5—6月號。
20. 此處及其後有關美國在非洲的新投資的材料均來自“新非洲”雜誌及1950年4月1日開普敦的“自由”報所載傑克·塔西(Jack Tarshish)的文章。
21. 1950年4月2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22. 1950年4月27日“紐約時報”。
23. 1950年8月10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24. “新非洲”雜誌，1950年5—6月號。
25. 亞爾法士·亨頓(Alpheus Hunton)著文，載紐約“羣衆與主流”雜誌，1949年

1 月號。

26. “經濟學家”周刊, 1950 年 4 月 1 日。
27. 美國國務院, “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 1949 年, 第 16 頁。
28. 同上, 第 14 頁。
29. “商業周刊”, 1950 年 7 月 15 日。
30. 1950 年 10 月 6 日孟買“民族旗幟報”。
31. 馬格里特·希根斯(Marguerite Higgins)著文, 載 1950 年 6 月 5 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32. 1950 年 8 月 12 日馬立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加引用。
33. 1950 年 7 月 20 日“紐約時報”會加引用。
34. 1951 年 7 月 21 日“紐約先驅論壇報”會加引用。

第十章

1. 材料來源: (1)美國商務部, “1789 年至 1945 年美國歷史統計”, 第 299 頁至 300 頁; (2)1950--1952 財政年度“美國預算”。
2. 1947 年 6 月 25 日“紐約時報”。
3. 1947 年 6 月 24 日“紐約時報”。
4. 同上。
5. 1950 年 6 月與 7 月對外貿易報告(外貿第 950 號)。
6. 國際聯盟, “武器軍火貿易統計年鑑”, 1937 年日大瓦版, 第 205 頁。
7. 1949 年 3 月 12 日“紐約時報”。
8. 1949 年 4 月 28 日“紐約時報”。
9. 1949 年 7 月 26 日“紐約時報”。
10. 根據“1949 年歐洲經濟調查報告”及 1950 年 3 月 20 日“商業日報”所包括的材料。
11. “商業周刊”, 1950 年 4 月 8 日。
12. 1950 年 4 月 22 日“紐約時報”。
13. 1950 年 4 月 10 日“紐約時報”。
14. 1950 年 8 月 4 日“紐約時報”。
15. “1950 年撥外撥款法案”, 第 33 頁。
16. 密德爾頓(Drew Middleton)著文, 載 1950 年 12 月 13 日及 29 日“紐約時報”。
17. 艾奇遜 1950 年 4 月 22 日的演說。
18. 1950 年 6 月 16 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19. 1950 年 5 月 20 日在新奧爾良城軍隊日宴會上的演說。
20. “商業周刊”, 1950 年 4 月 8 日。

21. 1950年5月29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22. 1950年8月26日“紐約時報”。
23. 1950年8月23日“紐約時報”。
24. 1950年5月18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25. 1950年4月23日“紐約時報”。
26. “國防計劃——統一與戰略”，見第81屆國會衆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聽證記錄，1949年10月1日，第186頁。
27.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1951年紐約版，第499頁。
28. 1950年11月15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29. “經濟學家”周刊，1950年12月9日，第994頁。

第十一章

1. 海勒爾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編：“一個工薪勞動者的家庭預算”(Budget for the Family of a Wage Earner)，每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柏克萊出版；伊麗莎白·勞遜(Elizabeth Lawson)著“美國的生活程度”(The American Standard of Living)(1949年紐約出版)曾加分析。
2. “美國統計摘要”，1949年，第927頁，第1022表。
3. (1)同上，第927頁，第1021表；(2)保羅·道格拉斯所作“1890年至1926年美國的實際工資”(Real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26)，第246頁，第88表。
4. 霍夫曼於1947年10月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座談會上的演說詞。
5. 菲立浦·莫萊在1950年5月對服裝工人聯合會的演說詞。
6. 杜魯門在1950年6月6日對華盛頓商業改進局的演說詞。
7. 材料來源：(1)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手冊”(Hand Book of Statistics)，1947年，第5頁，A表；(2)經濟顧問委員會：“經濟指標”(Economic Indicator)，1950年6月，第8頁；(3)“總統經濟報告”，1950年1月，第157頁，C-9表。
8. “聯邦儲備銀行公報”，1950年5月，第580頁。
9. “現代商業調查”，1949年10月號，第8頁，第1表。
10. “1946年至1948年國際收支”，第27頁，第8表。
11. 材料來源：(1)“1946年至1948年國際收支”；(2)“現代商業調查”，1950年6月、7月號；(3)“國民收入增刊”，1947年6月。
12.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1950年5月26日。
13. 1950年5月14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14. 1948年12月23日“紐約時報”。
15. “總統經濟報告”，1951年1月，第202頁，A-32表。

16. 1950年6月25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17. 1950年3月22日在紐約出口經理人聯歡會上的演講。
18. 美國電氣、無線電與機械工人聯合會：“雷明頓—蘭德公司失業報告”，1949年紐約發表。
19. 從1950年8月“聯邦儲備銀行公報”第953頁第4表算出來的。
20. 1950年4月23日“紐約時報”。
21. “列寧選集”，第11卷，1943年紐約版，第752及758頁。
22. 美國商會：“勞工運動中的共產黨人”，1947年華盛頓版。
23. “國防計劃——統一與戰略”，第566頁。
24. 朱爾根·古欽斯基(Jurgen Kuczynski)：“德國——法西斯主義下的經濟與勞工情況”(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1945年紐約版，第207頁。
25.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 Third World War)。
26. 1950年10月12日“紐約時報”。